中国底层

访谈录

下　篇

廖亦武　著

目　录

非如此不可

——关于《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对话

卢跃刚

前几年，托马斯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时候，他想着对特·丽莎的爱，默默对自己说："非如此不可。"一过边境，他却开始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后来，他躺在特·丽莎身边，回想起七年前发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把他引向了她，现在又把他带回了一个不可冲破的牢笼。这意味着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吗？——【捷克】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这天阳光明媚，一个"新闻事件的目击者"与一个"社会底层的见证人"相遇了，他们的相遇具有某种戏剧性的巧合，因为他们的相遇已经间隔了 15 年，这 15 年已经使当年的先锋诗人或者先锋小说家，变成了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阐释的稀有的另类。

我们都生于 1958 年

卢跃刚：如果这次见面提前到 1985 年，那该多有意思！那时你是有名的先锋诗人，而我写小说，并且都是丁玲主编的《中国》的作者。

老威：我们都生于 1958 年。还有吴滨、邹进、周忠陵、王朔，都属狗，狂吠着文学梦，非常青春，可惜，眨眼功夫大家都 40 出头了。

卢跃刚：你现在还写诗吗？

老威：这是个没有诗意的商业炒作的时代，如果还坚持写诗的话，我就成了卑鄙小人。1990 年初的一次突然的转折，我被抛出文学界，经历了漫长的苦熬，脱胎换骨，与文坛彻底没关系了。我的《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写作其实就是一个诗人的角色被抹掉之后的产物，我熬了十年，变成今天这样一个"记录者"。

卢跃刚：你的"底层访谈"我两年前就看过一些，当时感到诧

异，在我的印象中，诗人是相当主观和自恋的，很难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有的评论家称你的这种写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可我觉得有炒作之嫌，就在《北京青年报》上，就新闻采访的“原生态”向你提出质疑，如果这部书不从新闻学角度而从文学角度来定位，我认为它的内在解释的空间与张力就大得多。

老威：这个意见你通过朋友也给我转达了。说实话，它很难操作。你知道劳动人民的语言是非常松散的，他们没有经过语言训练。你做采访是带着新闻记者的身份下去，谈的话题相当集中，比如说调查案件，你促使对方围绕案件来谈，对方也知道谈什么事。但是，这套记者方式对我不适用。特别是你作为中央大报的记者，一旦切入武芳被毁容一类的冤案，就带有伸张正义的道德色彩……

卢跃刚：不是这样，我只是觉得如果每个人面对社会邪恶都无动于衷的话，同样的事情说不定哪天会突然落到你我的头上。

无权势者无历史

老威：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种力量。像我，没工作，没角色，曾经混迹于底层，靠吹箫维持起码的生计。我与人交往，不能带笔和录音机，一旦动了采访的念头，或许就啥也得不到。人的本能都想展示成功和辉煌的一面，我唾弃这种可怜的成功与辉煌，我往往是一次又一次地与底层的人交谈，更多的时候是听他们倾诉，过程太漫长了。或许一次长达几个小时的谈话，能让你脑门一震的，有时候就是那么一句话，或者一个细节。我曾与遗体整容师谈过八次，你相信不？我还为他吹过箫。我就是个会吹箫的无用的混混，但是能为与死尸打交道的人吹一曲我很荣幸。人是渴望倾诉的，但因其角色的卑微，没人肯听肯相信他的倾诉。久而久之，没人肯倾诉，大家都学一些政客、明星、商人，戴着假面具过日子，到最后连说出内心真实的欲望也没有了，或者已经忘了自己还有内心。无权势者无历史，武芳如果不被毁容，如果不被披露出来，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她人性的另一面。在我看来，你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哪怕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吧。而我呢，八十年代主动选择过，比如做精英倾向强烈的诗人，但后来，却不得不沦入被埋没的无声的历史中。

我知道失去言说权利是个什么滋味。嘴长来干啥？难道只为了吃饭、喝水？

卢跃刚：我是八十年代中期进入新闻界的，以前迷文学很深。文学这套观察的方法我觉得毫无疑问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事情，不论是体验、写作都是个性化的。我认为八十年代整个的情况是启蒙和精英写作。我们都知道精英写作有一种使命感，当然这与我们自身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这代人，一旦进入社会，是有特殊价值的。因为在一个总体的历史感下就是记忆，记忆要显现、要恢复、要复原，就是说它的文献性超过它的文体本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就是记录历史，记录我们正在发生的历史。如果有的东西不去记录，很快就会消失。这些东西是很有价值的，哪怕一句话、一个眼神。另外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还有社会的背景。你刚才谈到的写作方式使我为之心震，也许，你不单是记录事件，更是记录人的灵魂，或许是卑下的、残忍的、赤裸的、虚伪的，但的确是构成这个社会历史根基的活的灵魂。如何保持文本以后的价值？这是你的问题，也是我自己 10 多年一直在想的问题。这个问题严格来讲与我们的记者行为是不相干的，我对很多事件调查的方法也不完全是新闻的方法。

见证性永远超过文学性

老威：无论怎样，你是一种主动的重新的选择，我们以前都搞文学写作，而在选择过程中的差别又如此大。像欧阳江河、王家新、于坚他们基本上延续了八十年代的那种状况，如何通过哪个渠道出国，或争取更大的文化上的名声，都有了驾轻就熟的路数。人到中年有一种理性的操作在里面，包括写小说的余华、莫言、李锐等人，当他们面对世界发言时，这种操作的成分是非常明显的。可在我这里，我觉得还是一种被动，我八十年代有很大的文学野心，诗也写得无限度的长，意义非常复杂，这是一种自我选择。当一个人突然面对一个事件，觉得心灵上过不去，结果啪的一下被摔下来，这以后文化环境全变了。社会太冷漠、太势利，除了上面谈到的操作层面上的诗人、作家外，剩下的朋友现在基本上都在做书商，多出几

趟国，多出一些书。过去有追求的这帮人的确是跌下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比如《中国可以说不》的书商兼作者张小波，他在八十年代就是一天到晚琢磨如何发表诗，这个人如今却能把这本书操作出来，还操作得特别成功，当很多学者去反驳他时，这个人暗中笑得很欢。因为其代表中国说不可以赚票子啊！这帮人玩技巧可以玩到这种程度，的确叫人心里发冷。莽汉主义的万夏，一套《黑镜头》，赚了近千万；还有×××，当时做《魂断激流岛》，一次性 5 万元买断了某个当事人的全部资料。包括通信、照片、日记、甚至爱情的信物。他们现在就是这个状态。而我在 1994 年时，的确所有的生路都给堵死了，如果有那么一点出路，我也不会选择沦落江湖。除了周忠陵我没有任何一个朋友，要重新混入文坛是不可能的事，当时也有很多故交在编辑部，但很少有人发表我的东西，带出国的手稿都杳无音信，听说发表了不少，结果至今我一分钱都没有得到。我整个人生存压力和精神压力都特别大，妻离子散，我觉得自己是个无能的人，只能呆在家里靠我父母。为了生存，我必须把原有身份扔掉，我是没有办法才选择这样的生活，在江湖上卖了一年多艺，我觉得卖艺非常好，我也看开了，原来我就是这么一个民间艺人的角色。偶尔碰见八十年代的诗歌老友，他们老是怀旧，回忆过去。钱多没用，青春买不回来。我做这种选择是非常被动的，后来读了一些哈维尔的东西，才隐隐感觉到自己付出的代价，它把我八十年代的文学观念翻了一个底朝天。我认为：见证性永远超过文学性，文学趣味会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境的改变而改变，文学性会消失。可当我们在回顾某一个时代的时候，它是永远存在的，这一点可以肯定。再过几十年，后人要研究我们这段历史，凭借什么？难道还是根据统一口径编纂的地方志？或者虚构出来的“××乡”之流的小说？不是，“文革”式的宏大历史观该结束了，我们该回到每个具体的生命中，回到真实的细胞、肌肉、血泪里。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历史，否则，我们永远走不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一套。“文革”浩劫十年，我们却出不了一部《古拉格群岛》，所接触到的“文革”回忆录，大多是上层斗争、派别之战，偶尔有名流落难的故事。我们已淡忘了“文革”中普通家庭的悲欢，忘记了一人配

给半斤肉、四两油的“幸福生活”。不管宏大历史的乌托邦是如何令如今的新新人类向往，但一个正常的人绝不希望因思想有问题而被批斗，因观点的不同而被打入牢房。当下的时髦青年对革命的理解往往是一部话剧《切·格瓦拉》，浑身鼓满注水肌肉，他们早忘记老红卫兵刘卫东如今已下岗了。

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

卢跃刚：你这类访谈一不易得到，二不易模仿，三就是它的表现，这是一种无限拉伸的过程。

老威：你的人生是主动的，也是让人钦佩的，实际上很多人没有这种身份和机会，他们的选择都不是主动的。比如刚才说到的那些人，很多还是想跳出商海，继续搞文学，文学的梦还是没有灭，只是书商开销很大，你想回去就变得越来越难，所以说生命中的被动选择是普遍的，主动选择的却非常稀少。

卢跃刚：听到这里我很辛酸，人的生存落差带来的无力和无奈，这是很难描述的。你是在一种被迫的状况下进入了一个底层群落，开始是无意识去做，以后慢慢发现有意思。哈维尔是一个作家创造出一种哲学典范，从而支持了一个国家，完成了天鹅绒革命。他的过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两者进行比较，你会发现西方的知识分子和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东欧和前苏联有一种宗教，它始终没有断过，无论是一个社会制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实际上这种信仰是没有间断过的，它的一整套或许不为当局所容，但是始终存在着，并且形成了某种文化上共识的、融入血液里的东西，它支撑着一切并对某种价值给予认定，他们有自己的逻辑。同样是处于这种状况，我们就会比较被动。实际上哈维尔他们是没有被压到最底层去，他还有一个群体，政治上无论处于一个怎样的景况，他始终有同志，这些同志中有政治家、艺术家，还有学者，他们始终保持着联系，并形成一种共识。当一个重大事件发生时，东欧、前苏联的知识分子与我们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智慧在于追求语言的闪烁不定，把某种东西作为人生哲学的标志，并把这种哲学灌输给你。总之，我觉得老威你不得已做了这样的选择是很悲哀的。

老威：我不悲哀，卖艺生涯使我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心态，荷马不也是唱诗卖艺的么？

心中有一个意念，看谁耐得久

卢跃刚：老威你被边缘化以后与过去的生活不相干，你进入了另一个群体。在这种情景下你的写作中的一种描述就是强迫从无意识进入，觉醒到一个东西的见证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好像与将来不相干，实际上是相干的。这个群体是不被重视的，是被抛弃的，虽然他们有自得其乐的一个生存的小环境，有非常狭隘的空间。这让我想起哈维尔，他影响了很多人，九十年代初在北京看到他的翻译手稿，对我震动很大，你会发现同样的生存处境为什么他会这样想问题，而这种想问题的方法是包容性的。这种东西看起来起点很低，但做到却非常的艰难，需要一大批人取得共识后才能获得那种社会效果。在成都生活是安逸的，那种绵绵的、稀松的、疲软的东西，成都人把追求这种东西作为一种价值，侃起来津津乐道，把无聊当有趣。灰蒙蒙的天空下，那些毫无表情的、忧郁的眼神，生活的精细，在我看来也是很虚假的。这种虚假年复一年，能泡烂人的骨头。

老威：茶馆、麻将、遛鸟这些方式，成都人可以玩得非常精细。这个城市有这样一个特点，高、中、低层次的人都可以找到他享乐的去处，这里有消费非常高的夜总会；也有中档的歌厅；也有低档的发廊和卡拉 OK，提供性服务，一般消费在 50 元，一个工薪阶层每个月可以去泡几次。还有更低的，九眼桥一带就有擦黄色皮鞋的，擦皮鞋的时候摸你的脚脖子与你谈生意，30 元钱勉强放一炮。我写的那个打工仔，他想发泄又没钱，就不断杀价，最后剁到 5 元钱就想放一炮。群众的腐化由此可见一斑。建筑民工每挪到一个地方就会带动那儿的繁荣，面摊呀，录像厅啦，1 元钱可以进大棚看几部录像，你要深入“敌后”，就得降低姿态。庸俗化的东西也可以成为一种深入人性的道具。开端后，可以一次次与他们交往。

卢跃刚：与人交往，然后将进入的意识呈现出来，后来这个观念越来越强，有的篇目能看出前期的意识明显不够，然后要成篇，

就会发现它的体系不对称，形成文本后，你要对这种不对称进行弥补，这种弥补的痕迹是有的。

老威：耍了一些手段，你要想办法让你的对象有一种陶醉感，实际上文人与这些人是一样的，他们或许在面子上否认自己的无耻，但他本质上是欣赏这种东西的。这一点非常可怕。我也知道我的弱点。在理性上我力图化解这种东西，但我的本能又会表露出来，你说的不对称我想是指这种东西，叫人不寒而栗。比如高洋说："良心和正义和道德当不了饭吃，但只要敢公开这样叫板，就可以当饭吃，当酒喝，当宝贝卖。"

卢跃刚：这种无底线才真正叫人绝望。老威，当初你对精英有过预期么？我有过，当时我的整个精神状态是比较低沉，现在看来，社会发展恰恰与我当时的预料是不一样的，我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会主动选择以新闻切入个案的方法？这与我当时的预料有一定的关系。

老威：改变我、选择我的主要是生存，我已经被挤压得不可能再干别的。像"遗体整容师"，尽心尽力将一个遭车祸的小女孩恢复原貌，他用爱去描绘，将她打扮得如花似玉，可两小时以后，这个艺术品就被焚尸炉吞噬了……我倾听着，复现着这一过程，自己也变了。有一点我觉得很欣慰：这部访谈录对那些最恶的人与事都保持着克制和怜悯，如果能给他们好一点的环境，如果每个人都有公平表达自己话语的机会，他们或许就不会这样。经历了这么多磨难，我还保持着一种健康的精神和身体，我每天晚上都要坚持长跑五公里。

卢跃刚：心中有一个意念，看谁耐得久。你访谈的每个人都事先不确定角色，而且有被你主观化的痕迹，不够真实。你的"底层"总让人觉得后面还有东西，如果有一套后续的大作品出来，我就觉得老威你没有辜负这些年的磨难。

老威：本名廖亦武，八十年代写诗，主要作品有《死城》、《黄城》、《幻城》等。九十年代退出文坛，浪迹江湖卖艺。主要著述有《中国底层访谈录》、《活下去》等。另出有音乐光碟《汉奴》、《叫

魂》。

卢跃刚：八十年代写小说，后转入《中国青年报》社。曾获“中国报告文学奖”，著有《大国寡民》、《创世纪荒诞》等多部作品。因追踪武芳被毁容案而成为中外瞩目的新闻人物。

《南方周末》2001 年 4 月 20 日

异端开辟野道

海因

冷面刺客老威

无可避免老威在写作《中国底层访谈录》时自己也在漂泊中，浮现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个影子与声音，在他亲历的时间、地点与人物的采访线索里，一个又一个被他叙述得充满愉悦快感。老威在开篇《采访古琴大师王峪》中颇让人玩味地说道文人嵇康，“他多想做一个刺客啊！”在漫长的漂泊中，老威是否试图做一个“向现代文明的弊病行刺”的冷面刺客呢？我是说老威以文字叙述的语调、节奏、铺陈以及尽量成为“对话”展开故事迷团的某种幻觉程度，“快感”是老威的调性，里面已不包含任何渲染恻悱和复杂的意绪，像禅说里言及的一道道“公案”，它的结果不会只在两极徘徊--是与非，对与错等等，蛇不会只呈现“善与恶的花园”里的那种轻浮的判断。故事与人物本身的错节纠缠，已经很难清理，这也不是老威的立场，一个个生命危机，一段段悲情故事，将繁复而震撼的人生，社会真相轻挑出一个口子，让我看到“撕给你看的价值”，痛却又是微不足道。老威在前言里提及自己的一场“凶恶的诗意”--曾经濒临疯掉的边缘--我从中觉察到一个从前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个人关注与写作之间产生的细微摩擦，其质询的况味在“漂泊里”缓慢蜕变的巨大而令人惊怵的内在张力，将他转化为一个“民间老威”的零度写作所竭力挥斥的但又挥之不去的“前度经验与审美气息”，“一旦不写字，就被社会遗弃得太快，像一截狗屎。”老威完成的蜕变，也许像他自己所言“心静自然凉”，而海子等人的自杀皆因“心太热”的缘故，自恋倾向也是一种热，焚烧的热。因此，老威在《中国底层访谈录》中试图冷漠，他的目光是冷的，表情是冷的，声音是冷的，体温也是冷的。在他的鹜视下，哪怕是坏蛋，如混混周二黄，主编多吉一类，也会“坏得透明”，在老威的形同审问的“逼供里”去进行“无耻的自白”。老威不可能遗忘早已在他身上积渐形成的东西，也不可能彻底脱胎换骨。他的“冷”，还有地方

仍在不为人知地恻隐着，节制但却分外灼痛。街头瞎子张无名的悲凉琴声，令他收住脚步驻足细听，即使老威发出“现在，我只能隔着岁月听了”这样深具诗意的感喟，也决不会让我异讶。我既目击了他卑微的一面，又承担了他傲慢的一面，在他克制着不动声色的抽茧剥丝中，我首先感受到他自己的颤簌--手、心、脑，还有灵魂。不强烈却足以让人体会到温暖。

是叙述者更是揭示者

他称这篇篇采访都是“治病”的，不讳言先治自己的病，治病求快。不自觉地，《中国底层访谈录》中的叙述上的张驰快感显而易见，连同选材方面也难以用“缺少廉耻”一言以蔽之。也因此剥夺了他对书中人物的怜悯与感情讹诈的任何迹象。而只显现了难以平静的哑默和低调的嘲讽意味。由于行文的低温状态，我触及到老威的冷冰冰的一瞥。在这不多见的一瞥中，既有对炎凉世态的疾走如风，又有痛陈人生的快刀一闪。这是他疾行的原因。漂泊是在命中神秘的、深藏着的首要冲动吗？老威赋予了他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以宽敞的遭遇方式。这种“宽敞”展现的道路以白的即景式，和相约已久的成熟的邂逅，其准备的深度与容量显然具有不同层次：猎奇与偷窥的隐秘地带与哀感顽艳的身世之感同样不可同日而语；个人命运与历史的交汇；沉沦与觉醒；弱小善民的哀愁与美丽和见证现实的悲与欣；冒险与失意；高雅与俗媚；昏暗的镜子与黑色的喜感……共同交织为广阔而活色生香的阅读背景。但我隐约可闻老威在语言的声音里溅起的轻谑与哂笑的烟尘。这个陈旧而又悲悯的旁观者形象，适时地将自己“出席”、“缺席”或“告退”于任何时空。只要他愿意，只要他需要，我毫不怀疑，他将会逾越时令、物候、法则、疆界，拜访任何人与事，这场《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向导，以他个人的意趣与向度向我们推荐一个个形色各异的漂泊者，我不敢确信老威是怀着象征性的企图来构造这本采访的，好在老威从不指望让我们一味伤逝，他是叙述者，更是提示者。置身于时代的喧嚣之中，与其说《中国底层访谈录》是部充满冷冰冰光芒与药草幽香的书，不如说它闪烁着“抑揄的智慧”的开示之作。我以为，

抑揄，是老威的一种最安妥的方式。对嘲讽而言，它显得宽厚而坚忍了许多，尤其采访对象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是他的故交；抑揄，含有善意与内敛的慈悲，又有敲击与俏皮的洒脱。如果说老威的《中国底层访谈录》是一条混杂着呻唤悲吟、高歌与呼啸的原声之河，其中不乏精神失乡者与肉体离所者，那么，《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叙述就是删去杂质，让人物尽可能保持原有质感与厚度，不漂亮却真真正正。让我的内心时时忘记自己处于阅读的身份，驻留那种人类难以名状的忧郁与哀伤。

65　三陪王小姐

采访缘起：据《华西都市报》载，四川广汉市税务部门正在酝酿向三陪小姐收税的方案，引起轩然大波，专家们各抒己见，见仁见智。三陪小姐在中国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只要给钱，让这些“特殊的商品”接受匿名采访容易，但要她们说实话却相当困难。1996 年 11 月 23 日深夜，在成都磨子桥的一家夜总会里，我有幸碰上讲究“职业道德”的王小姐，她乐于卖淫，欢迎国家收税，这同通俗电影、小说里逼良为娼的悲剧对照强烈。王小姐自称 19 岁，我姑且信之。这个行当忌讳真实年龄，令人想起欧美女性也有这种禁忌。

王小姐：先生点歌吗？

老威：不点。

王小姐：跳个舞？

老威：不会。

王小姐：划拳？

老威：我从不划拳。

王小姐：那，我们猜子玩？这很简单，有或无，单或双，输了罚酒。

老威：没兴趣。

王小姐：没兴趣？哪您上这儿来……哦，我明白了，您别急呀。

老威：我凭啥急？

王小姐：先生您别为难我好不好？社会上混的人，随和一点嘛。

老威：对不起，我真的不会玩。除了工作，我的嗜好就是聊天，朋友、陌生人，我能聊，可今天这场合，我还真有点紧张。

王小姐：嘻嘻，做什么都有个第一次嘛，多来多往就不紧张了。

老威：我先付您三百元钱，您陪我聊一会儿，如果话很投机，

有了感觉，下面的活儿就好做了。虽然您把肉体当生意，但我还是愿意把相互的好感放在第一位，这同自由市场买东西还是有区别。

王小姐：您可以按质论价嘛。

老威：什么意思？

王小姐：先生出手大方，莫不是喜欢上了我？

老威：睡一觉多少钱？

王小姐：过不过夜？

老威：过夜怎样？不过夜又怎样？

王小姐：不过夜我就马上把这房门反锁，您就将就着在这儿干了。我这是替您着想，免得另开房花冤枉钱，刚刚我悄悄捏了捏您的身子骨，松包肉太多，不是能一干到天亮的主儿。入洞放一炮，您得再加三百。放心，我服务周到，连裤带也替您解了，然后把全鸡全鸭端上来，弄得您的大头和小头都酥得化渣。

老威：我不想另花钱了。

王小姐：那我只好替您吹箫，出水算数。

老威：咱们到街上去逛逛吧，透透气，我请您吃宵夜。

王小姐：先生想到别处开房？我提醒先生，这一晌扫黄，公安和联防隔三差五地巡夜拉网查外来人口暂住证。您最好还是在酒店里开房，安全，房价最低可打到七折。经济不景气嘛，这条街的夜总会已垮掉三分之一。

老威：您是满脑子的生意经……今晚上我为了要您这个三陪小姐，包间费几百，酒水 200 多，出台费 100，小费 300，已花了差不多 1000 元了。

王小姐：您是大老板罗，一个人就占一个包间。如果您觉得亏，我就再叫一个姐妹，三人一块玩。在兴头上，随您心意付一点钱就成。报上经常强调职业道德，我们这行的职业道德就是满足客人的所有要求。先生，点歌是免费的，您真的一首也不唱吗？齐豫的《橄榄树》我挺喜欢，“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很适合我们风尘女子。

老威：我平生最恨卡拉 OK，日本人发明的后现代娱乐方式，把世界上所有的歌曲都搞成一种节奏，这样，蠢猪也能成为歌星。

王小姐：先生骂人？嘻嘻，太豪放了！您这样有英雄气概的老板适合清唱，我关掉伴奏，用鼻音给您伴奏吧？

老威：您这小姐这会儿才出来点情调，不过，比古代的青楼女子差远了。唐朝的诗人杜牧有诗云："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大意是官场失意的诗人整日醉醺醺的逛江南的窑子，遭遇的都是貌美、轻盈、能在手掌中起舞的女孩。这样一恍十年，就象做梦，这个辜负了无数红尘知己心意的著名嫖客也不知不觉地老了。开始回忆、感叹人生无常了。当然，您这样 20 来岁，忙于三陪的小姐不会去读唐诗宋词，但是，古装电视剧总看过吧？《水浒》里的京城名妓李师师，琴棋书画样样精，《桃花扇》里的李香君，吟诗作画都会。懂点知识，从良的机会也多些。

王小姐：先生是大白天说梦话……对不起，我的意思是莫把书里戏里的东西当真。您刚才说的古代小姐，恐怕连陈希同也没玩过。当然，大人物玩的档次的确比我们高些，但是高在哪儿？高在皮肉上，高在身段、奶子和脸蛋上。中国是个农民大国，中国有十五亿人口，那么多人要工作要吃饭，而您讲的书上的小姐好像都不吃饭，她们吟吟诗，弹弹琴就饱了。先生，我没有讽刺您的意思，您想，即使我又会诗又会画又会弹琴，也没有客人耐烦听，人家花了钱，人家要得到实惠，您不能用这些虚招应付。先生，您是个好人，就是书读得有点迂，我呢，也不是坏人，就是没读什么书，我们俩个加在一块就安逸了，既懂社会又有文化。

老威：您不问我是干啥的？

王小姐：不问。问了您也不会说实话。我呢，不讲普通话，您就能听出我是自贡人。四川农村出外打工的特别多，其实，许多省份，许多城市，连自己地方上的下岗人口都解决不完哪还有多少工拿给你外乡人打？我敢说，全国所有的活路包括三陪都拿给四川人干，也能干下来。四川人特别能吃苦耐劳。我们村，青壮男女都出

来了，没本事的人（老幼病残除外）才守在家。我 15 岁就跟同村的女孩出来，一大群，七八个，下广州。

老威：您是被人贩子拐出来的吧？被卖过吗？

王小姐：我早就知道放飞鸽的事，我没那么傻。到了广州，大家分散开去找活干，到餐馆打零工，包吃住，一个月三百元。但这种活也不太平，客人一醉，就不规矩。老板也经常揩油，摸我屁股。就这样磕磕碰碰了一年，被老板骗上手，做了他的情人。有一天，我们同村的马姐跑来说，你那老板算啥情人，他在免费占你便宜，我给你介绍一位，又年轻，又比他大方。接着马姐就把我领到东莞一家夜总会，混在一群坐台小姐里陪几个年轻人喝酒。我啥也没做，人家就给了我 200 元。挣钱太容易了。后来酒喝到半夜，我醉成一堆稀泥，被人在一个房间里剥光了。我虽然头重脚轻，但还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就本能地护住下身。那客人倒不粗鲁，他一边捏我奶子一边说："另加 200 元炮费，怎么样？"我比了三根指头，他说："三百就三百。"就骑上来了。第二天清醒，我感到委屈，就找马姐评理。马姐说："你一晚上啥也没做，就净挣 500 块！这样弄一年回家，就可以起一栋大房子，比端盘子强多少倍？"

老威：您一干四、五年，也没退役？

王小姐：我被抓过至少八次，每次都罚款几千，您想损失了多少钱？还有堕胎啦、避孕、治病啦，也要花相当的费用，遇上扫黄打非，坐台小姐都得暂避风头。记得有一回，扫黄特别持久，我只好送货上门到厂区，为退休的孤寡老人服务，我联系了十桩业务，为期一月。也就是在一个月中，我得每天为十个广东老头提供性安慰。一人次收 25 元。这样起早贪黑完成了订货，我挣了 7500 元。

老威：什么叫性安慰？

王小姐：广义的性行为嘛。搂搂抱抱，摸摸捏捏也算，您想，六、七十岁的老头，有多少炮弹可打？他们最欢迎吹喇叭，有时我恶心死了，还得装出陶醉的样子。

老威：广东挣钱多，您为啥又回四川了？

王小姐：广东人特别精，花了钱，就想方设法折腾。搽油吃药

延长交配倒在其次，他们还要求你造型，什么立式、卧式、跪式、拱桥式，像做体操。有一次，一个瘦猴捉住我的脚后跟，撑直双臂，在床沿大大分开，恨不得把我撕成对瓣。我看他在哪儿挺别扭地做动作，忍不住抗议："你搞自己的老婆也这样？"还有一次，一个肥仔为了拖延时间，搞着搞着又起来开电视，后来瞪大眼睛看电视，也不能分散注意力，这狗日的竟从床边拾起一张过期《参考消息》翻起来，我快被压闭气了，只得一把扯了报纸，将他颠下身体。大不了退他一半炮费。

老威：我以前只知道广东人善吃，没料到还这么善嫖。

王小姐：什么善嫖？纯粹是缺乏嫖德。更加上娱乐业越来越不景气，黑社会的帮派也特别多，什么东北帮、贵州帮、重庆帮、潮汕帮，经常为争夺地盘而拼得你死我活。他们什么违法的事都做，一旦进了局子就自残，割手筋脚筋，吞烧碱。我们不但惹不起他们，而且得受他们管，成为他们的摇钱树。这种人抓了一批又来一批，而我们呢，在公安局和黑社会的夹缝里，我们心里欢迎警察整治流氓恶棍，可世道清明了，我们的生意又难做，夜总会养不起坐台小姐，有时客人与小姐的比例是 1：3，大家就六亲不认，抢生意做，直到把客人吓跑。小姐内部为争客人不知打过多少次……我看得淡，就退出，悄悄回四川。成都的治安还可以，客人也较文明。

老威：您觉得什么客人的钱最好挣？

王小姐：当然是公费三陪。这两年，工作吃喝、工作麻将、工作保龄球已逐渐平淡了，最刺激的还是公费三陪。一长溜小车停在门口，黑压压的肥佬轰进去，人人都要小姐。有时，我们全体出动也应付不了这些炮团，只好由经理传呼其它夜总会小姐救急。每逢此时，我们都象过盛大的节日，因为"老枪"们一般都醉醺醺的，抠不响，我们用不着付出肉体代价就能挣足小费。特别是整个公司、整个科室由领导带队来消费的，特爽。他们叫齐小姐，点几首歌，就像给幼儿园小朋友发糖果，一人几百。有一次，我路过某税务局大门，无意间觉得橱窗内的光荣榜中一张大照片特别眼熟，就停步仔细端详。您猜，我看见了啥？我看见了我的客人！这个昨晚才和

我睡过觉的劳模，竟是税务局长！于是我好奇心发作，就上楼拜见。人家当然不认识我了。我坐在办公桌前，哈哈笑起来，眼泪都出来了，真的，我闭不拢嘴。我这个疯子到底被秘书赶跑了，可当我回到家，一摸手袋，里面又多了几百块！您说这钱多好挣？

老威：据我观察，这酒店生意的很大部分是靠坐台小姐，你们也算是这儿的"支柱产业"吧？你觉得酒店收出台费是否合理？

王小姐：酒店为我们提供地盘和客源，收点介绍费天公地道。当然，如果没有我们，这儿的歌厅、包间和客房肯定会冷清得多。可做人不能光为了自己赚钱，得有点奉献精神，这样，大家关系融洽了，就能共同致富。否则，大酒店和夜总会没人光顾，都垮了，我们就只有像旧社会的野鸡，在街头拉打工仔。总的来说，现在中国比任何时候都好，解放前，青楼女子好不容易做点生意，老鸡婆就要抢去大半钱，而且客人都是耀武扬威，瞧不起咱们；而今天，有钱为大，只有穷才被人耻笑。所以客人来了，大家是平等的，你的萝卜我的坑，还不都是一个地里出产的东西？

老威：前一段时间，有报纸报道四川某地税务部门试图向三陪小姐征收所得税，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很多社会及法律问题专家参与了此事的讨论。您觉得怎么样？您愿意纳税吗？

王小姐：我愿意。国家财政负担那么重，许多下岗工人只拿百把元生活费，像我这种高收入，应该尽点义务。而且，我一旦交了税，我干的事就属于正当的，就没人扫黄了，用不着担惊受怕了。为了便于管理，我们这行还应该发证，至少是健康或卫生许可。在医院检查，身体达标后，方允许从事这种行业。我知道，国外一般是划一个红灯区出来，在红灯区外从事这个活动的属于非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个形象问题，绝对不能这么做。

老威：您还很有头脑。想没想过将来改行做生意？

王小姐：怎么没想过？除非以后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周围都不知道我的来历。最理想的是在陌生的地方又遇上心目中的白马王子，那么我一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现在的医学发达，要变成纯情少女容易。不过，这说容易做到难，我还不到 21 岁，身上

已经过了成百上千的男人，早麻木了。我还能爱上谁？再说，一处呆久了，再到另一处真有许多现实困难，别说出成都，出了这酒店我也感到空虚、渺茫。

老威：您做了这么些年，应该有些积蓄了。您可以歇一段时间，试试其它生活方式。

王小姐：生活方式不重要，关键是工作难找。没了饭碗，坐吃山空不行。任何时代都要人作出牺牲，我们付出了代价，下一代就会生活得更好。没想到，我今晚碰上个孔夫子的徒弟，我感到自己的水平也有所提高，您先生大约希望我进尼姑庵吧？

老威：好了，离谱了，我们跳个舞吧。

王小姐：您真的对我没兴趣？不要一出门就后悔。见笑，我多贪了几杯，头有点晕了。

老威：谢谢您为我开眼界。

66　蜀派古琴大师王峪

采访缘起：1994 年我从隐居地重归故里时，世道大变。因感念妻离子散，物是人非，所以灰心丧气，终日挟一洞箫在成都磨子桥的几家酒吧卖艺糊口。这期间，凑巧与王峪大师有数面之缘，各以琴箫会友，遂成忘年之交。

1995 年 10 月 3 日和 1996 年 1 月 31 日，我怀着个人目的，两次造访未果。王峪大师家中无电话，只能用传书带信这种极古老的方式联系。终于 1997 年 1 月 3 日上午敲定，下午 3 点相见。

王峪大师已 87 岁了，家住成都羊市街与东城根街交叉口旁的一条陋巷内，路人皆知其名。他的经历见《巴蜀地方志．音乐名人传略》877 至 880 页；他的琴音已由台湾天籁出版公司制成光碟，在海外广为流传。成都和北京等地音乐商店也在出售。

老威：听罢先生这曲《山中访友》，我有点坐不住了。我还没开口采访，您就用这意境高远的琴声“访”透了我。先生，晚辈真是高山仰止啊。

王峪：你还在吹箫吗？

老威：“还在吹箫”是什么意思？我肯定在吹。虽然年复一年，我被生计问题压得喘不过气，但吹箫是每日必做的功课。时间紧，心气燥时，就舔舔凹口，哪怕不出声也行啊。乐器也有灵性，你不爱它，它当然就疏远你。

王峪：是么？我可是许久没抚琴了。

老威：先生岂能降低自己，同我这种俗人相提并论？先生即使终身不再抚琴，其仙风古韵也回旋在天地之间、殿堂内外。想当年，孔圣人游说列国，推行周礼，被一群野蛮人围困于陈、蔡交境之处达三天三夜，水尽粮绝。夫子临危不惧，在众弟子前抚琴高歌，感天动地。我经常在想，这古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士大夫的沉浮史。

王峪：可以这么说。古琴是同中国的政治联系最紧密的乐器，

因此历史帝王会弄琴的不少。隔着千年历史，我们无法亲聆孔夫子抚琴而歌，但我们能从《论语》中“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中辩认出其琴其歌应该是正气浩荡，凛然不可侵犯。与孔子同时代的晋国师师旷，为了专心练琴，不受四周环境的干扰，竟刺瞎了双目。据说师旷之琴，直接预示着国运兴衰及个人祸福，几近巫术。特别神的是，他能通过抚琴上天入地，呼风唤雨，重演历史。虽说古琴起源有许多种说法，但在我的心里，师旷是最早的宗师。

老威：师旷有琴谱传下来么？

王峪：没有。孔子倒有一首《文王操》，但也有伪托之嫌。不过我觉得这没关系，因为许多古籍都描写了师旷抚琴的场景，你可以从这些场景去想象，从白鹤翩翩起舞到天昏地暗的雷霆之怒，当琴弦终于崩断，大王手中的玉杯也摔得粉碎。这种国势陡转，天人共怒的极端，是很难用乐器表达的。

老威：您的意思是世间有两种古琴，一种是能够抚奏的，一种是想象里的？

王峪：对，一种是现实，像我刚才为你弄的《山中访友》，有作者，有朝代，徵、羽、宫、商、角分明，平和而雅致，令人流连忘返；而另一种本来是书里的神来之笔，后人读了拍案称绝之余，就把书中千古流传的故事搬进曲谱。人都有模仿的习性，今人模仿古人是很雅很过瘾的事，于是这些故事化的曲子也能广为流传。

老威：我还是觉得想象里的好，例如“筑”这种乐器，我最早知道是在《东周列国志》里，荆轲为了酬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携徐夫人匕首及燕国地图去诈降，行刺秦王，“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之，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之。”这就是说，那首苍凉千古的《易水歌》是高渐离用“筑”来伴奏的，后来高渐离继承荆轲的遗愿，在筑里灌铅，并用两年多的时间，逐步接近秦皇，投其所好。终于在遭受挖掉双目的酷刑之后，持筑对专制者发起攻击。我一次次地根据这种故事想象筑的形状和声音，真是心醉神迷。可直到去年，我才在考古杂志上，读到在西汉古墓长沙马王

堆里发现失传乐器筑的报道，里面写道：“筑身窄长，筑颈呈三角形，可以看见，以前曾有五根弦，一根压三角顶棱、两根贴着左侧的斜面，另两根顺着右侧斜面。五根弦分在徵、羽、宫、商、角；西侧的筑弦被扼住后，又分别变成羽、变宫、宫、角、变徵五声。”

王峪：你说得不错，其实任何一种曲谱及乐器都是尸体，你不动它，它也就一天天地腐烂了；如果你像音乐学院的学生一样，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照搬，也没意思，你在照搬尸体呢。一个好的琴者，应该像你刚才阐释“筑”那样，把活人的精气吹灌进去，使尸体动起来，使尸体在你跟前跳舞。有人弄一辈子也只能达到琴匠的水平，教学生混饭还可以，就别谈什么境界了。

大约五年前，几十位海内外古琴高手荟萃成都，台湾、美国、欧洲的都有，我陪他们上了峨嵋山的金顶，正是隆冬，寒风怒号，天地浑然素白。当夜清月登空，云涛滚滚如万千银鱼雀跃，众高手面对奇境，却畏缩不前，我一时逞能，竟吩咐徒弟摆几于舍身崖上，老夫盘膝而坐，抚琴高歌李白的“明月出天山”，动情之处，云翻浪涌，天公陡降大雪，这是自然界的听众在哗哗地鼓掌呢！我边抚边唱边用心聆听那极为深远的回声，感觉自己一直就在舍身崖上坐着。我是一块老石头，一直在与山川对话。蓦然，我猛一睁眼，看见了佛光，那佛光像动荡的水井，在云海边一圈一圈朝上翻，在两个光环之间，我看见了盘膝合掌的佛，在佛的跟前，也摆着一张琴，我真忍不住诱惑想跳过去，抚一抚那张琴！

老威：许多人就这样跳下崖去，那佛就是您自己呀。

王峪：我知道，但我也知道这琴声这歌声不是我能发出的，是大自然在借尸还魂，是融入大自然的祖先在借尸还魂。我们身体在变轻变薄，终于像一具空壳在雪里化掉，我再唱“明月出天山”，我反复唱，我清醒地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刹那，我在苍海桑田中积蓄了几十年，就为了这一刹那，永恒的听众，《高山流水》的神话终于被粉碎了，俞伯牙和钟子期算什么？

老威：您对《高山流水》耿耿于怀？

王峪：根本就没有这支曲子，俞伯牙的境界，来源于樵夫钟子

期的两句赞叹："巍巍乎，其志在高山"；"浩浩乎，其志在流水。"这一静一动，或静与动的互相包含，涵盖了东方的全部哲理。但是在这讲得清楚的哲理之上，有讲不清楚的更高妙的东西，象《道德经》里说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古琴里的"玄之又玄"，就是听众的唯一，最后达到琴者和听众都是自己。但你又能从"自己"中触摸到众妙之门。众，大也，多也，普天之下也。那么钟子期就是另一个俞伯牙，子期病死，伯牙毁琴相祭，并发誓终身不再抚琴的真正原因是，他再也弄不下去了，《高山流水》是一支心死之曲。古往今来，没有一个高手能谱出心死之曲。

老威：现在流传的《高山流水》怎么样？

王峪：据说是根据失传的《高山流水》之意境重新谱写的，大约是明代的作品。我想，汉、唐、宋也应该有他们那个时代的"高山流水"，如果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有此雅兴，也可以弄。所以社会上流传的《高山流水》的琴谱版本有五、六种之多，有将"高山"和"流水"分作两支曲子的，也有合在一块的，更可笑的还有古乐合奏曲，据说还是音乐学院的教授搞的，在剧院里演出，挺卖座。俞伯牙果真有如此众多的知音？这个社会呀，只要炒作得好，不伦不类的东西也赚钱。

老威：您出的碟子也不少。前天我还在盗版碟市场上，看见了好几种，封皮上有"蜀派古琴大师王峪"的字样，照片很具飘然仙逝的味儿，我猜测可能是您在峨眉金顶让人拍摄的。

王峪：你的意思是我也炒作？当然，我是人，要穿衣吃饭，前几年，我感觉精气充沛，腿脚也灵便，就到处走走，以琴会友，我还上过电视。但这说明不了什么。我这辈子只会弄琴，能卖艺糊口养家，当然再方便不过。不瞒你说，我还收过学徒，然而某个晚上，我突然从电视里看见一个盛况空前的古筝大会，大约有上百个戴红领巾的小孩，面临泰山日出，摇头晃脑地齐奏雅调，令人大开眼界。我却吃惊得半晌吭不了声。圣贤之乐竟成儿戏！而且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名义下进行。惭愧之余，我将所有的学徒扫地出门，也搞得自己心气不畅。唉，世风日下，艺人何为？

老威：我能理解先生。

王峪：上次金顶抚琴见佛是我人生中的极致，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物我相忘的好时光了。如果说运作，也是别人的事，因为当时的琴声和自然之声都被录了下来，制成了光碟，在世界各地流传。整整三个小时呀，要是平常，人都冻僵了，而我却觉得一股滚烫的体液从丹田持续不断地涌出来，我的手指异常灵活，最后，雪在我的身上堆积起来，眉毛还凝着两根冰柱，然而当我在尾声引吭长啸时，雪卜地一下抖散开去……我徒弟扑过来，给我裹上棉大衣，拥我入房烤火，人们都向我这个八十二岁的寿星敬酒。

老威：我记得你病过一次。

王峪：对，病过一次，痊愈后骨节僵硬，就很少弄琴了。但我还是保持焚香、净手、凭几默思的习惯。这是一种姿态，面对琴，你不一定要抚它。你听听，外面多热闹，通宵不停地打桩，又一幢高楼大厦要建起来了，比左边窗外的这幢还要气势宏伟。才短短的两年时间，我这房外的僻静小街就已荡然无存，那掩蔽着小街的一棵棵大树还是解放初期栽的，不过一天功夫，全砍翻运走。我已失去了习惯已久的弄琴的环境，像你说的，乐器也有灵性呀。

老威：斗胆问一句，先生今天抚琴是因为我吗？

王峪：其实在我沉思默想的时候，心里已经在抚琴了，客人来访，我就应着心音动手，保持一种连续性的冥想。

老威：与听众无关？

王峪：何为听众？从前，敝舍周围，绿荫连绵，夜半推窗，随缘一曲，满街都能听见。那时如果你在街上路过，会以为自己走在汉、唐或宋朝的某条街上。而现在，我根本就不敢开窗，你看，有窗的地方都装成墙了。三面墙，挂了六张琴，一张为晚唐琴，一张为宋，其它都是明以下。我在家中与它们为伴，能从唐琴幽黑的纹理中，听出隐约的奔马之声，还能想象接纳百川的丝绸之路，长安郊外，各类踏青人长袖飘飘的姿态；而宋琴焦黄，严谨的书卷气却隐伏着连绵不绝的流离失所。这些年代久远的乐器，听众为谁？

老威：先生可否给我讲讲蜀派古琴的渊源？

王峪：这有很多种说法，我无意饶舌，挑起派内纷争，况且先师早有遗训。古琴也同文坛和政坛一样，有在野和在朝之分，有学院和民间之别，进入学院也就等于在朝，教学生、拿教授级别的俸禄，整理、讨论、甄别古谱，撰颂新篇，并编纂乐史。有时也为达官贵人演奏，成为国家级的权威；而在野也就等于民间，通过自发组织的琴会较技，自视清高，自得其乐，到后来自生自灭如我。

老威：我从来不读现代人编撰的历史书，因为改动太大了，最终你不知道历史是随心所欲呢，还是有严格的尺度。比如唐韬【弢】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大作家沈从文只有寥寥几行，大约还是汉奸文学的代表，张爱玲等人根本没写。而李季和贺敬之都占了大量篇幅，似乎只有革命立场坚定才是好作家。因此，先生您莫悲观，您想想从古至今，产生了那么多好的古琴曲，又有几支是在朝的教授弄出来的？

王峪：谢谢你给我鼓劲，但我已八十七岁，朽木不可雕也。这样吧，我们结为忘年之交，我送你一盘碟子，这第一曲《广陵散》还过得去。

老威：这《广陵散》也是伪托之作么？

王峪：对。因为嵇康在被刽子手砍头之前，抚琴一曲，然后愤然摔琴而叹曰："《广陵散》兹此绝矣！"遂引颈就刑，连曲作者本人都说"绝矣"，后来流传的《广陵散》当然是假借嵇康之名。不过，这支曲子同《高山流水》不一样，它似乎深得嵇康和魏晋竹林七贤之神髓，悲怆而激烈。它的另一个名字叫《聂政刺韩王曲》，聂政你知道，春秋的大刺客，为报父仇，隐姓埋名多年，终于行刺成功，与残暴的韩王同归于尽。在毙命之际，聂政怕株连亲人和同伙，竟自毁其面，令他人无法辨认。而其姐却在弟弟曝尸街头的时候挺身而出，披麻戴孝收殓遗骨，可谓大义凛然——《广陵散》叙述了这个故事，并且通过被冤杀的文人嵇康之口——他多想做一个刺客啊。

老威：先生，您也是个刺客，您在这支曲子里向现代社会行刺。世代相传的汉人血脉被腰斩，被接上；再次被腰斩，再次被接上。

我觉得在一次次空前的掘墓鞭尸的文化浩劫之后，好的东西都流落到民间，从《高山流水》、《苏武牧羊》到《广陵散》，都是民间的精气凝聚而成，所以《红楼梦》里也讲：“悲凉之雾，遍及华林”。而历朝历代的暴君所干的，正是肃清民间邪说，以正朝冈。天下清明，百姓都不敢讲话，民间的好东西就被烧、被封，被故意“失传”。久而久之，人们就习惯了遗忘，习惯了用朝廷规定的语气说话，奏乐。再久而久之，这个民族就没有历史，没有音乐，更没有文化。先生，您要保重，尽可能把扎根于您心中的好东西保存得完整一些。祝您长寿。

67　朝圣者旺吉

采访缘起：1997 年 8 月 26 日清晨，我与李亚伟、陈大华、宋明桂等朋友及妹妹小飞，结伴乘中国联航的飞机，从成都飞抵拉萨。

这是梦寐以求的神祇之国，我们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和震撼。在当日游历大昭寺时，烈日似火中，我同朝圣者旺吉有了以下交谈。

这显然只触及到藏传佛教的皮毛。如果我再有机会去，或许会更深入一些。

佛主保佑。

老威：可以和您说话吗？

旺吉：嘿嘿。

老威：您挺高兴的。

旺吉：很高兴。嘿嘿。

老威：我们认识一下，我叫老威。

旺吉：我叫旺吉。

老威：您一开始拜佛，我就站在这儿数，您磕了 81 个长头。不累吗？

旺吉：不累，我们的生命都是佛给的。我佛慈悲。不累。

老威：这太阳，够火曝的，我站在这儿，头都晒晕了。我的一位同伴，在太阳下停了一刻钟，就中暑了。可你们藏族同胞，在明晃晃的阳光里，一大片一大片地磕长头，这么大的运动量，居然就没一个出问题……

旺吉：喂，您的同伴在哪里？我领他找医生，我知道八角街最好的医生。

老威：他吃了人丹，在阴凉地靠了一会儿，就缓解了。您的心肠真好，您自己的额头，还有这手，这膝盖，这胸脯，伤痕累累的，

您该找一下医生，至少弄点药，要不会感染。

旺吉：谢谢您。我们藏人不会感染，我们心中有佛，佛能治所有的病，脑子里的病，也能治。这西藏，是佛的国，好大好大，离天近得很。没有污染。

老威：您是哪里人？住在啥地方？

旺吉：我的家在白云那边，他们，这些拜佛的人，家都在白云那边，白云比太阳还飘的高，您骑马也赶不上。我们藏人死了都到白云那边，鹰把我们带去见佛。佛很大，很多化身，鸟，风，太阳，或者冰雪，或者山，雅鲁藏布江，都是佛，歌声也是佛。

老威：人也是吗？

旺吉：人也是，您想帮助别人的时候，您就是佛。

老威：那人与活佛的区别呢？

旺吉：人很多时候不想帮助别人，还骗人，犯罪；活佛普渡众生，他一代又一代地轮回转世，是最大的善。现在，布达拉官没有活佛，我们只有到大昭寺朝拜。

老威：我是第一次到西藏，感触很深，这儿是明亮的阳光之国，河流和天空都像镜子一样，人走在路上，不，哪怕坐车，也觉得是在巨大的镜子之间。我的五脏六腑被洗了一遍，肠子都透明，这脑袋有点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西藏的一部分，从风里飘来嵌在我脖子上。然后是刻着藏文的经幡。走在拉萨街头，藏族人都很友好，向陌生的汉族游客点头微笑打招呼，并教大家怎样转经，怎样祝福吉祥。旺吉，您也是好样的。

旺吉：进了佛国的，都是兄弟。

老威：看您风尘仆仆的样子，不是拉萨人吧？

旺吉：我是磕头来的，好几百里地。我是牧民，我卖了一些羊，一些牛，又用卖的钱换金子，一年换一点，五年能换好多金子。这次我全带来了，献给庙里，把佛像修得大大的。再过五年，我还能换更多的金子，献给佛。五年前，我就献过金子，那次，活佛为我摩了顶，我喜欢得哭了，我妻子，骑马伤了腿，活佛摩了我的顶，

她的腿就好了。神佛保佑。

老威：您家里几口人？

旺吉：我家里五口人。一老妻，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出了嫁。我把两个儿子都送进庙里，侍奉佛。他们不识字，进大昭寺不够格，就先在我们本地寺庙呆了两年，然后进了小昭寺。太高兴了，他们不在外面惹祸、一心向佛，还学文化，每天学藏文。

老威：您把儿子都送去当和尚了，家里不冷清？

旺吉：能进寺院，是他们的造化，也是全家向佛修来的佛缘。我们藏族人，总是把家里最聪明最能干的孩子送到庙里去。

老威：人都是要老的，将来您和您妻子怎么办？

旺吉：佛自有安排。

老威：您家里富裕吗？

旺吉：除了吃的、用的和住的，财产都应该奉献给神佛。财产多余了，人就要产生贪心的念头，就会作恶。您看那根柱子下的老太太，牙都没有了，还边笑边吃糌粑，她比我还穷吧，可她活得高兴；因为她除了佛之外，就没多余的东西了。你们汉人可能不理解她为什么高兴？又脏，又无依无靠，吃东西都艰难，还高兴个啥。不相信？您过去问问她，您伸手要她的糌粑，她和糌粑的那只碗，她马上就会给您。因为您是在帮她，给她机会积德行善，这样她就接近佛，成佛了。她不会要您的钱，如果您扔在地上，她看都不会看……。她在笑呢，她知道我们在说她。她在这一带很有名，和许多外国游客照过相。

老威：老人家的眼睛非常有神，她穷得像乞丐，却笑得那样慈祥，我简单不敢看她。刚才，我逛了一回大昭寺，我没随其他游客的大流，而去走岔路，这寺里像迷宫一样，我不知不觉就沿着回形土梯上了顶，不是正殿的顶，而是靠西北角，庙后的一边。那儿没有金碧辉煌和照相留影的众多游客，连一个喇嘛也没有。四四方方的土圍子内，只有一间小屋。我在那儿足足站了一刻钟，什么响动也没听见。风渐渐大了，我刚缩着脖子要下楼，却瞅见小屋内有双亮亮的眼睛望着我。

我到底从小屋的暗处看清了那个老人，盘膝在卡垫上，面前的矮桌铺着经卷。他的白头发告诉我，他至少 80 多岁了。我猜想这老人抄了一辈子经卷。令我感动的依然是眼睛，像太阳下的水，一下子就涌到我的心里去了。他合掌对我说："扎西德勒！"我也回了句："扎西德勒！"他点点头，笑得跟孩子一样。不，比我们汉人的孩子还纯洁，他是天堂的孩子。那位老太太，也是天堂的孩子。

我回到了自己的家园。我是不是搞错了？我是在世俗里陷得很深的汉人，却感到那抄经老人是我的父亲？真的，这一切像梦，又太熟悉了。

旺吉：您的话我听不太懂，可您的眼睛告诉我！您有佛缘。其实，许多汉族人，还有许多外国人，都信我们的佛。不过，不少人把财产，把尘世看得太重，他们先是自己，然后才是佛，或者只有自己遇见了麻烦事，才想起佛来，这是得不了救的。

我也做得不够，还有不少尘世的俗事。神佛保佑，我和妻子感情很好。如果有一天，她先于我进入天国，我就毁了房屋，放生牛羊，到山洞里去修行。有不少人去洞里面壁，听我儿子讲，在尼泊尔，还有西方人削发进洞的，一修就是一两年，不出洞，甚至连天日也不见。我没有经济条件去尼泊尔，可我到时候，准备选一座天葬台，在天葬石下掘个洞修行。

老威：在天葬台下修行？太过分了吧？

旺吉：那儿离天堂最近。在拉萨郊外，有个女尼就整日在天葬台下诵经，已经好几年了。

老威：你们藏族同胞平时都极其和善，就是在天葬的时候很凶。昨天早晨我们去了，只想远远地感受一下气氛，藏胞们就从四面八方围过来，扔石头赶我们走。

旺吉：你们外人不应该去，天葬是神的仪式，不是供参观的。否则，升向天国的灵魂会被打扰。

老威：是啊，我们跑得非常远，才停下来，可我们还是看见一头鹰从铁青色的天幕后飞来，歇在山梁上，接着太阳从一个缺口露面，点燃了半边山和一片开阔地，鹰群飞来了，在空中盘旋，然后

俯冲下去。我的毛发都竖起来了。

旺吉：如果我们早认识，我可以替你们向死者家里人请求，让你们靠近，一起为亡灵祈祷。

老威：您是个好人。我把地址留给您，欢迎您今后到成都我家做客。

旺吉：我到过成都，到过内地的其它地方。

老威：去佛庙里烧过香么？

旺吉：烧过香，但我不相信汉人有佛。

老威：您这是大藏族主义吧？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信徒嘛。内地的佛教与藏传佛教只是分支、门派不一样，但源头是一样的。芙实藏传佛教也有黄教（经过宗喀巴改革）和红教（未经改革的原教）之别。归根结底，佛陀就是普渡众生，也不是只渡藏人，不渡汉人。成都的文殊院，无论普通节假日和佛教节日，都挤得水泄不通，若遇公开讲经说法，收纳居士，佛堂根本容不下。单就信教的热情，汉人并不亚于藏人，只是风俗不同而已。

旺吉：你们汉人信佛只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健康、儿女……反正世间所有俗事，都要求佛，都要许愿还愿。

老威：内地有佛学院，专门研究经文，培养出家人。在历史上，因看穿红尘出家当和尚的名人也不少。有些明星还常去寺庙捐款，做佛的俗家弟子，他们可不为什么。

旺吉：不为什么？先生，在佛国里是不能撒谎的。你们汉人信佛都是看破红尘，当不了官，发不了财，健康有问题，儿女不孝顺，还有男女不相好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于是想解脱，出家躲起来，人在寺庙里，心在外面。女的剪头发，男的剃头，还流眼泪，一幅想不开的样子。你们把佛信得很痛苦。这是对佛大大不敬。因为西方是极乐世界，痛苦的人是永远进不去的。

我们藏人信佛很快乐，从阿妈肚子里一出世，我们就是佛的人，佛国无边，哪有“红尘”？我们把金银珠宝都献给寺庙，把最聪明最有出息的孩子送去待奉佛。我们一路磕长头来拉萨朝圣，高兴啦，

心里一直唱着歌啦，头磕破了会长疤，只要身体还活着，血也没流完的时候。至于饿了渴了病了，都会过去，神佛保佑，你们汉人看不出我们心里有多快乐。

来去都一丝不挂，可你们汉人想在世上留下的东西太多，佛是帮不了忙的。你们吃的、穿的、住的都比我们好，也比我们讲卫生，可你们痛苦，因为你们的心在地狱里。

66　新新人类喂小姐

采访缘起：世纪末年我泡吧三次，前两次朋友相邀，后一次单独行动，直奔人民公园附近最火爆的迪吧。恰适万圣节，三层楼的迪吧被挤得膨胀，服务生们戴着鬼脸，在几百群众里穿来穿去。而台上的强歌劲舞，把大家伙的情绪激化得一塌糊涂。谢天谢地，喂小姐来了，我总算有点正事可做，否则，出毛病了。

据报载，成都迪吧之多，居多国之冠，而新人类肯去迪吧与繁荣成正比。未来是属于喂小姐们的吗？不，也许今天也属于这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

这几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正播出“财富论坛”，其中英特尔网总裁先生说：“中国有句俗话，叫‘偏执狂都是不成熟的’，那我们公司的职员都是偏执狂，都不成熟。”

如此看来，这位洋富翁在中国的知音也包括喂小姐。放眼世界，新新人类难道只是一个年龄界限吗？

喂小姐：先生，我可以在这坐吗？

老威：随您便。

喂小姐：到底可不可以坐？

老威：没别人，您坐吧。

喂小姐：这样算答应了，我坐啦。请您给我来瓶啤酒。要嘉士伯。

老威：给您点酒？我又不认识您。

喂小姐：你已邀请了，再过十分钟，我们就是熟人了。我的长相不错，至少打九十分，你一个人到迪吧东张西望，不就是想认识漂亮女孩么？

老威：你倒爽快？好吧，我请客。

喂小姐：味道不错，这牌子我喝了一年多，比跟人的交情厚，

有烟吗？

老威：我不抽烟。喂，你叫什么名字？

喂小姐：你是旧社会来的人吧，见面就问名字，苦大仇深。

老威：问名字咋个就苦大仇深？

喂小姐：发仔演的一部老片子，讲”文革“时期，大陆客偷渡到香港，被警察撵得鸡飞狗跳，好不容易站住脚，与一位小姐好上，同伙却找上门，见面就亮军装，喊同志。你刚才的口气同电影里下模一样。我猜，你是属于苦大仇深那一代。

老威：总该有个称呼吧。

喂小姐：你已经称呼了：“喂。”打电话开头有要“喂喂”两声，人类在一秒钟内，起码要”喂喂“几＋亿遍，我是大众情人，你叫我喂小姐吧。

老威：大众情人？你可以与任何人睡觉？

喂小姐：这也是问题？看来，新新人类和旧人类代沟很深。你色迷迷地盯我这么久，还不如直接拿钱出来，我有心情就做，没心情就不做。这同买东西，染头发差不多。比如出太阳了，我想染成金发，骑着摩托车来满街兜风；一会天阴了，我撑了一把伞，仅仅因为伞是红的，我就把头发又蚀红了，坐在家中看电视，突然觉得王菲的刺猬头很酷，马上又冲进美容院，照准了来一个，说不定，我妈都不认识我了，我购物更狂，心里不仅来电，而且熊熊燃烧，至于做爱嘛，你来电吗？

老威：我岁数太大了。

喂小姐：哪怕你 80 岁，我也敢上，这就是新新人类，70 年代出生的人没法比。

老威：你多大？

喂小姐：18 岁，今天是我生日。我与朋友，与情人一道过了许多生日，蛋糕啦鲜花啦 party 啦，我已烦了，就一个人逃，我去了三个迪吧。没劲。到了这儿半小时，好不容易在人海茫茫中瞅见一个光头。皱着眉，挺深沉的老帅哥，嘿，有感觉。你首先是滇艺

界的，像演录像片的……

老威：成龙、李连杰或者刘德华、洪金宝？

喂小姐：我连斯瓦莘格也看腻了，我觉得你像、你像，嘻嘻，我不好意思说。

老威：你还害臊？

喂小姐：噜，你像《阁楼》里的某个男主角，《花花公子》看过么？

老威：美国销量最大的黄色杂志？

喂小姐：是录像。姿势动作挺到位挺优美，墅面唯一的亚裔种马就是光头，一身红 T 恤，你矮了点，但眉毛和额头特酷，不知长胸毛没有？

老威：操你妈！就这样与长辈开玩笑！

喂小姐：操得好！酷！你适合发火，左臂择起来，性感极了。接近新人类的审美。而你刚才笑眯眯的，像满肚子坏水的老色狼，真的，你千万不能笑，你一笑，眼袋特重，下巴也堆起来了。

老威：拿你没办法 " 如果现在让我与你作爱，满腔的阶级仇恨就会涌上来。我晓得社会上有你这种职业，靠陪别人聊天挣一点小费，挺不容易，你犯不着与我过不去。

喂小姐：如果你讨厌我，不给小费也行。我从小就这么说话，80 年代的新人类，都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谁也没个兄弟姐妹。我是电视机前长大的，书读到中学一年级，就跑出来了，一直在社会上混。我 15 岁就当发廊小姐，见过的男人多、但从没与他们发生过啥，男人喜欢在女孩身上摸来摸去，摸过分了，我就吓得跑了。后来，又在迪吧当过领舞。一上台，就是两三个小时，随心所欲，倒非常开心。太累了，我 16 岁半就与一个男孩同居了，因为两个人租房价格便宜些。

我喜欢张信哲的歌，所以我的初夜在他的歌中完蛋。开始，那男孩赖在我屋里不走，我们对视着，他一来情绪，我就忍不住笑。后来，他冲动得历害，光着屁股猴上猴下的，我只好给他了。我戴

着耳机在他身下，他要扯耳机，被我一抓把眼情抓出血了。他虽然没用，只要把他想成张信哲就有用了，我在与大歌星张信哲作爱。我把眼闭得紧紧的。处女膜就这样被一个独眼龙给破了。

老威：你还是个浪漫的女孩嘛。

喂小姐：追星是新新人类最大的时尚。我的偶像是张信哲，张惠妹，还有张雨生。追过张学友，但他的男子汉做得有点假，王菲呢，老了点，风尘了点，虽然是歌后。我也不追，因为我才 18 岁，不可能对所有的男人丧失信心。我与姓张的有缘分，阿妹好活泼，一见她就啥烦恼也没有了。张雨生，还有张信哲的假声特爽，比一般男歌手要高几度，比玻璃还脆，我一听，泪珠一个劲掉，魂都丢了。你喜欢谁的歌？

老威：我不追星。

喂小姐：连怀旧歌曲也不听？我爸妈那代四十多岁的老人喜欢邓丽君、徐小凤，你的心态和他们一样吧？

老威：我的心态与谁都不一样，我似乎只追我自己。

喂小姐：哇！真是恐龙级的腕！我在迪厅跳了这么久，追星族也不少，都不敢说只追自己，你肯定搞过摇滚的，罗琦听过么？

老威：算了吧，小姑娘。喂，你第一个男友还在么？

喂小姐：已经蹬了，人家都说初恋是如何美好，如何永生难忘，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巴不得他到外面多交女朋友，可他不，一天到晚死缠活缠。我上班，他就在下面候着，特没劲。连崇拜者送花也吃醋，领舞全靠气氛和情绪，一旦调动不上来，就要冷场，走了顾客，老板要扣工资，我一个月才一千多元钱，经得了几扣？我还得养着这个白痴，工也不打了，就守着，我又不是犯人。

苦日子过了一段，我本来想认了这个命，却灵机一动，觉得他像张信哲，我陪他到美容院把前面一绺头发染了，为他介绍了一个三四十岁的富婆。住在棕北小区，搞药品推销的，为了勾住客户，每天都浓装艳抹地在镜子前练习抛媚眼，可惜那眼鼓得如狮子头金鱼，一抛，就把男人吓跑了。我鼓励我的初恋勇敢些。因为这钱好挣。如果一个月轮换与四个富婆发生关系各两次，好几千元就到手。

开始他不干，还打了我一顿。我一个星期不理他，他就下杷蛋了。我又软硬兼施，与他抱头痛哭，我说：加紧干几年，挣房子结婚嘛”。一听这话，他像吸了毒品，精神抖擞上阵去了。

老威：你真心想与他结婚？

喂小姐：以后再说吧。况且，结婚就一张纸嘛，我还没尝结婚离婚的滋味。你起码离过几次婚吧，难怪这么成熟。社会上流行“三证齐全”的男人最有魅力：大学毕业证、劳改释放证、离婚证。你呢？

老威：你是“老江湖”噢。

喂小姐：港片里许多男主角都三证齐全。

老威：你的初恋咋样了？

喂小姐：他成家心切，成了棕北一带出名的鸭子，还在同性恋俱乐部混了几遭。以前我还以为只有女人出卖肉体赚钱容易，没想到，男人一旦放开，就火爆十倍。你想想，三四十岁的无聊富婆有多少？市场搞活了，他天天干也忙不过来。

老威：你太没心肝了。

喂小姐：我从小喜欢看卡通片，变形金刚。外星人入侵人类。机器人没心肝，一旦恋爱了，就扎扎放电。我和他从没放过电。唉，和你这样老派的男人在一块太累了。我一辈子也没想过这么多问题。

老威：想结束谈话吗？

喂小姐：不，不，现在才 10 点半，第一轮歌舞刚完，台上那歌星挺会煽的，弄了一大拨人来捧场，假如我在台上，你会上去献花么？我喜欢花，为我买一枝？

老威：好，来一枝红玫瑰。

喂小姐：红玫瑰？火烈鸟的爱情，三十三个男人为我买过这玫瑰，你是三十四，最短暂最老的一个情人。我是坏女孩，曾逼着男友去应征导游，黄玫瑰的特种导游，交一千多元的服装费，为香港来的一批孤募老太提供形影不离的服务，皮条机构许愿说，一个月要尽挣三万元。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兴奋炸了。没料到，这是个骗局，

被报纸揭露了，好几百上当受骗的人都不敢站出来。我男友觉得太丢脸，就当着我切腕自杀，我见血就傻了。为他裹绷带。后来一道在街上走着平息情绪，不知不觉到了“廊桥”，就进去了。

里面正乌烟瘴气，在跳脱衣舞。那舞妃只剩下内裤和乳罩，可一拨醉鬼还围着喊：“脱，脱，我再添三百！”我加一百！“我的男友一下子推开我，鼓着眼冲入最里面，几乎就抵着舞女的下身怪叫：”我出两个五百！“这一来，没人吱声了，舞女的内裤闪电般拉下膝盖，他一边撒钱一边在那地方啃了一口，舞女的乳罩作为奖品自然塞进了他的衣领。我呆了，气得泪都出来了，就扭头冲出去。

老威：你不是啥也不在乎么？

喂小姐：我没想到男人都那样。也许，我以前错了。可是光靠我领舞的钱，是维持不了这种消费的，我浑身都是名牌，值好几千，一双袜子也是两百。我的摩托，是走私货，要一万五，新人类是绝不会落在时尚后面的，我还参加过选美，被淘汰了。不是不美，而是记性太坏，背不下名人的格言，什么托尔斯泰，我一见名字就头疼，都进了棺材的人，还背他们的话干啥。

找男孩要特别小心，我爱了一次伤害就够了。真的，我从家里跑出来，父母到处登“寻人启事”，我也不在乎。但那次我难过了好几天，接着，又是周润发在演“文革”的老电影里说的：“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们的尸体，又继续前进！”

老威：这是领袖的语录。你好像从来不读书？

喂小姐：我天天读书古琼瑶、亦舒、黄爱东西、席娟，还有周得东；《知音》和《瑞丽服饰》，还有《时尚》、《女友》，不抓紧时间，绝对看不过来，《欢乐总动员》特棒，张延”也！“的那个Ｖ字手势打得绝透了，我模仿了一百次也不像。我期期都看，如果晚上拉下了，第二天上午重播也要补回来。模仿阿妹的那女孩太丑，有′点得罪观众。演《还珠格格》时我简直过疯掉了，几个电视台挨着播我就换着看，连班也不上，被迪吧炒了。我崇拜小燕子。喂，你是演艺圈的人吧，替我弄个小燕子的签名？

老威：听小姐一席话，这张老脸不知朝哪儿放。我居然降格到

与小燕子的崇拜者成为知音。

喂小姐：你有啥了不起？

老威：我没啥了不起。但《还珠格格》太臭了。

喂小姐：你眼红吧？自己写不出来，就冒酸水。

老威：我凑巧看了几分钟，正是小燕子和其他一个什么公主被绑赴刑场处决，整个画面人山人海，似乎都是还珠格格的追星族。而那两个钦犯身着节日盛装，沿途东张西望、搔首弄姿，像现代妓女去超市的途中。要知道，清朝刑律极严酷，哪有犯人不戴刑具的？琼瑶一大把年纪的老太婆，自己卖不动了，就通过胡编乱造的电视剧卖。

喂小姐：你这人，说话咋这么毒？你该不会背后又坏我吧？

老威：我对你印象不错。

喂小姐：真的？那就别生气。《还珠格格》挺好，小燕子的性格像我。谁都认为小燕子演的好是自己，天真活泼，管他清朝不清朝，皇帝不皇帝。赵薇是穿着古代衣卖的新入类。只晓得玩。如果我是导演，我肯定比琼瑶新潮，我还要让太监跳霹雳舞，在皇宫内设计一段选美。乾隆皇帝是总评委，亮牌，九点九分，那才热闹。哎，别绷着脸好不好？

老威：你太可爱了。今晚咋付费呢。

喂小姐：你看着办吧。我发觉，你比我还单纯，初看，你像我叔叔，看久了，你倒像我弟弟，不到我家去看看？

老威：不担心我是色狼？

喂小姐：我安有报警器，你先不忙掏腰包。谈话气氛这么好，你付费走人，就啥情调也没有了。这样吧，到对面的西点房去买下大包。顺便带一盒金中华，一瓶王朝干红，我回家接着喝。

老威：愿意效劳。

喂小姐：一只小蜜蜂呀，飞到花丛中呀，飞呀，飞呀……

老威：你念啥子？

喂小姐：小女孩玩的击掌游戏。老蜜峰你飞呀，飞呀，飞回家

去吧。

69　花案魏西

采访缘起：魏西是电影怪才。魏西生活作风过硬。魏西有阅历，有地位，算这个时代受人尊重的人物。

然而，魏西却犯过花案。

“花案”这个字眼，在阶级社会的民间辞典里近似流氓，却比流氓还贱——这大约是受“万恶淫为首”的传统礼教的潜在束缚。

2003 年 8 月 22 日下午和晚上，天气阴沉无雨，有隐隐雷声，我和魏西在北京土城西路一带，从川菜馆食盅汤到赌徒周忠陵的租房，再到大街以及电影学院的宿舍，入迷地连续交谈 10 小时以上，意犹未尽。

接着又是 22 日的下午和晚上。

魏西讲述了自己在 1983 年严打运动中的偷生经历，他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把这段花案入狱拍成电影。89 年夏天，外景选好了，监狱也搭起来了，演员都是一流的，统统剃成秃瓢。可是，这头正要入戏，那头突然开枪，军心浮动，厂里接令不准拍了，50 万人民币连个水响都没听见就泡汤了。

老威：我最早晓得你的名字，是在康正果悼念诗人胡宽的一篇文章里，你们三人都是大个子，扎在一堆儿，肯定引人注目吧？

魏西：引人注目的不仅是个子，老康你已经熟悉了，被大学开除的反动学生，文革前就犯下给莫斯科大学写信，索要俄文版《日瓦戈医生》那样前卫的罪行；老康的爷爷，西北佛教界的大人物，旧社会与戴季陶等人传书往来，新社会成了政协委员，红了一阵儿，终于被打入尘埃，含冤死去。我和胡宽在文艺单位，也有类似的家庭背景和惊世骇俗的冲动，所以三个破落子弟凑一处，一拍即合。

老威：胡宽的诗我读过，比朦胧诗走得远，有人称他为“西安的食指”。

魏西：胡宽的爸爸是老诗人胡征，他有家传有天赋也有高贵的

哮喘病，但他既不顾城也不食指，他很健康，很帅气，很讨女人喜欢。他最后的遗嘱是在杭州的医院里，对守护一旁的漂亮女护士说："宝贝儿，我要窒息了，可很想和你亲吻。"你想想，这种连死都要标新立异的人物，在汉民族里有几个？

老威：所以你们要开风气之先了？

魏西：80 年代初，生锈的国门刚透缝，喇叭裤、邓丽君、老电影、舞会，还有《加里森敢死队》都进来了，大伙没有思想准备，就跟着感觉走。党组织和居委会老太太也守不住防线，资产阶级太厉害了，它针对中国人民压抑了几十年的情欲，连下猛药，除非太监，谁能坐怀不乱？

老威：当时成都街头，时髦男女也敢牵手了，夜晚滨江路的夹竹桃缝中，埋伏着一对对情侣，而电影院是谈恋爱的上好场所，人们在暗中互相抚慰，快活得跟神仙似的。

魏西：你参加过家庭舞会么？

老威：跳贴面舞？太超前了，过分超前就是犯罪。我记得派出所和居委会曾挨门挨户地调查，提醒大伙注意"新动向"，有流氓舞会的敌情，要及时告密。

魏西：我们的黑道教母，人称"老马"，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寡妇，长相一般，却是地下社交界的中枢神经。天一黑，各路人马就悄无声息地聚到她家，挪开桌椅，腾出空间，在邓丽君若隐若现的软歌中，鬼魂一样舞起来。老康务农多年，也没在文艺团体混过，像头手脚无措的大棕熊，善解人意的老马就主动上前充当他的舞蹈教师。其实，不需要任何技巧，所谓贴面舞，就是借个舞的名目，男女搂搂抱抱，似动非动地陶醉而已。我和胡宽如鱼得水，只有老康勾腰驼背，勉强让垫脚的老马吊住他的脖子，显得吃力而滑稽。

老威：没闹出风流韵事？

魏西：绝无当场出轨的举动，跳出感觉了，就自个儿约会去。你笑啥？真的，不值得笑。因为到了 1983 年 8 月，严打第一战役开始，凡是跳过舞，被人检举的，都栽得惨。可怜的老马，就这么糊里糊涂给毙了，胡宽和老康大约嗅到了风声，先溜了。我呢，总

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以为就跳跳舞，没做别的，犯不着跑。8 月 15 号夜里 11 点，西安全城戒严，警车扎住每个街口，拉网清剿。我还傻呵呵地呆在宿舍，突然听一个小孩在窗下喊："老魏老魏，日本鬼子进村啦！"我探头问："在哪儿？"小孩答："刚才还打听你呢，我乱指路，他们就杀过去了。"我连声道谢，小孩说不谢，你快躲起来。

我正犹豫是跑，还是当面跟政府交代清楚，公安局就折回来敲门了。转眼间屋里和身上都搜遍，因为我穿着工作服，相貌也朴实无华，公安局还怀疑是假的，连问几声："你就是魏西？"我一再点头，正要开口解释，带队的老公安却挥挥手："到局子里去说。"

我被搡进一辆面包车，里面像贩子关鸡鸭一样，满满地圈了二三十号，"蹲着！蹲着！"公安边吆喝边打压，如肉楔子一般嵌入。窗外的手电光扫来扫去，终于，车发动了。在路途中，押运的公安不时爆吼："老实点！挤紧点！人肉是有弹性的！"

那晚到底抓了多少人，至今是个谜。在路上，我听见两公安聊天，一个发愁说："一下子抓这么多，咋整呢？"另一个答："依我看，把这伙子整编成一个师，送到老山前线来一个大冲锋，把啥问题都解决咧。"

老威：这警察没一点法制观念。

魏西：严打就是乱打，我们一进公安三处，大铁门哗啦敞开，只见房沿、墙根，一溜溜蹲着的全是人，也不晓得我们是第几批。一个老公安懒洋洋地坐在桌前，把臭脚丫缩上椅子，起劲地搓着，并眯缝着眼，一边办交接手续，一边从纸上抬头对号。当轮到我时，他将搓脚丫的手拿起来，直戳我的脑门："你就是魏西？你在社会上名气大啦！"

我吓得一哆嗦，暗叫："糟了！"不料过了一刻钟，又进来一车人，那老公安在对号时，又用臭手戳了另一个倒霉蛋的脑门："你就是张京？你小子在社会上名气大啦！"

在凌晨 5 点开审前，老家伙起码重复了上百次"名气大啦"，每次都唬得人屁滚尿流。天蒙蒙亮时，我被唤进屋过堂，此前我已

把“案情”在脑子里滤了十几遍，打了详尽的腹稿，我以为至少得耗几个小时，不料，5 分钟就完事。公安打着哈欠记了姓名、年龄、工作单位，最后问了声：“犯的啥？”我刚答“家庭舞会”，立即被截住了：“行啦行啦，花案嘛。”接着叫：“下一个！”

6 点钟进收审所，7 点钟再次登记，更简单，令人觉得是屠场在收猪过磅，烙上一戳。大致对话内容是——“犯的啥？”“跳舞。”“什么跳舞？花案嘛！”见我懵懂，就顺嘴补充：“花案就是流氓。”我才知道我犯的是流氓罪。

那天早上下大雾，看不清人，磨蹭了许久，雾散了些，地上蹲的脑袋才慢慢显豁出来，密密地看不到头，估计至少有两三千颗，十分壮观。

老威：哪有这么大的收审所？90 年 3 月，我在重庆被收审，里面虽然热闹非凡，但也超不过 500 人。

魏西：你说的是正常时期，从重从快的严打时期，一通宵抓几千，往哪儿关？连公安局都发愁。寻常的号子塞不下，就把西安市××劳教所腾出来，改成收审所，这地方在郊外，老康早年曾在里面战斗过。

老威：也塞不下几千人。

魏西：你忘了人肉是有弹性的？至理名言呀。连老公安都傻眼了，他们也没见过这阵势，洪水一样一浪压一浪地涨进来。据说他们“紧急报告”了几次，称再这样塞下去，闷死人是谁的责任，如果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局面就不好收拾……上级却下令严防死守，说关多关少是方法问题，关不关是个立场问题，扛过热天，秋凉就胜利了。

先剃头后进号，这程序你清楚。我蹲在地上，那推子连续作战，弄光了上百颗头，已钝得像锅铲。狗日的用这发烫的锅铲，在我头上硬炒，东一块西一块，留下些撮毛的同时，扯掉了若干头皮。这大约是我平生遇到的最恐怖的理发匠，搞得我猢狲一般猛眨眼睛，终于，一颗疤痕累累的“花砂”诞生了——“花砂”是西安号子的黑话，你懂么？

老威：牢里每个月必须剃头一次，我经常成“花砂”。

魏西：入了号子，一间教室那么大，装两三百人。象一粒灰尘落入了飞转的马达，从此，耳边的嗡嗡声就没断过。骚哄哄的热浪扑面而来，想在门边再吸两口新鲜空气，已来不及，有无数的手无数的声音在边吼边搡：“朝里走！朝里走！”

两排长长的通炕，中间是走廊，我木头人一般朝里卷。一抬眼，发觉满目人肉，在蒸腾的肉雾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一丝不挂，剩下的三分之二只穿个裤衩，稍不留意，一根或几根锤子就甩过我的脸或嘴巴。“朝里走！”的鼓噪大约持续了几分钟，我终于抵达墙根。尿骚熏得人热泪盈眶——原来 9 个大尿桶贴墙排开，每个桶都满得溢出来，可还有人不断挤来放尿。两个瘦骨伶仃的孩子就倒头睡在尿里，居然没一点动静。

桶满了，大便者就直接拉在手纸里，然后包扎一番，大喊：“手榴弹！”朝尿桶里扔。若有人反应迟钝，屎弹就在身上爆炸。开始我感到这太过分，还愤愤不平，稍后就习惯了。屎弹往往引发号子内的春秋大战，大伙借机发泄一番。只要没出人命，公安都不露面。

老威：据我所知，号子里行规严酷，哪会这么一团糟？

魏西：俗话说的“监有监规”，指的是老犯众多新犯孤身的情况，可严打是春秋战国，没有规矩。你想想，几天内卷去那么多人，谁也不摸谁的底，连公安都是懵的，咋整？

老威：只有开打。

魏西：单凭两拳头打不出结果，搞不好啥没打着，自己先散架。

老威：这么说，你就从新贼朝老贼，一步步熬去吧。

魏西：我睡最里面的板。200 多人就一个窗户，透不过气，我也将自己剥光了。拉铃了，两犯人一组，搂腰，一个把腿插入另一个的裆里，喊“一二三”，人卜通下去，肉和肉就贴得没缝了。整个号象超级沙丁鱼大罐筒，沿走廊两边码过去，热汗犹如红锅里的猪油，化开了，烟雾腾腾。我个子太高，加上卜通摔板时，动作生疏，脑袋一下子悬空。回缩无缝，就只能吊着头打盹。一天一夜没合眼，才犯迷糊，就见侵华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密密匝匝地俯冲。

我下意识地哆嗦，一巴掌抽醒自己，原来是从一尺开外的尿桶群直扑过来的绿头苍蝇，蚕豆大的几百只，嗡嗡叫嚣着袭击人肉。我刚才那梦中一掌，已将五、六只苍蝇拍扁在右脸颊，顺势一抹，蝇尸就坠落坑下。

这一夜，我在似醒非醒中不知道抽了自己多少耳光，蝇尸碾碎在脖子周围，犹如出水痘。啪啪声此起彼伏，四周好些手臂有气无力地坚持作战……终于，天折腾亮了，离起床还有几十分钟，我一下子睡死了。

老威：以后呢？

魏西：以后，当然是动心思，向上奋斗，谁也不想过满脸苍蝇的日子。号内花案大约十几个，有文化有智商，一会儿功夫就串通上了。互相一报名，要么是熟脸，要么“相见恨晚”，因为那年月，与贴面舞有缘的，几乎都是有点背景的前卫青年。大伙马上抱成一团，要弄出一片天下。

机会说来就来，管号老公安王叔在早饭后驾临，隔着铁栅叫“大专文化的举手”。雾腾腾的房里有五、六只手举起，我虽然是初中生，也麻着胆子举手冒充。王叔点完数，接着命令“举手的出来”。

这个王叔吃了 20 年公安饭，心肠不坏，所以犯人以“叔”相称，他把“知识分子”们唤出，意在提拔重用，文明治监。我接受的任务是发馍。

老威：美差吧？

魏西：鬼知道。监狱的定量是每人每天 9 两，经过剋扣，每人每顿就一个黑面蒸的馍，外加一勺老菜汤。刚进去的人，肚里还有油水，感到这黑馍像锯末，一嚼满口钻；三四天后，这锯末就顺了，不刮喉了；再过一两天，饥焰熊熊燃烧，锯末一入口就化了，你吧嗒着嘴，回味无穷。

我刚到，肚里有些油水，所以发起馍来就显得小人得志。我双手提箩筐，从靠门往里发，一人一个，铁面无私。可发到老犯大老蔡的跟前，那家伙一欠身，叉开十指，叼去四个馍。这大老蔡可是个人物，十几岁开始，就踢破公安局门坎，如今 30 多岁，就已有

十几年牢龄，连管号公安也得依他两分。我懵里懵懂，小鬼不认阎王，居然又把他叼去的馍抢回。这下惹了祸，大老蔡的手下，都是行窃高手，转眼之间，我的馍筐就被挖出一大坑，我还挨了一顿乱打。

我大吼报警，王叔赶至，将大老蔡客气地唤出，好言相劝一番。又吩咐补够失踪的馍数。好歹完差，大老蔡狠狠地瞪着我，号内众贼蠢蠢欲动，都传言："这小子得罪了大老蔡，死定了。"

我暗中作了提防，不料大老蔡阴沟里翻船，被几个小娃治了。这些娃是晚上进号的，炕上挤得插不下腿，几个瘦猴样的娃东瞅西溜，见大老蔡等七、八个都是大平躺，一人占了三、四人宽的地盘，自然就朝那儿凑。可屁股蛋才怯怯地挨着炕沿，就叫大老蔡闪电一脚踹翻。那个娃跌倒时，后脑勺撞得鲜血迸溅，顿时晕头转向。

几个娃都才十五、六岁，比狼崽还毒。第二天我发糊糊，大老蔡和他的手下，排在十几颗脑袋后，远远地冲我冷笑。眼看要豁出去，我抄着铁勺，手心正冒汗呢，却见原先焉在马桶边的破头小娃从地上爬起，反捏着盛糊糊的洋瓷缸子，游泳一般向前挤……终于接近了仇家，小娃一猫腰，呼地蹦起，双拳握洋瓷缸子猛击大老蔡。号内大乱，人事不醒的狱霸被抬了出去，跟着，几个娃也转了号。

老威：天下自此太平？

魏西：在王叔的纵容下，花案犯们颠覆了老盲流集团，睡上了第一块板，靠门，大平躺，真他妈舒服！我们的花案联盟肃清了每个企图造反的贼，越战越勇。人肉太恐怖了，笼罩在其中，谦谦君子也会被改造成暴徒。特别遇进新犯，大家都恨不得让他立即消失。我们曾收拾一个扒窃火车的大块头，三个打一个，两分钟全趴下了，因为他刚来，体内油水足，有劲，而我们已饿极了，拳头过去，比棉花还软。

老威：牢头总有些特权吧？

魏西：饥饿面前人人平等，哪怕号长，也不能多吃馍，只能多喝几口菜汤。

老威：这同我坐过的牢不一样。

魏西：按平常的号规，公安之下，号长就是班房老大，由下面供着。可严打是春秋争霸，没号规，连法律也不讲。比如看守所超员，腾不出空间，大量进去的已决犯人也同我们搅一块，死刑犯就关隔壁。本来毛泽东思想武装过的人绝不迷信，可某个半夜，我突然被一阵阵猫头鹰叫惊醒，寒毛直竖。我坐起来，号里的犯人已醒了大半，都支着耳朵，听那一声声长唳。大伙议论说，明天肯定开杀戒啦，从古到今，猫头鹰一叫，必有人死。唐山大地震之前，不仅猫头鹰，连蝙蝠、老鼠、猫和狗都仰天叫得格外凄惨。

我又倒头睡，心跳却敲鼓一般。迷糊了片刻，大约凌晨三点，旱了一冬天，居然下起了飘飘大雪，却听见隔壁铁镣响。有经验的老犯马上说，开始"验明正身"了，5 分钟一个。7 点钟，我们起床，隔壁的法律过场刚走完。一老犯倒抽一口气，吃惊说："我的妈，今天要飞 62 颗头！"

果然，西安市在严打运动中毙了三批，第一批 45 颗，第二批 62 颗，第三批记不得了，估计要少些，因为批量杀人的间隔太短，人民群众再怎么"拍手称快"，血腥气也太浓了。

老威：真是"彭老醋一到，砍头如割草"。

魏西：你嘀咕啥呢，川耗子？

老威：83 年流行过的顺口溜，当时彭真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憋着一股恶气主持政法工作，这叫驴日的山西人，好喝醋。

魏西：一口醋缸淹死好几万。我们号里有个娃，几根骨头加几根筋，看上去，比秤杆高不了多少，却犯了暴力强奸罪，死刑！他整天哭哭啼啼地喊冤，烦透了，我就问他咋回事？他说，逑的暴力强奸，那是我女朋友，我们好了几个月。我说，好得再久，女方不同意，也不能硬搞。他说，谁赖我搞啦？我没搞。我说，没搞？谁信？他说，本来嘛，十六、七岁的人嘛，骚得起火，可是她家里有人，我家也有人，没地方搞。青天白亮，我拉着她，坐公共汽车，四处窜，累得呼哧呼哧，就是找不准地方。人嘛，高等动物嘛，又不能像畜牲，想搞，就拿出锤子搞，没谁监视。她家管得严，天一黑，就必须回家。

老威：憋成这样，到旅馆吧。

魏西：你忘了，80 年代，旅馆都要证明？况且每个房间都有监视孔，从里面不能上锁。因此那娃继续说，我们窜了好多天，总算在郊外寻见一块麦子地，立刻就倒进去抱上了。摔跤一样翻来翻去，我从她的衣领使劲掏奶，吃了几口，奶就滑进去了。我又扒她的裤子，拿锤子往里塞，我以前认为很容易搞，结果呢，她不会，我也不会。这戳那戳连洞都没挨上，腰杆子一麻，流水了。我跪起来一看，成泥锤子了，刚才搞的是土嘛！我和她又是土又是麦穗，抖衣裳就费了半天功夫，还要一根一根拣她头发里的穗芒！划不来，搞几秒钟，锤子都抵肿了。从郊外等公共汽车，朝回赶，天就黑了。她急哭了，骂我流氓。我说都流氓，一个巴掌拍不响嘛。

回家以后，她爹三审两审，她就招。于是她爹娘向公安局报案，我就落网了。审了两回就开庭，法官在上头念完《判决书》，我一听是“死”，急得当庭叫唤：“我干了个咋么？我没搞嘛。向毛主席保证，我就吃了两口奶。吃奶也判死？”可是法官把判决往桌子上一搭，语重心长地教训我：“娃呀，人一辈子，就你娘的奶能随便吃，别人的奶，你一吃一个死！”

老威：这法官在演话剧呢，后来咋样？

魏西：这娃不服上诉，改判死缓；再申诉，改判 15 年；第 4 次申诉，改判 10 年，最后，原告翻供，证据不足，放了。

老威：闹着玩么？

魏西：刚才说到的大老蔡，是郭××抢劫集团的二被告，此案一死两缓，多人判有期。据说在法庭上，法官边宣判，郭××边叫骂：“我弄你妈！劫了点浮财，你就判死！”法官憋了一肚子火，坚持念完文件，方吐口长气，一摔卷宗，起身指着那贱骨头回骂：“你死都死逑，弄得了我妈？我弄你妈！”

老威：这叫法庭？分明是庄稼老汉在野地斗嘴。

魏西：玩命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所以金圣叹的断头遗言是：豆腐干和花生米同嚼，有火腿的滋味；老子则言生命如水。到了两千多年后的社会主义时期，人多命贱，水就变成尿了。

老威：一段充满了尿臊味的高见，请继续。

魏西：那好，我来提供“水尿说”的依据。在收审号中，每人每天定量供应一缸子开水，排队打进来，晾在那儿，慢慢匀着喝。天气酷热，虽然人人都想敞开肚皮灌个够，但坐牢既是熬磨，你就必须掌握节奏，不急不躁，一次吸两小口，润润喉咙，舔舔嘴唇，就该满足了。

老威：你们一天放几次风？

魏西：一次，主要是倒尿桶，上茅坑。那茅坑是露天的，分两排，大约十五、六个坑。这坑里的蛆和苍蝇肯定上亿，屁股一下去，轰地一声炸营了。放风时间只有 10 分钟，两百多号人，必须在 10 分钟内卸完包袱……你想想，这是多么繁忙的景象，一个坑，蹲三、四个屁股，白白地凑到一处热闹，连苍蝇都顾不上赶，因为旁边还站着提裤腰，数秒催命的家伙。

老威：便秘者咋办？

魏西：时间一到，提裤子滚蛋。

老威：除了屎尿，可以在院里接自来水喝吧？

魏西：水管早堵了。人太挤，容易爆发痢疾，甚至更严重的传染病，因此所里不准犯人喝生水，逼大伙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老威：挺人道的。

魏西：是挺人道。有一次，牢里锅炉坏了，断水三天。大热天断水，不要人的命？事后想起都觉得奇怪，怎么熬的？不渴死，也得憋死，因为号里的空气全是尿。不仅仅是尿，是提炼出来的尿素，就筷子头那么一点，就能熏熟一分地的庄稼。我都恍惚了，一昏沉，就梦见喝尿，越喝越渴，越渴越喝，直到醒来，觉得嗓子眼已结了一块尿碱，又咸又苦又涩，一咳，刺痛难忍。人缺了水分，明显地干瘪下去，好在第二天，屙尿的只有十来个，接着就没人亲近尿桶了。第三天，号里鸦雀无声，连打饭都如梦游，个个两眼笔直。就在这关口上，我听见有声音叫我，凑近门栅，才认出是王叔。“拉水。”

他这么说。犹如导火索拉燃弹药库，就在我眼冒金星的瞬间，号内轰隆一响，200 多人全都手提瓷缸子站起来，向前扑。王叔开锁放我出去，然后说："你们等着。"

顺着走廊，一股新鲜空气迎面袭来，我连抽几口，直达肺腑，整个人几乎飘掉。我醉氧，一钻出房顶，过分充足的氧气压得我胸部巨痛。缓过了劲，我才拉起载了几个汽油桶的板车，跟王叔去监外拉水。终于，我见着了开水笼头，烫，喝不了。有人指了指旁边的温开水笼头，我立即拧开，双手捧着渴饮、狂饮、朝死饮。我大口大口地抽气，喉管象哨子丝丝响，然后又往死饮……最后，一股水从胃里反刍，直逼口鼻，憋不住，喷涌而出。

接着拉水回监，刚拢号子，里面全疯了。几十只、几百只瓷缸哐当哐当在墙上、炕上、地上砸，应着这刺耳欲聋的节奏，几十个，几百个喉咙一齐吼："给水！给水！给水！"唉，20 年过去了，这恐龙一般的声响还在回荡，令我在夜深人静时寒毛竖立。

老威：你应该把它写成个剧本。

魏西：谁来演？谁来拍？像《辛德勒名单》里的那种裸体犹太人排队进毒气室的大场面拍摄，谁不梦寐以求？类似的中国场景许多，比如打预防针，病人排着队，用同一根针头扎屁股，五秒钟喊一声："下一个！"转到我，针头扎弯了，狱医就咬牙切齿地用手掰直，瞄了瞄，继续使用；吃药也一样，排长队，上百张嘴巴得到的是同一颗治拉肚的黄连素。狱医身旁站一位端水的劳改犯，待小药丸一抛进嘴，就配合灌水，并命令你张口受检。

老威：太离谱了。

魏西：最离谱的是王叔遛耗子。我们敬爱的无聊的王叔，20 多年的老公安，整天捧个大黑茶缸巡视，东瞅西看。有一天，我们捉了只一尺长老耗子孝敬他。

老威：这牢里的粪耗子能吃么？

魏西：他没吃，而是遛。用个项圈套住鼠颈，每天牵耗子出门散步。王叔说："有钱人没事遛狗，咱公安人员没事就放放老虎吧。"

老威：听这故事，就晓得你已熬成老贼了。

魏西：我关了近一年，被判两年劳教。我的运气好，在节骨眼上检查出乙型肝炎，劳教所不要，只好退回原单位，由群众监督执行，并扣发工资，每月定期向组织汇报思想。

94 年，我花了 3 万元治病，好了，没留后患。

70　村民谢明

采访缘起：2002 年 4 月 30 日下午，我第二次与来省城上访的蓬安农民阙定明等人约定，在成都西玉龙街的某某招待所见面。由于案件主角突然回避，只得转而访谈 43 岁的配角谢明。

为了大家的阅读顺畅，我没能采用大量的地方土语，虽然这非常可惜，但我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这件事。苛政猛于虎，所谓三农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可怕许多。

应该说，冤案主角政治觉悟很高，信赖党和政府的各项农村政策，所以他过分自负，竟要通过反映、举报，依法查帐来揭露贪官，减轻乡亲们的人头税费，却阻力重重，最终被控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锒铛入狱。

“天哪，”据说他在法庭上仰天长叹，“这就是共产党的天哪？”

老威：我搞了多年的底层访谈，这个旅馆，我进进出出了好多回，但是昨晚看完了你们的上访材料，还是失眠了，用一句书面语来形容，就叫“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所以一大早就赶来了。

谢明：谢谢老威同志为我们作主。

老威：我一个跑滩文人，作不了什么主。我只能保证尽量真实地记录这个案子，让更多的人了解阙定明的冤情，至于以后咋样，不敢说。

谢明：这几年，我们接待了几十位报社记者，有的还亲自跑到中坝村走访，都说要真实地反映情况，结果都石沉大海。转眼间，阙定明的四年牢也坐满了，也没见有啥报刊公开报道过。听说新华社的内参登了，通了天，可整人害人的贪官至今还在台上耀武扬威，欺压百姓。时间拖得越久，越对贪官有利。

老威：想不到您还挺懂政治啊。

谢明：折腾来折腾去，中国人个个都炼成了政治家。

老威：我们还是书归正传吧：这份写给党中央、国务院等部门

的申述状可是您起草的？我挨着数了 3 个钟头，大约有 1100 多人在上面签名划押，手印盖得密密匝匝，真是触目惊心！

谢明：您的心这么细？看来有些来头。不过，这文章我做不了，至于谁能做，暂时保密。

老威：那就算了。

谢明：我直接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如果口水话太多，上不了台面，还得麻烦老威同志您花几把力气加工整理。

老威：您放心吧。

谢明：您晓得，我们的申述状标题是“嘉陵江畔第一案”，为啥这样说？因为在我们那儿，自盘古王开天地以来，还没出过这种事。你说国民党坏，苛捐杂税多，但是听老一辈讲，也就是乡长、保长、甲长带几个民团、乡丁进村来走几圈，催催摊派款；情况严重了才背上几杆破枪，壮壮声势。可在共产党手里，在公元 1998 年 4 月 14 日上午，朗朗乾坤，竟有 100 多名荷枪实弹的公安、武警驶着警车，冲进了我们长梁乡，封锁了各交通要道，接着包抄了四面环水的中坝岛。这帮兵匪的总指挥是蓬安县的父母官，县长孙明君。

老威：你们不过是普通的农民，怎么得罪了县长？

谢明：因为上访和查帐。1996 年 2 月以来，中坝村 5 组村民阙定明就多次向上级举报村社干部的贪污腐败，还就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多次上访，迫使蓬安县政府派出工作组，到中坝村调查。阙定明在工作组驾临当日，抄写了《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中央 1996⒀号文件，以及省农业厅对阙定明上访问题的批复意见，在村里张贴了好几处，还找了一面祖传的铜锣，边敲边喊，四方游走，通知大伙开会。他是个瘸子，一大拨娃娃跟着他，他喊一句“查帐！”娃娃们也跟着喊，直到全村 2000 多人都出来了，才挟着锣去接待副县长刘光福率领的工作组。

阙定明只有小学文化，可人耿直、仗义、见的世面多，所以他的口才在村里很出名。他当即走到刘副县长跟前，鞠个躬，代表村民汇报说：“我们长梁乡中坝村是嘉陵江畔四面环河的小岛，地势

低洼，河滩地种不了水稻，只能种玉米，花生、烟叶、油菜。广柑本来是传统产品，但无资金改良，也老化了，变不成钱了。全村 2300 人，负担人口 1910 人，耕地面积 992.5 亩，人均不足 5 分地，有的社还不足 3 分地。人多地少，在风调雨顺的年头也只能维持温饱，更何况常年遭灾（干旱、虫灾和洪灾），遇上特大洪水，村舍淹没，地里颗粒无收，青壮村民就只有成群结队逃荒，出去讨饭、打工，把国家救济粮省给跑不动的老小吃。幸好苍天有眼，阶级斗争不搞了，中央和四川省政府都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调动生产积极性，把近百种税费砍掉一半以上，后来又出台了《条例》，政策透明，我们到底可以直一下腰了：虽然天灾难免，但人灾总能免吧？93 年中坝村的人均负担为 40 元，94 年 50 元，95 年 60 元，如果一直按这个增长度，我们没啥怨言，乡村两级有那么多干部拿工资、补贴，农民不出钱出血供着，政府班子就瘫痪了。没人管事，影响了安定团结肯定不行——我们能体会基层政府的难处，但你们也该为我们想想，农民的钱是一分一厘从这块不争气的地里挤榨出来的，总有一天，这地就荒了，就大家都没吃的。一人出 60 元，一户六口之家，就要出 300 元。花生、玉米，几毛钱一斤，300 元要买多少？你们每天拿一分钟为我们算算帐，为土地算算帐，也就不至于在 1996 年，突然把人头负担提高到 170 多元，比上一年增加 180％！这就意味着六口之家要负担 1000 多元，而中坝村两年的人均纯收入才 483 元！砸锅买铁也出不起啊。你们于心何忍？

“当然，如果基层政府需要这么多钱来为老百姓办事，需要这么多钱去爱国爱党，去打击侵略者，推翻三座大山，我们也认了，卖儿卖女，卖房卖血都行。想不通的是，中央想减，地方却增，长梁乡好像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因此，我们这些泥腿子，也要依据法律、政策，要求查帐。全体村民都可以作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坝村就从来没有公开过帐务。“老阙的语音刚落，掌声就打雷一般响起来，整整持续了几分钟；刘副县长也感动了，当场和工作组其它人交换看法，同意了村民的查帐请求，并且说：“这是民主和法制意识的觉醒，共产党和蓬安县委为你们撑腰、打气。”

老威：关于农民负担问题，上面有什么具体的精神？

谢明：我这儿藏有 1997 年 9 月 1 号的《蓬安信息报》，上头全文发表了新修订的《农业法》和《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其中第九条明文规定：农民每年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上交的集体提留和统筹费的总额，以乡（镇）为单位计算，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5％，蓬安县委、县政府为此公开表态，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13）号文件精神，把减轻农民负担落到实处，并规定”村提留“、”乡统筹“不准超过县农业主管部门的数额。

老威：那 1997 年的人头负担是多少？

谢明：180 多元。

老威：我明白了，按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传达惯例，基层政府比你们预先知道了新政策，所以赶在实施期限之前，把人头负担从 60 元猛提至 170 多元，这样，在高基数上再增加，自然就符合”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纯收入的 5％“，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谢明：可人头负担增加了，纯收入并没有增加。

老威：那就做假帐，泡沫帐。

谢明：所以老阙提出查帐，可拖了一年多，不成。因为平头百姓查政府的帐，古往今来都没先例，虽然如今有法了，副县长也表态了，但县委班子调整，前任答应的事后任凭啥兑现？村民代表们乡里、县里，脚跑大了，人头负担还直线上升。老阙说：”这样下去，农民吃不起饭，政府的税费收不上来，恐怕人心惶惶，要暴乱了。“就在 1998 年 2 月 20 日，邀约中坝村各社村民代表十几人，一道去乡政府请求查帐。当时政府里只有副乡长唐杰超执班，其它干部都到乡治安员唐建国家吃喜酒了。唐乡长晓得大家来意，就说我们没有会计证，无权查帐。老阙说：”都是农民，哪来会计证？只怕乡政府的会计也没证。但我们有《村民组织法》，还有中央（13）号文件，请乡长您依法办事，兑现县上允许查帐的承诺。“姓唐的又磨了半天，见溜不脱，就签了字，并带领我们去农经站，找到站长代文平，提出 92 至 97 年的帐本。

我们喜出望外，就分头进行，各社代表查各社的帐。正上了劲，正乡长彭会昌吃喜酒回来，闻讯暴跳如雷，大吼：”反了！反了！搞颠倒了!“代表们不愿交回帐本，彭乡长又吼：”帐目坚决不许查，今天要打要杀，陪到底。“代表们气极了，就拉他上市里县里评理，争吵起来。闹了个把钟头，三个政府官员借故脱身，去乡治安员家汇合其它人，商量对策。下午，蓬安县委和政府接到密告，派调查组来长梁乡走访当事人，并在乡电影院召开大会，县委副书记兰坤发和副县长卫磊都讲话，批评了乡政府，同意并支持村民代表查帐。卫县长说：”对反贪污腐败的人要重用、大用；对查出有问题的干部，不管职位多高，权力多大，都要拉下马来，依法惩治。“还宣布：中坝村帐务清查小组正式成立，县检察院唐联喜副检察长任组长，乡党委副书记唐树全任副组长，村民代表任组员。

话音没落，全场鼓掌，大家都连叫”包青天卫县长“。于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帐务清理按部就班，先从群众反映最大的九社和十社开始。一上手，就查出十社社长漆文光贪污 2.7 万元；九社有数笔巨额款项跟县长孙明均有直接牵连（县里兴建马回水电站，九社全部房屋搬迁，时任马电公司董事长、总指挥的孙明均经手了国家下拨的巨额房屋街道重建款。马电计划投资 1.7 亿元，实际耗资 4.3 亿元）。谁也没想到，拔了萝卜带出一堆泥，一桩特大经济案眼看暴露——帐务清查被勒令终止。

父母官亲自出马了，村民代表不小心捅漏了天！1998 年 4 月 14 日，中坝村 2000 余位乡亲终生难忘，100 多警察带着枪杀了进来！兵分两路，一路包围乡电影院，把骗到场的村民代表阙定明、吕长君、谢自为打翻在地，反扭手臂，以十几支手枪和冲锋枪抵住脑袋。武警班长喝叫：“老实点，动就一枪崩了！”接着被拖出电影院，一顿拳脚。三人还被按跪在公路上，锁了背铐。当时在场有几十个村民，都骇炸了，四下乱窜着叫唤：“抓人！共产党抓人！”县委副书记兰坤发见了，命令鸣枪示警，并大吼：“今天接到密令，如有妨碍执行公务者，就地正法。来几个杀几个，先斩后奏！”在阙定明等三人被拖上囚车带走的同时，武警大部队已过河包围了中坝村九社，挨户进行大搜捕。大祸临头，许多村民房门紧闭，但都

被踹开了。当然，农民家穷得叮当响，一眼就望穿了，于是兵匪们又驾着警车，冲进庄稼地，碾倒大片庄稼。正在地里干农活的村民代表何文有，还没弄醒豁，就被枪托砸翻，嘴巴啃泥，戴上铐子。站在一旁的青年吕德良，只有 20 岁，血气方刚，质问了一句："光天化日，你们凭啥……"话没落音，就挨了几拳，口鼻直喷血，跟着，也被戴铐扔进囚车。

一帮兵匪歪戴帽子，在宽阔的田野上施展威风，谁敢吭气就打就抓。受伤的村民横躺在地里，没人管，而警车却一路拉着警报，制造恐怖气氛，老人和妇女都吓得发抖，紧紧抱住自己家的强劳力，不让再出门惹祸。还在外头的村民，像受惊的鸡鸭，哇哇往家跑。警车不停地撵人，横冲直撞地耍疯了，村民代表吕功辉被撵到嘉陵江边，跳水逃命，差点被淹死。兵匪们耍尽兴了，就鸣着警报到县轮渡码头会师，命令俘虏们当众跪在河边，打得死去活来，群众远远围观，指指戳戳，还以为破获了一起抢劫杀人集团。

阙定明等五人被关进县看守所，三天三夜的刑讯逼供，精神几乎崩溃，只能在审讯人员早已写好的定罪材料上签字划押。一个月后，除老阙外，其他"认罪态度较好"的四人均"取保候审"，作为释放条件，四人书面保证："一，不准对外说案情；二，不准走亲访友；三，不准上告。违者再抓进来，罪加一等。"

"首犯"阙定明继续坐牢，在此期间，县太爷孙明均指挥的专案调查组进驻中坝村，拎着手枪、手铐，揣着《拘留证》"收取"已定证据。为了逃避作伪证，村民们纷纷在夜里外逃，十几个村民代表更是有家难回，20 多天在河边荒草地露宿，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投嘉陵江。天老爷，这是啥日子？蚂蚁都有巢，难道做农民连蚂蚁都不如？

老威：这狗日的贪官也太狠毒，贪了，不让查；不让查就算了，还要搞恐怖活动，封人的口，这和本·拉登有啥区别？老谢，您可晓得朱镕基总理说过"预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的话？

谢明：中国起码有几十万贪官，见钱不怕死，所以几百个朱容

基也不够用。

老威：湖北监利县有个乡党委书记，叫李昌平，曾经为民请命给朱镕基写信，他反映的人头负担问题同中坝村大同小异，我念一段给你听听：“农民不论种田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 80 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 500 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跟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又涨了，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涨，唯望天地哭。”

谢明：这是个有良心的好官，可惜没生在长梁乡。

老威：接下来有：“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多么不公平啊。”

谢明：变了农民，脸朝黄土，就没啥公平的，我们从没要求公平，只求能过得下去。

老威：没想到您还挺平静。

谢明：眼泪已经淌干了，老阙为中坝岛坐牢，大家的眼泪都流干了，他不是官，就一个农民，一个瘸子，却心比天高，非要拗这个劲。他和清官一样，为民请命，但写不了那么好的文章，小学文化，给市长、省长写信都不行，词不够用，不够用来形容当农民的苦。何况总理，这么大的国家，只有一个总理，绝对看不过来。农民的眼泪只能把农民自己淹死。

老威：我理解，请您继续讲。

谢明：这是命，阙定明命中该坐四年牢，1998 年 9 月 14 日，蓬安县检察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向法院提起公诉。10 月 7 日，法院开庭公审，被告和辩护律师都作了“无罪申辩”。群情激愤，几百名当地村民将法庭内外挤得水泄不通，大家举着“阙定明冤枉”的横幅，多次从旁听席上起立发言，要求释放被告，惩治贪官。法官多次制止无效，就宣布休庭。因证据不足，11 月 3 日，

县检察院撤回起诉。11 月 5 日，村民们聚集法院门口，要求依法放人，刑庭庭长刘某某出面接待，并压低嗓门对大家说："阙定明的确无罪，法院判不下来，可是县委主要领导一再施压，我们叫他们签字，我们判，他们又不签。"

权力干预司法的结果，1998 年 12 月 1 日，县检察院第二次提起公诉，罪名和罪证无一字改动。12 月 22 日，县法院开庭审理这起轰动一时的冤案，为了防止骚乱，县委书记谢发国亲自出马，在县邮电局设立临时指挥部，致使城内电话中断数小时；并出动大量警力，在城外拦截从成都、南充等地赶来采访的记者。

全城戒严了，岗哨林立，公路和水路交通被封锁，警车响着警报在街上巡逻，水上派出所出动汽艇阻拦从中坝岛过江的渡船，超载的渡船在江中摇摇晃晃，眼看要沉了，汽艇才网开一面。

而在庭上，检察官和律师嘴仗打得激烈，只听律师声音洪亮地说："本来'奉命起诉'，'奉命审判'，权大于法已成为过去，然而在新刑法、诉讼法颁行的今天，又重现这个问题，这将是我国法制史上的一个悲剧、蓬安县的悲剧。因为，只有千年的百姓，没有千年的官，你可以镇压一个阙定明，而无法镇压百万蓬安人。一个阙定明被镇压下去了，千百个阙定明会站起来，历史将宣判阙定明无罪。历史将把蓬安的大、中、小贪官钉死在耻辱柱上。历史上的莫须有都是这样，可以压得了一时，却不能压一世，历史上的秦桧，至今还跪在杭州的风波亭外，受千人骂，万人打。"

老威：这律师胆够大的。

谢明：他是南充的律师，蓬安管不了，而且他实在被气毛了，明摆着的冤案嘛，硬要开庭。到了中午，天阴得很，几千群众不断线地涌入法院，挤在旁听席，为阙定明和律师鼓劲；而检察官一开口，群众就起哄，喊冤枉，法官制止不了，就连连叹息。到最后，检察官就只擦汗，不说话，蜷在座位上，像受气的小媳妇；而律师穷追猛打，滔滔不绝，把法警和城里人都感动得热泪直流。阙定明在被告席上，边哭边冲着四面八方拱手道谢，连说："我满足了，满足了！"拖到下午 3 点，法官摸出事先拟好的官样文章宣布：判

处阙定明有期徒刑四年。

老威：依据是什么？

谢明：前头已讲了，是因为98年2月20号的查帐。

老威：我看过南充市中院的“终审裁定”，纸上的罪名有：私立社员代表；聚众强行提帐；殴打乡干部，致使一人轻伤，两人轻微伤，共用去住院医疗费五千多元；致使乡政府当日瘫痪。

谢明：纯属造谣，律师在法庭上已逐条反驳：村民代表是根据卫副县长和工作组的指示，由各社自己推选的，小社2名，大社2—4名；定期张榜公布帐目，允许村民查帐也是中央（13）号文件第2条第2款明确规定的；至于殴打乡官，在场的群众都写了证明，阙定明没动过一根指头。您想想，十几个泥腿子对两、三个乡官，若真要打，狗日的早爬不起来了，咋会只是轻、微伤？从古自今，只听说官欺民，很少有民欺官的。律师说，鉴定书是伪证，因为2月20日出事，伤者24日才住院，直到4月29日才通过法医鉴定，早过了“24 小时内验伤，过时不认”的期限。还有，破一点皮，就赖在医院不出来，花去国家5000多元，也太贪了。

老威：5000多元是十几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吧。

谢明：这样下去，我们在本乡本土都呆不下去了，98 年发特大洪水，村庄淹了不少，大春农作物颗粒无收，但人头费还在提，管理费提得更高，老人和小孩都分摊。农民，祖祖辈辈，守着一亩三分地，可现在，地里出不了东西，养不了人，你不种地，跑了，可税费还得交，在外面打工挣血汗钱回来交。不然，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等村、乡干部下来，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黑啊，太黑啊，我爸已七、八十岁了，他说还是毛主席好，毛主席至少不会让干部随便抢社员的东西。阙定明就是个例子，他只是想查帐，反反村官，他从来没想得罪乡以上、县以上的官，自己才几斤几两？但他的命太硬，一摸帐本就发现大问题，查下去，县太爷就下不了台。若在文革中，就把这贪官当走资派打了，现在呢，贪官一批比一批密，你垫脚后跟也数不到头，阙定明敢反，敢怀疑人头负担有鬼，就扰乱了社会秩序，就有枪杆子对准他。

老威：看样子您很悲观。

谢明：年轻人活不了，还可以去抢去偷，我已 50 多岁，没有身体本钱了。我陪着老阙上访，打官司，这条路再长也要走到黑。大不了要饭，当盲流。除了房子和地，农民已经没啥可失去的，要关要杀，他们看着办吧。

附录：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1999）南中法刑终字第 29 号

原公诉机关：蓬安县检察院。

上诉人（即原审被告人）阙定明，男，生于 1952 年 4 月 27 日，汉族，四川省蓬安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蓬安县长梁乡中坝村五组。现押于蓬安县看守所。

辩护人：冯开熙，南充市金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蓬安县人民法院审理蓬安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阙定明犯聚众扰乱秩序罪一案，于 1998 年 12 月 24 日作出（1998）蓬刑初字第 93 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阙定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1996 年下半年以来，被告人阙定明为了搞垮中坝村村级组织，利用群众关心的提留等问题，先后书写大字报张贴，打起锣走村窜户煽动，私自确定社员代表进行活动。特别是在 1998 年 2 月 20 日上午，被告人阙定明组织带领数十名群众到长梁乡政府提帐。先后将副乡长唐杰超、农经站长代文平围住进行推搡，当乡长彭会昌出面制止时也遭到阙定明等推、打，致使三人受伤住院，经法医鉴定，唐杰超为轻伤，代文平、彭会昌为轻微伤，用去医药费近六千元，致使长梁乡机关、单位当天无法正常工作。同时阙定明的行为使基层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中坝村提留款项无法收缴。原审认定被告人阙定明的行为已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且系首要分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之规定，判处其

有期徒刑四年。宣判后，被告人阙定明不服，以其是受迫害且查帐是依法、有组织进行的等为由向本院提出上诉；其辩护人辩称该案人为的假案，应宣告无罪。

经审理查明：1998 年 2 月初，上诉人阙定明等人到长梁乡政府找到乡长彭会昌要求由自己对本村的财务帐进行清查，彭给阙等人作了解释并当即决定由乡政府出面组织对该村的财务帐进行清查；随后乡上召开了有关会议进行安排布置，决定成立查帐小组由乡武装部副部长刘国福带队。2 月 13 日查帐小组到中坝村准备召开动员大会，后因逢场、下暴雨等原因，未开；第二天查帐小组找到中坝村文书谢建国准备查帐，但因谢要抢修被风吹垮的西瓜蓬，致使查帐工作暂停，同月 20 日上午 9 时许，上诉人阙定明便组织中坝村由其个人确定的所谓社员代表等人共计数十名，来到长梁乡政府所在地，上诉人阙定明首先对副乡长唐杰超说："今天我们是来提帐的，不提帐就提人"。同时用手推了唐一掌，唐在解释无效的情况下，拒绝了上诉人阙定明的无理要求，上诉人阙定明等人便抓住唐的手和衣服进行推、搡，部分人员还对唐进行拳打，唐被迫到厕所躲藏，上诉人阙定明将唐找出，并强迫唐在其事先写好的提帐申请上签字，随后上诉人阙定明等人又找到乡农经站长代文平，要代交出有关财会凭证，遭到代的拒绝，上诉人阙定明称"是代在装怪"并打了代一掌，随后其他人员将代围住进行拳打和推、搡，代文平被迫同意交帐。此时长梁乡乡长彭会昌闻讯赶到予以制止，上诉人阙定明冲去打彭背部一掌，其他人员围住彭进行拳打，并将彭的手提电话天线折断，彭被迫离开现场。当日下午二点左右，上诉人阙定明便安排社员回家吃饭后再来；一个多小时以后上诉人阙定明等人为了壮大声势先后聚积了几百人到乡政府，直到晚上经有关人员疏导才得以离开，当日乡政府工作陷于严重瘫痪。乡长彭会昌、副乡长唐杰超、乡农经站长代文平被打后均住院治疗，共用去医疗费五千余元；后经法医鉴定唐杰超所受损伤属轻伤，彭会昌、代文平所受损伤属轻微伤。认定上诉事实有阙定明及其他参与者的供述并与受害人唐杰超等人的证实相映证；围观群众及乡政府有关部门均证实当日乡政府部门工作处于瘫痪；蓬安县委、县政府 1997

年 8 月 15 日作出的蓬委字（1997）57 号《关于全面开展农村财务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了财务清理方法和步骤，要求由党委、政府牵头组织，社员代表参加，有序地进行；这进一步证实了阙定明等人是无组织的非法活动。

本院认为：上诉人阙定明无视政府有关规定，私立社员代表，并以其为首聚众到乡农经站准备强行提走有关财会凭证，当遭到拒绝时又致伤多人，情节严重，致使乡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并造成严重损失，其行为已构成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阙定明在上诉人中辩称其是依法，有组织进行的理由，经查与政府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其辩护人辩称这是一起假案的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一百八十九条（一）项之规定，本院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李文明

审判员袁彪

审判员陈登科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罗勤阳

71　村小老师许长久

采访缘起：这篇谈话进行了几次，最后一次是 1998 年 11 月 6 日，在成都百花潭公园门口的茶馆。

许长久 50 多岁，是下到川北某县的老知青，教过村小，在当时的文教系统还比较有名。虽然他讲的东西年代久远，几乎没人再愿听，但我还是不知不觉被感动了。

小时候，我记得有部苏联电影叫“乡村女教师”，许长久无疑是它的中国版，如今，记忆的胶片已逐渐模糊，并出现多处空白。

老威：我们谈了好几次，互相都感觉比较隔，什么原因？

许长久：我们是两个时代的人，历史背景一变，有些东西沟通就难。

老威：难在啥地方？

许长久：一时说不出来……你好像喜欢戳人的痛处……

老威：你可以反击，戳我的痛处，也许我会跳到桌子上与你吵。真的，我没感觉你比我大多少。

许长久：10 岁，一个轮回吧。

老威：但你没把这世界看透，不肯豁出去，所以这辈子显得平了些。

许长久：毛主席说：“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老威：这也是你的座右铭？不错，伟大。不过我要的不是这个。我不是新闻记者，不是圣人、领导，我对境界啦、白领啦、好人好事啦、一夜成名啦都不感兴趣，因为所有的成功者或超凡脱俗者全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连说话的语气都差不多。就像你刚才引用的最高指示，老干部、老军人、老知识分子、老工人，经过几十年风雨人生，现在离休，钓鱼或打太极拳的，都有资格这么说。虽然如今世道风雨飘摇，人心险恶，谁能完全“闲庭信步”？

许长久：你我都是小人物呀。

老威：小人物的痛才是真实的，没人理解，甚至没处诉说的。

许长久：所以尽量别诉苦。鲁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写出了《祥林嫂》。这个农村寡妇的儿子被狼吃了，她一遍一遍地找人说，结果谁都不耐烦了。任何社会都一样，只有成功者有权诉苦，名星、政客、记者和企业家，成天在电视、报纸上诉苦，老百姓反而喜欢听，还感动。例如某女歌星与男友拌嘴，掩面而去；某市长为了办实事，作表率，深夜下不了班；某企业家向山村小学捐钱献爱心，他的孩子还躺在医院里。生活中处处充满成功者的阳光。我看过《北京人在纽约》，当王起明穷途末路，准备离开纽约回北京时，他对阿春说他厌倦了，他讨厌这鬼地方。阿春却回答："只有成功者才有权利这么说，你失败了。"好家伙，穷人连骂街的权利都没有！这资本主义一旦霸道起来，与文革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差不多，逼得你发狠、吃人。如果你老了，牙齿钝了，已经没有吃人的力气了，只能忍着，趴着。怎么啦？你不可能让我忆苦思甜。

老威：你的脑子还挺活跃，这很出我的意料之外。好吧，松弛一下老许。你不愿讲自己，我绝不勉强，不过今后你再难找到我这么忠实的听众。

许长久：这倒是实话。

老威：你讲讲别人也行。透过时间去看那段历史，许多东西还是有趣。

许长久：你这是绕圈子来掏我的话。

老威：这样说就没意思了，我又不是警察审案。

许长久：的确没意思。我 50 多岁，其中有 10 多年的黄金岁月被农村耗掉，等到真醒过来，啥都干不动了。

老威：听我爸说，你教过村小？文革中的村小比希望小学咋样？

许长久：差远了。希望小学虽然简陋，毕竟教师和教室还有；我教的村小，就是座破庙。据说原来还有和尚。文革破四旧，撵了

和尚，砸了菩萨，改造成生产队的保管室，后来鼠害、盗贼都猖獗，保管室又迁走。大队领导商量来商量去，为了避免封建迷信卷土重来，决定在庙里办村小。这庙办村小离公社所在地石牛还有几十里，又穷又偏僻，没一个民办老师愿来献爱心。大队支书没办法，只好就地取材，起用一个解放前的私塾先生，叫张红旗，当时已 50 多岁了。

大队按正规手续，逐级申报，上级拖了几个月，下文只承认代课教师资格，由公社发月津贴 26 元 5 角，大队擅自克扣 10 元，但按当地 7 分钱一个劳动日的标准，张红旗算“富农”。

68 年秋天，我下到石牛当知青，鬼使神差地做了张红旗的同事。本来公社的意思是让我取代张红旗，但 60 多个孩子，我一个人咋教？大队也不同意。支书把原扣的 10 元钱还出来，由两位教师均分一个人的月津贴，不足的部分拿工分弥补。

破庙建在大山脚底，早向阳，晚背阴，据说风水很好。正殿为教室，板凳和课桌一字儿地并了七排，每排坐八人，余下的六人就挤坐入殿的高门坎。班级按竖排分，两人一桌，从左至右，一、二、三、四年级。学生的年龄从 4 岁到 18 岁不等，依个头大小排前后坐次。而老师的讲坛就直接置于铲除了佛主的莲座，授课时高人一等，且目空一切。

生产队把右边偏殿隔出两间，算教师寝室兼教研室，空神龛在我这边，我顺着神龛铺床，隔着蚊帐，床后并着一口红漆老棺材。刚到时天已晚，队长领着两个人用长竿扫帚为我搞卫生，大块大块的黑灰直朝下坠，吓得我朝殿外退，却正撞见张红旗一手端油灯，一手扶一位驼背老寿星进隔壁。我上前认同事，他只咧咧嘴，就要关门。我注意到门上贴着大红喜字。心里纳闷：这人脾气怪得出奇，乡下都兴早婚，他偏独反潮流。也许是续弦？我趴在门上窥视，瞅见两人正添柴煮饭。灶前火光熊熊，我想真是个孝子，连蜜月新婚也顾着老娘。

老威：这情景有点像古代。

许长久：大山沟沟，百年一景，看不出有多少变化，至于某朝

某代，一溜烟就过去了。比如我在爬坡时突然听到林彪在温都尔汗爆炸了，感到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接班人咋会反党叛国呢？而农民就不会惊讶，甚至没有“不相信”这一说，上面的文件下来了，队长让会计在灯下念个大概，就过瘾一般大骂林秃子。干部们依次骂，把妈和祖宗都带上骂。队长一直把毛主席叫“毛太阳”，他说：“毛太阳他老人家农民出身，晓得农村人生活单调，就给我们弄些事来耍，今天忠字舞，明天样板戏，后天打倒刘少奇。林秃子更不是好东西——这样年年变花样，农村的文娱生活一下子就丰富了。”

老威：我有点不明白：四个班级都在一个教室，书咋个教呢？

许长久：张红旗教一、二年级，我教三、四年级；那边讲课，这边自习，黑板也一边一半。

老威：你教语文还是数学？

许长久：全教。政治，包括生理卫生都教，比如三年级语文、四年级就算术，张红旗也一样。那年头经常有头等大事，比如学习最新最高指示，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宋江、忆苦思甜等等，就四个班一块上。每天开课前，全体师生都要对着神龛上的主席像“早请示”，敬祝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材扎实（健康），永远扎实！农闲时，教室外围着许多看热闹的农民，牵着牛，赶着猪，嘻皮笑脸跟着吼。队长也偶尔来学学文化，与一年级娃娃一块朗读“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才是 a、o、e；日、月、水、火；山、石、田、土。张红旗教过私塾，习惯用当地土话唱读，抑扬顿措，尾声拖得极长，比如把“万寿无疆”唱成“万咒无肛”，把“万岁，万万岁”唱成“万醉，万万醉”。这种教书方式极具感染力，所以我一般要等一、二年级闹腾够了，才开口教三、四年级。敲着教鞭提醒高年级莫往低年级倒退。

老威：咋会呢？你的学生比他的大。

许长久：妇女主任的娃娃四岁就上学了，坐在头排东张西望，把尿撒在裤裆里可以不管，但有一回，他坐着拉屎，老师就降成幼儿园的阿姨，给学生换裤子。张红旗的班长李桂英，16 岁，读完二年级就出嫁了。而我的班长李大柱，18 岁，看起来比我高，络

腮胡子都长出来了。有一回，李大柱批宋江学李逵，就凭着拳头维持课堂纪律，他当着老师的面，把一个小调皮按倒在板凳上打屁股，我上去拉，他反手一挥，把我的鼻血扇得直淌。我气坏了，就当堂宣布撤换班长，并命令众学生一拥而上，逮住那目无师尊的疯子。李大柱抵敌不住，就抓根板凳要拼命。我的学生中大个子不少，有人从课桌下拿出根牵牛绳，挽个套，抛了过去。李大柱的脖子被勒住，束手就擒。张红旗拖根大竹片来帮忙，据说这是他的看家宝，从旧社会打到新社会，“黄荆条子出好人”，他说，“过去私塾出秀才，讲究的就是个打，手心、腿肚子、背和屁股，学生犯啥事，打哪里，打几下，都有规矩，现在娃娃不好教，就欠打。”

我急忙制止，问被捆在板凳上的李大柱：“认不认错？”他犟着牛脖子不认。反而骂我是宋江，害了他这个帮忙维持课堂“江山”的李逵。张红旗挽袖连抽十几竹片，李逵终于喊爹叫娘，我看不过，就解绳放他。不料他跳起来就踢了我肚子一脚，要反“招安”。

他一跑，我气糊涂了，老子是知青，如果被农民娃娃打了，就别想翻身了。我转头拧了根顶门杠，满山遍野撵。学生像一群呱呱乱叫的鸭子，跟着我捉拿凶犯。坡上干活的农民见了，也一齐围歼，李大柱走投无路，急得跳崖。幸好崖下是个水塘，没伤着人。

老威：你这叫教书育人？

许长久：我事后也惭愧，就写了辞职书。没想到第二天，李大柱的家长把孩子捆了送上门，向老师陪罪。生产队长也赶来，还送来一小块难得一见的腊肉。革命群众一致夸奖我是好老师、负责的老师。后来贫协代表还专门在课堂上训话：“今后哪个龟儿子敢与老师作对，向毛太阳保证：老子一锄头挖死他！”

老威：臭老九在农村威信挺高嘛。

许长久：自古农村就缺文化，尊敬秀才也算一种割不断的传统吧。毛主席清楚这个，所以动不动就下乡搞农会，与群众打成一片。毛主席身上肯定流着乡村秀才的血，在农民中过得自在，在臭老九中就不自在，因为他们吃着五谷杂粮却瞧不起农民。像张红旗这种变态狂，在城里肯定逃不过运动，至少都是地主阶级的走狗，说不

定早劳改去了。可在乡下……

老威：张红旗怎么变态？

许长久：他搞学生的屁眼儿。在我来之前，他起码弄了七、八个小男生，结果东窗事发，家长们告到大队。还闹着要去公社。支书亲自出面劝阻。然后找张红旗谈话。

老威：这种人还配教书？

许长久：那你说该咋办？开除、劳改当然够格，但张红旗没了，村小也就没了。大队党支部经过研究，一致认为，张红旗之所以乱搞，是因为婆娘死得早，没个伴。于是由妇女主任出面作媒，让五保户李二婆与他喜结连理。李二婆高龄 75，苦大仇深的雇农，自解放前丈夫被上门逼债的恶霸地主打死，就守寡至今。李二婆作为阶级斗争的活教材，经常在村小向娃娃们忆苦思甜。每次，大队支书作总结发言，总要说："二婆的苦就是大家的苦，每个贫下中农的后代都是二婆的亲生儿女，需要出力，都随叫随到。"

据说李二婆根正苗红，万万没想到会下嫁私塾先生，开始还拿出烈女风范，誓死不从。支书只好拿起杀手锏，宣称是"组织安排"，让她随时对张红旗进行思想改造。二婆瞎了一只眼，却晓得与其成为大家的负担，不如傍死一个人的道理。犹豫两天，只好在妇女主任搀扶下，哭哭啼啼地被蒙上了盖头。支书代表他们去公社办了结婚证，花公款买了糖。没钱请客，就宣布"新风易俗，新事新办。"

老威：张红旗同意么？

许长久：出路已经摆明：不成家就劳改。

老威：这叫成家？找了个妈来养着罢了。

许长久：你咋晓得他俩不能上床？我房里棺材是李二婆的，也一道摆过来了。大家认为只要有二婆拖累张红旗，他就没空隙犯错误。没想到，这家伙一旦尝出女人的胯比男人的屁眼儿舒服，就动真格了。床被占了，他就把勾引战场扩展到玉米地里，他搞了两个女生，有回被我碰见，汇报给大队。支书气坏了，就找来基干民兵和赤脚医生，把张红旗按在阶沿上，就要动手阉割。二婆一见，要死要活地扑在花心丈夫身上，再三磕头求情。支书骂道："你以为

有红色五保户挡驾，就可以鸡巴乱戳？把二婆请开，这回非要给你长点记性。”民兵把李二婆拽住，保证鸡巴暂保留，以观后效。赤脚医生抽出手术刀，很细心地按支书命令，为屡教不改的流氓秀才做包皮手术。那场面太刺激人了，在几道手电光的照射下，张红旗的包皮被一点点地剥掉，石阶上淌了一滩血。张红旗只鬼哭狼嚎了几声，嘴就被胶布封了，李二婆大骂支书禽兽不如，支书回骂："老封建，张红旗把你日得敌我不分了！"

老威：这大队支书太霸道。比旧社会的族长还霸道。

许长久：这叫秉公执法，其实这支书挺仗义，我在农村多亏他照顾。你想想，受害女生将来怎么嫁人？幸好肚子没大，否则真会闹出人命。

老威：中国农村的贞洁观念真是根深蒂固！

许长久：其实是愚昧。女孩十六、七岁就出嫁，此前根本不晓得自己的身体是咋回事。我班上的女生，来月经时几乎不垫卫生纸，而是缝一条狭长布袋，袋中填草灰。这样阴部轻易就感染了。后来，我不得不替买卫生纸，发给每个 12 岁以上的女生，但她们都含羞拒绝。那年月，男女之事为禁区，谁也不敢公开在课堂上讲，虽然也有生理卫生的课本，但能教的只是五脏六腑及消化系统。我怀疑张红旗就是钻了性神秘的空子。

老威：赤脚医生也不普及性知识？

许长久：想当流氓么？

老威：你是咋晓得女生不垫月经纸的？

许长久：有一回，一个女生肚子疼得直打滚，我只好带她上大队医疗室。我与两个男生轮换背，跑了五里山路才到。我把衬衣脱下来拧，汗水当当地滴了半痰盂。我正光着膀子捉摸这女孩有啥怪病，赤脚医生从屏风后出来，手上的止血钳夹了一块气味强烈的破布，他质问我："你这老师咋当的？"我一下子懵了，医生又吼："烂了！那地方都化脓了！"

等回过神，我的脸热辣辣的，那时我还是没结婚的毛头小伙。可是感到自己对不起人。老师嘛，在学生的眼里就应该啥都晓得。

老威：现在还是这种心理？

许长久：时过境迁。现在我的孩子都上中学了。这一代碰上了市场经济，一切朝钱看，与老师的感情还不如花仙子和变形金刚。唉，人生若梦啊，有时早晨醒来，真不敢相信自己活在这么个繁荣的混帐世界。

老威：你怀念教村小的日子？

许长久：其它场合不会说，就给你瞎扯一通而已。村小有啥好，一座破庙，而教过的农民孩子，像烟一般消失了。可偶尔有些场景会冷不防窜上来，如酒劲，令人慢慢回味。比如走夜路，带着一大群孩子翻山越岭去公社看电影。虽然《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已放过几十上百遍，但每次我都吹着哨子集合学生，冲着缓缓下山的夕照列队出发。天黑了，孩子们点燃火把，蜿蜒在崇山峻岭中。从高处看下去，各村各队的农民们牵着火把长蛇，向同一方向汇集，太壮观了。这是乡下人盛大的节日，孩子们一路唱歌壮胆，穿越成片坟地时，就唱时代最强音："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到底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往往开头学生腔，后来又加入了上百泥腿子的喉咙，真有点排山倒海的阵仗。如果当时真有孤魂野鬼，肯定拔腿就逃了。到了公社，场口早已扯起银幕，山风一刮，那巨大的布就前后哗哗像漩涡中的船帆。电影开场的永远是《新闻简报》，一遍又一遍放。接着，公社书记在广播里讲话，或念本次政治运动的红头文件。挨次点各大队的名，直到每个大队每个生产队都雷鸣般地回答："齐了!!"方正式推出正片。

老威：手续太复杂了。

许长久：一般放正片的时间是 12 点左右，如遇上"跑片未到"，那就还得等。有时中间还要等。等片时学生都打瞌睡，四周农民却忙着社交。除了赶场，这时我碰上的知青最多，大伙互相递烟、聊天。两部片子放完已下半夜，我又吹哨点名，踏上归途。农民们像暴动一般，却让孩子们先上路。

有个小女孩我特别关怀，我至今记得她叫刘光明，小名"光明

子”。她是富农的孙女，仅仅因为家庭成分，她参加不了“红小兵”。村小 62 名学生，只有 3 名地富子女没戴上红小兵的胸牌。当时她伤心极了。我越安慰，她越哭个没完。为了避免受歧视，我把她从中间调到第一排。这是我班上衣着最整洁的孩子，柳叶眉，扎着小辫，脸蛋红扑扑的。调皮鬼们见我偏袒她，气不过，就趁我写黑板时向她扔粉笔头，在她背上写“地主婆”。

刘光明不敢上学了，我就亲自领着学生上门。恰逢看电影，我就背着这个瘦弱的小姑娘走夜路。在阶级斗争的年月，我不能明言禁止贫下中农欺负地富子女，但我可以通过行动，表明老师的态度。我背了她好几里，光明子挣着下地，牵着我手走。遇着陡坎或坟场，就把我的手臂紧紧抱住。从来没人这么依赖我，唉。

老威：太美好了。

许长久：不晓得她后来到哪儿了，光明子，这么好的名字，该有好的前途。

老威：她会永远记得你这个老师。

许长久：她当时 12 岁，就读四年级了，在当地非常难得。算了吧，感慨太多了。

老威：我当时也 12 岁，却失学流浪，始终没碰上你这么好的老师。光明子，我几乎爱上她了。谢谢你，许老师。

72　民运人士许万平

许万平，重庆市大渡口人氏，身段细小，眼弯嘴瘪，酷似一只微笑著的狐狸。然浑浑然心窍未凿，认死理。许氏原为国营印刷厂一本分工人，三代根正苗红，地道无产阶级。不料受天公作弄，于 1989 年学潮期间，随大众卷入街头政治，游行呼口号，合唱《国际歌》："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其亢奋之态，如两颊绯红的求爱的狐狸。

据右派诗人流沙河回忆，他曾于 1989 年 5 月某日在成都家中临窗俯视街巷热景，恍若隔世，居然将 1948 年夏天之群众示威与眼下的混淆。"反的政府不一样，但标语口号差不多，都是自由民主人权，打官倒和腐败。"他叹道，"历史和现实在轮回，过几十年又转一个圈罢。"然许氏的年纪及阅历比流沙河浅一半，所以他必然要把转瞬的爱国热劲落到实处。象小说描写的那样，他发起成立"中国行动党"，并于十几日后被捕，旋即以反革命组织煽动的罪名，被判刑 8 年。其时，北平屠城已成铁案，腥风呼啸，市面清静，几千万热血民众已作鸟兽散矣。

1992 年冬，老威戴罪北迁至位于大巴山中的四川省第三监狱，相遇二十余位六四反革命，其中，许氏算最矮的。与他仿佛的是前大学老师侯多蜀，但肤黑且壮，与体弱的许氏对照鲜明。许氏节俭成癖，常捧一大茶缸糖水，一匙一匙喂自己，慢条斯理，津津有味。因正在学写诗文，与老威友善，遂邀其共享。老威虽为文人，但身粗胃大，略言客套，就端过水缸，咕咚咕咚底朝天，末了，还挺豪气地揩一把坠糖珠子。许氏含笑恭候，连道："威哥慢点，莫噎倒了。"——这一镜头，许多年以后的今天，老威方嚼出些滋味。许氏家贫如洗，父早年亡故，母退休，工资仅够糊口。偶有三二十元碎银汇达狱中，宽解一下不孝儿之碌碌饥肠。

许氏革命意志弥坚，在狱中因参与罢工、绝食等违规活动，数次遭罚，关入狗笼一般逼仄的小间。他还作为反革命之谈判代表上二楼队部，未及言语，就被放翻在地，捆成一只绽放出狐狸头的肉

粽。于是他把口舌当作仅有的利器，指明要操政府的老奶奶和妈，可见其斗争艺术不甚高超。97 年许氏刑满开释，生活无著，曾携其诗文，不远数百里去投奔落魄中的老威，栖身威母之茶馆月余，殷勤肯干，颇得中老年客人赏识。无奈茶水价廉利薄，许氏赚不够伙食钱，饭量每况日下。然而在此期间，许氏博览群书，广纳朋友，舞文弄墨，思如涌泉，其水平和名气在满面菜色中见涨。

接下来的 1998 年秋，许氏作为"中国民主党"的活跃分子，在风声鹤唳中二进宫，罪名"颠覆"。这一次，重庆警方嫌司法程序太烦琐，直接将其送西山坪劳教三年。2001 年的一个秋日黄昏，老威接到许氏电话，气息微弱，夹杂著咳嗽。他说西山坪是人世间最恶毒的去处，他差点就活不出来了。老威心酸，就忘了怎么开口。许氏又说，一边关烂贼，一边关法轮功，他夹在其中，连个战友都没有。你该把经历记下来，老威终于插话。我被打坏了，许氏喘道。一提笔，脑袋就嗡嗡响。

生存如刀，人权不能当饭吃，头破血流的许氏不得不降低姿态，汇入亿万中国人民的挣钱糊口洪流。他跑过推销，守过货摊，名片上曾有"业务主管"的头衔。萨斯猖獗前夕，他终于用海外某人道团体援助的 500 美元，同另一难友蒋仕华合伙，开了一家面馆。据说生意由冷清到红火，许氏之底气逐渐充足。老威闻之，击额庆幸。不料，萨斯如洪水猛兽，逼得人们逃无可逃，大热天，满街口罩。餐饮业遭受重创，转眼工夫，许氏面馆，还有同一条街的张氏、王氏、无名氏面馆，均被政府勒令关停。

许氏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情急之下，就独自去警方抗议，要生存权，无结果。又给海外打对方付费电话，无端谩骂某某吃民运的人血馒头，这无异于自断后路。某一傍晚，许氏与老威通话，告之已驾临成都火车站。老威详细指明路径后，放下听筒。一直恭候至深夜，再无动静。这疯狗日的莫不是被警察逮了？老威躺在床上不得其解，竟模模糊糊坠入了梦乡。

如此，许氏磕磕绊绊地赖活至六四屠杀 15 周年前夕，并且还结了婚，这真是天大的奇迹。好歹稳当了，老威闻之感慨。依稀记

得新媳妇也是下岗工人——这两口子具有马克思指点的无产者家庭的全部特征。在互联网上，散见许氏时政文章，老威掐指一算，可挣稿费少许。各地开始纪念六四，许氏也宣称要在重庆搞，老威见多了，就不太在意。许氏于 6 月 3 日被捕，本来老威也不太吃惊——这些年，民运分子的抓抓放放已形同儿戏。

然许氏被栽赃“贩毒”——据网上报道，有人将一包海洛因塞进迎面而来的许氏怀里，旋即被四面埋伏的警方录像并“挡获”。真他妈像演港片，老威悲愤地想，脑海里顿时浮现许氏脑袋开花的镜头。可六月四日一过，许氏又释放了。他被公安辑毒大队拷打后，捆绑在椅子上达 48 小时！怎么熬的？没说；往后怎么过，没人问。世上的新闻太多，转眼就成旧闻。

许氏还活著。仅仅活著，就不错了。

2004 年 7 月 21 至 24 日，成都

73　《扫荡报》记者羊定清

采访缘起：2003 年 5 月 22 日，《中国底层》之法译本在彼国南部蒙佩利耶书展上举行首发式，我因没拿到护照和非典型肺炎的双重因素，不能前往出风头，难免心气浮躁，拍遍栏杆。

是夜辗转难眠，照旧坐回桌边，翻检种种原始材料，竟发现这篇谈话稿已搁置了将近一年，几乎淡忘了。犹如梦中惊醒，我一点一点回想在上访旅馆初遇老人的情景。那是个太阳天，羊老租张小茶桌，摆放在旅馆门口，自己却长髯飘飘，手捧"代写书信、诉状"之纸招牌，端坐一旁。

穿梭在那条陋巷中的上访专业户极多，所谓谋生手段大致为乞讨、拾荒、擦皮鞋、钟点清洁工或小偷小摸，而 77 岁的羊定清却选择了如此与世风格格不入的清雅古业，不禁令我肃然起敬。

于是交往，进而长谈，方知此老颇有来历：他曾向国民党官办之《扫荡报》和《中央日报》投稿数次，为我辈"自由撰稿人"之祖师，因逢改朝换代，其旧社会的言论被新社会治罪，九死一生，并殃及家族。唏嘘未了，我父随之病重入院，不久撒手尘寰，接着是祭七、择墓、入土。再接着，中共交班，伊拉克战争，非典。

家事国事，一桩又一桩，在走马灯一般的旋转中，双鬓依稀添白。

而羊老先生今在何方？前几日，我才骑车重游过旧地。因非典，旅馆配合公安机关将所有"外来人员"扫地出门，剩一片白地。我在那儿站了一刻钟，除了苍蝇的嗡嗡再没别的——我的脑子也只剩一片白地……。

老威：老先生，在这上访堆里，您的岁数最大吧？

羊定清：今年虚岁 77，和在高院门口擦皮鞋的霍老头同庚。

老威：可您的名字、资历相比老霍，一个天，一个地。

羊定清：啥意思？

老威：人家老霍虽满腹冤屈，但阅历单纯，哪像您这鼎鼎大名的国民党《扫荡报》记者，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羊定清：大风大浪是经历过，可“记者”算不上。

老威：大伙背地给您取的绰号就叫“扫荡报”。

羊定清：看来这个黑锅我得背到死。

老威：不想自己澄清一下？

羊定清：我对许多人当面澄清过，可说来话长，人家不耐烦听。唉，一个人没有社会地位，说啥都顶个屁。

老威：我喜欢“说来话长”，我相信您的故事。

羊定清：不是故事。好吧，您当作故事也没啥。我是宜宾高县云河乡人，生于民国 15 年（1926）正月初八，头上两个哥哥，脚底三个妹妹，据我老母亲讲，羊家的香火原来很鼎盛，自晚清到民国，在当地算得上远近闻名的姓氏，出过好几位秀才，还出过举人。可到了我这“定”字辈，由于时局动荡，战乱频乃，家道就有些中落了。民国 25 年，二妹、幺妹死于天花，民国 28 年，大哥、二哥又累死在背盐途中。旧社会，川盐很值钱，特别是自贡自流井的盐，一贩运出川境，价格顿时涨一两倍。所以，老家许多青壮劳力都相约去自流井打工，熬盐或背盐。那时山川阻隔，如今半天的路程，要走十几天，而且都是崎岖小路。我的两个哥哥据说死在贵州安顺场附近，可噩耗让同村人捎回来时，已过了一月余。我还小，正读私塾，还依稀记得父母在祖坟地里为哥哥们垒了两座空坟包，埋了几件他们生前穿过的衣裳。丧事不久，被伤痛弄懵了的父母就商量着要我辍学，因为家中太缺人手，我虽年幼，也可放猪放牛，干些杂活。

可祖母溺爱我，老人家把父母叫到膝下训斥，并令其诅咒：哪怕拆房卖瓦也要借清娃念书、进取，待来日飞黄腾达，为列祖列宗争光。

长话短说，民国 33 年（1944）夏天，我 18 岁，高县中学初中毕业。家里张灯结彩，遍请亲戚后，父母就卖掉 20 亩水旱田，一头牛，凑足一大笔银元，助我去重庆求学。当时，父母要求我读工

商，将来做个生意人，中兴已衰败不堪的家道；而我身处抗战胜利前夕，同所有忧国忧民的热血知识青年一样，心系国是，渴望投笔从戎。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这一年秋天，我于家中稍事休整，准备去重庆投考黄埔军校时，竟在高县郊外被绑了壮丁！其时晴天白日，我刚走上公路，就从路边树林里窜出一彪人马。一条麻袋自脑壳罩到脚，我还以为撞上棒老二（土匪）了，就在麻袋里大喊救命。外头捣来几枪托，痛得我一下子耷在地下，只听得有人拉枪栓骂道：“喊个屁！一枪毙了个狗日的。”

我骇出一裤子尿，就低声求饶：“大爷们放我学生娃娃一条生路，身上的钱财都孝敬。”

麻袋外应答：“老子们不是大爷，是国军！而今打抗战，前方兵员缺乏，对不住了！”

就这样，我昏天黑地栽进驻县城的壮丁部队——叙泸师管区当了壮丁。随后辗转宜宾、泸洲、自流井、贵州安顺、遵义、毕节等地背盐，作牛作马。

老威：当兵咋做苦力呢？

羊定清：国民政府的战时壮丁法令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可一到地方，就乱套了。有钱人家不愿出壮丁，就出一大笔钱，空缺的壮丁名额，就四处抓人顶替。到了管区内，不发枪，不操练，先白做几个月的苦工，累不死的，才交给正规部队。这之前的军饷、粮饷，以及壮丁们背盐挣来的辛苦钱，统统落入各级长官的腰包。

老威：他妈这壮丁部队就是人贩子团伙。

羊定清：跟共产党贪官一样，国民党贪官也在政策法令的保护下，无法无天。短短两个月，我所在的连队就因害红白痢疾、闷头摆子不治身亡，逃跑，累成肺痨等原由，减员过半。剩下的 30 多个骨瘦如材的弱丁，缩编成一个排，由排长和班长押着，继续背盐。为了怕我们逃跑，每人都刮光头，却在脑顶盖留一撮毛作为标记，屙屎屙尿也喊报告。最后，干脆 5 人一组，一条绳串起来，在路上就谁也跑不了。

抗战胜利时我仍在贵州山路上背盐，直到某一天，上峰要到叙泸师管区视察，营里才急了。为了应付，就由连排长带上人枪，挨家挨户抓县城老百姓，临时套上军装充数。我记得已是民国 34 年（1945）双十节，站在操场上接受视察的壮丁不足 200 人，而抓来的假壮丁却超过 300。谁也不敢吭声，因为长官言明：应付了场合就放人，出了纰漏谁都走不脱。

那天来的是省城大员，屁股后还跟了大拨本地贤达士绅，没想到，我的同窗沈云山居然也在其中！我老远就认出他了，却忍住不吭声，直到沈兄随显贵们来到跟前，我方突然伸出手，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轻声叫道："云山！"

场里所有的人都楞了，营长气极败坏地跑过来，瞪我一眼，却又转脸笑对显贵们。我已豁出去了，死揪住同窗的胳膊继续叫道："我是羊定清！云山，认不出了？"

此时，连过去了十几米远的省城大员都回头来。沈兄见状，急忙拍拍我的肩，耳语道："我会救你。"随后大声说："莫激动，莫激动。"就抹下我的手闪开了。

我脑子一片空白，以为完蛋了。不料当日下午，沈云山就亲自到壮丁营接我出去。犹如囚犯出狱，我当即大哭一场。沈兄温言劝慰，原来一两年不见，他进了国民党高县党部，任通讯秘书，所以能够很快打通关节，救我于水火。

回到家，父母一见皮包骨头的儿子，以为大白天见鬼，傻了一阵，才互相抱头痛哭。经历这场变故，我本已心灰意冷，不料在家没歇多久，国共内战又开场，好歹是读书人，总不甘心这辈子在庄稼地里混。正郁闷着，就接到沈云山来信，一番叙旧，赞我志向高远，才华出众，为诸学兄中之翘楚。接着，就引出替《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之地方时政版约稿的正题。我受宠若惊，免不了回函谦辞；沈兄再次来信恳请，并寄来样报若干，他说："拙弟不才，滥竽充数为扫荡诸报之特约通讯，当竭尽犬马，举存兄之高文，幸勿推辞。"

两番知遇，沈兄对我的确恩重如山。于是从命动笔，在一年内，

通过沈兄向《扫荡报》投稿 8 次，刊登 4 篇；向《中央日报》投稿 6 次，刊登两篇。内容均为地方见闻，稽稼之辛，兵役之乱。我还评论了所谓壮丁法令，以亲身经历，有感而发道："抓丁者如匪类，贩丁者视国家律令如废纸，长此以往，则将贪兵疲，官强民弱，共产魔道乘虚而入，社稷危矣。"

老威：内战结果还真被你言中了。

羊定清：《扫荡报》稿酬不错，发表一次能挣一个银元，在乡下就算一笔大钱了。所以父母很高兴，就起早贪黑，承担全部农活，让我潜心撰文。四邻也羡慕，都说羊家祖上显灵，风水要转了，只这定清一人，就抵过几任秀才。因为在整个县境，能在国家大报上发文的，也凤毛麟角。

老威：您是我辈的祖师爷，因为本人目前就卖文为生。

羊定清：现在的稿酬如何？

老威：比您挣银元差远了。

羊定清：我也就挣了一年。48 年夏天，沈云山调升重庆，断了联系，我的投稿生涯就告一段落。捱至 49 年，国民党败象已显。经济滑坡，军事吃紧，物价飞涨，人心惶惶。父母还捏住这银元不肯用，而金元卷和法币又贬得太快，揣几大卷去赶集，只能买回两斤盐巴。转眼岁末，四川全境解放。接着，工作组下乡来，按阶段开展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我家十几亩薄田，本来划阶级成分只够上中农，却被贫协一致推选为地主，为啥？就因为我"落入了法网"。

老威：您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

羊定清：本人没参加过任何组织。

老威：那为啥"落入法网"？

羊定清：因为发表文章。朝代一变，《扫荡报》就成了反动喉舌，我当然罪不可赦。父亲年纪大，想不开，几场批斗下来，就"畏罪自杀"了。我挣的银元一文没用，连同房子、耕牛、田地和祖传的首饰，统统充公。我被关押在乡公所的黑屋内，白天黑夜都点着煤油灯，写交待材料，向人民缴械投降。

老威：这同我爸在文革中的状况差不多，大约是 1971 年，他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和几百个臭老九一起，集中关押在盐亭县城关小学内，天天写材料，背靠背检举他人。有人受不了，在厕所用剃胡刀片抹脖子，死了，还抬出来，放在水泥乒乓台上曝尸示众。而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出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羊定清：文革和土改不一样，在土改中，工作组就是法律，枪毙、管制、关押、批斗、用刑，全凭一句话。幸好我在土改初期就被揪了出来，当时正“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工作组的作风还较温和，主张说理斗争。划清阶级后，工作组领导由南下的外省干部换成了本县的复员军人，就开始大刀阔斧地镇压“坏蛋”。

有段时间，几乎天天毙人，只要有三个以上的贫下中农检举某个不法地主的复辟言行，马上就把地主抓起来批斗，当场就枪毙。杀人上瘾了，后来，连贫协组长、民兵连长都随时提着枪，找借口消灭了敌人，方先斩后奏，向工作组补充汇报。

老威：您没被毙掉？

羊定清：如果我留在村里，十颗脑袋都不够崩，因为几十年后，出狱还乡，才晓得方圆十里的地、富、反、坏、军、警、宪、特已被消灭了大半。有的地主，全家老小被斩尽杀绝，连看门狗也没逃脱。幸好我被早早定性为反革命敌报记者，问题步步升级，在村里关几天，就转乡公所，接着又进县监狱，才得以公审公判，走完法律过场，保住脑壳。

老威：谢天谢地。

羊定清：是该谢天谢地。因为当时不比现在，要经过侦察、预审、正式逮捕、检察院动检、请律师、开庭，人犯在接到《起诉书》时，就能大致猜到自己要判啥子刑。当时全懵，只要被抓起来，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有没有背景，聪不聪明，全懵。你不晓得这颗头明天还在不在脖子上，甚至开万人大会，你被五花大绑架出去公审，仍然不明白最终结果。法官一个接一个地宣判，书记员在旁边龙飞凤舞地手写《判决书》，这一场走下来，灵魂早就出窍了。你居然

还活着！感觉好奇怪嘛，那些呼口号的胳膊好像在另一个世界起起落落。回到监房，松了绑，掐一把自己，那一阵痛，来得又缓慢又遥远。当局者迷，记得 1951 年初春，我得知沈云山在重庆郊区歌乐山农村落网时，还暗暗叫苦。果然，沈兄熬不过，屈打成招，承认是我的"上级"，并交出了一直保留着的本县向敌报投稿的记录，一共 18 人。稍后，这 18 人悉数落网，除了在土改中被当地群众枪毙 6 名外，其余 12 人均被判刑，而我因发表次数多而名列 18 人之首。

形势所迫，我连叫声冤枉都不敢，只整日心惊肉跳地怕"升级"，年纪轻轻，头发就急白了。连做梦都是脑浆、血和拼命地逃。民兵提着枪，满山遍野地撵。累醒吓醒了，还喘，腿肚子还抽，还妈呀妈呀地乱叫。同监关了 20 多个人犯，恶霸地主、袍哥、土皇帝、特务、一贯道、破坏分子，可谓货色齐全。枪毙沈云山是我陪的杀场，土改中我已陪了好几盘杀场，本来已习惯了。其大致程序是，在开会崩人的头天下午，狱警就从监房挨次点名，提出一批囚犯，转交给候在监外的武装民兵，然后被押往城郊某个地方（一般是山脚下或河边斜坡）挖坑。这坑有锅台大，半人深，大伙用铁铲和锄头拼命挖刨，稍有迟缓，背后的民兵一枪托捣来，你就一跟斗栽进自己挖的坑。说实话，这活儿又累又紧张，但犯人乐意干，甚至越干越兴奋，因为挖坑就意味着吃了暂时不掉脑袋的定心丸。

睡我旁边的目不识丁的千年平安国土皇帝就死在我挖的坑中，他姓李，罪名是搞封建迷信，串通信徒围攻工作组。结果在"案发"两个钟头后，就被闻警赶去的剿匪小分队制服。我跪在一旁，一见枪管抵住土皇帝的后脑勺，赶紧扭头闭眼。执行民兵见状，骂我一声龟孙子，影响他的情绪。于是押解民兵就把我的头掰回去，命令不准闭眼。我只好眼睁睁地瞪着土皇帝开瓢，脑浆子卜地向前射出一股，两尺远，白白地溅落在坑那边；然后才是血，咕嘟咕嘟从那泉眼往外冒。土皇帝的桩子太稳了，好几秒钟都不倒，刽子手蹬一脚，轻了，他身子晃了两晃，居然要后翻。刽子手赶紧补上一枪一脚，狗日的才栽进坑中。我哇地一下呕了，幸好早上没吃东西，只呕出一滩绿茵茵的汤水。刽子手毙人不顺，就骂骂咧咧地过来，踩

住我的后背，起劲揩擦鞋底。我死了一样趴着，感到土皇帝的魂附体了。

老威：这刽子手不会做恶梦吧。

羊定清：亲不亲，阶级分。那时，这种“杀敌”的光荣任务，只有苦大仇深、根正苗红的积极分子才有资格担当。而我，杀场多陪几次，就麻木了，不扭头不眨眼，哪怕脑浆子溅上脸颊，也不闪不避。手反绑着，又擦不了，只得让铜钱大的脑浆晾干在那儿。

老威：沈云山是你的恩人，毙他你也麻木么？

羊定清：我还以为会结伴走上黄泉路，因为头天挖坑没有我。次日凌晨，我被提出监房，解手铐换绳子，不是五花大绑，而是下巴以下，膝盖以上，一圈圈绕着捆紧，连裤腿也扎了。据说这是典型的死人捆法，人直通通栽地上，要么向前跳，要么一寸一寸移。扎裤腿则为防大小便失禁。

我晓得不妙，但万念俱灰，任由狱警架过长长的走廊，扔出监狱大门。一辆苏式嘎斯车早停在那儿，我和另外 3 名犯人被解放军战士接过，拽上车，顶着满天星斗驶向宜宾。

公审大会在宜宾中学操场举行，我们被押到时，天已大亮。操场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专员、书记讲过话，法院某某庭长就一个挨一个地通过高音喇叭喊“把反革命恶霸地主某某某带上来”之类，一共喊了三十多遍。整个场子沸腾了，解放军战士两人一组，一手持枪，一手架起坏蛋们飞快穿过人海正中的小道，跃上临时搭的木台子。

沈云山就站在我旁边，好几年不见了，神采奕奕的他已皮包骨头，形同厉鬼。几轮震耳欲聋的革命口号后，开始宣判。有 19 个死刑，沈兄在其中，罪状是特务、颠覆、破坏等等。

宣判我时，刚好接了一轮口号，我竖起耳朵，不知咋的，竟误听成死刑了。沈云山瘫在台上，又被拽起，我没瘫，却骇出尿了。接着天蓝地白，云里雾里就去了法场。解放军比民兵专业多了，一声口令，各就各位。射击前，战士自己检查了不算数，带队军官还过去一一拉枪栓，确认无漏洞。子弹也在皮鞋帮上摩擦几遍，方咔

嚓上膛。接着分两轮执行，即甲组上前三步，一齐平端起步枪，啪啪射击完，马上后退，再由乙组重复补枪。沈云山不经打，一枪就进坑，那解放军后撤时，还吹了吹枪口的青烟，歪头对战友笑了笑，很得意。

我跟前也有一坑，但枪口只在我背心点了点，就迈过去了。我几乎死了，直到周围响过枪，又平息了一阵，才慢慢活转来。松绑换铐时，我接到了《判决书》，原来是无期徒刑！

我先在宜宾监狱服刑，62 年转到新疆塔里木某农场，65 年又转回重庆弹子石的省二监。如此煎熬了大半辈子，还总是梦见沈云山。虽然我没害过他，但感觉对不住他。这叫啥子阶级斗争？不分青红皂白，错杀了多少好人！

老威：是啊，没有沈云山，您恐怕早累死病死在壮丁营里了。

羊定清：直到改革开放后，监狱不那么左了，我才敢在《申诉书》里讲讲当壮丁的悲惨遭遇，说一点沈兄的好话。可惜死无对证，没人相信我会受国民党欺压。

老威：您是《扫荡报》记者嘛。

羊定清：可笑可叹！

老威：老先生冤狱几十年，也不知咋过来的？

羊定清：千头万绪，理不清。

老威：您是读书人，曾经有过抱负，总不至于像普通犯人那样浑浑噩噩地混吧。

羊定清：我对国共两党均无好感，生不逢时，岂能言他。

老威：但您仍然申诉了 20 多年，不甘心嘛。

羊定清：我能苟活至今日，全凭母亲的教诲。年轻时，父母含辛茹苦供我念书明理，等不及回报，就逢改朝换代。家破人亡，劫后余生，曾是当地大户的羊氏就剩下孤儿寡母。我身陷囹圄，母亲四处打听，终于在 1953 年的春节亲自到监狱墙外，给儿子送进她亲手缝制的冬衣！从高县乡下到宜宾，上百里水路，有时船工同情她，愿意捎带一程；但更多的时候，她老人家拄根棍子，拖着小脚，

走五、六天才到。母亲初识几个字，见不着儿子，就寄简单的信进来，她总是写："儿呀，有妈在，你千万别想不开，你想不开，妈也要想不开了。"

1954 年端午节，母子终于通过接待窗口见面，她递给我两个青鸭蛋，就边摸我的脸边流泪，说不了一句话。连旁边的张管教都看不下去，转过脸，叫里面的人打开门，放母亲进去。母子俩坐在一条板凳上，老人家就抖着手剥蛋，喂给我吃，我推开，反过去喂她。接见时间结束了，张管教才开口劝说：

"羊定清，好好改造，莫惹你母亲难过。"

在我发配新疆以前，母亲每三个月必来探监。也不晓得她一个人在外面咋活的，可总给我送来一点吃穿：两个饼、三个馒头、两个蛋或一两件衣裤。那时我还年轻，总盼望着有一天出狱，能守在母亲身旁尽孝——我们这辈人，受的传统文化熏陶，孔夫子的忠孝仁义已入骨髓，所以，将来为母尽孝也作为一种信念，支撑着自己。

母亲第一次探监才 50 多岁，满头青丝，身板硬朗，直到 1983 年，她探了 30 年的监。新疆太远，她没法去，只好仍去宜宾，在监狱大门口哭诉了三年，狱方多次出面解释，但她下次还去宜宾探监。也许是母子情感动了劳改系统，我三年后又破例转回四川，重庆虽比宜宾远，但见面总要容易些。

老威：您的母亲太伟大了。

羊定清：谈不上，因为血缘无法选择。在牢里，感情再好的夫妻，也扛不过两三年；上了五年不离婚，就算世界奇迹。所以犯人刚进来时，探监送东西的几乎都是老婆孩子；过一段时间，老婆孩子来得稀了，你如果在外头人缘不错，还有三朋四友探望；再过些日子，朋友也不来了，只剩下母亲，年复一年地惦记你，探望你，只要她还能走得动。所以牢里的长刑犯都明白"娃儿是娘心头肉"这句话。

老威：您母亲还健在么？

羊定清：如果健在，我就守在家中，再冤也不上访。我出狱的第二年，她就去世了。她的家族有长寿基因，如果日子安乐，老人

家可能要活 90 岁以上。可惜我在重庆坐牢时，她每探一次监，就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还被收容遣送过几次，受了惊吓，脑子出了毛病。她活了 84 岁，死前还放心不下她快 60 的老儿子，怪自己没福气看见儿媳妇。

74　落魄文人阳九根

采访缘起：这次乘酒“诱供”显得有点不太人道，因为前几天老阳才灌得口鼻来血，医生警告他必须戒酒，“我有遗传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他说，“喝死算逑”。

老阳生于抗日战争后期，所以性格像地雷一拉就炸，可惜目标极其混乱，杀伤力也就等于零。我曾对他说：“你是文学评论界的三朝元老，又桃李满天下怕啥？”

他怕自己，心肠一软就改变主意。有的主意还是上帝通过《圣经》给他出的。1998 年 10 月 7 日，我刚从北京回来不久，就心怀鬼胎地登门拜访。为了提防这德高望众的老小孩又一次改主意，我特邀冉云飞、汪建辉同往阳府混吃混喝兼作旁证。

半年以后，我对老阳朗读了这篇采访，他大为震动。其时，他刚被成都某报纸变相开除，神态激愤、忧伤而无奈——这也是贯穿他一生的三种情绪。

老威：老阳，我一直想做你一篇采访，但又怕做了之后，你老人家翻脸。你是评论界的三朝元老，又是以写诗歌方面的道德文章著称的，而我的专长你晓得，善于揭人内心的疮疤。

阳九根：随便你咋个搞。上了我这把年纪，已经不在乎什么了，也就是说，从里到外，已经被剥得精光了。

老威：那好。今天有冉云飞和汪建辉在座，两位哥们可以作证，免得你酒喝麻了，说话不算数。

阳九根：你尽管乱问，我保证如实回答，哪怕某一天我的形象栽在你手里。

老威：我觉得你是个失败者，看看你的同时代人，很少有混得你这么差的，你的长像酷似耶稣，枯草的头发，皱巴巴的脸，浑身上下的排骨和青筋，你就敲着排骨绷着青筋在“重建诗歌精神”。因此，你的文章有的是抽象的激情，你侃起理论来，一套一套的，

象射精一般。恐怕你除了写文章之外，能够射精的时候很少吧？

阳九根：我的性生活肯定没有你那么丰富多彩。我的卧室一尘不染，地面和桌面，都能照出人影子，书、笔、信件、杂志都有规定的摆放样式。我见不得脏，哪怕一丝废纸，都使我心烦意乱。我是一个清教徒，我自己把《圣经》供在醒目的地方，我信奉那么一种苦难的感觉。

老威：你有洁癖，《十日谈》里的神父都有洁癖。

阳九根：我身边没有女教徒，因此就没有《十日谈》里那种乱搞女人的环境。久而久之，对那种事就淡了。你晓得，我是酒徒，每天喝醉之后，就乱说乱动，甚至丑态百出，我不晓得醒和醉，哪种状态更真实一些。直到有一天，我喝出血了，耳朵、鼻子、嘴，一齐来血，止都止不住。我有传统的高血压，父亲，还有上一辈的好几人，都死于脑溢血。我不得不提醒自己，要节制一些。但是，我不醉又咋办？这世道太空虚了。有一回，一个多年没见的老同学来做客，我陪他一直灌到半夜。他回不去了，就摇摇晃晃爬上我的床。嘿，我最不习惯与人同睡，可是，又不能不睡。我在外面沙发上躺了一会儿，觉得不舒服，就起来拿个枕头，回到床掉转睡，幸好我的床大，两条牛都摆得平。

酒喝得过多了，我沾床就不省人事。但没一会儿，我却被人摸醒了。开头，我还以为在做梦，就想翻个身，不料翻不了，背给贴得紧紧的，还有根硬梆梆的肉在抵屁股。活了五十多岁，还没开过这种洋荤，为暗示对方不要采取过激行动，我就提腿折腰，变成一只巴在床沿的老虾子。他妈的，我本想再掉一次头，又怕得罪人。

我的同性恋同学见我有动静，就假装睡着，还发出微微的鼾声。我想，毕竟还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至于太过分吧。就放松警惕。刚一迷糊，就感觉自己的雀雀儿被捉住了。我惊出一头冷汗，下面却又捏又搓地开始动作。日他妈，成何体统！按我平时的火爆德性，早该跳起来痛斥这淫贼！但转念一想，也许这样闹翻了，同学之间就永远不会再见面，都一把年纪了，还能够有多少相见的机会呢？的确，他很失态，然而他心甘情愿在我这种最看重人格尊严的知识

分子面前失态吗？

老威：你想得太多了，可人家一心舒服，没顾这么多。

阳九根：也许吧。他也没碍着我啥子。

老威：还没碍着？雀雀儿都被人逮了。你没感觉想吐？

阳九根：怜悯之心，人皆有之嘛。你想，人为啥会变态？明明知道变态的行为是不正当的，会遭到社会的唾弃，为啥他还控制不了自己？这一定是家庭生活的不幸造成的，说不定他同我一样，长期丧失正常的两性生活。

老威：真是自作多情，你又没去摸男人。

阳九根：你没遇上这种事。遇上了会……天晓得。反正我一动没动，随便他摸。平心而论，当啥子都不想的时候，还是觉得鸡巴被人弄得挺舒服。

老威：后来呢？

阳九根：后来他天不亮就走了。唉，我这同学是个极传统的本分人，说不定都该抱孙儿了，却被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这半个世纪以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国人被搞瓜了，多少都有些变态，不是这方面，就是哪方面，谁也不敢说自己完全正常。我也不正常，你之所以把我作为瞎子，算命先生，神医、农民皇帝之中的一员进行采访，恐怕正因为我不太正常吧？

老威：的确，老阳。现在笑也笑过了，我觉得有点辛酸，甚至有点悲凉。你是个好人，连这种事也能包容。你是从那个变态之夜透视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吧？

阳九根：我有两种日常生活，精神的，和世俗的。

老威：把精神的留给你的学生和广大读者吧。

阳九根：说实话，我真的不在乎有人摸我的雀雀儿，可我的同学也许再也不会来做客了。很想给他打个电话，这个苦命人，咋会沦落到这步田地？

老威：怎么啦，老阳？

阳九根：你是不会理解的，因为你有个好老婆。我没有，我想

离婚想了 20 多年了，每次都是事到临头，又怕麻烦，得过且过。我老婆还不如我的变态同学，我和她的关系从未密切到这种程度。你不相信？

老威：你们有孩子嘛。

阳九根：孩子能说明啥问题？我与她早分居了，从我的屋到她的屋，感觉上比万里长征还远。中国的婚姻是什么玩意？孔夫子说："相敬如宾。"也就是夫妻俩都把对方当成宾客，当成在家里暂住几夜的客人，把孔孟之道发扬光大到现代，娶老婆不仅是娶客人，而且是娶政府和娶警察。两个人拴在一块，个人隐私就彻底交待了。反党言行、家底、变天账、历次政治运动的表现，以及经常聚会诽谤朝廷的酒友，总之，所有的把柄都握在对方手中，你胆敢咋样，就给你抖出来。你了解，我这张教书匠的嘴，是从来管不住的，一沾酒，天王老子都敢骂。

老威：你是憋得慌吧？

阳九根：憋成习惯了，也就不憋了，不就一股水嘛，哪儿不能放？

老威：你在哪儿放过？据我了解，你是朋友中唯一以柏拉图式的精神恋压制欲望的圣者，你似乎还停留在中世纪。这太残忍了，老阳，我并不是赞同嫖妓，但是你的情况特殊。过两天，我替你买火车票，送你到绵阳好不好？那里的鸡价廉物美。

阳九根：你把我当成啥子人？

老威：嘿，解放前的大文豪，有几个没嫖过？胡适、郭沫若、林语堂、梁启超，那徐志摩，就干脆弄了个婊子在家里养着。我看你是舍不得钱吧？哥们几个先垫着，为你成立个人道主义基金会。

阳九根：我看就不用操心了吧。

老威：自己去？那更好。雨田认识好多你的崇拜者。

阳九根：你太烂了，啥子都嬉皮士，其实你的骨血里又不是这种人。

老威：这和"是什么人"无关。喂，老阳，真神面前莫烧假香

嘛，据说前不久唐晓渡来成都，你还去过夜总会？

阳九根：那是马松做的东，邀了十几个诗人，先在馆子里大吃大喝，都灌了差不多六、七两泡酒，然后摇摇晃晃地找了家夜总会。我晓得一进去就什么都完了，想溜，却被一帮强盗扯住。我见晓渡那种正人君子都不虚，也就仗起酒胆。大堂里太闹，于是马松领头进了雅间，可是卡拉 OK 一开，雅间也就不雅了，再加上三陪小姐一进来，那屋子就有点水泄不通，像春熙路的公共厕所。我不是来玩的，我也不会玩，我想和晓渡探讨些问题。我和他都搞了多年诗歌评论，可从来没有坐在一起交谈过。我们内心都有那份东西，遗憾的是他长期在北京。

老威：既然这样，你们都不该喝这么多酒。特别是你，一醉就失态，哪能探讨理论！

阳九根：朋友碰面不易，岂能不喝？这也是 90 年代的风气，除了一大帮子在酒桌上较劲，私下交谈已越来越少了。这是最聪明的社交方式，大伙一视同仁地豪饮，也不疏远谁。但是我当时的确只想找晓渡说话。不料，石光华挡在我们中间，早接上火了。他们在争《天涯》上的一篇文章。石光华一张铁嘴，如果任其发展，那一晚上都轮不到我。我气得猛灌一杯洋酒，扯着喉咙大吼：“日你妈晓渡！”他像没听见；我又吼：“日你妈唐晓渡！”他才在震耳欲聋的卡拉 OK 里心不在焉地拍拍我的肩，仍然头没回嘴没停。有人说老阳醉了，有人说老阳醉了习惯骂“日你妈的这块土地”，今天“这块土地”换成“唐大胖子”了。

我从来没感到这么累，这么失落。这世道，谁又能理解谁呢？但是你必须硬撑着。我捏起话筒，乱叫一气《黄土高坡》，我把唱软歌的杨胖子给盖了。我晓得，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嘲笑我的气喘吁吁，果然有人劝我：“老阳，不要爬坡了，爬一个三陪小姐给大家看看。”是的，我落伍了，这些人都比我小十几岁，他们早抛开“黄土高坡”进入后现代了，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不写诗的诗人，磨皮擦痒的诗人，可我还把他们当回事，写文章追溯他们的过去！我又灌了一杯酒，最后，干脆拦住屏幕。眼皮都打架了，我还想折腾，

这相当可笑。更可笑的是，我被两位小姐拖倒在沙发上，紧紧地夹住。我连蹦了几盘，都被按回去。我清楚，大家都火辣辣地盯死我，准备编排个理想主义者的笑话。我豁出去了，酒壮色胆搂了小姐的腰，没有任何快感，倒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同鸡婆能谈啥子？吃喝嫖赌？不会。我搞了几十年文学，除了文学只有谈文学。于是就自我介绍，仿佛是文革前的恋爱幽会。接着，我指着唐晓渡说："中国的大批评家。"还指着石光华说："整体主义诗派的创始人。记住，都是艺术家，精英！"小姐回答："哦，都是些伟大的名人，我们也沾光了。"我说："肯定沾光了。"小姐充满崇敬地说："不管啥子人，都要付小费，我们这是做生意。当然，伟大名人给钱也应该伟大。"我忙解释："小妹妹，别误会……"话音没落，周围爆起哄堂大笑，大伙纷纷教训我说："鸡嘛，摸就摸，搞就搞，鸡巴妹妹哟。"我生气地说："不准侮辱人！她们也是迫不得已才干这个。"岂料小姐闻言，却把一手红指甲戳到我的眼皮下说："啥子迫不得已？革命的分工不同嘛。今晚你多给钱，小妹妹就喊你一百声老哥哥。"真是羞死他妈！我只好给一人掏一百元才脱手。

老威：肉都没碰就损失两百元？

阳九根：以后倒给四百元我也不上套了。

老威：你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阳九根：啥意思？

老威：你是评论家，读了某些人的作品，然后按照你自己的理解替他们分配角色。你带着这套计划好的文学理论进夜总会，出于根深蒂固的人道理想，你把鸡婆认作你的小妹妹，你认为凭几句悲天悯人的话就能拨云见日，解人于倒悬，不料，人家的三陪行动早进入市场运作了，你不给钱就出不了门，打手在外面恭候呢。老阳，你还是适合放下老师架子，找一个生活之友。

阳九根：我刚离婚不久，还需要调整心态。

老威：现在你和嫂子，不，前妻，关系怎样？

阳九根：离婚之后，她没房住，所以暂时维持现状。没想到，这种失去法律保护的"家庭"反而比以前和谐、轻松。公共食堂嘛，

各出各的伙食费，自己的客人自己掏钱招待。我承认她买菜做饭、操持家务都是一把好手。

老威：你的婚离不离都很奇怪。像你这个人，把许多极其矛盾的因素揉和在一块了。你写文章，教学生，以及进行大多数文学、文化交谈时，有很强的思辨抽象能力，你活在这种纯精神之中，却对构成自己悲剧性格的若干细节视而不见，你了解自己吗？

阳九根：细节把握不是我的长处，虽然今天我在你的“挟持”下，趁酒兴讲了不少细节。我只能这样做人做文，这不是分裂，而是别无选择。我已经 50 多岁了，按理啥都看透了，但还是常常被本能、被血性所支配，血涌上来，又做不了什么。如此一天到晚忧国忧民，象苏格拉底，漫画了的苏格拉底，一辈子，性都没得到过充分满足，因此热衷于哲学对话。唉，人一辈子生也艰难，死也粪土，哪天，血朝脑门一冲，就报销了。可就是这使人致命的过激的血，产生爱，产生恨。爱谁恨谁？年龄越大，目标越来越不具体，不甘心哪。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狗屁，就是他把任何终极目标都写得非常具体，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武林高手个个象官僚，都一心垂涎第一把手的位子。

老威：你想过当第一评论家么？

阳九根：我没有文本批评，我老是在文章中点很多名，这是一种潜在的“天下太平”的思想。其实，具体也好，抽象也罢，都将人引回源头，生命诞生的地方。我经常想起我的祖父，解放前，他在江津城里开了一家绸布庄，在当地是有声望的士绅。后来，工作组通知他去开会，临行前，气氛很压抑，连我这么个小娃娃都能感觉到。他拍拍我的头就出门了。不久，被五花大绑弄回来，插亡命标游街示众，然后在离我们家门不远的地方公审，执行枪决。祖父与当地袍哥组织交往密切，这就是通匪。我永远忘不了他路过家门时，在人头攒动中回望我的目光，专注而慈祥，我不由自主地叫：“公！”他就那样深深一眼，把一种宿命的东西留在一个娃娃的心里。

也许，这就是构成我性格的最初的因素。太阳落山了，一家人

去为祖父收尸，他被绑在一架梯子上，直直地抬回来。那时电力不发达，整个县城没几盏灯火。祖父的灵魂随着鬼眨眼的灯火去了，而尸体还在家停了一夜，我从母亲的腋下瞥了一眼，觉得尸布下的目光还活着，专注而慈祥。

我已快走到终点了，因为我最近越来越多地想起这个情景。我为啥经历了如此多的坎坷？为啥热爱并从事文学这一行？为啥子与潮流不合拍？为啥从未有过健康的私人生活？

谜底已经要揭开了，真是可笑，可笑而辛酸。

75 户口受害者杨成舍

采访缘起：杨成舍先生今年 62 岁，是和我父亲一起收听、交流“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的同道。大约 1999 年的一个夏日，杨先生兴致勃勃地敲门拜访，向我父通报其儿子在电台朗诵“十分油爆的屠杀诗歌”。

刚巧我在，投缘之际，两代人各自谈起生活遭遇，竟相对唏嘘不已。比如我的户口自 80 年代迁出成都后，经历了调动、结婚、坐牢、离异，至今人户分离已近十年，给本人带来了无尽头的麻烦；而杨先生为我辈先驱，60 年代就被当作“问题学生”踢出故乡，发配到边远山区接受改造，一波三折，逆来顺受，如今做“黑人黑户”已经二十余年矣。

据杨先生考证，户籍制度应追溯到两千年前东汉时期，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在战火绵延之后恢复生产，把大量流离失所的农民重新捆回土地，就发明了“编户齐民”，即按登记在册的户主名字分配土地。“新中国的土地是国有的，”我却提醒道。

2002 年 7 月 23 日傍晚，我乘杨先生还书之机，企图做个采访，不料他摇头道：“不算冤，因为像我这种屡屡碰壁的黑人黑户，全国起码几十万；如果把从农村外出打工的民工也算上，就是一个填满各个城市的浩浩荡荡的流民大军了。”

我只好鼓动口舌，诱供不止。

杨成舍：老威先生，您这本《沉沦的圣殿》我慢慢翻了大半年，今天总算完璧归赵了。

老威：您若喜欢，就留下吧。

杨成舍：岂有借书不还之理？况且里面有收藏价值的文章，我已托人复印下来，比如第一章这篇《书的轨迹》，重点评述了文革前内部出版，供党政军高干当作反面教材去阅读批判的几百种黄皮、灰皮、白皮书（因控制发行，此类书籍没有单本的装帧设计，只笼

统选用或黄或白或灰的单色作封皮——老威注），并列举了在高干子弟和知识青年中影响深远的四十多部，都是西方和苏联的文、史、哲名著。

老威：老先生不仅好学，而且勤思，佩服佩服。

杨成舍：您别戴高帽，我是文学的门外汉。之所以对这段历史感兴趣，是因为 40 年前，我曾经接触过其中一本灰皮书，叫《白轮船》，是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小说，薄薄的一本，前面还附有一篇大批判性质的导读。事隔多年，小说内容几乎忘了，但是那种凄美的描写和情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主角好像是个孩子，对，是用孩子的目光在看那人性和自然一天天毁灭的世界，"白轮船"是个象征。那是 1965 年春天，我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读四年级。借书人是重庆市委副书记某某的公子，与我同桌，在校期间就以江帆的笔名发表过诗歌和小说，是老师和同学都争相巴结的"贵族才子"。江帆放荡不羁，曾私下借黄皮书给好几个同学，都没出事，偏偏我鬼迷心窍，在上晚自习时看禁书，被班长告了密。下课铃响，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辅导员和一帮班委给拦住了。《白轮船》从书包里搜出，人赃俱获，我只得招认是江帆主动借的。众人一听，哑了，辅导员犹豫了一会儿才说："不管谁借的，你在上课时间偷看反动书籍都是犯罪！性质说严重点，这和收听敌台也差不多。"

我被骇得脸色发青，就心虚地辩解说："江帆看过许多这种书，他家里还多的是，你们咋不去搜？"辅导员一楞，答不上话，班长却心直口快："杨成舍，厕泡尿照照，人家是哪一级，你是哪一级，人家的爸爸是领导干部，打过小日本，打过国民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自然就高，能从这种反面教材中汲收反帝反修的政治营养，你呢？"我嘀咕说："我咋个？我家也是城市贫民嘛。"班长嘲笑说："比革命干部出身差了几个等级。"我反驳说："马克思说过，革命就是要消灭等级，消灭三大差别。"班长不屑一顾："强词夺理！反正同一个东西，江帆爸爸能看，你不能看，看了就犯法。"我气坏了，就争吵起来，辅导员厉声制止，并且指出："你要深刻

地检讨，一份不过关，就重写一份，直到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危险性。注意，检讨时只谈自己，不要牵涉别人！眼看要毕业分配，希望你不要把污点带到未来的工作岗位上去。”

老威：什么意思？

杨成舍：威胁的意思，虽然当时学校没搞运动，但阶级斗争的弦一直绷得紧。辅导员把《白轮船》搜去，亲自奉还江帆。从此江帆不再理睬我，他可能猜想我告了密，恶报了他的启蒙善意，而我却为此，一遍又一遍写检讨，最终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被发配到川北穷县盐亭境内的柏梓区（文革时更名为柏梓公社）教乡下中学。柏梓中学坐落在一个山坳里，闹土改时，没收了当地一个乡绅的地产，包括大小两座四合院、鱼塘、晒坝和周围的田地，并增建了礼堂、教工宿舍和两层教学楼，就成了方圆百里最大的开放式学校。我所指的开放式，一是学校没围墙，与农田农户没界限，课堂外的树荫下常栓着牛羊，操场上常晒着粮食，礼堂的一半也做了生产队的秸杆、柴禾库，出没着钻来钻去“打游击”的农家小孩；二是柏梓区及相邻的黑坪，安家等数十个公社的生源都集中到这儿。一开学，只见四面八方的山梁子上，一串串学生背着米面红苕豆类，上坡下河、风尘仆仆赶来，真是毛主席“五七”道路的最好样板；三是这儿离山垭的柏梓场口有五里之遥，并且全是三倒拐的上坡路，还要经过一片较大的荒坟地；四是师资力量在县境内算相当强，1965 年秋天我报到时，一打听，暗暗吃惊，原来校内藏龙卧虎，不仅有我好几位校友，还有重大、川大、西南交大、政法学院、川师、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体院等 20 多名大学生，占学校教师的 50％左右。同是天涯沦落的“臭老九”，大伙见面，都对自己如何发配至此晦莫如深。

老威：这有点像钱钟书在《围城》里描述的“三闾大学”，为了躲避兵荒马乱，方鸿渐、赵辛楣等一帮读书人千里迢迢去了，才发觉这儿“人材济济”，什么都有，连“克莱登大学”假博士文凭都有。

杨成舍：现实不是小说，三闾大学虽地处偏远，校风虚伪可笑，

但来去自由呀。这也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国民党再怎么混蛋，也没有用一个户口本把你死栓在一个地方，不愿伺候了，拍屁股走人，天下大得很，何愁没有安身立命之地？所以方鸿渐等人一会儿上海一会儿湖南。就是远涉重洋也没啥，战争嘛，国民党想管也管不过来。但是到共产党手里，户口随工作调动而迁移，我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市人，祖宗几辈都在川西平原，却突然之间，仅因为看过半本禁书而被发配这么远。可时代就这样，你撞上了，就得逆来顺受。柏梓中学实质上是农业中学，有果园、菜地、鱼塘，师生们一日三餐除了主食，其它都自力更生。那年头，文革一天天临近，升学率早就不是衡量教学水平高低的标准，所以除了上午的正课，下午多半就是劳动，担水挑粪，喷药下塘，老师都得身先士卒，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名义上我是数学老师，但整天一身泥一身汗，改造资产阶级臭思想。那阵子评价一个好老师的标准就是劳动，铁人一般无休无止的劳动。校长是本地人，大学毕业，学邢燕子、董家耕回乡务农，娶了个苦大仇深的雇农后代，生了三个孩子。他三年前走马上任，正逢贯彻“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于是他拎着两只亲手打造的大号粪桶走上讲台，提出要把学校建成“革命的花果山和米粮川”的口号。校长总是嫌我的粪桶太小，直到某一天，我被炎炎烈日晒晕在地里，手里还下意识地死抓住扁担。文革初期，县文教局派工作组下来，指导“校内闹革命”，校长、书记、主任、团委和学生会串通，组织保守派红卫兵，开始对出身剥削阶级或有政治把柄的师生进行审查，教师中一大半落马，我的问题也从档案中被抖出来。开罢全校斗争会，就戴高帽游乡，前面有人敲锣，历数罪状，跟电影中斗土豪劣绅一样。接着就在烈日下，围着操场练长跑，十多个臭老九，排着队，有人手提棍子，站在树荫下喊“一二一”。操场中间，晒着豌豆，脚的落点稍偏，就踩着豌豆，人啪地摔得硬梆梆的，跑了一下午，每个人都散架了，鼻青脸肿，幸好那时都年轻，腰腿伤了，内脏还好。稍后晴天一声霹雳，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工作组转眼成了刘邓路线派来的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手，我们挨过整的这伙人，立即响应号召反攻，组成造反军，把校长、书记等“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连夜揪出来，如法炮制，以反对毛主席的名义，游他们的乡，戴高帽敲锣，也像演电影。接下来的半个月也是围操场长跑，一整天一整天，不管天晴下雨、刮风打雷，就是不让他们停下来。校长比我们长十多岁，熬不过，累垮了，瘫在雨地里，被揍得遍地打滚都不起身。

老威：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杨成舍：我趁大串连之机回成都呆了一个多月，每日去红卫兵接待站免费用餐，如同过节。然而好运不长，当我在“浩荡东风”鼓舞下回校不久，又被造反派认定有散布反动书籍的“历史问题”，开除出组织。这一来，我又成了走资派校长的狗腿子，陪斗陪跑。我熬不下去，就逃回故乡。不料才一个星期，学校的红卫兵就拿着介绍信跟踪追击，并会同街道派出所民警，以查户口为名，将我连夜捉拿，押送回户口所在地接受监督改造。大约是 67 年 2 月镇反之后，四川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先并肩打垮保守组织产业军，接着内部又分裂成红成和 8·26 两派，势均力敌，拉开真刀真枪的武斗序幕。盐亭是全川第一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县，在几起几伏的欢呼声中，人民的注意力由批斗牛鬼蛇神转到保卫红色政权，柏梓中学也卷入，时常在半夜一声哨响，全体师生摸黑集合，跑步、爬坡，去柏梓场口外挖断公路，设埋伏，企图迎头痛击从邻县梓潼来犯的红成派。直到 71 年林彪爆炸前后，我等臭老九都比较逍遥，种蔬菜，打扫卫生，渐渐也排几节课。闲下来，几个人也能凑一块，打电筒去田坝抓青蛙，或星期天沿着水沟摸鱼捉蟹，改善伙食。日子混久了，想法就多，苦闷、无聊，因为转眼间，我们这批大学生都已 30 岁左右。高学历的光棍在山窝里不好弄，找女生犯法，找女农民，人家还瞧不起，时代风气，臭老九掉价，特别是我这类有历史问题的。

老威：你们不设法在成都解决个人问题？

杨成舍：痴人说梦，大城市户口多值钱，会嫁给山区户口？况且，回家要请假，要开介绍信，否则住在父母家也不保险。70 年

暑假，我好不容易被校革委会准假，却把介绍信丢在长途客车上了。搞得我心神不定，在成都找同学借宿，东一晚、西一晚，做贼一般，自卑的心态，搞啥对象呢？

老威：您爱人看上去比您年轻。

杨成舍：她是中学旁边刘家院子的农村姑娘，只读过村小。当时院子进门的过道，安有一架榨面机，桂芝就成天围着榨面机忙碌，做挂面和切面。我们几个人都常去献激情，和面、绞面滚，将刚出的湿面条挂到太阳底。桂芝当时 21 岁，媒婆把她家门坎都踢断了，况且还有成都体院的老贺、西南交大的老李与我竞争。桂芝的脸红扑扑的，眼睛象豌豆角，笑起来好看。我以为她看不上我，还隐瞒了岁数。桂芝的父母贪图小恩小惠，我就写信让父母省下票证，先后从成都捎来春燕牌纸烟两条，红糖两斤，固体酱油两封，细盐巴三斤，高粱饴软糖和水果糖各两斤，的确良衬衣两件，等等，分期分批贿赂，在物质匮乏的 70 年代，这些都是根正苗红的当地相亲户所无法办到的。“名声是臭了点，”桂芝爸在面对同村人的质疑时回答说，“但好歹是拿工资的人。”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我们这帮怀才不遇的臭老九，恍眼都 30 左右了。故乡回不了，只能削尖脑袋在本地找对象。于是“老师追村姑”成了柏梓区的旷古奇闻，还上了县文教局的内部报纸。老贺比我大两岁，32，却自称 26，逗得农村的老娘们抿嘴笑，因为他教体育，晒得像非洲黑人，谢顶也早，恍眼还以为是两个孩子他爹。桂芝慎重地接受了一盒雪花膏，算承认与我耍朋友了，一个周末傍晚，我俩一前一后地转田坝，遇一水沟，我先跨过去，回手牵桂芝，趁此机会搂了她一下，就被眼尖的贫农代表（指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驻管理学校的庄稼汉——老威注）从远处瞅见，他长声吆喝着赶过来，指责我“耍流氓”，我以“自由恋爱”相反驳，老汉气得跳脚：“爱你妈个屄！”不由分说把我拽回校开批斗会。学校“农家恋”成风，老农要杀一儆百，却没人站起来发言。老农下不了台，就将我隔离反省一星期，命民兵严加看守。老农自己去做桂芝工作，要她揭发我“作风败坏”，桂芝含羞叫冤，桂芝爸却叉腰站门口为女儿撑腰：“败坏你妈屄！你两代贫农，老子还是三代贫农呢。你造反动舆论，搞得我家黄花

闺女莫法嫁人，狗日的阴险！”两个庄稼老汉边骂边从刘家大院揪扯出来，站到学校操场去对阵，终于发展到解裤腰，亮家伙，让对方“啃了”。桂芝在家寻死觅活，被她的妈和弟抱住。事情一闹大，挨了煞威棒的贫农代表就叫人写了检举材料，亲自到区上汇报，要求政府将我“劳改”。不久，文教局派专案组下来调查，所有的人都证实贫农代表的确当众脱裤子，给毛主席抹了黑。解除隔离，恢复上课后的一个星期，我就用三盒春燕香烟哄着贫农代表盖章开证明，与桂芝扯了《结婚证》。当时她只有 21 岁，生产队替她虚长了 2 岁，凑够晚婚条件，因为山区农村，失节事大，两人“流氓”都耍了，就“降价处理”吧。吃喜酒时贫农代表不请自到，与桂芝爹你一杯我一杯，称兄道弟，原来这老汉是个不长记性的炮筒子。

老威：看您的模样还有些得意。

杨成舍：若不是贫农代表横插一杠，婚事还进展不了这么快，要论桂芝的年龄，长相，学校十几个未婚大学生要流口水，他们的对象都不如桂芝。老温的爱人教村小，都 25 了；老顾的婆娘特横，婚后，经常从坡上冲下来找他，与水牛一道立在教室外；倒霉的体育天才老贺，干脆就找了蒙家山上带一孩子的寡妇，就扎根在那儿了。

老威：您好歹回来了。

杨成舍：现在户口还没迁，一恍 30 多年，柏梓中学都撤了，操场、宿舍、教学楼都变农田了，我还没迁。大约是 1973 年，桂芝生了儿子杨都，由于生活较拮据，我就趁暑假，在生产队平价收购些鸡鸭和布票，搭便车回成都变卖，吃些差价。有一次，我在沙湾铁二局外面交易时，被市管会的人抓了。

同时被逮的有十几个人，我因下意识舍不得鸡鸭，就闯了大祸，“投机倒把”的帽子稳稳戴在头上。我被押回盐亭，依法判处三年劳教。掐指一算，我倒卖了两只鸡两只鸭一丈布票（还有四尺被人从裤裆睾丸下面抠去），赚赃款 200 元左右，扣除成本，得 110 元。75 年刑满释放，由于劳教属“人民内部矛盾”，公职没开除，教书的资格却取消了。我被降级留用，做学生伙食团的会计，直到 1978

年。当时邓小平复出，主持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人心思动，我再也呆不下去了。78 年底，我领着一家三口，逃难一般回到成都父母家。十几平方米的小屋，住不下，我又找同学故友租房，先是免费住别人的单位宿舍，后来因清查人口，就搬到东郊红瓦寺 23 号，8 平方米，啥都没有。三个人睡地铺，剩下就一张桌子两条凳。

老威：太落魄了！

杨成舍：再苦也不走回头路！我找了个临时工。在东门外背河沙，几毛钱一个立方。一天要干 15 小时；稍后又俩口子合拉板车，一分一厘地挣钱，像毛主席说的，我已经脱胎换骨了，不读书不看报，比摆烟摊的大肚汉还瞧不起文化。然而，我们在红瓦寺住了半年，还是被赶了出来。因为户主和房产折子是其它的名字，我们是“黑人黑户”。半夜两点多钟，我和桂芝被查夜民兵带到派出所，在黑屋里冻了一夜。幸好父母还健在，他们接到通知，就揣着罚款和街道办事处的证明来领人。毕竟还是换天子了。若是从前，又得遣送回原籍。这些年，我们不知被查过多少次户口。直到 93 年，父亲去世，老屋也拆迁了，我才搬回去，与老母合住一套二。我已办了 20 多个《暂住证》。儿子都大学毕业工作了，我还要在自己家里暂住下去。

老威：您去迁过户口么？

杨成舍：原来很着急，特别是桂芝，还是农业人口，一天到晚埋怨，催我托关系，找门路。七、八十年代，大城市的户口政策是进一出一，铁板一块。

单位一再来函或托人，要我回去教书，县教育局也来了个科长，说要考虑给我平反涨工资。我啥都不要，那块伤心之地，毁了我一生。我就黑下去，只要不偷不抢不违法，能咋样？

老威：您就一直干体力活儿？

杨成舍：也代过两年课，高考补习班。后来用父母的户口办了个杂货店，桂芝经营，我当采购。经常登货三轮，身体反而比教书匠棒些。

老威：孩子呢？

杨成舍：我有同学在中学里当教务主任，多出点钱，就能升学。杨都小学只读过两三年，发蒙时我亲自买课本教的他。

老威：现在办户口简单多了，您也该叶落归根吧。

杨成舍：一个人要交15000元的城市建设费，两个人就是30000元，太黑了。这么多年都耗了，一把老骨头，骨油榨干无所谓，我总要熬到自由入户，自由成为成都人的那一天。况且，粮油关系取消了，票证消失了，户口也没过去那么值钱。人生，人生，咋说呢，连梦都不是。我现在没梦做，想都不敢想这辈子咋混过来的。

76　冤死者杨继年

采访缘起：2002 年 1 月 13 日深夜，滞留北京的上访户老陆在麦子店一带的某处民房火灾现场，撞见了一个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乞丐，他就是本文的主角杨继年。

出于慈悲，老陆立即将受伤者送往附近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分院抢救，得以脱险。至 2 月 5 日，由于无钱缴纳拖欠的两千多元医疗费，杨继年被强制出院，遣返回四川原籍，入住双桥乡敬老院，五天后因烧伤感染而不治身亡。

作为遗产，杨继年留下了几百万字的各类申冤材料，所以，他堪称世界上创作量最大的“上访作家”——当我在去年秋天听人提到这一头衔，不禁嗤之以鼻，并反问道：“11 岁坐牢？您在编小说吧？”

2001 年 10 月 12 日下午，我在成都西门的某处街沿上拜访了杨继年，印象不太好。他拧着眉毛，一脸怨毒。我说想与他沟通，他回答：“沟通有屁用，您又不是法官。今天您是个无权无势的文人，闲着没事，搜集个素材，所以能陪坐在这儿磨牙；如果明天您时来运转，不慎当上大官，心肠马上就变黑了。”我下不来台，只得边撤退边说：“改日再会。”过了一个星期，我在“上访旅馆”顶楼 3 号房再访杨继年，乘其情绪稳定，与之长谈，还算顺利。之后，缘分尽，他上访去了北京。

我花了大半年时间琢磨材料，仍然没把握写好此案。我数易其稿，曾尝试使用报告或记实小说的形式——焦头烂额之际，最终不得不沿袭简朴的原始访谈。因为杨继年已经死了，大量的空白无法填补—— 一个人惨到如此地步，文学杜撰有何意义？还是让冤魂开口，用自己的原声告诉读者吧。

老威：许多上访人士告诉我，您年仅 11 岁就被判刑了，是真的吗？

杨继年：我生于 1946 年 12 月 8 日，1957 年 11 月 5 日被××县法院以偷窃罪判刑 10 年；1958 年 1 月 10 日又被加刑 3 年。老威同志您看，这是两份《判决书》。

老威：原件呢？

杨继年：没有。

老威：坐牢是大事，咋可能没法律原件？

杨继年：您是故意挑刺吧？

老威：老杨您别生气，我真的、真的懵了。例如这所谓的《判决书》，字迹如此潦草，恐怕大学教授辨认起来也吃力，就凭它，您蹲了 34 年大狱……

杨继年：这很正常，五十年代提倡"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当时的法律文书都是手工制作，当场写当场判，没那么多讲究。可能是我太瘦小，高高在上的法官大人觉得没必要发给我《判决书》，因此本人手里的这些复印件，也是 1998 年 6 月 23 日从××县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查到并复印下来的。这很正常，在劳改队，许多人手上都没《判决书》，要么被原判法院收回去统一存档了，要么被某个管教永远"借"去了。农民嘛，文盲居多，如果不申诉，"判决"就是一张废纸。

老威：您也不看重这张"废纸"？

杨继年：当然看重。因为它，我上访几十次，申诉 700 多次。开始，地方法院赖帐，不准查，我就拿出全国人大和最高法院信访办的回复函，狗日的看都不看就朝外推我，没办法，我只好在法院门口打地铺，住了两个多月，每天起码吸引几百观众。狗日的面子绷不住，最终同意查询。接下来该我跑腿，地、市、县、区，好几家档案库，耗了许多天。东兴区法院档案室是个仓库，黑咕隆咚，保管员打开门一指——你去查嘛，莫弄乱了，否则不好归位。我懵头懵脑地朝里走，周围全是顶天立地的大铁柜，都锈起壳了。霉味、死耗子味，还有防蛀防腐的药水味，呛得人喉咙直痒。保管员拉开日光灯，边转钥匙圈儿边吼——查嘛，冤有头债有主，你查嘛。

我在铁柜子中间的巷道绕来绕去，浪费了半个多钟点，才醒悟

过来：原来像火葬场的骨灰寄放室，这儿也按年头、月份排队，每竖排铁柜档头都贴有标记。我拐弯抹角钻到最里面，突然瞅见“1957—1958”，整整七大柜子！您想想，一个犯人的判刑材料平均才几十页，七大柜子，要判多少毙多少？心跳比擂鼓还重，我喝了口水，稳住神，开始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厚沓厚沓的卷宗夹着纸，日子一久，就锈成千层饼了。纸也生锈，您信不信？

天气热，心里发毛，我昏天黑地的翻、翻。身边带了个塑料壶，能装五磅水，一会儿就灌光了。汗出得多，衬衣贴着背，我刚要脱，保管员在门口吼——下班了！

第二天起个大早，赶去继续查，还是从下至上一屉一屉翻，还是锈成千层饼的纸。一埋腰就是几个钟点。蜘蛛在背梁上牵网都不晓得。“1957”看遍了，卷宗封皮都没“杨继年”三个字。轮到“1958”，个个抽屉都锈死了，拽不开，我用脚踢，用拳头砸，把一窝耗子从顶上震栽下来。还没弄醒豁，巴掌大的一片陈锈哗啦砸得我满脸花。

眼睛睁不开，脑壳又哐啷撞了铁，我只有摸出门去冲自来水。清醒了，假装歇气，偷捡了半块砖头进去猛敲。搞破坏么？——保管员又吼一声，但没进门。我估计他这辈子也没进来过几次，因为我隔一阵再抡砖头时，外面就没动静了。

我这次先拽最顶的抽屉，不料里面真躺着“杨继连”（法庭判决之笔误，应为“杨继年”——老威注）的卷宗！也是一沓“千层饼”，我闭住呼吸去掰，手又抖得厉害；我把整张抽屉搬到青天白日下，掰开案卷，天！我的原判决！黑里透黄的纸，锈缝缝牵着一泓泓虫蛋，我吹、拍、抖了又抖。这玩意害了我一辈子，我还拿它当宝贝。

老威：您这查找过程挺惊险，不过，我完全能理解，因为我的《判决书》也在十年前被四川省二监狱的黄政委永远借去了，如果现在我要上访或申诉，遭遇恐怕同您一样，还不一定有您的运气。好啦，我们来说说这判决本身，它的确漏洞百出：您的主刑判决的落款为“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发出”，而加刑判决为“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发出”，也就是说，在主罪还没最终以书面形式敲定之前，

您就已经投入劳改，并且因“抗拒改造”加刑 3 年。

杨继年：您的头脑好使，是个当律师的料。

老威：您被加刑的书面罪状是——公开质问民警许国成说：“我犯了什么罪，要判十年刑，我没有罪，也没有犯法”等，气焰非常嚣张。又先后向张金山、刘彪等犯人说“要逃跑”来煽动犯人。又说：“看守所的伙食好，余家垭的生活不好，连酸菜都没有吃。”57 年四月份又煽动犯人董光华、彭克彬等说：“这样冷的天气要我们来栽秧子，衣服也不发给我们。”企图煽动犯人不堪改造……

杨继年：我一个娃娃，牢骚发过就忘了，谁会料到有人背后记小账。

老威：现在请讲您为什么被判这么重。

杨继年：起因是一只羊。1953 年，我同父异母的长兄偷了邻村一只羊，被检举，判刑 10 年，送往新疆劳改，从此就没音讯了。我们全家七、八口人都受株连，被管制劳动 4 年多。到了 1957 年，地方上偷盗成风，公安机关人手不够，经常破不了案，于是就根据群众意见，拿“偷羊贼家属”开刀，杀鸡骇猴子。

我的父母和地、富、反、坏等阶级敌人一道，被反复批斗，终于受不了，就在半夜拉家带口出逃。热闹地方不敢去，只有钻岩洞当野人。我中途迷路，天亮时又转回家，正撞见县公安局的肖民警领着人来搜“赃物”（包括集体丢失的镰刀、锄头、米、肥肠、肉、黄豆等），结果一根毛也没捞着。

肖民警扣住我，怒火冲天地叫扒房子。几个民兵都放下枪，取来长竹竿捅屋瓦，一槽一槽地戳，稀里哗啦，三间房全豁亮了。肖民警站在远处指挥，灰尘扬过了，没响动了，才过去侦察。他在碎瓦片中翻来搅去，突然眼睛一亮，拣起一撮麦种。他仰起脑壳想了半天，就招手让我过去问：“杨小娃，你偷了公家多少麦子？”

我吓得腮帮子咯咯打架，说不出话来。肖民警得意地拍巴掌说：“心虚了吧？偷的东西吃不完，就一把把撒房顶上，窝藏犯嘛。”

我心里争辩说：“麻雀才是窝藏犯，哪家瓦缝没有它们衔漏的粮？”但浑身越抖越凶。肖民警拽过我的双手上铐，不料腕子细得

跟柴棒似的，钢圈一戴就滑下来。肖民警没奈何，换根麻绳把人捆了。我一屁股跌地上，哇哇大哭，肖民警说："哭死骇不倒人民政府，无产阶级江山是铁打的！"

围观群众都鼓掌欢迎，喊："整得好！"生产队会计提了个墨桶，舞排子笔刷墙头标语，我不认识字，估计是大家呼的口号："严惩反革命偷羊贼！"

"打倒破坏分子杨小娃！"等等。肖民警见斗争气氛够了，就摸出个工作笔记本，碴碴写几笔，当众宣读："为了确保一方平安，使国家和集体财产不再蒙受损失，我代表公安机关对惯盗杨小娃实施拘留。"

我赖在地上不去，肖民警就将我拦腰夹在腋下，分开大伙走了几步。我边哭边蹬腿，姓肖的稳不住，毛了，骂声"狗日的"，把我横搁在膝盖上，噼里啪啦打屁股。周围群众都被惹笑了，几个民兵笑得连步枪也背不住，我嗓子嚎哑了，有人还凑拢来开玩笑说，肖公安在管教自家的娃儿。肖假装叹气说："这辈子倒霉，养了个贼儿子。"

警车停在村口大路旁，同村人像过年一般热热闹闹"护送"我上车，颠簸了两个小时进入县公安局。"罪证"早就弄齐了，肖民警脱了警服，把双脚放在办公桌上，边啃大肉包子边连续作战，问"姓名、年龄、哪里人"。司法过场几分钟就完了，肖民警叫我盖手印，我饿惨了，吞着口水，双眼紧盯住他嘴边的包子不放。他连催几回"快盖"，我竟没听见，我说："叔叔，给我个包子吃嘛。"姓肖的说："盖完印让你吃个够。"

唉，我一个农村娃娃，打出娘胎，见得最多的是饿鬼，见得最少的是油荤，一听说"肉包子能吃够"，脑瓜嗡地就大了。我趴在桌面上，指哪儿盖哪儿；姓肖的见我嘴馋心切，就叫我自己一页页地翻着盖。一会儿，我浑身虚脱，像蒸笼上气一般腾腾冒汗。姓肖的见活儿干完，就去伙房端来四个大包子，一海碗菜汤。我简直疯迷了，一头扎过去，转眼间包子和汤就下肚了，连滋味都没尝出来。我吧嗒吧嗒咬了半晌空气，将姓肖的逗笑了，又去端了三个馒头。

我兴奋得连叫“叔叔好”，肖民警把脚举上我的脑壳，敲了两下说：“切莫胀死逑了，国家又少一个劳动力。”我嘴里塞着馒头，只好含含糊糊地答应：“在队里我只算小半个劳动力。”肖民警楞了一下才说：“吃牢饭是嫌矮了点儿。”

老威：您就这样被四个包子加三个馒头定罪了？

杨继年：那年头，人都饿傻了，逮住其他人也一样么。

老威：虽然《判决书》白纸黑字写着“11 岁”，可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中共 1955 年就颁布了《刑法》，按规定，受监护的儿童是不该接受刑事处罚的，您……

杨继年：这是我的《身份证》《选民证》《释放证》，这是凤天乡政府，杨家冲村委会出具的出生证明，还有当地老人和村民的证词——我生于 1946 年，千真万确！

老威：莫激动，老杨。

杨继年：我如何能不激动？一个娃娃被陷害坐牢，居然没一个大人站出来，讲几句公道话。我在万人大会上，被公捕公判，那天在凤天乡 13 村操场，一口气就判了几十个阶级敌人，我最后一个登台亮相，骇得尿筋都缩了。大伙都举拳头，比森林还密，都喊要打倒我。

老威：疯了么？

杨继年：不跟大形势才疯了。

老威：给儿童判刑是“大形势”？好吧，那年头的荒唐事本来就多，可后来呢？

杨继年：后来就劳改、申诉。我加了四次刑，1957 至 1991，我关了 34 年才出狱。坐牢唯一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学文化，我两、三年就脱掉文盲帽子，不用求别人帮我写申诉了。老威同志您看，这床底下，这几口纸箱和麻袋里都是我的杰作，从十几岁到如今，40 多年，我写的申诉材料能把人淹死。我无家无室，一条老光棍，所有财产就是申诉。“11 岁的无辜罪犯！”我喊了上万回冤，可法院直到 1991 年才答复：“判刑时年仅 11 岁经查不实。”

老威：法院认为您生于何时？

杨继年：除了“经查不实”就没下文。当时气得我自己煽自己百十个嘴巴，难道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又不可能把死去的爹妈从黄土下拽起，送到糊涂法官跟前。

老威：我对监狱的情况不算陌生，您是一桩特例，老杨，加四次刑的犯人算稀罕了。能不能讲讲是怎么回事？

杨继年：要完整地讲，得几天几夜。

老威：那就简略地讲。我先提个头，念念××县人民检查院的“手工”《起诉书》——……该犯自投入劳改以来，不认罪服法，公开叫嚣无罪，多次申诉，企图翻案。经××中级人民法院对其申诉驳回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于 62 年 6 月蒋匪窜犯大陆时，该犯于 62 年 7 月三次书写反动词句（因拉肚子作草纸用了）。7 月 14 日晚两点钟将事前已写好的反动词句投入劳人（犯人之笔误——老威注）经常来往的杂务室桌子上，其内容是：“请注意改造的全体同志们，事实下面认点，如下为准。愿望到达，62 年世界上有先大人，三斤大米，两斤柴，今年第四次大战，一定蒋介石坚决打回来。以后全国所有个个干部来同时当劳改犯人为准，但是也可以积极行荷。注意张罪联盈，打倒毛主席。”…

杨继年：莫念了，反正就是配合老蒋反攻大陆嘛。

老威：是您写的么？

杨继年：直到现在，我都没把“反动词句”的意思弄明白。记得当时的《人民日报》上，经常有美蒋特务在沿海地区登陆的报道，监狱结合形势开会讨论，警告囚犯们夹着尾巴做人，不要对反动派心存妄想，否则将“加倍从严处罚”。我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顶风作案，写“打倒毛主席”这样挨枪崩的反标！——这次我被加刑两年，您想想，收听一次敌台（指港台、苏联及西方电台——老威注）都判 10 年以上，写反标哪会轻易放过？

老威：咋回事呢？

杨继年：我因为不服罪，被树为反改造典型，那边美蒋特务一登陆，我就被控制起来，打入小间。谁知没过多久，就爆发了“反

标事件”。我被脱得赤条条，吊打几天几夜，只好承认是“反标”主谋。狱方整理材料，正准备上报，反标真凶暴露了，原来是本队的“风水先生”×××。他妈的，×××被枪毙时，我还被弄去陪杀场，就在老矿井旁边的空地。监内犯人开了大会，他就插上亡命标，送县城示众。快到晌午，我也被五花大绑，与他碰头，同赴鬼门关。那一瞬间，我和×××都反绑着跪在一个土坑边，间隔才一米，老实说，我没看清他是怎么栽的，枪一响，我就闭上眼睛，只感到一盆滚水兜头浇下来，我打了个冷战，裤裆就湿了。接下来，绳子松了，我一抹汗，半边脸和半个肩头，都是×××的血，胡茬上还粘着脑浆渣子。回到队里，我洗了个澡，打肥皂使劲搓，还感觉×××附在身上，我晓得肉皮是搓不白的，煤矿的油已侵进去了，连内脏都黑了。

才加两年！我当场松了口气，感到太便宜了。然而 5 年以后，我又以“反标罪”被加刑！事情是这样：1968 年 5 月 15 日，我在煤矿严管集训队打扫厕所时，发现蹲位边有一大把纸条，我用扫帚理开一看，竟然是“打倒共产党！打倒毛主席！推翻共党专制”的反标，共 50 多张。我见四处无人，就没管这事，盘算着搞完卫生后再汇报敌情。可等我兜一大圈回来，反标不见了。

岂料一星期后，中队管教付××亲临监舍，半夜一点钟将我从床上拽起。

拖到饭堂背后的臭水沟，踹进去，挥棘条把我抽得死去活来。然后叫来犯人组长，给我钉脚镣，镣链上还加几十斤的大铁砣，双手则戴马蹄土铐。我连叫：

“冤枉！”付××说：“我让你活不如死。”就把我吊起来，命令人轮番乱打。我熬不过折磨，只好写交代书，承认犯有写反标、无理申诉、破坏刑具，企图私藏凶器杀害审讯干部、企图逃跑等罪；另外还检举揭发李星明、厚大文、谢丕安、王月西、李平、王清云等人的“犯罪事实”。由于我无中生有的检举，致使厚大文加刑 3 年，谢丕安加刑 12 年，王月西因“反标罪”被枪毙，王清云被判无期徒刑。

大会开过了，我蹲在小间等待处决，头顶双岗管制，不放风，不洗澡。手脚被铐死，一动弹，就叮铃哐啷闹地震。唉，真是命不该绝，还和上次一样，骨节眼上真凶暴露了：经查证，“反标事件”系本中队犯人王春林、刘永龙、谭永照、华超群四人所为，与我无关。王、刘、谭三人很快被枪毙，华被加刑四年。知情不报视为同谋，我加刑七年。为了避免法律上的漏洞，我与他们不是同一张《判决书》。

老威：文革中还有法律么？

杨继年：公、检、法统统砸烂了，代替专政机构的是“××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区公检法军管会”，我的判刑单位属以上两家。

《判决书》抬头就是：“最高指示——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老威：这东西让我复印一份，也算历史文物。

杨继年：历史文物？它可把我气疯了。大概怕我陪杀场时喊反动口号，那天狱医朝我嘴里打麻药，还塞了棉花。有过一次体验，我就不闭眼不尿裤子，听一声枪响转一下头，盯着身边三人的脑壳开瓢，栽下土坑，双脚还朝天连蹬几下。有个人连挨几枪都稳住不倒，刽子手就使枪筒将他戳下去。咕嘟咕嘟冒的血啊，染透好大一片地，一直到当夜梦里，我都在无边无际的乌红色里爬不出来。我开始出现幻觉，明明看见那三个死鬼提着脑壳追我、围我，骂我害了他们，可一转眼，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我想，落到今天这人不人鬼不鬼的田地，都是管教付××害的。

老威：您要报复他？

杨继年：我现在还想整死他，我神经彻底错乱了。加刑后的一个月，我每天都写“申冤信”，我在信里破口大骂。我还主动找付××汇报思想，我说：“我要杀人。”

他问：“杀哪个人？”我说：“杀你。”他问：“啥时候杀？”我说：“吃完饭就杀。”他问：“用啥子刀？”我说：“砍甘蔗的刀，或者铡刀。”他问：“刀在哪儿？”我说：“铡刀埋在你过路的地方，

切掉你的脑壳老子就逃跑。”思想汇报完毕，付××叫来犯人，打断我两根肋骨，还撬开嘴塞大粪，验证我是否装疯。随后，我被关进小间，不放风，不洗澡，不用筷子，象畜生一样锁在黑暗中四年。1975 年春天重见天日，以反改造罪名被判无期徒刑。

老威：您逃跑过么？

杨继年：我三次弄烂刑具，把小间的墙戳了一个大洞。我要自由，要阳光。提讯时，我装着起身看口供，把一个手印盖在付××脸上，转身就跑。一大拨解放军脚跟脚撵，赶鸭子一般。我抵拢墙了，九米高，墙头拉了几道电网，我向后退几步，再俯冲，一次又一次跌跟斗，一次又一次上窜下跳。脑壳撞大了，浑身血口子，哨兵懒洋洋地拉枪栓，鸣枪示警，我不理，继续喊叫着逃跑、撞墙。哨兵射击了，左一枪，右一枪，都没伤着我一根毛。我折腾得不行了，一屁股坐在地上，那些追捕的解放军战士才笑嘻嘻地围上前，问我：“逃够没有？”接着拳脚如雨点落下来。

老威：这样下去您只有烂在牢里。

杨继年：所以我心灰意冷，从此停止写申诉信，见干部和红毛犯人就点头哈腰。我尽量不说话，不瞒您说，除了学习发言、汇报思想等囚犯必做的功课，16 年来，我没主动和任何人打招呼。大家表扬我脱胎换骨了，可惜患上了自闭症。

我减了两次刑，1991 年 1 月 30 日释放时，左膀子吊着，永远抬不起来了，左脚也跛了，幸好内脏没大毛病。

老威：之后您就开始上访？

杨继年：没有。我回到离开了几十年的故乡，路都不认得了。我两眼抹黑地在村里晃荡了几个来回，治保主任就带着人捉贼。我忙掏出《释放证明》，治保主任说：

“什么杨继年！这儿没这个人。”我说：“我离家时你还没出娘胎。”后来到了村委会，村长叫来几个 70 岁以上的老辈子辨认，都确定我就是当年的“杨小娃”。但老辈子们说，我的父母、哥嫂、姐姐、侄儿、侄女等一大家人都在六一、六二年被活活饿死！由于绝了门户，家产就归集体。我问：“宅基地呢？父母的坟呢？”村

长回答："旧社会的事，我咋晓得？你走嘛，我们要关门下班了。"我说："这是我的家乡，你得按政府规定安置我。"村长生气说："人民公社垮杆后，耕地和宅基地早按人头分给各户了，你家又死得连毛都不剩，你一个孤人挂靠在哪儿？我拿啥子安置你？"我哀求说："无论咋样今晚你要给我找个住处，能遮雨避风就行。"治保主任说："你到底滚不滚？"我的眼泪哗地出来了，我喊："我滚不动，我要去你家端碗。"治保主任叫几个人把我扔出村口，还顺手塞过一只破碗说："这是我家看门狗老黄用的，免费送给你。"我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在当地好心老人的指点下，找到我家原来的宅基地。三十四年前，11 岁的我被肖民警从这儿抓走，父母钻山洞，房子被扒……而现在，一切都没影儿了，原地建了一座小型水泥厂，我稍微靠近一点，紧闭的铁门里就炸起狗叫。

接着我想拜祭父母，可村头村尾瞎窜了一天，也找不着坟地。后来才晓得，当时饿死的人太多，根本不可能单独起坟。能够掘一大坑，十几具尸混埋就不错；坟头也垒得浅，日晒雨淋，荆草猛长，翻两个春天就辩不出原样了。

老威：村里绝情，您还可以找乡（镇）政府，国家有"两劳人员"回家落户的政策。

杨继年：我去了，可凤天乡政府的答复是：政府是个空架子，既无钱无粮，也无房无生产工具。

老威：那要政府来干啥？

杨继年：乡长和书记都让我滚远点，我说我要告他们，乡长说："你尽管告，告到江泽民哪儿也顶逑用。"我说："我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请大人们给我指条生路。否则饿死在政府门口也不光彩。"书记说："一个大活人还叫尿憋死？

杨家冲生不了根，你就回监狱嘛，你在里头混了三十几年，那才是你真正的家，说不定还能娶上个女犯人呢。"我说："你开玩笑么？"书记说："跟你这种人有啥玩笑可开？你回监狱吧。"我说："哪你们出个证明。"于是凤天乡人民政府就给我开了回监证明，也算路条："原我××市东兴区凤天乡杨家冲村二组村民杨继年，

因劳改释放，现家里无一亲人、财产等，所以无法生活。

根据本人技术特长，故介绍前来××市第一监狱做工。望贵处给予支持，特证。”落款是 1991 年 3 月 4 日。

老威：您真回监狱了？

杨继年：走投无路嘛。

老威：您好不容易才熬出头啊。

杨继年：自由不能当饭吃，与其流落街头，不如回去继续劳改。于是我沿途乞讨着走了几天，拢监狱时岗哨森严，根本进不去。我只好绕到犯人家属接待处，嚷着要见监狱政委。里头的人回答政委没空，我就轰地双膝跪下，喊道："不管有空没空，我非见不可！否则我就跪死在这儿！"

这一闹，围观者就朝屋子里涌，狱方害怕影响不好，就派人把我接到狱政科，还问寒问暖。我鼻子一酸就嚎啕大哭，监狱折磨我大半辈子，但此刻，高墙、电网是那样亲切，我真想长一对翅膀飞进去，我的监舍，我的双层钢架床，躺在上面，至少有一个房顶遮着，至少没人撵你，至少还算暖和。一会儿，狱政科长出面，我双手呈上乡政府的路条，并口头表达了重返监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科长皱眉说："这咋行，你又没重新犯罪。"我说："我在里头习惯了，我愿免费为牢友们服务。"科长说："你想留监再就业？更不行，你的户口已迁回原籍了。"我绝望了，又跪下磕头说："×科长，劳改单位管了我三十几年，凭啥突然就撒手不管？你们是我的再生父母嘛。"科长说："杨继年，就我个人的感情，我很想收留你，监狱大锅饭，添一付碗筷不算啥，但国家法律摆在那儿，留你就是渎职、犯罪。所以，你回家吧，或者随便去哪儿，你是自由人了，谁也没权利再抓你。"我说我真的没地方去。科长说："我们协助你再做地方的工作，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谁乱来你就告他。"

监狱又给我开回乡证明，狱政科长还亲自给当地公安局、乡政府打了电话。我被"请"出门，第二次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乡。上户口，办临时身份证都顺利，但乡政府仍以"无钱安置"为由，拒绝

我落户，还说："再上门纠缠就打断你狗腿。"无奈，我只好再回监狱。这次，乡政府开的证明写着："你省级监狱释放杨继年回家，房子、生活生产用具的钱应该负责，你们不解决，我乡不收。国家的房子壹佰贰拾元钱一个平方米，我乡人民政府、民政没有一分钱，是空架子，所以杨继年应该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当然我回不到"哪儿"，监狱领导给接待处打了招呼，戒备森严，再也没人与我照面。我恋恋不舍地绕着高墙转，守候了一个星期，也没遇半个熟悉的干部。有个好心人听了我的冤情，建议我去成都找四川省劳改局，见我可怜，还为我买了一张汽车票。

十来天后，我的手上又捏了一张省劳改局致××市公安局的公函："你市凤天乡杨继年来我局反映……他于 1991 年释放回捕前户口所在地入户，但凤天乡政府以无钱为由，不予落户。根据（83）公安部文规定，由乡政府负责解决贷款，做好安置工作。现介绍去你局，麻烦做好乡政府的工作。"

老威：皮球踢了几个回合，该有着落了吧？

杨继年：乡长被惹毛了，冲我大骂："你敢到处告我们，给本政府抹黑！"我说："你们本来就黑，还用抹？"乡长说："那就尽管去告，看哪级单位肯为你出一分钱！"我说："这可是你逼出来的。"

老威：这一告又是十来年。

杨继年：对，从市、省到中央，几级公、检、法，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信访办、省政府，我见庙就递申诉状。看来，还得告十年状，这条道走到黑了。

老威：一个小小乡官这么横？

杨继年：公函去一份他撕一份，抵死不办。一直到 1998 年，书记才出面扮白脸，答应在敬老院给我找间屋，我说我才 50 多岁，能够自食其力。书记说："那我就给院里伙房打招呼，不煮你的饭。"

老威：欺人太甚了！

杨继年：我只好搬去与一窝孤寡老人同住，漏雨，没电灯，条件比劳改队差远了。我入住的当晚，邻铺张大爷就害哮喘死了，他

呼呼拉了一夜风箱，天快亮时突然嘎然停止。我感觉不好，就翻下床去摸摸鼻孔，已经断了气。

张大爷一送火葬场，我就受不了，但强忍着坚持住了半年。里头半身不遂者居多，经常在饭桌边大小便，而且没油荤，吃不饱。我逃了，什么敬老院，简直是垃圾成堆的活公墓！我流落异乡，成为省高院的上访老客户，这样一来，乡政府向上也有交代了："政府已妥善安置了杨继年，他住不惯，跑了。"

老威：您没生活来源，能撑多久呢？

杨继年：我乞讨，运气好的话，一天能讨几十元。有时饿坏了，也翻垃圾桶，里面的东西比敬老院的狗食还好。天当被，地当床，星星、月亮当蚊帐，这么些年，也混过来了。我还好端端地站着，没趴下。我与这个社会有太多的帐没算清，哪天感觉自己不行了，就提前去买 10 公斤炸药，10 支铜雷管，1 公斤铁沙子，用四副电瓶接起引燃，炸死那一伙不公正的人。

77　下岗工人营门口

采访缘起：2000 年 4 月 6 日下午，我骑自行车路过成都西门外的营门口立交桥，在嘈杂、混乱的人流中，不幸遭遇了一位自称“下岗工人”的撞车者。明知是骗局，也只能自认倒霉，割肉赔款 200 元人民币。

心里窝火，就拿出从前做访谈的那股忍辱负重的劲，笑里藏刀地与之周旋，渐渐，悲从中来。人不被逼到绝地，怎么会自残谋财呢？——这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

看上去 40 多岁的“营门口”最后说：“只有富人才有经常激动的资本，得高血压的资本，而穷人，抱歉，穷人只能想钱想疯球了。”

这是否可以作为马克思先生阶级斗争理论的最新注脚？

营门口：哎哟，痛死个天！你狗日的骑车不长眼睛嗦？

老威：我狗日的眼睛雪亮。

营门口：亮个鸡巴。哎哟，你撞了人，还闪那么远，快扶我起来上医院。

老威：撞你？我的自行车轮子还没转拢，你自己就倒了。

营门口：我疯了？自己倒下去把手杆整断？周围的群众评个理！你听，听，竖起你的狗耳朵好好听，人民的呼声：赔钱！医药费！当然，这位同志说了，光赔医药费不行，你的态度恶劣，还要给营养费、精神损失费。伤筋动骨一百天，这一百天的伙食费、误工费你先预付一半。前几天报纸上登了，有个作家开车撞断人家一条腿，赔了几十万，我的命贱，你就赔个几十万的百分之一吧。太霸道了！简直比旧社会的保长还霸道，撞了人，还赖帐，搞清楚，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你横冲直撞要受到法律制裁。他妈的，你以为自己是中央首长的跟班？是钦差大臣微服私访？戴副眼镜，就冒充知识分子嗦？眼镜一取，我看你就一脸横肉，资格的杀猪匠……

老威：你是扯场子卖打药呢，还是当街说评书？好嘛，我服了，坐上车来，我搭你上医院检查。

营门口：这附近有个诊所，几步路就到。

老威：是你家开的黑店吧？进去就一竹杠把我敲晕？

营门口：书读得多，心理就阴暗。我明明为你着想，上大医院花钱多，还要跑不少冤枉路，哪有小诊所方便、实惠？再说骨折上夹板又不是高科技。你是担心不能报销吧？这家诊所任何医院的发票都能开。

老威：你少废话，到正规医院检查了再说。

营门口：我还有几个同路的兄弟一块去。

老威：你们是一伙么？

营门口：大路不平众人铲，一伙又咋个？这些朋友陪着我，防你开小差。喂，你把这破车锁在这儿，打辆出租车。

老威：我不会溜。

营门口：说不准。哼，莫转歪脑筋，今天你不蚀财走不了路。

老威：既是这样，只好叫交警来解决。

营门口：交警管汽车，不管自行车。

老威：管这立交桥的交警是我弟弟，叫廖大毛，我去叫他过来。

营门口：先把医药费留下！

老威：先检查，我用自行车搭你去。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把《记者证》押给你。在医院照个片，新伤旧伤，一下子就真相大白了。

营门口：你是记者？

老威：算个耍笔杆子的，这是证件。

营门口：记者咋个了？又不是皇帝老子，撞了人一样赔钱。

老威：我兜里有两三百元钱，可以给你，跟我走吧，这儿人越堆越多，趁街没扎断前，我们先到桥下的茶馆坐一坐，摆摆龙门阵。

营门口：我的手痛，没有闲功夫，哎哟，今天惨啊。

老威：我看看你的手腕。

营门口：有啥看头？认栽了，你随便掏点票子脱手吧。

老威：没有问题，交个朋友嘛。两三年前，我也和你一样，在江湖上混，要杂技卖打药搞不来，但苦肉计还是会使的。不过你想想，骑自行车上班的一般都是工薪阶层，挣几个钱？去打他们的主意，撑死也榨不出多少油水。所以，要使苦肉计，就撞汽车，舍条胳膊舍条腿，净赚几十万……

营门口：你撞人不赔钱，还编个筐筐来套我？！

老威：我先付你两百元咋样？我在这个血盆里抓过饭吃，我晓得，人不逼急了，是不会赌这个。老哥，你这手，还得赶快治，否则长期这样"压缩性骨折"，最后就残废了……唉，同是天涯沦落人，就坐一会儿茶馆吧？

营门口：好。把证件还你。你不像记者，我也不晓得你是哪条道上的。你真撞过汽车？

老威：见笑了。

营门口：我看不像。说实话，我不是没想过撞汽车，我曾直楞楞地站在前面拐弯的路口，等车开过来。老等不到合适的时机，车速不是太快就是太慢。

过路的多数是中巴车，拢站的时候，把门的早早就一只腿吊下来，狂喊拉客。

我面无表情地拦过去，中巴却擦着我的身子刹住，把门的说："大爷您太急了，等车等到路中央来。"我惊出一头冷汗。二环路上，小车多，藏区来的卡车也多，卡车轮子不敢垫，我就放弃了中巴去琢磨小车。

老威：中巴拉客抢客特疯，出的车祸不少。

营门口：我眼睁睁地盯着我厂里的一个同事被中巴撞了，嘣地一声闷响，像轮胎爆了。我的同事被撞出几米远，一个鱼跃，人都飞起来了。当时是两辆中巴抢客，你追我赶，夏天尘土飞扬，人在大太阳下等车本来就烦，中巴起码五十码的速度，吱地刹过来，眨

眼间就出事。半个脑袋没了，前车杠喷满了血。交警赶来处理事故，我是证人，当然出场。结果你猜咋样？拖了一个星期，责任嘛，各打五十大板。按照有关规定，事主赔了四千多元，还包括丧葬费。

老威：人命太不值钱了吧。

营门口：按政府文件，只赔这么点，事主还骂骂咧咧的，埋怨自己找的熟人与交警关系不到位，所以又蚀财又惹了晦气。这情景太刺激，使我清醒了许多，人穷命贱，上吊也要找大树。

老威：开小车的就是大树？可万一你不小心牺牲了，还不是几千元一条人命。

营门口：我当然不想牺牲，只认准了赌一把，断腿断胳膊最理想，上上夹板，几个月就恢复了，除掉消耗，对方的赔款还能剩不少，起码上千吧。如果只是皮肉伤，赖不了人，几十上百就打发了。这年头，富人的心眼都黑，一出车祸，能逃则逃，不能逃，撞伤不如辗死，钱还出得少些。我抹不下老脸，怕做得太明显，被人看破。有一天深夜，我睡在路当中，没想到，一辆小车在我跟前停下，就差一尺远。下来几个人，二话不说，就把我一顿暴打，然后抬起来抛到路边。我的手腕断了，浑身都是伤。回到家，老婆还以为我是醉鬼，她又哭又骂："我辛辛苦苦上班挣钱，你却在外面鬼混！"我说："没喝酒，我被人打了，上医院吧。"

老威：你老婆干啥的？

营门口：她在布鞋厂扎了二十多年鞋底，现在也面临下岗。布鞋不好销，就改做运动鞋与皮鞋，还不好销，就开职工大会，把鞋折算成工资分配给大家。这一晌街头巷尾，都走动着我老婆这类皮鞋推销员。我住了三天院，就赶紧逃跑，再也医不起了。各种医疗费加起来 2000 多块，我老婆要卖差不多 100 双鞋！

老威：你就不能找点正经的事做？

营门口：我在厂里是车工，在机床上重复弄同一类部件，机芯啦轴杆啦，一干二十来年，搞得除了车床啥都不懂。后来厂子被私人老板收购了，一个五十年代建起来的老厂，老先进单位，几百万就卖了。私人老板接管我们之后，原来想马上来个全体下岗，他只

需要把老厂子的地皮再转手卖掉，就可以净赚千把万，但是遭到几百名职工的抵制，半数以上的工人干脆住进厂里守着，谁也不许动厂房和机器。

老威：你们原来的上级领导呢？

营门口：厂长、经理、书记，一个都不见。他们肯定与私人老板有猫腻，得了好处，所以趁上面政策放宽，就急匆匆把国有资产处理了，历朝历代，都是剐平头百姓肥当官的。我们被死去活来拖了两年，减员百分之七十，剩下的几个月不发工资。东郊邻近的几个信箱厂矿，连年亏损，职工处境也和我们差不多，但人家级别高，人多势众，惹急了，就上街请愿。为拖欠工资问题，几千人规模都闹过几次，引来了防暴警察，两个架一个地驱散。年轻人好对付，关几天就老实了。可老头老太太满眼泪水一喊："我们要吃饭！"连警察也心软了，提着根警棍楞在那儿。我们这种百人小厂，不敢闹，人穷，耗不下去，就只有散。我一个车工，流落到社会，能干啥，40 多岁就成废物了。文凭没有，本事没有，拿《下岗证》到人才市场登记，遭尽白眼。我十几岁进轴承厂，积极进步，入团入党当先进，把一切献给社会主义事业，转眼风向就变了，工人阶级既当不了家，也做不了主，反而成了被人踢来踢去的贱民。除非有特长，现在的用人单位一般要大专学历，35 岁以下。我完了，这辈子搭进去了，连看大门都没资格。如果在旧社会，我还可以赖在这里盼解放军进城，现在谁来解放我？

老威：你没有退休金？

营门口：一次性领了两万块，一分钱都不敢用。

老威：为啥？

营门口：这年头，万一有个病有个灾，谁管你？再说我女儿上学……

老威：你女儿多大了？

营门口：16 岁，上高中，一学期要交好几千。

老威：老哥，你真的不容易啊。

营门口：我女儿老实，是块读书的料，我不能委屈她。我就是砸锅卖铁，变泥鳅钻洞，也要送孩子考大学。

老威：现在供一个大学生，要花好几万。

营门口：又回到解放前了，所以我干这个，也是迫不得已。

老威：你干这个多久了？

营门口：三个月了。自从上次拦汽车被打断手腕，一直就吊着。

老威：你玩苦肉计挣了多少钱？

营门口：几千块。

老威：几千块？！你还要玩多久，才能挣够孩子的学费呢？

营门口：不晓得，我盼着有一天能撞上个大买主。

老威：不可能。

营门口：这是乱世，啥子不可能？我那次挡车不成折断手杆，从医院逃跑，刚拢家门，就刷地穿过来一个冒失鬼，自行车笼头扯住我的绷带。这下不得了，我痛得翻了个滚，把住车轮，大喊赔钱。街坊邻居围上来，自然偏向我。

你猜咋样，不到 20 分钟，那没用的小子就投降了，掏了 200 元医药费。这钱到手太容易，兴奋得我灵感大发，就立即甩开老婆娃儿，躲一个背静处拆了绷带和夹板。难熬啊，伤口一痛一冒汗，内衣内裤全湿，整个人像从水里捞起来一样。止痛片都吃麻木了，看来真正见效的止痛片是精神，是挤在人堆中盯买主，只要车上身，屁股一坠地，那股要死要活的泼劲就轰地上来，钱永远都比痛重要，哪怕你现在砍我一刀，我的第一反应仍然是“拿钱来”，而不是报警、上医院，或者回敬你一刀。骨折是钱害的，猪狗不如的生活也因为没钱，只要朝深处想，假戏就越演越真。感觉到位，手伤又装不出来，进医院粗略一检查，几百元的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就有了。精神损失费往往是虚张声势，没个谱，人家能出血当然好，不出血也不勉强。软磨硬逼的讨债还价进行到最后，我往往会很慷慨地表示：“精神损失费就免了吧，下次骑车小心点。”

老威：谁会吃你这一套？

营门口：只要拖时间，检查了，不马上照片，十有八九生意就做成了。两三天没有进账，我就心如猫抓，骨伤剧痛，吃一把止痛片也不管用。唉，告诉你，目前这手腕的痛经常在半夜三更一股一股朝上窜，前天我去骨科医院检查，专家说，骨折的部位已经变形了，要还原，就得动手术，把增生的东西挫掉。全部疗程要好几个月，费用起码上万，我治不起，只好破罐子破摔。顶多半年吧，这条膀子就报废了，丧失了劳动力，也祸害不了人。这辈子活够了，再挤在世上，就是不吃不喝，也要消耗空气。与其把老婆娃儿拖着一块儿受罪，不如跑远点，找个风景区安乐死。报废的日子不远了，我现在被一个无形的追魂讨债鬼押着，风雨无阻，日夜兼程，要把这生意进行到底。可惜这个城市，晓得玩这种把戏的越来越多，生意有难度，不保险了。前些天有个农村娃娃，为做生意，用砖头砸了手腕。可第一次上五块石扑自行车，就穿帮了。于是被过路群众打得满地爬，恐怕这辈子，那娃娃的内伤治不好了。

老威：你被打过么？

营门口：被扭送过派出所，关几小时完事。我是真伤，与砖头、棍棒制造的伤不同；我又是资格的本市下岗工人，与来这儿抢饭碗的棒棒军更不一样，警察能咋样？

老威：说得轻松！万一让你家里领人，老脸就丢大了。

营门口：老婆与我一条战线，把女儿瞒住就行。

老威：你老婆咋看你？

营门口：女人家，除了哭，还有啥主见？没办法呀。这种生意，单枪匹马已干不成了，必须有帮腔的，声势才造得大，但是事后许多人都得从你手里分钱，他妈的。

老威：你没尝试过干点别的？你这是团伙诈骗，够判刑的呀。

营门口：这年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我的帮腔之一就是个劳改犯，他说我这号的进去了，也干不动体力活，还不是养老，办保外就医。目前我啥都不怕，就怕亏了我女儿，她胆小，爱面子，我怕她将来对付不了这个人吃人的社会。本来下岗后，我去石板滩买了一辆偏三轮，准备卖体力挣钱。那天傍晚我高高兴兴的，拉着

老婆回家，不料斜着横过来一辆交警摩托，不由分说要收车。我拿出《下岗证》不行，我喊“我们是俩口子”也不行，还惹起一阵哄笑。老婆又哭又闹，赖在车上不下来，交警叫来几个民工，把车端起来朝外倒。他妈的，认了认了，不就一百多元钱么。

老威：这交警咋总跟偏三轮过不去？我不明白，警察每天都在搜缴，并且一缴就是几卡车，堆得冒尖尖，可这偏三轮就是弄不绝，并且还满城转。昨天晚上，二环路口全是人，把街扎断了，交通堵塞几个小时，110、119、交警大队全都齐了，可就是疏散不开。汽车拖着长龙，最后群众和警察展开了你进我退的拉锯战，连车缝里都涌着黑压压的脑袋。我和老婆刚好骑车路过，一打听，原来是一个拉偏三轮的被交警打了一顿。本来这跟家常便饭一般正常，可这个偏三轮太犟，打不服，还要缠着论理，因为他刚刚向某部门交过管理费。交警可能心情不好，被这贱民顶撞得恼羞成怒，于是就抓住那厮，二话不说就扔进一条被称作河的臭水沟——他没想到会出人命，自然一走了之。人被打捞上来，围观群众越聚越多，“惩办凶手”的呼声越来越响，可警察无影无踪。公愤无处发泄，交通就断了。“真是作孽啊，”有人这样说，“缴偏三轮的是他们，卖偏三轮的也是他们，创收创出命债了。”

营门口：我幸好改了行，否则这一幕让我女儿看见，她爸的老脸朝哪儿放？在路上，交警就是皇帝老子，咋能跟皇帝老子论理？找死么。

老威：你演苦肉计就不找死？

营门口：你这样挖苦我，就还得加钱。

老威：你想钱想疯逑了。

营门口：就疯了，咋样？你那辆破车不值钱，就留我做个纪念吧。

老威：你要就拿去，我可是一分钟也不想跟你呆了。

营门口：这么高傲，凭什么？还不是比我多几个钱。你没落到为吃饭发愁的地步，所以容易激动。穷人的悲惨事说不完，如果你见着就激动，当心得高血压。我隔壁有个老头，偏三轮是他的命根

子，车一缴，他就跳府南河死了。

打捞尸体时，电视台还拍了片子，人都泡胀了，门牙露了出来，女儿要去看看，我拦住，娃娃看了要做恶梦。我不会死得这么难看。到时我光棍一条，跑远些，越远越好，让老婆登报找我，就当失踪吧。今年大年初一，我到郊外昭觉寺去烧了香。人山人海的，几堆冲天大火，都想烧新千年的头一柱香。多数人烧香是为了求菩萨保佑发财、升官、升学、去病，总之，缺啥子求啥子。我呢，除了替老婆、娃娃给财神爷敬香，就是求佛保佑去得干净、利索。

庙里有尊新塑的立佛，我挤在人群中过去拜，没想到正看见一个守佛的老和尚在打人，被打的是细皮嫩肉的斯文人，他转到佛身后，抬手摸金光闪闪的屁股，却被发怒的和尚当胸一拳。斯文人要还手，和尚的另一拳又冲过来，斯文人搞不过，就说："出家人慈悲为怀！"和尚答："老子为民除害！"又说："世上只听说拜佛，哪有摸佛的？"

虽然和尚厉害，但是大伙都一边喊好，一边趁他不注意去偷偷摸佛。佛的大腿、屁股上，金粉摸掉了不少，我也狠摸了两把。上了年代的佛，随便摸，金粉都不掉，看来这年头，佛像也有伪劣产品。

世上除了钱，啥东西靠得住？你们读书人讲信仰，可真佛造价高而假佛成本低。只有富人才有经常激动的资本，得高血压的资本。而穷人，抱歉，穷人只能想钱想疯迷了。

78　蒋派遣特务于东山

采访缘起：2002 年 8 月下旬，我 80 高龄的老父因肺癌晚期住进了成都中医大学附属医院内科 11 楼，直到驾鹤西逝，前后一个半月，我尽孝榻旁，饱尝生离死别之痛。

75 岁的于东山就住父亲的病房隔壁，且与父亲的体形（偏胖）、某些习惯（收听美国之音）、言谈举止（慢条斯理）相似，在三天两头死人的这层癌症楼里，我与他几乎日日相见，成为短暂的忘年交。

因此有了 9 月 13 号和 17 号的访谈，再以后，老人家的病征也和我父一样，说话开始含混不清——如果说，这篇从文字上加工了不少的东西能算他的人生遗嘱，那其中细节方面的缺憾永远无法弥补了。

父亲逝于2002年10月7日凌晨，于老先生在7天后相随而去。当时我正忙于料理家丧之头七，所以不知他的遗容是否安祥——但我焚烧纸钱时也想着他，并祈祷这个被不同的时代所误伤的灵魂安息。

于东山：老威先生，我有话对你讲。

老威：直呼其名吧，老伯您千万别客气。

于东山：我没有客气的时间了！我犹豫了一个通宵，打了三针杜冷丁，痛啊，你没得癌，不晓得这种滋味！白天要好过些，所以叫你来，想讲讲自己的经历，否则……我看了你送的《底层访谈录》，很不错，只是不明白，别人怎么会把这么多属于隐私的东西告诉你？

老威：我在江湖上厮混得太久，太不把自己当回事，所以在很多时候，人家的种种经历也就是我自己的经历。比如说现在，我望着你的眼睛，内心有一种震颤，因为我父亲就在隔壁，我守了他一两个月，您们是同代人，目前又在相似的处境中……

于东山：上午我去拜访你父亲，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老威：一个星期前，他还对我说，要把这辈子的主要事情大致理一下，或者他讲，我记。当时没料到，这么快就来不及了！当他睁圆双眼，直楞楞地盯住我，我就把耳朵贴上去；他的喉管咕隆了半晌，那种声音，很深很含混，我辨识不了，他的手就下意识地拍床……

所以，老人家您千万别对我客气，生死大关，俗套的安慰话我说不出口，但是，在这层楼里，您只认得我这么个写字的人，天意乎？而我父亲此时这种状态，也是天意乎？

于东山：你会怀疑我的话吗？

老威：也许会，但我会尽量完整地记录您的意思。

于东山：我今年 75 岁，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监狱里。为了自由，我把自己弄成了肺癌……

老威：什么？

于东山：我的病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没想到啊。在大墙内，自由和女人都让人疯狂，为了得到这两样，逃跑，自残，要么就变态，就变老，成为废人，总之，你得选择。当然，大多数犯人不会选择，关几十年，重新做人吧，注定要被社会淘汰。我不行，就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老威：请您从头讲起。

于东山：1947 年，国共开始内战，地方上征兵征税，按战时三丁抽一的政策，我们家刚好有三弟兄，大哥二哥都娶了亲，有了儿女牵挂，不便上前线打仗；只有老三我，刚满 20 岁，就被拉到乡里凑了壮丁的数。那一年秋天，光我们于家坪一个乡，就招募了 21 个壮丁，由保长、乡长和三青团乡党部的人领着，走了几十里山路，到彭山县城集中。父亲、大哥、二哥都陪着送行，一长串壮丁家属队伍，上百人，一直送到募兵处，已是傍晚了。各乡送来的壮丁好几百，热闹非凡。第二天，领了二尺半军服和两个银元，我就趁着告别，把银元揣进父亲口袋，因为从此吃公家粮，花不着钱。

这就是我和亲人的最后一见，周围爹啊娘啊的震天响，父亲和哥哥们也扯着我的手，眼里含泪，舍不得的样子。而我呢，血气方刚，胸前戴朵大红花，一心要报效国家，奔个好前程。一声哨子响，新兵们就列队上敞蓬汽车，沿着颠簸的公路离乡去了成都，现在一小时的路程，那时要折腾一整天。进了成都，有路灯了，大伙还挺好奇地东张西望——这是我头次看见电灯，彭山县城没电灯，路灯都是灌煤油的风灯，天黑尽了才撑个长竿子往上挂，一条几十米长的街，只挂十来盏玻璃风灯。

我们在成都北较场（现在的成都军区后门）的中央军新兵训练队进行训练，出操、打枪、拼刺刀、投弹，每天早晚还要升降青天白日旗，背诵《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唱"三民主义我党所崇"，那阵式，也跟新社会升降五星红旗，唱《国歌》差不多。三个月后上前线，坐火车出汉中，编入新 2 军第 4 师 381 团 2 营 3 连，这是宋希濂的部队。后来又过了黄河，与解放军打运动仗，每天都跑路。记得第一次与解放军打阵地战是在陕北榆林，我闭着眼睛放枪，待我睁眼时，左右两边的同乡都一脸鲜血歪倒了。

共产党呆的地方又穷又荒凉，解放军士气高，会打仗，虽然武器落后，但枪法准，在战壕里不小心脑袋冒高了，就要吃子弹；而国军派系多，壮丁抓了一批又一批，草草训练，就上前线充数，所以经不起打。新兵怕死，一门心思开小差，我也不例外，结果于 1948 年底在徐州外围的永城地区的一次遭遇战中躺下装死，被解放军三野 12 兵团 28 军 84 师俘虏。

解放军很宽大，开罢忆苦思甜，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会后，师首长讲话宣布政策：愿意留下当兵的欢迎，不愿意的，就遣散，发放路费回家。我前思后想，就投诚当了解放军，因为当时四川还是国统区，回去没好日子过，再说种田也没意思。

1949 年 5 月的渡江战役后，国军兵败如山倒，解放军三野奉命进军东南，负责解放福建的是第 12 兵团，司令员为著名战将叶飞。大概 9 月份，除了沿海的一些岛屿，福建境内的国军主力都垮

了，省主席汤恩伯逃到了台湾，接着厦门失守。

我所在的 28 军 84 师接到兵团下达的攻打金门的命令："肃清沿海残敌，建立尔后解放台湾的基地，决定乘厦门胜利余威以及金门守敌防御部署混乱之时，以 28 军第 84 加强师为主，29 军 85 师配合，即日发起对金门的攻击。"

当时全军上下很乐观，因为厦门岛大兵重，厦门都拿下了，一百多平方公里的金门肯定弹指可下。我还以为打完这仗，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和许多以前连海都没见过的"解放战士"一样，向党表决心，一定不怕牺牲，争取立功赎罪。1949 年 10 月 24 日晚上，解放军的 244、251、253 三个团，8700 多人，加上船工 350 多人，乘紧急征用的各式渔船，从大山登岛、厦门、澳头东北海湾出发，渡海攻金门。午夜三点多钟登上北岸海滩，因地雷爆炸，国共两军开始激烈交火。此后，战斗进行了二天三夜，在国军兵力 5 倍于我的劣势下，解放军困兽犹斗，终致全军覆灭，三个整团加第二梯队增援的 246 团，1 万多人，无一生还。

27 日上午 10 点左右，金门战役基本结束，解放军阵亡 5000 多人，被俘 5000 多人，剩余的残兵败将，由古宁头突围，转移至岛东南山区。我们 3 营 2 连 1 班，就剩我和副班长刘永禄，汇合 251 团其他残余，共 47 人，在团政委田志春的带领下，东躲西藏了半个月。无奈金门岛太窄小，几万国军从滩头到山区，从民房到山洞，象篦虱子一般，一寸一寸，反反复复地梳。

我们弹尽粮绝，军装碎成些布片，披挂在身上，犹如野人，连下身都暴露着。

几乎每个人都有伤，我只伤了胳膊，饿得不行了，就趁下半夜，从岩洞里跑出来，到几百米外的农田掏番薯吃。等不及抹泥，就边回跑边朝嘴里塞，探照灯隔五分钟来回扫一次，动作慢了，子弹就风一样刮过来，把人打成蜂窝。

为了偷番薯，牺牲了 6 名战友，岛上的居民都是渔民和华侨，除了"共产共妻"，对解放军没啥了解，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就去告密，还主动带兵来搜人。语言也不通，到后来，番薯地拉了铁丝

网，不敢去了。重伤员全部活活拖死，而我们也半死不活。水源卡断了，国军就在山洞上头筑工事，扎营，明明晓得我们在脚下，故意不打扰，看你扛到啥时候。我们都渴恍惚了，喝自己的尿，后来尿比海水还咸还涩，奇臭无比强咽下去，喉管更干更疼更辣，犹如吞火。终于，团政委召集了临时党小组会，然后对大伙宣布出洞缴械求生。

大伙互相抱着干嚎，人都消耗得跟鬼一样，还不理解团政委的命令，认为有损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2 连刘排长是陕甘宁老区来的兵，打惯了胜仗，很倔，他跳起来用枪托砸政委，还连骂："叛徒！"政委一脚踹翻他，含着热泪，也不解释，就头一个摇着栓白布条的树枝钻出岩洞。我们跟在后面，一长串，20 多人，洞里还留着十几具战友的尸体，已有臭味了。投降以后，国军允许我们先埋葬战友，我们在里圈，他们围了好几层，下葬时，国军还一齐朝天鸣枪三次，表示敬意。

我曾目睹 251 团刘天祥团长阵亡的情景，当时他正与 28 军前敌指挥部通话。掩体已塌了，话务员倒在一边，刘团长一手搂电台，一手握话机趴在瓦砾里叫："报告首长，我们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有二话说！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话没落音，敌阵地就射来一堆炮弹，前后左右地开花，刘团长一下子飞起来，他原来趴的地方炸出磨盘大的一个深坑。一瞬间，警卫班全报销了，没有全尸，我钻进尸体下面，才躲过一劫。

金门的几千战俘押回台湾，又从基隆港转乘闷罐火车，运至台东，入战俘营。稍后又转到对岸著名的火烧岛，开荒，筑监狱，兼学文化和政治，进行反共洗脑。几年里，那儿陆续进来许多共军战俘，有朝鲜战场的，有沿海各岛的，1952 年，国军突袭南日岛，一次就抓回上千名共军俘虏。

老威：国共两军没有交换过俘虏吗？

于东山：据说朝鲜战场交换过，可我们当时完全与外界隔绝，除了《中央日报》和蒋总统训示，啥也不晓得。大约关了 6 个月，训导处主任找我谈话，他们根据我提供的个人情况和部队番号，确

认了我的原国军下士身份，准备开释。×主任试探性地问：愿意回大陆与亲人团聚么？我干脆回答：不愿意，因为共产党饶不了我。后来知道，不仅我，连众多正宗的共军俘虏也害怕回去——在红色中国，俘虏是叛徒的同义词。

老威：你又改换门庭了？

于东山：那时我才 20 多岁。再次“新生”后，又编入 17 师 49 团六零炮连服役，一年后，送入凤山陆军步兵学校，在第三总队第二大队，接受预备军官训练，每月剃一次光头。由于在射击、肉搏训练中的出色表现，改制后的调查局到学校物色人选时，看中了我。在局属台北站工作了 5 年，转调国防部特别军事情报室，军衔为上尉——这一时期，我算春风得意了，讨了老婆，她姓佘，祖籍河南新乡，49 年随父母迁台，在新竹做水果生意。我们经人介绍，按传统习俗，三媒六证。我们育有一儿一女。

50 年代，光复大陆是国策，蒋总统经常发布训示，勉励全军将士“勿忘国耻”。朝鲜战争之后，多次进行军事演习，特别是海陆空配合的模拟登陆战。大陆历次政治运动，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台湾报纸都尽情渲染；三年大饥荒时期，更是天天有逃荒要饭，饿俘遍野的记实报道和巨幅图片，惨不忍睹。

勘乱之际，宣传声势一边倒，连我老婆以及街坊邻里都相信“共产主义气数已尽，中共政权人吃人”。我至今还记得 1960 年×月×日一份报纸的头版标题：“与其饿死，不如造反——大陆民众的心声。”

1963 年元旦，蒋总统在台北中山堂主持国军军政战士的团拜典礼，1 月 5 日，又接受了美国《芝加哥太阳时报》主编迈克尔的采访，他说：“反攻战争是革命战争，就数字上说，共匪军队的人数诚然较多，然而我军有旺盛的士气，有充足的武器用于出击登陆。”

蒋总统还说：“大陆民众渴盼着革命军队回来摧毁灭绝人性的共产制度。”

老威：在上一辈人的回忆中，63 年的台海局势相当紧张（此前还有较大规模的中印边界战争），为配合国际大气候，国内风向

再次左转，大搞阶级斗争和忆苦思甜。我访问过一位盗窃犯，叫杨继年，11 岁被判刑，坐了 34 年牢。1963 年，他因《反标罪》被加刑，起诉书里的罪证是："坚持反动立场，于 63 年 6 月蒋匪窜犯大陆时，三次书写反动词句……'今年第四次大战，一定蒋介石坚决打回来……'。"

资料证明，城乡都加强了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监管。著名右派流沙河先生认为，当中共内部的狗咬狗因相持不下而趋于白热化时，老毛的惯用伎俩就是"大敌当前，一致对外。"

于东山：啥意思？

老威：59-62 年，国内饿死几千万人，不是天灾是人祸，更确切的说，是老毛想当然的"共产试验"，已成为有目共睹的铁案——在党内外形势的逼迫下，老毛言不由衷地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引咎放权，由较务实的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纠正政治和经济中的"失误"，宣告共产风破产。62 年底，因政策调整，粮食丰收，饥荒得以遏制，刘少奇的威信借此提高，最终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与老毛平起平坐，连标准像也在百姓家中并肩而挂了——这是老毛不能容忍的。为了防止刘少奇等人借"几千万饿俘该谁负责"逼官，维护其绝对的权力垄断，就"金蝉脱壳"，借台海局势突围。应该说，蒋总统帮了毛主席的大忙，使他赢得喘息之机，并把祸国殃民的极左路线进行到底，直至发动文革，把刘少奇等对头一个个置于死地。

于东山：掰指头一算，整个 63 年"反攻大陆"的先遣人员有十来路，每路六、七或十几个人，全部加起来不足百把人，一个连的兵力都不到，"光复"个屁，开国际玩笑嘛。

老威：这百把名特务是老毛的救命稻草，是"蒋匪全面进犯"的铁证，你说国共两党合作得默契么？

于东山：1963 年 6 月×日，我被编入"反共救国军第××支队"，抵达大金门，然后由军舰送至福建漳蒲境内，转驾汽艇，一行十几个人，在支队长××的率领下，从将军澳（地名）登陆。我们携着电台和武器，准备按上峰指令深入到福建武夷山区建立"游

击根据地”。可没想到，上岸不过 40 多分钟，就被民兵发现包围了。随着三颗信号弹射上夜空，周围的海滩和礁石突然长满了人，一齐吼：“缴枪不杀！”我们惊呆了，忙背靠背地端起枪，做出抵抗的架式。子弹嗖嗖地飞过来，有两个弟兄倒下了。可我们面对这密密匝匝的人，不晓得该咋还击。终于，支队长带头扔枪，高举双手走到明处。数不清的手电乱晃，马灯更象八卦阵，从远处渐渐游拢来。支队长高喊：“我们向共产党解放军投诚！”一幅吓坏了的嘴脸，其他弟兄也跟着叫：“投诚！投诚！”我这是第三次当俘虏，要镇定些，双手投降时心里还在想：该咋交待？要不要把三次被俘的经历全坦白？

老威：您真够倒霉的。

于东山：这叫身不由己。回来才知道，国民党的宣传也同共产党一样，只强调“形势大好”，结果正好相反，老百姓并没有在水深火热之中夹道迎解放，反而杀声震天。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太可怕，无怨无仇的，渔村里一听说抓特务，男女老少全出动，有枪拿枪，没枪就提鱼叉和棍子。我们十几个弟兄，一半是当地人，有两个还是 49 年抓过海的壮丁，很快被辨认出来。于是渔民们冲我们拳打脚踢，还扔石块，婆娘也上阵，撕衣服抓脸。弟兄们边躲边用闽南语叫：“我们是苦出身啦！是蒋匪帮抓去的啦！”大伙回骂：“渔霸、土匪、地主、爪牙！没一个好东西！”弟兄们又辩解：“不是事实啦，我是张叫化的儿子，在村里吃了五年的百家饭啦。”大伙气愤说：“还嘴硬充好人？揍这个美蒋特务！”

幸好有边防军出面阻止，我们才没变成肉酱。临出发前，台湾特别军情室还认为当地人熟悉闽南话和地形、民情，容易长期潜伏于民众之中；可落网后，大陆的报纸却说：“当年的渔霸和匪徒，被他们的主子送回来投案了。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老威：后来呢？

于东山：我们都被当作“美蒋派遣特务”判了刑。由于我的情况特别，就与其他同案犯分开关押，单独审讯了 6 个月，重判 15 年，被转到内地，在四川省达县专区的××监狱服刑。有关部门曾

找我谈话，令我不准泄露解放军战俘的那段经历，否则将受到严厉惩处，所以在狱中我只能装聋作哑地苦熬。1978 年 6 月，我本该刑满释放，狱方却接到上级指示，将我强留下来，在狱内当工人，这相当于判了无期徒刑，并永不减刑。我与劳改犯唯一的区别就是每月领取 26 元人民币的工资。

老威：工人与犯人还是有区别吧？

于东山：监狱分内外圈，有三道岗哨，还不算巡逻哨，其它留场工人有《出入证》，通行无阻，并可以利用这点特权替犯人买书、买熟食品，偶尔还捎封信，赚不少外快；而我的名分虽为工人，但仍住在监区内，没任何自由。我气疯了，就吞钉子自杀，狱方还算人道，马上弄我去监狱医院抢救，开刀取出钉子。政委亲自到病房来探望，他说：于东山，你在劳改期间，踏实肯干，不多言多语，监狱上下对你的表现是满意的，就我个人来讲，巴不得尽早放你回社会，自食其力，但是上级有安排，我们只能服从。我说：我没有在任何场面谈论自己的过去，今后也不会，请政府放心。他说：我很放心。我说：过去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我太冤了。政委瞪了我一眼，想批评我，又不忍心，就说：想开些，退后一步自然宽，说不定留监比回社会还好些，在这儿，只要好好工作，积极靠拢党和政府，就没人敢歧视你，结婚生子，养老送终，我们都会管到底；而在社会上，劳改身份就低人一等，难哪。

老威：这官僚挺会做思想工作。

于东山：这是人家的基本功，天天都练着。所以，话到这份上，我只有死心了。政委给一大队打招呼，我就从集体监房里搬出来，单独住楼梯下面的小屋，有五个平方米，进门得低头弓腰。大队卫生员刑满，我就接任，这就算政委恩赐的特权了——在狱内，这非同小可，我有单独的卧室，周围有两个破药柜，我平时不用上班，只在犯人去车间改造时，才检查监舍的卫生，被子叠得要棱角分明，我随身带卷尺，拉一拉，看是否符合规定标准。床底有杂物要扣分，门框有灰也要扣分——天天如此，这活儿我一干又是 20 年。除此之外，就是给头疼脑热的犯人发药，领他们去监狱医院看病。日子

久了，分队长的权利下放，我甚至能批一天以内的病假。

老威：您已经适应了做个模范囚徒？

于东山：都认为是这样，一般犯人惹不起我，因为我通了天，能直接找政委汇报工作情况。我整天绷着脸，象只老耗子，已习惯了在阴暗、潮湿的楼梯底活动，我的腰一天比一天塌。但我死心了么？在监狱里呆一辈子，一个人能这样死心么？

我有妻子，有儿女，有生之年，难道就象梦一样，永无相见之日？不，我等待着，盼望着邓小平的政策能放得更开，两岸尽早三通。我养成贴剪报的习惯，近 20 年，我按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民俗分类，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四川日报》上，每天剪贴些文字，一年做一本，20 年 20 本，这可是一笔财富。如果有一天牢门为我而开，凭它我就能糊口。

老威：是么？

于东山：我 99 年初出狱，直到得病前，都同时向全国 30 多家文摘杂志投稿，每个月要寄几十份。由于资料丰富，命中率极高，除开日常开支，我三年存了 7 万元钱的稿费。

老威：您太有远见了。

于东山：20 年，加上原判 15 年，我迎送了多少批犯人，可自己却没有动静。我见识过几代反革命分子，哥老会，会道门，文革造反派，破坏计划生育的农民，还有 89 年六四进来的学生和教师。我不和他们往来，在背后，犯人都把我叫“特务”。我甚至有了一个收音机，夜深人静时可以收短波，偶尔，能听到美国之音。犯人成分很复杂，收听敌台的事很快就传到政府耳朵里，指导员找我谈话，我回答：“我有这个自由，因为我不是劳改犯。”指导员惊讶得眼睛瞪大了，追问说：“你咋不是劳改犯？”

真叫人哭笑不得，新来的指导员竟忘了我的身份！还开玩笑说：“于老头，你不愧为特务嘛。”后来真正的特务叫我撞上了，一个案子五个被告，首犯关在我隔壁，叫周××，潜伏在重庆 20 多年，三年前通过收音机短波与台湾取得联系，领受任务和经费，发展了四个特务成员，代号叫“沙漠变绿洲计划”。据说他们在八九学潮

当中，曾四处散发过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传单，被游行反腐败的学生拾起来，马上报告了公安局。

老威：政府方面一直没开释您的意思？

于东山：我被遗忘在牢里，监狱的领导已换了几届，每一届都没接到有关我的指示。绝望之中，我只能孤注一掷。98 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躺在被窝里，像往常一样瞪着楼梯底想心事，渐渐，在迷迷糊糊中听见老鼠的吱吱惨叫。我爬起身，从药柜下面拉出鼠夹，那小东西的肚皮已被压开膛了，可还龇牙咧嘴地乱动。

我把它放在小桌上，慢慢欣赏，心里突然觉得开了锅：坐了一辈子牢，逆来顺受的，连响屁都不敢放一个，人还不如老鼠！它都知道折腾，宁死也不守规矩，我 70 岁的老头，风烛残年，有啥怕的？太窝囊了！太窝囊了！我不停地咒骂自己，比老鼠惨一百倍。

老鼠挣扎了几分钟就死了。我没有摘下它吃肉，而是拽下一条后腿，鬼使神差地找出一把小刀，仔细地剥皮。光光的耗子腿，半透明的肉，我咽了几口唾沫，就将它丢在酒精里浸泡。接着，我把刀子消了毒，点燃酒精灯，让刀锋在上面烧。准备工作就绪，我最后一次用药棉涂抹右胸，就自己给自己开刀。

没有麻药，第一刀横着戳下去，浑身疼得触电一般哆嗦。我急忙止血，稳住神，把刀尖深入上下搅，扩大刀口。最后为了结束剧痛，一不做二不休，我猛拉了几下，感觉到胸皮和肌肉分离了。我扔下刀，在冷汗淋漓中夹出耗子腿，切下脚爪，把豆瓣大的一块精肉朝伤口里塞，我用棉签充填了约五分钟，眼前一片浓雾，看不清，也忘了自己在干啥。缝合伤口就没咋痛了，已经麻木了，耳朵里一片呱呱的青蛙叫，我缝了五针，然后包扎止血。

我吃了十来天消炎药，自己拆了线，又涂了一段时间的疤痕灵，窄窄的伤痕就变得很淡。但耗子腿在肉里隐隐作痛，折腾得我整天整夜睡不着。白天提不起精神，脸色蜡黄，这正好装病。我在警察跟前缩着脖子，拼命地咳嗽，喉咙不痒也咳，到后来，气管拉破了，口水里带血丝，严重时，就是血砣，这是肺癌的显著征兆——如此硬撑了三个月，终于，我感冒了，低烧长久不退——这是肺癌的征

兆之二。我天天观察右胸的伤口，直到确认凭肉眼看不出什么，才老谋深算地报告政府，要求到监狱医院体检。这一去，命运改变了。

老威：我听过许多犯人自残的事，例如挑手筋、吞烧碱，还有长期每天吞服少量砒霜，直到脱发烂肉，显出麻疯病的特征。但最终，还是被识破，因为狱警见多识广。您居然能瞒过去，算是奇闻吧。

于东山：我不吭不哼地忍了 30 多年，把监狱当家，警察早麻痹了。狱内的ＣＴ机太旧，清晰度差，院长和狱政科长就亲自带我到重庆一家大的医院复查。等了 20 多分钟，医生从机房露头，盯我一眼，然后把院长叫进去——我心理有数，片肯定出来了，右胸肺显示出肿瘤阴影——只是医生做梦都没想到，那叠在肺上的阴影是鼠腿！

很快，我被当作癌症晚期病人释放了，监狱发给我 2000 元钱，并与有关方面联系，将我安置回彭山老家。父母和两位哥哥已去世，侄儿侄女根本不认识我，于家坪呆不住，我就乘车到成都，先租房安顿下来。

我按 30 多年前的地址，先给台湾的家人写信，虽然那边变化大，很渺茫，也得试一试。接着我就开始搜集全国的文摘报刊和开有文摘专栏的杂志，真是多如牛毛，较有名的也有 30 多家。分门别类的投稿生涯从此进行到我生病住院前。

老威：您的耗子肿瘤取出来了？

于东山：出狱没几天，我就趁夜到一家小医院开刀取瘤，一路鬼鬼祟祟，生怕有人跟踪。鼠肉在里面已成溃疡，打了麻药，一刀下去，一股很臭的黄脓就喷了出来。

医生小心翼翼用镊子捡出鼠肉渣，还又刮又清又消毒，忙活了两个钟头，胸上被刨出一个核桃大的洞。人老了，免疫能力下降，伤口愈合了两三个月，我心里却去了一块大石头，以为苦了一辈子，老天爷有眼，让我得个善终。家人没回信，可能是地址已变了，或者老婆已改嫁？于是我又按查找来的地址，给《中国时报》等几家台湾报纸寄过《寻亲启事》，后果咋样不晓得，就当“老夫聊发少

年狂”。

老威：我真替您高兴啊！

于东山：当头一盆冷水，不，一盆血！一个月前，我查出了肺癌，就在右胸，在我塞耗子腿的原地，CT 照出有肿瘤阴影，胡豆大。可过了十几天，再照，胡豆就长成了胡桃！这次取不出来了，扩散得太快，连淋巴结支气管都出现了葡萄串。

昨天刚抽了腹水，医生晓得我开过刀，却不晓得为啥开刀，留下这么宽的感染区域。没料到鼠肉这么毒，会一滴滴地渗透进内脏，变成瘤子。

老威：如果晓得鼠肉最终会引出这种后果，您还会干么？

于东山：我不后悔，烂在监狱，活一百岁也冤，毕竟我自由了三年多。最近，我到底盼来了台湾家人的回信，是我儿子。我老伴已去世多年，儿女有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我能撑到见面那一刻算运气，不见面也没啥，免得给后代心里留下阴暗。

79　被抢劫者余桂生

采访缘起：余桂生女士 59 岁，曾与我母亲同在一所小学教书，后来又搬到白果林小区，做了我们的邻居。两家经常往来。最近，余老师得知我会用周易打卦，就迷上了，三天两头找我。不料古代的神灵也免不了灾，她于 1996 年 3 月 17 日深夜，被入室盗贼抢劫，惊险之极！

3 月 18 日上午，余老师急匆匆地赶来打卦，于是有了下面这篇访谈。

我劝老人家养一条小狗，虽咬不了贼，但可以吠叫报敬警；她苦笑摇头说："为防狂犬病，要花好几百元申报狗户口，并且一年还要交 300 元免疫费。"

我说："50 年代过来的人，政策水平就是高。"

余桂生：威先生，我又求你打卦来了。

老威：我记得上周才替您老人家卜过卦。《易经・蒙之四》里说："初筮，告。再三渎，渎之不告。"这意思是，您第一次占筮，神明已告诉了您，如果您再三打卦亵渎神明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人与神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需要互相信任。

余桂生：我唯有战栗而已！上周星期二，我在您家打卦，得"震之六五"，曰："震往来厉，意无丧有事。"意思是惊番轰鸣，危险在前，但只要小心谨慎，还不至于酿成惨祸。"当时我想，这可能是一种抽象的引喻，它象征我磕磕碰碰的一生，因为每次政治运动都是"惊雷轰鸣、危险在前"，但还是让我侥幸躲过——祸从口出，我们这种教书匠，不说当然不会有祸。没料到，这《易经》里的神不玩"抽象"，不玩"人生哲理"，当晚我回到家，就下雨了，跟着雷电交加，全城仿佛在一片汪洋之中。

老威：您没关窗？雷电打到屋里来了？

余桂生：贼进屋里来了。后来听说，这贼本来准备偷楼下有钱的王家，但在撬防护栏的时候，王家的狗突然叫了，于是小王起床，拉亮客厅的灯，那贼没得手，就顺着绳又攀了一层楼，撬断两根防护栏，就钻我家了。

老威：什么时候？

余桂生：大约夜里四点多钟，雷雨停了，月光照了进来，也有可能是路灯。平常我是要扣卧室门的，那晚邪了，我意忘了扣。迷迷糊糊觉得有个影子推门而入，我以为是老头子，就问几点了，你进来干啥？脚心有点凉了，还感到那凉气一点点浸上腰部，于是我又说，老头你既然进来了，就把毛巾毯拉来替我盖上。那影子应声过来，弓下腰，把一种亮晃晃的更凉的东西抵住我的颈子，我一摸，这可不是毛巾毯，瞌睡一下给吓没了。

老威：您什么也别管，看他怎么办？

余桂生：刀架脖子的事可开不得玩笑！贼还冲我笑了一下（至少我感觉他笑了），挺客气地说："老太太，请把银货交出来。"我本能地抵赖道："我没银货"，就觉得脖子一麻，嘴随既被一只大手捂住了。慌急之中，我伸手到枕头下，把三千多元钱全上缴了，那贼才松了我的嘴。我气喘吁吁地坐起来，贼又说："把黄货交出来！"我吓得浑身抽筋，说："我一个孤老太婆，那有黄货。我已下岗好多年了。"贼立即戳穿我的谎言："你们老两口有一儿一女，都在外地工作，客厅墙上的全家福照片我欣赏过了，你更不象下岗女工，下岗女工家里没对联："书山无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不错，您是活到老学到老。

老威：这贼不像打工仔，至少中学文化程度。

余桂生：我也吃了一惊，刚想接茬教育他，那刀子却抵住我的胸，我被命令下床，领他到衣橱翻"黄货"，先递给他一只石英表，那是我女儿从国外带给我的，他却看都不看，就扔到床上，我又递给他一支大号派克钢笔，那是我用了几十年的宝贝，笔尖纯金，他却被激怒了，骂我疯老婆子。一把搡开我，自己动手，弄了个翻天覆地，几次我想退开逃命，他看都不看，就伸手把我拖回来，嘴里

咬着刀，背上长着眼睛。我的耳环、项链、戒指全搜走了。这样的抄家文化大革命也发生过，红卫兵冲进来，许多就是我自己教过的学生，他们翻箱倒柜，“金货”、“银货”全没收，并装模作样地声明：这全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没料到时过 20 年，这噩梦又重温了，我脑袋嗡地大了。待清醒过来，那贼却已扣上门，放下窗帘，打开床头灯，让我躺着，他背对着我，并伸出只血淋淋的胳膊说：“老太太，你刚才叫了，没用，我的刀比你的叫声还快，我本来该宰了您省事。但我忍了，划了自己一刀。你这样躺着就好了，贼有贼的职业道德，除非万不得已，我是图财不害命。”

老威：这狗贼欺人太甚！

余桂生：我也这么恨得牙痒痒，但我一个老人，只能躺着，老头子就在隔壁，他已 80 岁，一吓命都没了。于是我只好强打精神与他谈判：“你快滚蛋吧！算我倒霉。”其实，我身下的床单全被汗水湿透了。不料贼却反叹气道：“您是老师，骂人不光彩。”

老威：现在我知道“强盗逻辑”是怎么回事了。

余桂生：贼还摊开手掌，让我给他看掌纹算命，他说知识分子都会算命，差点把人逼疯了。他见我一再重申“滚蛋”，就自言自语道：“我原来的厂倒闭了，我做了十几年钳工，就发给我一万五千元的安置费，这一辈子，就值一万五千元！您是老师，您从小是怎样教育学生的？要有集体主义思想，要有组织观念，对不对？现在，我有困难了，组织在哪儿？再就业？摆摊卖东西？都去卖东西，谁来买？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做买卖。我这双钳工的手，指头这么粗，大概只适合做抢劫。”我反驳说：“生存路子宽得很，你这么棒的身子骨，什么不能干？”贼却狞笑说：“我是天生的入室抢劫犯，这一行已做了大半年，又来钱又刺激。”我说：“您就不替你父母妻儿想想？”贼说：“又来这一套，您的话说得象国产电影台词。告诉您，我正是为了他们才深更半夜努力工作，我用我的命钱让他们活得象个人样，这世道，已经全翻个了。从前是斗天斗地斗老财，贫下中农当家作主吃大锅饭，现在是你越穷，周围越笑话你，穷人全是龟孙子，懂不懂？”我愤怒地说：“我宁愿被人笑话，也不做你

这种人渣！有本事你去抢贪官污吏，你再不走，我这条老命就豁出去了！”那贼凄然一笑说：“能够与老师谈心，也是缘分，这样吧，我留一颗戒指在这儿，你让我讲个故事。三个月前，我抢了一个供销社，那也是个雷雨交加的晚上，我采好点，用焊枪切开卷帘门锁就进去了。里面有两个执班的，年轻的好对付，一拳打懵，用胶布封住嘴，再用自制的土铐把双手锁在床头就行，偏偏年老的是供销社经理，共产党员，挺不好对付。我也象对待您老人家这样，刀尖抵着他的胸，让他打开保险箱。老家伙装着埋头开锁，却一倒肘砸来，让我接着了。我再次把刀尖抵着他，发出警告，我真的不想伤害他，没想到这老人受过革命传统教育，把集体财产看得比生命重要，竟喊抓贼，我一急，就把刀尖朝里轻轻送了半寸，我真的不想杀人。可老头见血就疯掉了，不仅大喊大叫，而且双手乱挥，要夺刀，我只好叹息一声，遗憾地把刀全送进那肉里。您看，我干活用的都是这种手术刀，又薄又锋利，入口也极小，从左胸胁骨间一送，吹灰之力就点着心脏了。只有野蛮人才用匕首、菜刀等虚张声势的东西——总而言之，那共产党员老头一下子就没声了，眼睛鼓得像牛蛙。我急忙抬起左膝，将他抵在墙上，然后顺势撩起他的外衣，裹住刀锋，徐徐往外抽，我用他的衣裳塞住口子，慢慢将他平放下来，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为烈士，而我，只好像报上说的‘仓惶逃窜’，一分钱没捞着。”这贼讲完这故事，临出门前又赞美“好刀”，一颗血也不沾。

老威：您就一声不吭让他逃了？他下楼还有个过程，您扣上卧室门就可以报警呼救的。

余桂生：贼知道我老伴在隔壁房，我一吱声，他狗急跳墙就朝他下手。算了吧，这哪是一般毛贼，简直杀人不眨眼。我躺在床上苦捱到天亮，去派出所报警，然后，就到你这儿来了。

老威：既然灾祸是注定要降临的，那又何必打卦呢？我承认《易经》能够给人某种暗示，我们从这种暗示中，领悟避凶就吉的方法。我们清楚地明白，世间万物都是吉凶各一半，但是一个人在被无形的凶象所笼罩之际，他往往是茫然无知的，哪怕神明在上，他也不

会抬起头来仰望。

余桂生：您是不想给我打卦，还是含沙射影地讽刺我这老太婆？照你这么说，《易经》根本就不该存在，从古至今，人们也不用以此预测命运。

老威：您老人家误会了。《周易》是周文王被关在地牢里生死未卜之机，以伏羲八卦为基础推演而成的。当时地牢只有一个小天窗，文王就是通过这个小天窗日夜不停地观察天象，领悟天地日月的循环往复，而人虽然微不足道，也在其中经历了大宇宙的循环往复，世界的循环与人的循环在冥冥中的接触点构成我们的吉凶祸福，这样，命运既不可逆转，又可以探测。

余桂生：你这是宏学，贼可不认这个，贼只认钱。

老威：老师您也这样说？记得小时候，我是个调皮孩子，有一次，偷了家里十元钱，那时的十元钱相当于一家三口半个月的生活费，我爸爸让我跪搓衣板，还是您及时赶到解救了我，您托着我的光头说："教育为主吧，教育可以感化一切，包括罪犯。"而我母亲反复讲的故事是从前有个孩子，偷了一根针回家，他妈妈不仅不谴责，反而夸孩子聪明。后来这孩子就在妈妈的纵容下，一再偷鸡摸狗，胆子越来越大，终于发展成杀人越货的强盗，被政府逮捕，并判处极刑。砍头之际，强盗要求妈妈给他最后一口奶。哪有不疼孩子的娘啊，妈妈不顾刽子手的劝阻，拉开衣襟，把孩子紧紧按在胸上，却不提防被这狼崽咬掉了奶头。强盗怪妈妈在他第一次偷针时没及时制止，以至一发不可收拾。

余桂生：所以你在这种家庭教育下不仅没成强盗，而且成了写强盗故事的作家，问题是，您能对撬门入室的贼讲刚才的故事吗？

老威：他反而给您讲了故事。

余桂生：他给我上了一课，这就是我要再次向你求卦的原因。

老威：事前真的没一点预兆？

余桂生：雷雨交加，又雨过天晴，月光如洗，我刚才已经说了。平常在我们楼下，冷啖杯鬼饮食会开到下半夜，猜拳行令十分烦闹。

那晚因为天气异常，鬼饮食就早早收摊了。两点多钟雨停，一开窗，空气特别清爽，四下静得能听见树叶落地的声音，我想今夜能睡个好觉。

老威：您没听见楼下狗吠？

余桂生：那是条观赏犬，有事没事都叫，我听见小王起床拉灯，还骂狗发梦癫。就没特别在急。当时我只开着床头灯，看了几页书，这是我多年的习惯，我看的是一本蔡志忠的漫画《禅说》。

老威：《禅说》？里面有一篇讲一个贼去偷庙里的和尚，那和尚躺着一动不动，眼睁睁地看着心急火燎的贼到处乱翻，终于什么也没翻着，出家的那有啥值钱的东西？贼失望得差点哭出来，临出庙门时只好把和尚晾在窗外的唯一的袈裟也扯下了。和尚不忍，忙起身喊站住，准备将裤衩脱下一并送他，不料贼听见喊声吓得灵魂出窍，一溜烟就不见踪影。于是和尚只好抱着光膀子，站在庙外的空荡荡中叹息道："可怜的贼！我为什么不能把天上的月亮送给你？"

余桂生：你的记性太好了！里面好像有这一篇。

老威：而且您的窗外也有月亮。

余桂生：您的意思说我应该躺着不动，或者把家当全送他？小威，你是书呆子，这贼不等于那贼，况且现实里根本没有如此诗意的贼。

老威：已经发生过的事，过去就过去吧，我是指老师您此刻的心境，还需要打卦吗？

余桂生：我不知道。

老威：《震》的下一卦是《艮》，静止如山的意思。您已报了案，没什么可想可做的了。

80　家庭基督教徒袁福生

采访缘起：我具体了解中国有家庭教会比较晚，那是在 1998 年 7 月份，我应邀往北京主编《沉论的圣殿》。有一天，我上徐文立在白广路 2 条 4 号大杂院内简陋的家，老徐向我介绍在座一位寡言而敏捷的中年人："徐永海，神经科大夫。"

我们彼此点头，进而彼此产生好感。两位徐先生像弟兄俩，都瘦弱如弓，脸型狭窄而苍白。他们把头抵在一块，大约正在商讨打印什么违禁材料，眼神也不自觉地环顾左右，给人一种地下工作的紧张感。

徐文立已经谢顶，徐永海正在谢，我是秃瓢，早就谢无可谢。正是由于这种相类似的人物标识，徐永海在谈完正事后，转而把头与我抵一块，耳语道："小心，这屋里有窃听器。"

我在头皮发麻中接着听他讲信仰，讲基督教里的拯世。他当时入没入教我不知道，只记得我曾经回答："我不进教堂。"

"我也不进，"徐大夫会心地一笑，"现在的教堂都是来自爱国会的。"

接下来的几年，我们偶尔有电话，徐文立"民主党"案发前夕，我曾经托他把放在徐家的《证词》原稿转移出来。再接着，他的旧电话不通了，我从网上得知，徐大夫不仅已入教，而且是北京地区家庭教会中的一位活跃传道人。

再接着，他家住了几十年的老屋被强行拆除，徐大夫求告无门，一度想以死相抗——是废墟上十几位兄弟的祷告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

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几代蒙难的基督教徒都曾这么说。2004 年初，徐大夫与主内弟兄刘凤刚在浙江萧山地区传教时被捕，从此音讯全无。他的妻子，曾经是神经科护士的李珊娜在网上说，她将继续为丈夫祷告。

同走路、睡觉一样，祷告是人的一种本能。我曾见过佛教、回

教、天主教，甚至无神论者的无助祷告。哪怕动物，哪怕凶残的狼，也有在月夜里奔上最高的悬崖，仰天哀号的时候。所以徐大夫妻子的祷告虽然是具体的，却从几千年，或上万年的混沌里延伸下来，并且还将贯穿一代又一代的灵魂，延伸下去。一个制度，一个政府，可以为了统治的需要，尽全力去剿灭这种生生不息的祷告，但一百个制度，一百个政府灭亡了以后，祷告还将无休止地回荡。

因此，我从我的朋友余杰和刘敏那儿，看到了远志明先生的记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知道在官方许可的教堂之外，参加家庭聚会的基督徒已达七千多万。我想起了徐大夫和他的妻子，目睹了自上世纪初，特别是 1949 年以来有许多人殉难的"神的道路"，我的内心也开始祈祷。

我希望能做一个老基督徒的访问。

我托家庭聚会的传道人刘敏打探相关的消息，2004 年 2 月 25 日，星期六的下午，我在阳光明媚中接到刘敏的回音，她向我提供了一个电话，并告之电话的主人正是《十字架》里记录过的，在中国北方最为人敬重的袁相忱夫妇。

我随即拨通电话，与 86 岁的梁太太取得联系。那端的声音清晰而和气，于是我们约定，在 2 月 28 日，星期二的下午登门拜访。梁太太在告之袁牧师的作息时间的同时，还详尽地叙述了去彼处的地铁和公共汽车的线路，我一一记下。

想到这对高寿基督徒的种种不平凡，我不敢怠慢，遂约会了台湾籍的记录片拍摄者温××，商讨了几样现场访问的方案。温××是个娇小的颇有爱心的姑娘，在台湾拍过多部社会题材的片子，而我是她在大陆的第一个跟踪对象。

刘敏自告奋勇。于是在 28 日下午，一男两女携着摄像机和录音器材，满面春光地出发。将近两点从宣武门上地铁,天气晴转阴,一阵阵冷风从灰蒙蒙的高楼间刮过来,令人不由自主地缩头。眼尖的刘敏率先望见路口旁的天主教堂，云缝里透出的阳光给高耸的十字架染上了几颗金，我们进大门参观了一番，而刘敏乘隙做了祷告。

接着，我们乘车至洋桥，打了电话，开始在几座大楼间转悠。

我们先进了洋桥医院，打听了几个人，然后没有结果地退出大门，绕着极漫长的围墙由街面朝里深入。风贴着巷道吹，两位姑娘的头发凌乱地飘着，而我的双臂却紧抱着自己，把寻觅的重任交给擅外交的刘敏。

大约又进过两三座大楼，我们抵拢了目标。由于沿途的波折，刘敏扬了扬她出众的额头，向封锁楼门的一位保安再次核实："这是正阳家园 1 门吗？有一位 90 岁的袁伯伯住在这儿吗？"

"你们是谁？"保安没有回答，却警觉地盘问道。

刘敏也没回答，却直接按了二层二病室的电铃，刚好有本楼住户进门，我们就乘机跟进去。不知深浅的温××出于职业习惯，从提包里剥出机器拍摄起来。

通过电梯和楼道，我们终于进入袁家。这是一个普通而和睦的基督教家庭，四壁有十字架和圣经里的箴言，宽敞的客厅内有十几位家族成员，而迎门的沙发上方是二三十人组成的四世同堂的全家福照片——寿星袁氏夫妇位居正中——可现实中的袁氏夫妇却一直冲我们微笑。知书达礼的刘敏介绍了来意，就靠着目光清澈的梁太太坐下，那种水乳交融，令人瞬间就升华到神的国；我的身边却坐着袁牧师，由于激动，我说话有点结巴，而袁牧师耳背，总是抬起右手，扩音器一般搭在耳轮上；于是梁太太和刘敏争相贴过去充任翻译。四周发出善意的笑声，采访的气氛顿时就有了。我拿出笔记本和录音机，而温××挺默契地在茶案的另一端架好摄像机，我与她相视一笑，并竖了一下手指。

在这中间，袁牧师送了我一些书和资料，彼此商量怎么开头；而刘敏却坐在靠中的椅子上，向大家介绍她的夫君余杰等一批信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以及她主持的家庭聚会的情况。我吐了口气，正庆幸着出乎意外的顺利，门却笃笃响了。

空气顿时凝结了，象一张松弛的弓，突然被拽成满月，聚成一圈的人眨眼就分散了。如同变魔术，摄像机、录音机、包，甚至纸条都失踪了。袁家的一个儿子闪到门旁，俯耳又听了两三遍门响，才咳嗽一声，放慢节奏问："谁？"

门外答：“我们是派出所的民警。”

又问：“什么事？”

又答：“我们接到群众的反映，说有不明身份的人上您家采访。”

“没人采访。”

“我们是执行公务，开门吧。”

犹如一个拍电影的剧组，待每个人都各就各位，准备就绪，门才开了。大家都把目光的镜头冲着进来的一男一女，男的着警服，是管这儿的片警；女的着便装，据说是刚上任的居委会主任。中间的椅子早腾出来，他们一坐下去，片警就盘问道：“谁在这儿采访？是你们吗？”

梁太太答：“没人采访，是几个慕道友。”

“谁是慕道友？”

刘敏的脸色惨白了一会儿，这时已镇定如初了：“我是基督徒，听说袁伯伯病，特地来探望；他们是我领过来的慕道友。”

我附和道：“我想了解一下基督教，就跟来了。”

片警转而问温××：“你呢？”

温××板着一张胀红的脸,抬手指了指喉部。

片警道：“什么意思？”

温××哑巴似地张了张嘴，镜片后的目光闪烁不定。

刘敏道：“她声带发炎，说不出话来。”

片警道：“哪我倒想听你说说。”

于是刘敏从上帝造人开始，滔滔不绝地侃下去。她的口才是天生的，况且传道又是本行，所以把个片警弄得晕头转向。时间不知不觉过去，刘敏讲累了，就让片警提问题，可怜的警察文化底子薄，提不出什么问题。倒是年轻的居委会主任问信仰有什么好处，大家都笑了，主任显得不好意思。

片警的手机响了两次，他每次出门接听，大伙都不禁暗地紧张。待他第三次出去，身后却跟进一位年长的警察，直接与袁牧师打招

呼。原来是本辖区的派出所副所长兼特警队长，他二话不说，就要依法检查我们的证件，我和温××不敢出示身份证，因此我辩称，大白天出门，没有必要带证明，如今又不是文革时期。刘敏见状，生怕露了马脚，就接过话头，坦承自己是某外企公司的职员，大概是产生了美女效应，警察沉吟一番，放弃了带我们回派出所核实身份的打算。

遵照指令，我们把姓名、电话、地址写纸上，供公安查验。我和温××自然是假的，而刘敏的名字太大众，写写也不妨。接着，三个公差稳如泰山一般耗上了，刘敏只好继续传道。其间，警长还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比如警察这种职业与基督教有冲突吗？等等。刘敏的回答是，一个忠于职守，服务于社区居民的警察一样会得到神的恩典，因为人人都有安全感的社会更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

公差们点头称是，一副虚心好学的模样。片警还称，他受袁牧师的感召，已考虑了一段时间的信仰问题，今后，他会每个星期天来参加团聚，交流读《圣经》的心得，居委会主任也附和说要加入。可就在这种感人的氛围中，警长连接了四次电话，每次嘀嘀铃响，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触碰。我的心悬着，温××的脸板着，刘敏还在讲神是如何高于警察（可耶酥就是被古代的警察钉上十字架的），袁牧师耐不住，在半小时内问了三次警长：“您们还有什么要问的？”潜台词是：“快走吧，别在这儿烦我们！”

公差死活不去，没办法，我们先站起来。警察象膏药一样贴着我们出门并下楼。幸好袁家子女多，防不胜防，终于还是把暗号递到了我们耳边。

离开袁家几百米，警察早不见了，我们还在贼头贼脑张望。拢大街，钻入一辆破出租车，我们还在猜疑是否有车跟踪。原计划过几天，由袁家派人把藏起来的东西送到某个约定的地点，考虑到夜长梦多，我让刘敏打电话。

我们在宣武门下车，二进天主教堂，大门内，停了一辆崭新的奥迪轿车，令我们紧张了一会儿。因为奥迪是便衣特务的专用车，两天前，我去探望刘霞刘晓波，他们楼下就停了一辆奥迪，结果我

入屋刚坐下，屁股还没热，警察就敲门了。

在紧闭的教堂穹门外，我们缩头缩脑。此时，我开始用玩笑来抵御寒风，直夸刘敏适合做地下党。刘敏露出女儿本相，连称“紧张死了”，并反击我说谎不自然，辜负了监狱的培养。大约等了一个多钟头，奥迪开走了，袁牧师的二儿子袁福生把一大包东西送到我们手里,计有录音录像器材、挎包、笔记本、通讯录、书籍、资料等等.

袁福生瘦弱、顽强，有丰富的地下活动的经验，他将我们的东西用报纸裹了,再装一条旧塑料袋提着，这样就显得极普通。刘敏与他接头的同时，得到了一个电话号码，两天后的 3 月 2 日，全国人大和政协召开的前夕，我正是用这个秘密号码和他联系，并约定次日在地坛南门见面。

3 月 3 日午后风和日丽，但街头巷尾警察遍布，以确保“两会”的胜利开幕。我和袁福生都提前了半小时，可相见却推迟了半小时，原因是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逡巡着，探查四周有无可疑之处。

我们相视以笑，就一齐出了大街，越过天桥，去了斜对面的麦当劳快餐店，在人来人往中找好坐位，要了饮料。我把袖珍录音机用餐巾纸盖着，访谈就开始了。

“太紧张了，每年两会都这样，”袁福生望着窗外说，“我父母让我向你表达歉意，他们欢迎您以后再去。”

我望着对桌的一对情侣，点了点头。

“我父亲在为一个叫徐永海的大夫祈祷，他是在浙江传福音时被捕的，”袁福生又说，“父亲在聚会时公开讲，徐大夫是年轻一代基督徒的骄傲。”

我内心震撼，一股暖流从多年以前涌过来，可眼睛依旧望着别处。

几个钟头逝去，我们出了麦当劳，分道扬镳。黄昏的天空象剖腹产的肚子，将满腔的血泼在大街上，北京的人群、车辆和房屋都在永恒的血潮中川流不息。

老威：我已经在地坛外走了几个来回，还去地铁口逛了一圈，脑袋不动，眼珠子却转个不停。我恍惚觉得每个行人都是特务。刚才有个骑自行车的警察嗖地擦身而过，我居然出冷汗了，真有点悬。

袁福生：我也提前半小时到，在周围慢慢磨蹭，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每年"两会"期间，都特紧张，不能不留意。

老威：这里面还安全吗？

袁福生：麦当劳是挺新潮的去处，进的几乎是年轻人，应该没什么问题。假如有问题，托主的智慧，能感觉得到。不过，您的笔记本太显眼，容易被人逮住，成为"罪证"。我们主内的弟兄碰面或接受采访，遇敏感的话题，都用小纸片。我兜里揣了很多，您看，就是这样的纸片，小半个巴掌大，互相在上面写，你问我答，我问你答，声也不必吭，旁边人看着，还以为在玩什么文字游戏呢。撞上突发情况，处理起来也方便。

老威：什么叫"处理起来也方便"？

袁福生：警察脑门上没刻字，他不会象演电影那样，让观众一眼就认出来。有时候，他突然就扑上来，控制你，抢你桌上、椅上、身上、地上的一切证据。你的本能反应是尽快碎掉小纸片，如果来不及，就在警察箍你手腕、卡你脖子之前塞嘴里，嚼烂了，咽下去。他不可能马上切开你的肚子取证。

老威：真叫人喘不过气。

袁福生：感谢主，我们坚持了这么多年，现在福音已传遍中国了。

老威：我是通过远志明先生的纪录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认识您父母的，其中有个场景令我久久地感动：这一对劫后余生的老人用有些干涩的嗓音唱道："我要高声称颂主十架/直到在主台前见父面/那时听他说——忠心仆人/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

袁福生：这叫《古旧十架》，父亲在坐牢时经常唱。

老威：当时您父亲放开嗓门唱，脸涨红了，双臂也抬了起来，那种激昂一点不像年愈 90 的老人；而您母亲却低声跟和着，清澈

的眸子显得羞涩，甚至有少女的天真。我对比了您母亲年轻时的照片，这眼神始终没变——她也八十五、六了吧。我不能不说，您的父母本身就是奇迹，是造物主给这个种族留下的奇迹。

掐指一算,基督教传入中国已 100 多年,《十字架》里，叙述了自上个世纪初到目前的信仰的劫难与传承，让我这类怀疑论者也记住了王明道、宋尚节、倪拆声，以及以巴佛、谢模善等名字，这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道可歌可泣的神迹……

袁福生：我父亲，还有他们那一两代以身殉道的老人，真是无愧于“十字架可换公义冠冕”的诗句。

老威：我没能完成对您父母的采访，是一种太深的遗憾。

袁福生：您已经尽力了。听说您写过 100 多个底层人物，那么在您的身上，也有一种信仰的力量。所以，我愿意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和您见面，代我父亲讲讲他的经历，留下见证，让更多的人信主。

我父亲袁相忱，生于 1914 年农历 6 月，具体的生日他忘了，却牢牢记住了自己重生的日子——1932 年 12 月 29 日，这一天，他从内心信了主。我父亲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两个生日，肉身的和属灵的。稍后的 1933 年 8 月，由著名的王明道先生施洗，在万寿山后，用从颐和园流出的清水受洗，当时还拍了照片。王明道先生对要求受洗者都进行过极严格的考察，经过反复学习、交谈，让人真正明白受洗的含义——表示我的旧生命在基督里与耶稣同受死、同埋葬，代之而活着的是用耶稣的宝血换来的新生命。

我父亲是在安徽蚌埠出生的，祖父袁禹庭，广东东莞人，因曾祖父跟随广东籍的设计师詹天佑北上，修筑轰动一时的京张铁路，早年就举家北迁，在北京南口镇落户了——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铁路员工。由于经常要同洋人打交道，都受过较好的西式教育，懂英文。我父亲是在动荡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13 岁开始入读青年会办的教会学校，学英文，背诵《圣经》，从这儿，他知道了耶稣。他至今难忘的两位启蒙老师是美国人萧安娜和中国人石天民，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在父亲大量研读孙中山先生的著作，吸取新思

想的同时，向这位孜孜不倦的学生传福音。就这样，在他们的引导下，父亲认识了王明道先生。

父亲信主的过程充满痛苦和矛盾，国家、家庭和个人的种种无法摆脱的剧变，令他觉得人生无常，生活无意义，曾想一死了之。有一次，他双手握铁钉，都准备触电自杀了，但刹那间又觉得对不起生养自己的父母。

1934 年夏天，父亲结束了高一课程，准备升高二。本来照此下去，他毕业后能谋得一份好工作，吃穿无忧，即能够娶妻生子，过比较安稳的日子了。而他却顶住来自父母的巨大压力，退了学，把自己前途交给神，由他来定夺。这是父亲人生中的第一个择抉，他的勇气源于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我主耶稣在其中说道——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父亲通过祷告，按神的指引入远东神学院在北京开办的圣书学院。这是专门培养当地传道人的场所，学期四年，三年半为上课时间，半年实习。条件异常艰苦，父亲却得到系统的知识训练。1936 年夏天，父亲参加了宋尚节博士在厦门鼓浪屿举办的全国第二届基督徒查经会，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同 2000 多人一道，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查考到《圣经》的最后一章，灵性充溢。1937 年，父亲开始在远东宣教会的刊物《暗中之光》发表属灵文章，英译并出版了史可福的《个人布道手册》。1937 年秋天，于日本入侵的兵荒马乱之中，结识了从天津一所教会学校读完初中，逃到北京的母亲梁惠珍。

1938 年初，父亲完成学业，到天津圣会所事奉，这个机构是由宋博士创立的布道团演化而来的。由于母亲也信耶稣，不久他们就订了婚。父母的婚礼于 1938 年 7 月 22 日在北京举行，半中半洋，即坐中式马拉车，穿西式婚纱；100 多位客人中，也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各占一半，还有一些外国牧师来参加。

1939 年秋，母亲怀孕了，父亲结束在天津的事奉回到北京，本来他可以接受远东圣书学院的吴智院长的邀请，回校做翻译，挣一份稳定的足以养家的高薪水，而他却选择了离开舒适，去农村传

福音。

1940 年夏到 1941 年底，父亲携妻带子，跟随美国牧师裴约翰在河北南部的城安、永年、广平、卫县以及附近的山东五县的各个村落布道，将福音传给在战乱中精神饥渴的穷人。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美交战，日本人就把能抓到的美国人集中起来，关入山东潍县的战俘集中营。于是不久，裴牧师一家四口也从教堂里被带走，父亲受连累，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抢掠一空。母亲那时年轻、漂亮，怕出意外，就脸上抹锅灰，抱上孩子躲进教堂后的地窖。

日本兵从美国人手里接管了教堂，战火频繁，原先聚在教堂的同工们纷纷解散回家。父亲他受神的鼓励，继续留在农村传福音，并从此与乡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真正的农户。稍后,我姐姐安湖诞生了，第一个家庭聚会点也办起来。父亲说——日本人封了教堂，神的羊群却需要牧养，信徒们不能终止肢体生活。

当时的河北南部，白天由日军控制，晚上有八路军活动，父亲他们骑着自行车下乡传福音，身上必须带上日票和八路军通用钱票。碰上谁，不仅申明“我们传福音”，而且得出示谁的钱票，否则就有麻烦。在整个抗战期间，父亲布道的秘诀就是脱胎换骨，成为彻头彻脑的农民，粗茶淡饭，浑身虱子，把兵荒马乱的田野当作无边的教堂。作为独子，他甚至没能赶上为父亲送终。

抗战胜利前夕，父亲一家因祖母病重回到北京。父亲在讲道的同时兼做英文翻译，以维持全家 7 口的基本生活。他一直期待着时局好转，好回到最需要他的偏远乡村，但国共和谈破裂后，共产党施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毁坏北京周边的铁路和公路，要拖家带口去乡下谈何容易！

父亲很焦虑，他不明白神为什么要让他在城里耽搁，不让他奔赴更广大的牧场，于是他祷告，学习洞察什么是神的旨意。这期间他以每月 300 斤小米的价格，租下了阜成门 160 号，一座原属日本牧师的被查封了的福音堂。自此，父亲作为一个在农村事奉多年的传道人，终于在城里有了固定的教堂，即不依靠任何组织，受神直接供养的属灵地。

由于拒绝挂神召会的牌子，福音堂和家庭的所有开销都要靠父亲想办法。这锻炼了父亲的事奉能力和独立风格，他说："中国基督徒应该建立自己的教会。我现在靠翻译来维持生活，补贴教会的开支，中国教会应该朝自立自养自传的方向发展。"

1948 年底至 1949 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时局凶险，物价一天飞涨几次。传教士和基督徒担心受逼迫，纷纷逃离大陆。父亲却回绝了远东神学院院长吴智等许多人的劝说，坚持留了下来。49 年 2 月 3 日，解放军首批部队从阜成门我家门口进城，2 月 23 日，城中各教会成立了"北平基督教联合会"，商讨如何适应新环境，在无神论政权上台后求得生存。父亲却认为没必要自我恐慌，因为宗教与世俗政治没什么关系，况且共产党政策中有"信仰自由"这一条。

开始，政府全力稳定政局，来不及染指宗教生活。有一天，父亲带着几位信徒在大街上打鼓布道，引来许多人围观，同时也招来维持治安的解放军。他们驱散了人群，将父亲等人带到军管会，经过简单的审理，却又释放了他们。当父亲以"信仰自由"为据辩论时，军管会的干部说——信仰当然自由，不过目前刚解放，治安较乱，鱼龙混杂，最好不要在外面传教。

老威：政府对宗教界还是客气的。

袁福生：客气是暂时的，因为有神与无神水火不容，在中共内部，早就制定了对所有宗教实行限制、改造，最终消灭的国策。况且，宗教界也不是一片净土，在历朝历代，都出过配合世俗政权，引狼入室的叛教者。

老威：您指的是吴耀宗先生吗？

袁福生：也包括丁光训、刘良模等宗教界名流。王明道先生称他们为"不信派"。吴耀宗生于 1893 年，早年信主，曾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后来具有明显的亲共政治倾向。照他自己的说法——一生经历了两次巨大转变，第一次接受基督教，从怀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

吴耀宗等成为首届全国政协代表，并三次晋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共同制定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方向，那就是：1、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2、实行三自，即自治、自传、自养。

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开始。三自方针迅速演化为爱国运动，基督教界必须要在“支持自己的国家，还是支持帝国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在不爱国就是反革命的时代潮流下，基督教义受到史无前例的歪曲和颠覆，签名拥护三自爱国运动的信徒达 33 万。

可尽管如此，各地仍有许多人拒绝三自。当时北京有 60 多个基督教团体，其中就有 11 位教会负责人公开声明——我们早就自治、自传、自养了，所以没有参加的必要。这 11 人是王明道、袁相忱、毕永琴、王镇、彭宏亮、吴慕迦、王伟明、张周新、陈善理、吴文静、刘秀颖。

由于父亲主张“政治和宗教要绝对分开”，神的东西归神，凯撒的东西归凯撒，不应该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他自 1952 年开始，一直受到了引诱，拉拢和逼迫，自己的福音堂也有大批信徒离开。对此，父亲毫不介意——主托付给我多少羊，我就牧养多少，但我的选择是不介入政治。

同时，他也拒绝按政府的要求参加政治学习。

老威：您父亲真是不识事务啊。

袁福生：几年来，宗教事务处的李处长经常找他谈心，就象现在的片警，都混成老熟人了。可到了 1955 年，政府的忍耐期终于结束了。这是继 1900 年拳乱中两万多名基督教徒遇害以来，最大的一次劫难——全国上千教堂被毁，几万名教徒被捕，其中被当作邪教镇压的达好几千人。但是在首都，政府却迟迟没动手，他们希望与三自运动对着干的 11 个团体在大形式下屈服，在军事战略上，叫“围而不攻”。

老威：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却没一个人声明加入三自。

袁福生：对，1955 年 8 月 7 日深夜，王明道先生及太太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十几位传道人。

老威：《十字架》里讲，这些领袖级的传道人都判了重刑。

袁福生：15 年以上至无期徒刑。王明道先生入狱后，因一时动摇，写了《悔过书》，被立即释放。可他回到家中，却受到比坐牢更痛苦的灵魂煎熬，于是他跪在主前忏悔说谎的罪，并再次收拾行装，自投落网。他说——我要以毕生的牢狱来平息主怒。

父亲他也经历过类似的动摇。8 月 7 日大逮捕后，北京的传道人们终于在压力下参加了政治学习。李处长对父亲表示了空前的宽宏大量，他说："你才 40 岁，年轻得很，要好好学习。追求进步。"接着又鼓励父亲发言。父亲一直沉默，其实他内心一直在进行听从神意还是屈从政治的征战。通过祷告和反省，他决定不再犹豫。1957年左右开始，父亲又被叫去参加由李处长主持的三自会议，领导指明让他表态，他缄默良久，退无可退，就把憋了很久的话吐露出来——第一，现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基督教的信仰没有自由；第二，在三自队伍中有一些人根本不是三自，这些人称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来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国人来了就领美国人的津贴；现在摇身一变，成了靠拢政府的三自。其实他们最不"三自"，他们只不过是基督徒队伍中混饭吃的，也就是"吃教者"。

父亲的发言之后是一片寂静，许多人暗暗捏了把汗。父亲却感到从未有过的畅快淋漓，当众说真话原来这么好，他想，以后一定不委屈自己了。

不料，会议刚结束，学习组长就宣布——按政府要求，每个小组要产生四个右派，根据大家的发言记录，袁相忱很突出，被划为右派。

既然一发言就成右派，父亲干脆来个"闭门思过"，不参加任何政治学习。并且照例祷告读经，照例开堂布道，不理会任何人的劝说。因为"教会的头是基督，而不是宗教事务局和牧师"。

一次，父亲的老朋友祁庭铎牧师来到福音堂，两人一起吃饭，祁牧师忍不住叹气说——袁弟兄，我要劝你几句，虽然你不想听，但作为朋友我不能不说。你的处境已经很危险了！在这种短檐下，你就低一下头，忍忍个人的脾气，至少装装样子，主动去学习，参

加三自。如果你还是一意孤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唉，看看你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怎么办？反革命家属的黑锅不好背啊。——也许是触景生情，祁牧师流泪了，他还说——共产党要求入三自，我们就不能不入，有什么办法呢？

1957 年底，，政府对父亲进行了最后一次“挽救”。先由李处长的秘书打电话给母亲，叫她和奶奶次日九点去长安街的宗教事务处。当两位家属依约赶到，李处长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她们，李处长严肃地说——我请你们来，就是要你们做好袁相忱的思想工作，要他赶紧向政府靠拢，悬崖勒马，不然我们再不能容忍他！他还年轻，才 44 岁，所以你们一定要与政府一道挽救他！你们老小九口，他是当家的，万一出事，你们怎么糊口？王明道的下场都看见了，不要把政府的仁慈当作软弱，我们收拾他太容易了。但是，你们一大家子就惨了！老太太，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没有他，你怎么生活呀！劝他回头是岸，悬崖勒马吧！千万记住我的话！

老威：“悬崖勒马”一词在文革中很流行，有最后通牒的含义，没想到这是独裁政权的一个传统外交辞令，意思是我他妈不讲理，要直接干了。

袁福生：父亲明白，母亲回家一提，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老威：他就不可以为了自己的亲人暂时避让吗？暂时的屈服——难道不是人性吗？您父亲有什么理由让最亲的人跟着受罪？

袁福生：您这些问题，甚至比这多十倍的问题他都想过。但一个基督徒，最大的不幸不是落难，而是为了地下的，背叛天上的。那么，即使您得到或保全了地下的，灵魂也在永劫不复的黑暗中，无得救之日。当时，父亲曾反复给全家人诵读《约伯记》——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于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老威：我也坐过牢，但却做不到如此心如铁石。假如敌人以迫害亲人好友相要挟，逼我放弃信仰，我会撑不住。写《悔过书》、爬狗洞、说谎，我或许都会干，但是•

袁福生：您不会砍掉自己的右手，发誓永不写字，永不记录人

间的苦难吧？

老威：当然。

袁福生：那父亲也不会背弃主。这是他的命，命都没有了，拿什么去爱自己的亲人？

老威：上帝啊，你听听吧。

袁福生：父亲也曾跪在黯夜里，辗转难眠，一遍遍这样祷告。在他自己被捕的前夕，公安局一次又一次当着他的面，在他的福音堂抓走聚会的教徒。“上帝啊，听听仆人的请求！”父亲甚至泪流满面了。

从外表看，当时只有死活两条路——活路是主动表态，参加三自，向政府妥协，保全自己和家人；死路是顽抗到底，这样的下场必然是坐牢，骨肉分离。

老威：还有不死不活的中间道路吗？

袁福生：中间道路？既不用加入三自，违背神的旨意；又不用被捕，与亲人分离，让他在福音堂继续事奉神？

老威，对，上帝既是万能的……

袁福生：可神有他自己成就儿女的方法，有时就是经由地狱，而一步一步地为中国的福音开了出路。父亲祷告了十多天，这期间，再没人来警告他、劝说他、打扰他了。父亲天真地认为，神已听他的祈祷，要以奇迹救他出患难了——只要基督徒坚决地摆明立场，政府反而会默许。

1958 年 4 月 19 日深夜 11 点半，父亲被捕了，此前，他已让母亲备好了劳改穿的棉衣和布鞋。逮捕父亲的方式很特别，先是派出所民警叫门，母亲作为街道主任，以为是安排明天打麻雀的工作（因麻雀偷吃粮食，所以在 1958 年春天，被中共中央正式列为务必满门抄斩的“四害”之一。于是全国人民充分发动起来，占据所有屋脊、树枝、山坡等至高点，鸣锣、打鼓、吆喝，铺天盖地的噪音令贼雀无处落脚，只能在空中四下惊飞，直到累得掉下来摔死。其结果，麻雀干净了，蝗虫却泛滥成炎，成片啃光农作物，引发了

59年的大粮荒——老威注），就开门迎客，不料两个民警却借故“所长有请”，把父亲带走了。

在香家园派出所，市局的警察才露面，宣读《逮捕证》，戴手铐，罪名是“现行反革命”。与此同时，我家被抄了，一大群警察，人人手里都拿着铁棍等工具，从福音堂到每个房间，一寸寸搜查起来。所有的《圣经》、诗本、属灵书刊都掀在地上，任凭践踏。翻箱倒柜不过瘾，他们还每进一步，就用铁棍杵一下，觉得有空响，就立即撬开，这样，房子被毁坏得乱七八糟。连浸池周围的地也翻遍了，仍然一无所获。

直到凌晨4点半钟，警察才把搜检的物品装了一卡车拉走。我们六个孩子从梦中被叫醒，穿好衣服，围在母亲和年迈的奶奶身边，目睹了自己不理解却永远难忘的一幕。

父亲这一去，就是21年零8个月。而作为现行反革命家属，母亲不可能再当街道主任，连17岁的大哥福音，也被撤销了少先队大队长的职务。1958年8月底，我家被迫迁离居住了多年的阜成门福音堂，八口人挤入十几平方米的白塔寺内大街40号。这儿原是白塔寺的西配殿，住喇嘛的，如今却住了落难的基督教一家。三代八口都挤在砖头垫起来的通铺上，穷困极了。

老威：十几平方米住八口人，也跟监狱差不多了。

袁福生：为了养家糊口，母亲还去建筑单位做临时工。

老威：我母亲在文革中也做过临时工，又累、工资又低，还受人歧视。

袁福生：都是一般人不愿干的苦力，可母亲已感恩不尽了。

老威：《十字架》里讲，自1955到1958年，随着王明道、袁相忱、谢模善、林献羔、以巴佛等一大批基督教著名牧师的逮捕、判刑，全国的教会纷纷关闭，仅北京地区的64所教堂就合并为4所，66年文革开始，所有的教会都关闭了，共产教终于达到了清除一切有神宗教的目标。

袁福生：上帝在人心，是清除不了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母亲和我们仍然天天祷告。有一次断炊，一家八口，连一颗米都没有。

于是母亲就跪下祷告——主啊，我们没有米，没有面，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了。如果等到明天还这样，如果您觉得我们应该这样，我也不怨您，不怨谁，我就喝一点暖壶里的水，这就行啦——没想到第二天，有个妇女敲门问——这是袁弟兄的家吗？母亲答是。那个妇女点点头，放下 50 元钱就走了。母亲反应过来，脚跟脚撵出门，却连影子也没有了。50 元钱在那年头，够八口人两个月的粮食钱，母亲赶紧跪下来感恩。

老威：您父亲在看守所关了多久？

袁福生：有大半年，家里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直到 58 年 11 月，法院的人到我家，交给母亲一份无期徒刑的《判决书》。基督徒面对世俗政权的迫害，是不上诉的，于是母亲拒绝上诉。《判决书》所列罪状有七条——1、右派言论；2、破坏三自，污蔑三自领导人是三朝元老；3、开黑会抵制政治学习；4、攻击政府“信仰不自由”；5、坐牢时继续搞反革命煽动；6、汉奸嫌疑；7、里通外国。

父亲后来说，自己被押上囚车，就直接去了北海后面的草岚子胡同，在那儿预审。父亲不爱记琐事，除了传福音，公安要向他核实的事，他都记不住。而一涉及传福音，公安认为有罪，他却认为有功。有一次，审讯员突然问——“老和尚为什么不说话”是什么意思？父亲懵了,真的摸不着头脑，人家才提醒他——这是你说的，老和尚指的是毛主席。父亲纳闷——这是我的话吗？本来我不发言，你们要我发言，还说“言者无罪”，现在却要追究我的右派言行了。审讯员说——你不发言岂能了解你内心深处的反动？你还把共产党比着大红龙，煽动信徒不爱党不爱国。父亲纳闷了——我这样讲过吗？基督徒只记得《圣经》,不记得俗世里的话。把人家气得暴跳如雷。

那年头，监狱的大门敞开着，稍不留意就栽进去了。与父亲同号的两个人，因在国庆游行队列中一走神，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喊成“中华民国万岁”,当场就被揪出来，投入大牢。

老威：和我同监有个六四政治犯，判刑 4 年，罪状也是混入学生游行队伍，喊了两声“打倒共产党”，结果被爱国群众扭送公安

局。

袁福生：1958 年 12 月，家里收到父亲从北京监狱发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首次探监的日期，于是母亲带着奶奶和小六在一个星期天赶到自新路。很高的炮楼，很厚的围墙，背枪的解放军或笔直不动，或走来走去地俯瞰四周。在顶天立地的大门旁，有一扇非常小巧玲珑黑门，母亲将明信片递给哨兵，验明正身后，她们三人被放进监狱。里面老老少少，挤得水泄不通，都是等着探监的。母亲和大家一样排队，半小时准入一批，大约等了一个多钟头，才轮到母亲他们进去。接着是坐在一张小桌后等待，有解放军按明信片上的名字喊犯人接见。终于见面了，父亲被剃成了光头，走路有气无力。一家子的手都握在一起，太激动了，真不知说什么好。

父亲出事后，又有一批批弟兄姐妹被捕，可当兵的就守在身边，母亲再焦急也不好告诉他，只好聊些家庭琐事。母亲把几包糕点交给父亲，父亲推辞说里面不准带吃的。半小时刮风一般过了，警察哨子响，犯人全体起立，列队回监。

在某一个接见日，父亲还望见了自己的属灵启蒙老师萧太太，她的女儿当时也被判刑劳改，萧太太去探监。他们不能说话，只能互相点点头，以示问候。59 年的某个晚上，里面看露天电影，父亲挽着马扎，夹在犯人大队中进入操场，忽然瞅见自己的导师王明道坐在前面。刚好此刻王明道先生回头，两人不能说话，也只有对视一秒钟，然后，都不约而同地仰头看天，意思是仰望星空中的主。再往前挪动坐位时，父亲感动极了，因为他们都读懂了对方的内心。

老威：您父亲在里面经常碰见熟人？

袁福生：偶然能碰见，但不可能有什么具体接触。父亲在看守所曾被一个天主教徒检举过，指他在审讯期间继续传道。吃过亏，他的言行更加谨慎了。1960 年夏末，由于饥荒蔓延，犯罪猖獗，首都各监狱都人满为患，于是政府决定把判刑 20 年以上的重犯迁往黑龙江，在中苏边境的兴凯湖监狱劳改。刚上火车犯人们还是单衣，待下了火车，大伙已经穿上了厚棉袄棉裤，加上皮帽和毡袜，就是过冬的“全幅武装”。

接着，又经军车押运，抵达了目的地。兴凯湖与苏联只隔一条河，刚去时，全是住一座连一座的帐篷，外面圈铁丝网，由解放军持枪把守。因为在东北住帐篷无法过冬，犯人们的劳改第一课，就是烧砖盖房子，也就是自己为自己盖监狱。先砌围墙，再修哨楼和干部房，最后才是监舍和 50 米长的大通炕。接着的劳改任务是种庄稼，秋收后，又去打草，北大荒的草比人还高，秋天打的草，要烧一个冬。

口粮是玉米面和高粱米，每人每天 8 两；主要的菜是土豆，餐餐吃，令人倒胃口。不久，大饥荒又蔓延到黑龙江，在牢里，伙食定量几个月一减，后来连窝头也吃不饱，犯人们饿得受不了，就游泳越境，逃到苏联。结果人家也嫌麻烦，就一批批把逃犯装入麻袋，货物一般送回来。

东北滴水成冰，一次，父亲在零下 30 多度的的野地干活，有人瞅见他的鼻子惨白，立即推他进屋。幸亏进去及时，不然，鼻子就冻没了。这不是说笑，曾经有人耳朵被冻，一掰就下来了。父亲听说，常有犯人被活活冻死，也不倒下，就树干一样，笔直挺立，嘴巴还嘻着。

很难想象瘦弱的父亲是如何渡过这段饥寒交迫的时期，感谢主，熬到 1962 年，中苏关系正式破裂，政府又觉得把重刑犯放在修正主义的眼皮下不合适，决定把他们调回北京。象来时那样，专车专列，重兵押送，大伙又千里迢迢回关内。只不过，来时一件件加衣服，去时一件件脱衣服。

车到天津，2000 多名犯人就留下劳改，而父亲等 50 多位反革命中的危险份子，才重回北京严加看管。不管别人用怎样的目光看他，父亲都认为这是神的恩典，因为回到北京，家人能探监，伙食也比外地好些。比如在东北，父亲常常连野菜窝头也啃不上，只好吃糠窝头充饥，而北京监狱还能吃到白薯干。并且狱方为了减轻口粮负担，也一改不许家属送吃的传统惯例。

按当时的配给制，市民每人每月只有 2 两油、半斤肉、半斤点心。母亲把全家 8 口的点心票留下来，一大早去商店排长队，然后

在探监时给父亲送去。所以，虽然在困难时期，父亲的身体却得到了较好的保养。

1965年10月底，我去宁夏生产建设兵团前夕，又去监狱探望。父亲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18岁就出门在外，自己多保重吧。下农村很好，我过去传福音就在农村。接着他又问我对信仰有没有信心？我答有。他又问还会不会唱诗？我答会，诗篇23首我至今还记得熟。父亲象个孩子一般，点头直笑。

可世事难料，谁知我们父子俩见过这一面，要等14年后才能见下一面？

老威：你们这种家庭在中国是极罕见的。我坐过牢，我知道狱外的等候更难耐，更煎熬。若换个人，早家破人亡了。

袁福生：我们都知道，父亲在里面是为主作见证。

老威：我也在作见证，主知道吗？

袁福生：主是万能的，当然知道。

老威：但是我妻子与我离婚，我没有做丢脸的事，她却变了，在生存的重压下重新选择生活了。

袁福生：可您不孤独，失去女人，您也不孤独，因为在冥冥中，主在注视您，选择您，垂恩于您。您不会受到根本的伤害。就像我父亲，厄运中还结识了一个叫刘浩的好朋友，向他传道，让他靠近并最终信了神。

老威：是吗？那么狱中的警察如何看待宗教信仰？

袁福生：除了共产主义的任何信仰，在他们眼里都是封建迷信。巫婆神汉，会道门，一贯道，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他们统统一锅煮，不分何为迷信，何为真信仰。有一次，干部还拿一些破除迷信的小册子给大家学习，父亲说——我不属于迷信，我有真信仰。大家为他捏把汗，干部却好奇地问——你有真信仰？难道你是个和尚？父亲认真地说——我不是中国庙里的和尚，如果要算，也只能算洋和尚。不料干部一听，不仅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从此，“洋和尚”这个绰号就在北京监狱传开了。

老威：这个干部还挺豁达的。

袁福生：北京监狱的条件和干部素质都比外省好。但好境不长，1966 年，文革爆发了，因外头大抓反革命，牢里又人满为患。共产党为了稳定首都的革命形势，又把父亲等 2000 多名重刑犯迁往黑龙江。这次目的地是音河，同初到兴凯湖一样，犯人们烧砖，自己盖监狱，连吃的也照样是高粱米、黑土豆。到了年底，监狱里也搞起了文革，到处是““批臭”的大字报，父亲作为“帝国主义走狗”，在政治风潮中从音河农场转押齐齐哈尔监狱，接受严管。

所谓严管，就是天天组织学习，听完政治广播，还要发言、记录。父亲是个政治盲，虽然耳朵听着，心却完全不在那儿。有一次，他听了广播，随口发感慨道——这两天怎么没有刘少奇的消息了，难道他垮了？共产党内也存在党派之争吗？不料，这话说了没多久，就被打了小报告。监狱领导亲自调查，并且说父亲的思想问题很严重。

父亲先安静地站着，只回答是和不是，可当领导郑重其事地问——“袁相忱，你现在还相不相信你的上帝时”，父亲也郑重其事地回答——是的，我还相信。领导又问了两次，父亲还是答——我相信。领导气极败坏地指着父亲责骂——你是个顽固不化，反动透顶的反革命，你的问题不是通过学习讨论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严惩处。于是父亲被打入小号，禁闭反省。

老威：四川监狱也有小号，专门对付逃跑、打架、散布反动思想等严重违规行为。小号是犯人们最怕的地方。

袁福生：就是暗无天日的“狱中之狱”，长宽不足两米，没有窗，甚至没有透气孔，说白了，就是墓穴一般的地槽。父亲被押入小号前，裤腰带被抽掉，衣裤上所有的扣子都剪去，以防他在禁闭期吞扣子或利用裤带自杀。牢门哐当一关，就再也不开了。每日两顿饭，均有人定时从门下地面掏出的小方洞递入，俗称“喂狼狗”。

老威：没想到，四川和东北，文革和现在的小号都一样。

袁福生：小号又叫“一米屋”，犯人吃喝拉撒都在里面。父亲蹲了半年多，不见阳光，不能走动，没洗过手和脸，没换洗过身上

穿的衣服，更谈不上理发和洗澡了。每天，父亲除了躺和盘腿坐着，只能勉强弓腰站一会儿。

不仅如此，狱方还天天派人，透过门缝查看他是否按规定的姿势，挺直腰板坐在那儿反省。稍不留意，就要遭到体罚。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受罚入号的坏人一天比一天多。有时小号不够用，就塞两个人。父亲同好几个陌生犯人挤过，象比目鱼一般扁扁地侧卧，通宵睡不安稳。幸好同住的人出去得快，总把父亲剩下来。

半年多的禁闭，父亲毛发凌乱，浑身虱子，已经折磨得不成人形。由于长期坐着不动，他的小腿细如鸡脚，只有扶着墙才能勉强挪动，虱子成团往下滚，眼睛被阳光一照，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不仅同监犯人，连他自己也觉得这辈子残废了。可没想到，神又一次在他的身上施行了奇迹，他迅速康复，挺过来，没有留下后遗症。

老威：是的，那天我初见您父亲，真不敢相信他已经 90 岁了。头不白，气不喘，腰不弯，除了耳朵有一点背，似乎哪儿都没有毛病。

袁福生：父亲整 90，母亲 86，托主的福，都和谐，喜乐，是远近闻名的一对寿星。感谢主，如果 1966 年父亲不去东北，可能就死在文革中了。因为北京是风暴中心，东北监狱与之相比，斗争的力度只能算小儿科。

到了 1969 年春天，齐齐哈尔的监狱又暴满了，父亲和另外 1000 多犯人，又被转移到嫩江地区肇源县的革志监狱。这是一个更远的地方，父亲来这儿，第一件事还是盖房子，好让自己从帐篷里转进去。

老威：这是您父亲第几次自己为自己盖监狱？

袁福生：从兴凯湖始，他已经是第四次自盖监狱。

老威：这也算造物主特别的安排吧。

袁福生：父亲在革志监狱还遇见了老朋友吴慕迦，当年北京不肯参加三自的 11 个教会代表之一，后来因此被抓，判刑 15 年。父亲是在菜地里看见这个“同一战壕”的战友的，当时吴在另一块地里。由于狱中规定，劳动时不许互相说话，所以父亲灵机一动，就

唱一支属灵歌曲来同他打招呼——主不曾应许天色长蓝，人生的小路花香长蔓。

吴慕迦听到了歌声，果然抬头，注视着父亲，却又低下头去。父亲以为他会接着唱，可是他没有。父亲感到惊讶，因为吴不仅是老熟人，更是一个共患难的基督徒呀。直到后来，他通过接触才明白，吴已经放弃了信仰。这没办法，中国社会太让人绝望了。

老威：在《十字架》第二集里，我读到了您父亲那批老基督徒的苦难阅历，世俗政权越逼迫，他们殉教的意志越坚定。银川的以巴佛老人，坐牢多年，体弱多病，当狱方以“认罪服法”为由提前释放他时，他不肯；后来他被不由分说地释放了；再后来，他回监狱的要求被拒绝。他就在监狱的围墙外搭了间小房子，住进去，每周禁食五天，维持了 20 多年，以此平息主怒。他说——为什么要释放我？我没有认罪，因为信仰上帝不是罪。

还有上海的谢模善老人，被折磨得受不了，就在监室里站上凳子，想触电自杀。他在临终前祷告，请求神的宽恕——主啊，您让我去吧，我为什么要受这种苦呢？冥冥中，他似乎听见了神的回答——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一遍又一遍，谢模善重复着神的声音——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他啜泣着，满面泪水，就凭着这种支撑，他活了下来。

袁福生：是啊，父亲也没有想到他还能够活到今天，继续为主做工。父亲坐牢 21 年零 8 个月，有 16 年的光阴在黑龙江。他刚入狱时，皮包骨头，戴个眼镜，不仅自己，连家人都不相信他还会活着出来。一般情况下，无期徒刑以上的重刑罪犯有三个结果——一是上吊或投江，一死了之；二是疯掉；三是通过灵肉的熬磨，受到了神的特别看护。我的父亲正是被神选中的，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吃猪狗食，干牛马活，关小号，挨批斗，好多次都该没命了，但他却没生过病。在劳改中，父亲常干的活儿是担土，沉甸甸地压在肩上，必须直着腰，才不会在冻土冰面上栽跟头。天长地久的锻炼，令父亲受益，直到现在也腰不弯，气不喘。

1979 年 12 月 20 日，父亲收工吃午饭时，监狱领导进来宣读

公告——父亲被释放了。原来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已成为历史，邓小平上台，政策开始宽松了。父亲已 65 岁，改造了 20 年以上，刚好符合分批假释的条件。

父亲的假释《裁定书》编号为“79 刑清字第 655 号”，里面写着——对罪犯袁相忱予以假释，考验期限，从假释之日起，至一九八九年十月三日止。按刑法规定，剥权期不能离开居住地北京，还得向当地派出所定期汇报思想。

父亲拿到《假释证》后，就马不停蹄地回家。从监狱步行 3 公里到汽车站；再赶车到革志县城转最慢的普通列车，经黑、吉、辽三省，方能抵达北京。

而此时，全家人正沉浸在沮丧之中。因为不久前，大哥福音根据邓小平“拨乱反正”的政策，写信给法院，要求为父亲平反冤假错案。法院为此约大哥面谈，并且象审犯人一样说——你父亲的问题错综复杂，不能跟你说。他和王明道一样，是反革命集团首恶，不能平反。大哥辩驳说——我父亲的问题再复杂，也能讲清楚，要不你们凭什么判他的刑？刘少奇当初不也被判反革命吗？后来你们不也说弄错了吗？连国家主席都敢乱判，更何况其他人？法院的人一听这话，顿时面红耳赤——你父亲怎么能和国家主席比？人家判错了，你父亲就是没判错，以后你不用来了。说完就给大哥一张纸条，上写——袁福音，你的来信已收到。经复查认为：原我院（58）中刑字第 1013 号刑事判决，对袁相忱的定罪、量刑都是正确的。特此函告。落款是 1979 年 11 月 16 日，还有北京市中院的大红官印。

老威：那么，1 个多月后的 12 月 21 日，您父亲就被假释了。

袁福生：对，党的政策有时就象小孩的脸，说变就变。

老威：您们还不知道父亲要回家？

袁福生：知道，信和电报都收到了，全家人都去接人，但却错过了，归心似箭的父亲一出火车站，就直接搭夜班车回家，到了白塔寺，找不到庙门，他就一边绕着墙走，一边扯着喉咙喊“梁惠珍”。幸好大嫂在家，把第一次见面的公公领进门，打热水让他洗脸洗脚，

正在烫脚的时候，一家子就回来齐了。主的恩典太大了。

老威：关了哪么多年，您父亲能够适应社会吗？

袁福生：在生活上确实落伍了。监狱发给他 60 元遗返费，他还认为是笔大数目，要母亲收好。可在信仰上，他一如既往。本来 79 年以后，许多因宗教信仰坐牢的知名人士都获得平反，只要他们表态，相信三自，宗教局就既往不咎，安排工作，得工资，分房子，社会地位也直线上升，象吴慕迦，就在燕京神学院教书，生活优越。可父亲不仅不信三自，甚至觉得没必要平反，因为《圣经》里讲，基督徒不必要求申冤，申冤在我，要听凭主怒。

1980 年春天，我家的聚会就有近 10 人，几年后，聚会人数不断增加，已达两三百人，是北京地区人最多的家庭教会。白塔寺的家太小，里面坐不下，窄窄的胡同也挤满了人，连我们睡觉的床都拆了，放小凳子。我家什么都缺，就是《圣经》和凳子不缺，好几十只凳子都是信徒送的。而美国、香港，还有个叫“敞开的门”的组织，都找到我家，通过父亲，向那些拒绝三自的受迫害的人送《圣经》。父亲主张政府与教会要截然分开，神的归神，凯撒的归凯撒，因此，既然家庭教会不属于“人民团体”，所以不必登记。一直坚持了 16 年，仅管被多次抄家、骚扰，但信徒仍然成倍增加。

1989 年发生了六四大屠杀，那天晚上戒严后，满街满巷都是兵，不时能听见嗖嗖的枪响，可就这样，家庭聚会仍没中断。白塔寺的公车停了，我父亲凌晨五点钟起床，匆匆出门，赶了 30 多里地，到我姐姐家去传福音，谴责天安门事件，以主的名，安慰那些正在蒙难的人们。过后一想，真为他捏把汗，子弹不长眼睛，那时小老百姓谁敢出门呀，可父亲他，一个快 80 的倔老头，揣着《圣经》就走了。

警察每年都以“非法聚会”为由，威胁要抓父亲进去，教会的“聚聚散散”也与政治形势的敏感有关。像两会、六四、国庆或西方国家首脑来访期间，都是全天候监视，电话要么窃听，要么掐断，但每一次，父亲都顶在前头，对峙着。他经常大声对警察说——信徒要来我没办法，除非你把我家的门封上，把我带走，他们就不来

了。至于我个人，是信仰至上，国家的法律如果和我的信仰抵触，我只有顺从神。”

为了确保北京的安全，公安部门经常在一些重大日子，例如香港回归，克林顿访华，宗教、人权组织来访时，提前把父母接走，软禁在某个宾馆，不让他们与信徒在一块。

老威：与“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以及我的朋友刘晓波的待遇差不多。

袁福生：但是，父亲的行为不是对抗政府，而是要完成神的使命，拯救在中国的失散灵魂。一不靠势力，二不靠金钱，而是靠对主的信心，很难很难。感谢主通过父亲指明了这条道路，我们全家二三十口都信了。

老威：据说美国总统克林顿曾邀请您父亲参加有全世界各行业基督教领袖在场的每年 2 月的“早餐祈祷会”？

袁福生：是的，但父亲拒绝了邀请，原因之一是美国也邀请了三自的负责人，父亲与他们无话可说，更不愿和这些屈从权势，放弃信仰的人在同一个场合面对神。原因之二是美国政府也是政府，他不愿参加任何政府形式的宗教活动。原因之三是政府不给办护照。但根本的原因是——他向神祷告，心中始终没有感动要去参加——因为基督徒的头是基督而不是政府。

81　法轮功练习者曾氏

采访缘起：74 岁的曾氏是我早年文学上的引导者之一，为人正直，长于理性思索，她练上法轮功，实在令人震惊。于是在 2000 年 3 月 8 日，妇女节的下午，有了这次谈话。曾氏说，我是练功同行之外唯一的登门拜访者。她还提醒我出门当心长“尾巴”。真是风雨飘摇，世事难料。

老威：老人家，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练法轮功的？

曾氏：97 年底。那时你方伯伯刚刚去世，他活了 70 多岁，没过几天舒心日子，临终还摊上个肺癌。你想象不出一个人竟会受这种罪！一米七五的个头，就剩下一堆骨头架，轻飘飘的，连我这个虾米老太婆都抱得动。喘气要忍，咳嗽要忍，忍不了，轰轰出声，血就一口接一口朝上翻，手脚抽搐，把我都弄成血人了。唉，反右、四清、整风、文革，老方经历了数不清的政治风浪，已习惯了在厄运中苦撑苦熬，可这次，他几十年炼就的意志力彻底垮了。他控制不了自己，一再拔氧气管自杀。后来连护士都害怕，只有我死死地掰住他。注射大剂量吗啡，他会安静两小时。我感觉在似睡非睡之间，他眼缝里的红眼珠还在瞪我，瞪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的心在痛，老泪纵横，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我还以为泪都干了呢。咋会这种结果？清高、正直的老方咋会是这种结果呢？

50 年代到现在，文学界一直是一潭浑水，几代文人都在里面搅，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原来还指望“真理终将战胜谬误”，可后来，或左或右的运动多了，你才发觉，世道千年，甚至万年不变，总是风派人物吃香，吹牛拍马，卖友打小报告的吃香，管他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余任何党，中国人天生就喜欢这个。老方要做正人君子，没人拦，但渐渐就落得孤家寡人。平反恢复工作没几年，原来一起挨整的老朋友也疏远了。掌权的永远是掌权的，老方认了，只能成天呆在家，钻研《二十四史》。出差开会也躲，他不花国家的那种钱，大鱼大肉使他便秘。

终于熬到头了。我守了他半个月，偶尔女儿也进病房探望，她是诗人、作家，支过边，原来的作品还有真情实感，可现在，生活压力大，就埋名隐姓写烂电视剧，一集七千元，钱挣疯了，对临终父亲的安慰话也不地道，听起来像流行的台词。这不能怪孩子，我们这代人艰苦朴素，认死理，从物质上，没给下辈留下什么，所以她们就实用一些。过去整她爸的那批人，现在都在台上，照样拉帮结伙，一荣俱荣，一毁俱毁；因为在台上，所以就是我们宝贝女儿的朋友，一起搓通宵麻将，一起上电视谈些鸡零狗碎的休闲话题，这就叫“文化优势”，或叫“赢家通吃”。

老方去了，他坚守了一辈子个人道德，可最后连女儿也失去了。我空落落的，一个人在这大房子里转。墙上挂着老方的遗像，床头摆着年轻时代的像册，隆冬将至，就添几枝老方生前喜欢的腊梅花。这就是一个老编辑的退休生活：总是回忆、回忆；总是生病、生病；吃药、吃药。

大概有好几个月，我在家像幽灵一样，煮一锅饭吃好几天。老方的骨灰葬在龙泉驿他的老家。我老是梦见那公墓，像儿时的台阶，我坐在台阶上，感觉到处都是老方。楼下的老白，过去与我同一编辑部，退休了，渴望出名的年轻人也不登门拜访了，他就养花养猫，还写诗感叹“人不如猫”。这也叫一代老人的精神生活。

我的病越来越多，腰、腿、颈椎、心脏、血管、肾脏，轮翻折腾。这台老机器，医院有啥办法呢？换换这儿，补补那儿，维持下去：这就叫科学！老方就死于这种修理身体的科学。快崩溃了，修理不了，就打吗啡，那时医生的唯一作用就是止痛。我怕病，我不能像老方一样。在文化界没朋友，我就经常出门走走，街头巷尾，卖报补锅的，都凑过去谈几句话。

老威：你女儿与您住同一座大院，来去挺方便嘛。

曾氏：她与我楼对楼，可十天半月见不着面。几分钟的路，也打电话，给人感觉比北京还远。她在电话里总是说：“妈，请个保姆嘛。”这不是请不请保姆的问题，我还能动呢。

老威：于是您就练上法轮功了？

曾氏：有一天傍晚，我到《四川日报》后面散步，正好碰见几十个法轮功练习者，整整齐齐的几行，在一面墙前打坐。当时寒风刺骨，我身上穿毛衣、棉袄，外头还裹了件羽绒服，可仍把脖子朝里缩。练功的人中，中老年居多，他们居然都是运动服，脸色也比我红润多了。我曾经练过气功与太极剑，你方伯伯在世时，还嘲笑我，这么没耐性的两个人，咋能练成气功？果然，我练了半个多月，就坐不下去。不是没耐性，而是心不静。你想想，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自由、民主、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这些东西像变戏法，东一阵，西一阵，牵着我们的鼻子在时间里赛跑，最后，没人牵了，我们反而迷失了方向。真是见鬼了。不想则已，一想，或多想，就心烦意乱。而气功要求什么都不想，只靠一个意念，强制性收摄心神。这不行，至少我不行。幸好我没继续练气功，否则走火入魔，就糟了。说不定会跳起来，给自己一刀。太极剑的原理与气功大同小异，我练了一阵子，眼睛就动白内障手术，把剑带进病房，瞎头瞎脑地练，剑头差点刺着邻床病友的鼻子。不行不行，我与这些东西没缘分。

法轮功不一样，我不知不觉站了半个多小时，被一种氛围罩住了。这时，有位中年妇女从坐垫上站起，笑着招呼我“大姐”。我说我女儿和你一般大。她说没关系，大家都是亲姐妹，我早就在注意你了。我说练功不能有杂念，你这样当心走邪。她说大姐你是练过功的？却不晓得这法轮功与传统的任何气功都不一样，它不以消灭人的意念为目的，你尽可以带着自己的心事练功。我原来也与你差不多，死了丈夫，丢了饭碗，前途渺茫，心智一堵塞，就害病，下半身麻痹，几乎就起不来床。自从练上这功，老师就在我的下腹装了一个法轮，你看墙上那张图，那就是法轮静止的模样，它一旦转动，就 24 小时不停，哪怕你因为杂事缠身，没功夫来这儿，法轮一样带动着你，达到“法练人”。你看我，两年多没吃一颗药，病全好了。业力消了。

我问何为“业力”？她说是前世带给你的病根。消除病根，就叫“消业”。佛教叫“恶业”，又有“孽障”之说。法轮功吸取了佛教的循环论，也吸取了道与儒的优点，但去掉其被动的因素，达到

真正的“普渡众生”。不是来世，而是今生，业力在你体内，像许多虫子渐渐长大，分爬开去，啃嚼你的各个器官。再加上现实社会、环境污染、空气浑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尘土飞扬的环境更加糟糕。某一天，你突然病了，进医院，花了大把的钱，却不一定找得准病根。医院根据人体的表象，划分为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骨科、男性病科，五花八门，就像一群总是在外表忙碌的汽车修理工，油路、电路、方向盘、刹车、发动机，还有类似皮肤科的汽车美容。每个医生只负责把一部份弄得暂时不出问题就行了，他们不懂他们只解决了病的诱因，而诱因下面，是业力。外部环境每时每刻都在诱发业力，比如食物：洗衣粉馒头，工业油炸的麻花、油条，激素饲料催肥的猪，过量化肥弄出来的大米。我们的每一节肠子都是毒，早晨伸个懒腰，吸毒就开始了——空气中的粉尘。再比如电视：官僚假惺惺的笑脸，你无动于衷地听每天的谎言，也是毒。再比如车祸：发生得太频繁，只要没撞着自己，你就习惯性地围观一阵，然后走开——这种种日常生活都在增加你的业力，积累到一定的量，突然爆发——您的身体被摧垮了。没有医生明白，这是一个比他们有限的医疗知识漫长得多的演变过程。

老威：老人家，您的记忆力真惊人！

曾氏：练功之后，我把背了十多年的药罐子砸了，有点小病小灾，也从不吃药，身体顺其自然就好了。睡眠也足，饭量也增加。以前总想自己如何，业力缠身。

现在总想着别人，想着一道练功时的和睦场景。只要一声通知，哪怕凌晨五点钟，大家也随叫随到，从来没有一人迟到早退。

老威：自从 99 年 5 月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之后，法轮功被中共中央定性为“有组织的邪教”，您置身其中，是否认为李洪志在国外遥控这一事件？

曾氏：您这种口吻有问题，法轮功注重自身的修练，讲究“真、善、忍”，会“围攻”谁？一个围字，一个攻字，都违背了法轮功的起码准则。因为某市公安局抓了四十多名无辜的法轮功练习者，交涉无效，我们只有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上访。虽然大家聚

到一块，人数成千上万，但并没有闹事，只是边练功边等待上面的答复。我们找的是中央信访办，难道法律规定了“上访不超过多少人”吗？当然，如果有一定的自由生存空间，大家也犯不着上北京找衙门。可是，诺大的中国，除了共产党官方的信口雌黄，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法轮功评理的地方，上街游行犯法，贴大字报犯法，想来想去，除了“上访”，其它营救被捕者的行为都犯法。

我不明白法轮功到底邪在哪儿？它威胁了共产党么？它提出了颠覆政府的纲领么？如果是这样，我也不会参与。我一把老骨头，没几天活头，一心想的就是远离政治，消业，健康起来。尽天年，无疾而终就是福，这一点，同其它练习者没啥区别。文化层次的高低在世俗社会有用，在“法轮”的世界却无用。

人类的老龄化是全球性的问题，在西方国家，经济条件、人文环境、社会福利都跟得上，所以老年人的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至少是衣食无忧的。而在中国的现阶段，信仰崩溃，风雨飘摇，弱肉强食，人人都没安全感，老年人就更没安全感。在家里，与儿女有代沟，在社会上，被视为累赘和废物；病了，没有照顾不说，还看不起病。像我还能公费报销，而许多人，病了就拖，拖得不行，一查就是绝症。大病别提了，感冒稍微严重一点，进医院就是几百元。多如牛毛的医药公司派代表驻在各大医院，直接与医生、药剂师勾兑，让他们多给病人开病方，报销又贵又劣的产品，从中吃回扣。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下，法轮功以“功”代药，以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去抵抗侵蚀脆弱肌体的百病，当然对中老年人很有感召力。法轮功练习者的年龄大都在 50 岁以上，大家共同练功，同在一种“场”内，发生心灵感应，这不仅是老师的力量，更是同一法轮之下的互助的力量。

“真、善、忍”是人性中的三个点，互相呼应，形成稳定个人道德的三角形。个人道德稳定了，社会也就稳定了。从国家经济利益看，还节约了大量的医疗费用。

共产党的错误就是把不以任何东西为敌的法轮功树为敌人，把弱者视为敌人，他们只看见了练功者惊人地增加，几年之间，达数

千万之众。他们被这个数学吓住了，因为他们就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信奉“团结就是力量”。于是，除了在专制的旗帜下，在以某某为核心的强制性的“民族大团结”，其它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群，都必须是离心的，勾心斗角的，否则就是图谋不轨。这种丧失理性的唯我独尊恰好是邪教最显着的特点。这已经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从毛泽东开始，共产党口口声声说依靠人民，与人民打成一片，可实质上，他们除了强权什么也不相信。这也是中国传统，“抢得了江山是王，抢不了江山是贼”，所以失败者、弱者，构成这个社会基础的“沉默的大多数”，永远应该被利用、抛弃、践踏与蔑视，他们忘了在几千年前，圣哲老子就在《道德经》里讲，弱如水，弱如婴儿，婴儿是能最终强健的，而水无处不在，再厉害的拳头打下去，也伤不着水。

法轮功与共产党的关系就是水与拳头的关系。年轻力壮的警察，小伙子们，您们可以打我，把我这个弱不禁风的老年人推倒在地。我没事，我爬起来，法轮还在小腹里暖暖地转，我还在练，感谢您用拳头帮我消业、增功。您可以把我抓进监狱。世界就是大监狱，对于老年人，墙内墙外都一样，练功不择场地。您把我从北京遣送回来？感谢您，累着您啦——老师八岁时眼角多了点东西，是他师傅加在那儿的，叫“真、善、忍”，老师过了很久才悟出来。我 70 多岁了，却从警察的身形里看见了老师，看见了“真、善、忍”。

强者替弱者树立起了信仰，法轮功由一种消业的过程被外力超拔成具有世界性的弱者之道，也算是宿命吧。

老威：宿命？哪您承认法轮功是一种宗教了？

曾氏：法轮功是老师创立的，老师没这样宣称，我也不敢乱说。

老威：您这么崇拜李洪志？

曾氏：老师是开了天眼的，在他的身上，凝聚了宇宙万物的精华。

老威：老人家您是怎么啦？您们这代人，经历过反右、文革以及其它的政治运动，应该深知个人迷信给中国造成的灾难。

曾氏：老师是大慈大悲，老毛是大奸大恶。

老威：但就个人神化这一点，他们是一致的。请别打断我，在中国，一种绝对权威一旦树起来，就不容任何置疑，像“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像“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之类，都是一种形式或包装，它完全可以根据时代背景，转换成“凝聚了宇宙万物精华”的李洪志先生。在李氏自撰的著作《转法轮》里，作者追溯了“法轮功”的来历，声称从四岁开始，就接受了佛家独传大法第一代传人全觉法师的亲自传功，修练“真、善、忍”最高特性，这明显是一种文学创作。

接着的创作就是他先后跟着“隐形”和“显形”的佛家、道家、大道的师傅学上乘大法，具大神通。等到他决心“改编”法轮功时，十方世界里各门各派的二十多位上师全回来，参与了对法轮功每招每式的推敲、演练，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无法考证的，我只能说，这是李洪志先生的痴人说梦。老人家，您也相信梦话么？

曾氏：梦比现实更可信，这是一种超验。你是诗人，应该相信法轮功基本信条就是不打妄语，否则要遭天谴。共产党的无神论灭掉了“天”，灭掉了压在我们头上的茫茫的宇宙，使人除了怕俗世的权威、权势者，就啥都不怕。唯物主义使人心堕落，“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另一种说法就是“为教条、灭人欲”。而法轮功没有这种非此即彼的攻击性，没有“阶级斗争”，它的最高信条，就是“真、善、忍”，人类做到了，天下不就永远太平么？你不要问它的来历，我活了 70 多岁，回头去看，没有任何现实是摸得着抓得住的，一个接一个弥天大谎，每一天都在重复。

老威：我也有同感。

曾氏：80 年代，许多人读不懂你的《死城》，当时你说《死城》来源于儿时的经验，是一部个人精神史，没人能破译得了。例如“我是夜夜爆发惨笑的房间”。

我还与你争论，我说：“你夜夜都在惨笑么？你疯了么？”你回答：“是的。”

我说：“你妻子受得了？”——现在看起来，我那时对你的误解同你此刻对老师的误解一样幼稚可笑——你是认真的，在《死城》

里破译自我生命的密码；老师更是认真的，他破译了，却用平直的语言说出。

老毛的个人神化引发全民狂热，万众成了同一台战斗机器，而法轮功人数再多，也没有狂热，大家只是通过练习演绎老师的生命密码，祛病消炎。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比如“达摩面壁”，比如耶稣作为一个木匠，怎么能发明“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再比如摩西一个人圣山朝觐上帝，然后下山宣布“十戒”，等等。无神论者自己做不到，没经历过，就统统排斥，岂知天外有天，人的认识能力很有限。西藏人朝圣，一步一个长头，磕上千里路，途经传统的神山，还要加磕几倍的头。在他们看来，天是有灵魂的，具有法律的威力。他们的心灵匍匐在地，倾听神的声音。好的宗教，对人类是一种提升。我承认我在练习法轮功时，也企及了众多好的宗教，历史悠久的宗教。它们在演化发展中扬弃了血腥的，征服性的东西，保留了接近“真、善、忍”的本质。

老威：各种宗教都具有“超验”成分？那每个想象力丰富的作家都可以成为李洪志，创立某种功法？

曾氏：你能对人类有益，与上千万的人心相通么？如果能，也未尝不可。

老威：老人家，您的确到了“人心皆佛”的境界。不过我还是对“法轮功”包医百病心存疑惑，这一段时间，国内舆论都在揭露法轮功受害者的死伤事件，各地加起来还不少。有的人财两空，就疯掉了；有的癌症患者，一练上功，就拒服任何药，结果很快就不行。

曾氏：世界上没一种东西是包医百病的，你本来就病入膏肓，作为补救，练功可以延缓病情，但把所有死、伤、疯事件都归罪于法轮功，却是共产党一贯的宣传手法。比如文革要打倒刘少奇，就把从古到今的所有屎盆子都朝他头上扣。我敢说，医院治死的人绝对比练功死掉的人多得多。

退一万步，就算有人因练功出了问题，但他在练功者中感受到的关怀与爱心绝对比医院，比其它场合要多。过去有练功点，大家

在一块息息相通，如今共产党破了这个“场”，一些人心理脆弱，抗不住，但多数会挺过去。

老威：我也纳闷，以中老年为主体的法轮功咋这么顽强？

曾氏：对于我来讲，过去是练功，现在却是招魂。这是一种仪式，不信，你学我的样子，站或坐都可以，把手心向上，双臂抬起…我不再感到孤独，时间流逝着，从里到外，法轮嗡嗡地转。我就是地老天荒，假如一种来势汹汹的邪教把世界上所有文明都摧毁，剩下的就是地老天荒。我站在这儿，为自己，为亲人，为死去的，为我不认识的人叫魂。”你不要到东方去，你不要到西方去……”回到躯壳里内心里。屈原招魂练过法轮功，不过他不知道，因为两千年后，上天通过老师的喉咙才命名了这种末日的招魂神功。中国人怕强权怕了多少年？上有老下有小，还有工资和领导。可这群无神的世俗的百姓，一旦做了这个练功的姿式，就什么都不怕，就敢站在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以自我为中心。中国人是有这个传统的，有个叫孔飞力的美国人写了本书：《叫魂》。叙述了干隆年间，民间流传的剪人毛发，施以符咒的巫术。据说中了这种巫术的人，就“失了魂”，最终将害病死去。这个传说从浙江萧山开始，像瘟疫一样蔓延，引起了全社会的恐慌，因此干隆皇帝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叫魂”巫术。

我要特别说明：法轮功驱病叫魂，但不是巫术。这个民族“失魂”太久，今天，魂通过法轮功回来了，哪怕监狱，也只关得了身体。魂是自由的，伤不了，你就是砍了我的手，我心里，意念里，还在练功，还在忘我地向天祈祷。

82　农民皇帝曾应龙

采访缘起：1993 年大年初七，我在四川东北部的大巴山中的一座省级监狱里，拜访了 48 岁的农民皇帝曾应龙。

大墙之下，“天子”已秃顶，但斗鸡眼中的烁烁神光依旧。他脚登解放牌胶鞋，身着劳改犯特有的蓝色短袄，袖手对我滔滔不绝地发了两个钟头的“口谕”。这是我降临人世以来，闻所未闻的宏论，但愿读者诸君看这篇采访，不要以为我在编稀奇故事。

曾应龙犯了组织、领导、颠覆等多项反革命罪，政府念其愚昧，从轻判处无期徒刑。他性情乐观，服从管理，警察和犯人们都对其印象较好，经常戏称“陛下”。

我被“恩准”向陛下赞助人民币 50 元，资助他读四川函授大学。

老威：您就是这座监狱鼎鼎大名的土皇帝？

曾应龙：应该叫陛下。

老威：好吧，陛下，您是什么时候称帝的？

曾应龙：不是朕想称帝，是朕的十万臣民拥戴朕登基的。大约十年前，在乌江中游的观音岩，爬上来一条娃娃鱼，这牲畜会说人话，而且总在月明之夜，从岩里向外唱一首童谣，什么“假龙沉，真龙升；河之南，降太平”。

后来，连三岁小孩都会唱了，于是这歌谣经过许多小孩的口传遍了九村十八沟，有位好奇的人叫马兴，是当地的风水先生，一天夜里，他带着一拨村民跟踪歌声，在“观音”的嘴里找到娃娃鱼，那牲畜见人不但不逃跑，反而啪啪扑打着尾巴，像迫不及待地欢迎人来。马兴捡起它，从它的嘴巴当众挖出三尺黄绫，正是那首童谣，而在鱼肚皮上，刻着“大有”二字。其时皓月当空，马兴出洞，望月冥思片刻，突然对天地三拜九叩，向大家举鱼布告玉皇大帝的诏示。

朕事先并不知道娃娃鱼的事，计划生育闹得厉害，乡干部隔三过五带着医生，挨门挨户地查超生子女，查出来要罚款，装在肚皮里的要拿掉，还号召育龄内男女都去结扎、安环。朕有两个丫头，还想要个龙子，就同村里许多人一样，悄悄带着没出怀的婆娘外出打工，在新疆搞建筑七个月，果然天遂人愿，有了龙子，按辈份取名延泽。联不敢回乡，就领着妻儿到了河南，在新乡落脚。可还是让马兴冶算出来了。所谓“真龙升”，正暗合“曾应龙”这个姓名，“河之南”即河南，也有坐北朝南的意思，那么“新乡”这个地名正是新天子藏身之地。乌兴领着一班臣民，千里迎驾，见着朕就取出龙袍加之，纳头便拜，山呼万岁。朕却之不恭，只好顺应天命，回乡称帝，国号“大有”，改公元 1985 年为太平元年。

老威：“大有”的含意是什么？

曾应龙：大有者，你有，我有，大家有也。朕登基下的立国御旨“有地大家种，有钱大家花，娃儿随便生”，已在臣民中广为传颂。

老威：陛下的疆土有多大？

曾应龙：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朕实际管辖的也就是湘、贵、川交界，有三县之地。宰相牛大全在立国之际，专门组织人丈量土地，绘制成地图，送达四川成都国，湖南长沙国和北京国政府。

老威：说句不客气的话，陛下的这个大有国完全是从史书里照搬来的，包括童谣、娃娃鱼显灵、河南迎驾等细节都是陛下与大臣事先密谋的结果，真没想到，时过境迁，您老人家还在做皇帝梦。

曾应龙：放肆！朕知道你是四川成都国来的什么记者，又同狱方混得颇熟。但朕有权拒绝你的采访。

老威：我不是记者，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民情研究者。如果陛下这次不愿同我开诚布公地交谈，恐怕以后就再难有机会让人了解您和您的“国家”。据我观察，您读过不少古籍，您知书达理，素怀鸿鹄之志，虽然这种远大志向有点过头，您不想永远成为世人的笑柄吧？

曾应龙：成王败寇，有什么值得笑的！您能保证如实地记录朕

的口谕吗？

老威：当然，陛下。我保证。

曾应龙：话说太尉马兴、宰相牛大全等一班臣民迎驾回乡后，向朕奏请起事步骤和时机，马兴认为，大有国地理偏僻，人烟稀少；乡民们受祖宗规矩的约束，传宗接代的旧意识根深蒂固，计划生育政策在这儿难以推行。更由于一些乡干部的粗暴作风，激起了人们的普遍反感。婆娘们宁愿钻山洞、吃野菜、喝泉水，过野人的生活，也不愿做人流。这种害怕断子绝孙的普遍民情是能够利用的。牛大全认为，应该让大有国的开国大臣们深人民间，在老百姓中宣传生娃儿的权利是天地祖宗给的，当然是生得越多越好，虽然养娃苦一点，但人穷惯了，苦惯了，养一个和养七个、八个也差不多，多一个娃儿就多一份盼头，谁要是连咱的盼头都要灭掉，就应该同他干。经过半年多的发动群众，大有国的基础就打好了。于是朕连续颁发几道痛斥计划生育为妖术的秘密诏书，号召大有国臣民敞开生，谁要生养十个娃以上，朕就赐封为“诰命夫人”。

正当其时，曾家沟的百岁长老去世了。在山里，百岁老人的仙逝是方圆百里的头等大事，许多人老远赶来参加送葬。风水先生作为贵宾被请到，他翻山越岭，忙乎了两天，终于期寻到一处向阳的风水宝地。逝者灵柩停了三七二十一天。请外山的和尚念经做道场，方选定出瘊日。

按马兴的计算，必须要在太阳刚露头时落下棺材，百岁长老的香火才会同旭日一般，永远上升。于是一千多人的送葬队伍半夜就吹吹打打地起身了，大有国的开国臣民一百多人也混在里面，普天之下都是逝者的孝子，朕在这时也不能免俗。大家认为如果能借百年之尸·还魂立国，无疑是天赐的吉兆。绕着山梁盘桓而上的长蛇阵壮观极了，连星星也暗然失色，并且越朝上，越辩不清哪是星星，哪是火把和人群。牛大全奏道：“陛下，这一切都来自天国呀。”

于是跟着朕一道加入嚎丧的队伍。领头哪个家伙嗓音特别亮，他颂一句，上千人就合一句，把山震得嗡嗡直响：“走哇走哇/不要歇气哇/不要抬头哇/到天河上游/去投胎哇/二十年后你又来哇/娶

个大姑娘/日牝又下崽哇……”

老威：您老人家还挺有诗意的。

曾应龙：好戏还没开场呢。下葬的时辰到了，太尉马兴义率领十几位禁卫军迎着刚露头的日头跳神，许多人不由自主地跟着跳起来。宰相牛大全趁机亮出膀子，祭起大有国的龙旗，跺几跺，摇几摇，接着从怀里掏出一把豌豆，扬手一抛，连叫几声“变”；人们都弯腰去捡那些人土的神豆，不提防乌云从山涧底阵阵涌起，一会就遮住了太阳，霎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似有十万天兵天将杀向人间。

老威：这就叫“撒豆成兵”的把戏了。

曾应龙：你还懂点行。众人被暴雨浇得鬼哭狼嚎，纷纷下施恳求牛宰相收了法术，朕自然准奏。雨过天晴之际，臣民们完成葬仪，随朕下山，一路竖起招兵旗，四方乡民纷纷投靠，十几天聚了数万之众。

老威：什么数万之众？您的判决书我看过了，也就不过几千受你们愚弄的群众。

曾应龙：君王无戏言。朕还亲率御林军攻人县城，占领了县医院，赶跑院长，将所有的避孕妖物搜出，在院子里堆成小山，点火焚毁。这一惊世壮举，相当于林则徐虎门销烟。万众欢呼雷动，于是牛宰相马太尉率文武两班大臣，着蟒袍持玉笏，依次上朝，行君臣之礼。

老威：听说陛下还拥有三宫六院，共四十名嫔妃？

曾应龙：那都是牛、马二位爱卿做的好事！朕曾下诏辞退，说创国伊始，百废待举，天子理应与众臣民同甘共苦，岂有功未成，先思淫欲的理！可众卿苦苦相劝，言从古至今，天子都是三宫六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陛下不′承淫欲的精神值得万世景仰，但这排场是不能不讲的！

老威：陛下的嫔妃都是哪儿选来的？

曾应龙：县医院的女护士都人选了，其它就是文武大臣的公主，

但朕日理万机，连一起厮守了半辈子的皇后也无暇宠幸，哪顾得上嫔妃！

老威：陛下的朝廷也太腐败了，满朝都是皇亲国戚。我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把皇宫选在医院了。一是女人多，二是大有国的乌合之众根本就攻不下县政府。

曾应龙：朕一心记着攻医院烧避孕妖物，召唤民心，把政府和公安局全忘了。后来，解放军包围了医院，朕亲率御林军迎战，不幸被虏，而马太尉却押着后宫嫔妃，投荷花池自尽殉国，可惜池水太浅，淹不了人。马卿一时兴起，竟舞起大刀片子，斩了两个嫔妃的头，唉，亡国之痛，没齿难忘啊！

老威：马太尉和牛宰相不是会撒豆成兵吗？他们的法术到哪儿去了？

曾应龙：牛卿祭起大有龙旗，正要作法，肚子就挨了一枪。好个牛卿，大吼一声，又向前冲了几丈远，可还是倒下了。

老威：陛下的朝廷也覆灭得太快了！

曾应龙：天命也，非战之罪也！马太尉拖了命债，被判处死刑。朕与牛卿等一干大臣均身负重罪人狱。朕就是不服北京国的法！你想想，朕祖祖辈辈的骨头都埋在这地方，朕的族谱能够上溯至宋，一千多年啊，朕还不应该承接风水，建立大有国么？北京国管辖的地盘那么大，且四方八面都要朝贺，还缺一个小小的大有国么？吾国贫穷，就是因为五谷不丰，人丁不旺，计划生育一旦落实到户，朕愧对列祖列宗呀！再说，既使要结扎、安环，做手术，也得通过朕下诏，哪有外国人跑到本国来推行他们的政策的？

老威：陛下说谁是外国？

曾应龙：吾国之外都是外国。

老威：那我也是外国人了？

曾应龙：然也。国与国无论大小，都该平等相处，互派大使，互通关贸，试问如果吾国硬要到你国去推行“娃儿随便生”的政策，你国能接受吗？

老威：这就是陛下申诉多年的理由？

曾应龙：然也。

老威：陛下的朝廷也太小了，如果都像您这么干，那全中国至少有几万个皇帝要登基。您大约已劳动教养了十几年了，人民政府对您怎么样？

曾应龙：朕学过医，大队就安排朕做了卫生员，也算广施龙恩。朕每天也读报，晓得外面每天都要发生许多大事，而大有国相对封闭、落后，许多年也没有报上一天朕大事多，朕要在监狱里勤学习，争取能早日减刑出去，造福于本国臣民。

老威：还想称帝？

曾应龙：穷不能立国，这是教训啊！所以说，要挖穷根，奔富裕，首先就要学习文化和科技。朕过去潜心钻研古藉，忽视了本土本乡之外的时代变化，入狱后，朕反而在高墙之内开阔了视野，还报考了函大。

老威：皇上读函授大学？这倒是新鲜事。听说陛下为上学之事还下诏给监狱长和政委，称他们为"黄、王二大臣"？

曾应龙：读函大需要钱，朕的用意是在表彰黄、王二位管理监狱有功的同时，向狱方征集几百元学费，不料朕的苦心被误解。大队长亲临监舍，把朕好一顿训斥！

老威：皇后来探过监吗？

曾应龙：朕已将她贬为庶人。

老威：这么说您离婚了。儿女改姓了么？

曾应龙：一言难尽。朕的心情不好，不想再谈下去了。

老威：但愿我能拉到赞助，支持陛下学完函大。祝君健康。

83　遗体整容师张道陵

采访缘起：成都的殡仪馆在东边的群众路，我曾在里面诀别过一位诗人。殡仪馆的墙外，有一座规模不小的破茶馆，生意兴隆，百分之八十的茶客都是老年人。据说有一次，一位老太太因打麻将输钱太惨，高血压上来，身子却到了桌下，来不及送医院，就直接入殡仪馆停尸间排队了。

我就是在这里认识 66 岁的张道陵先生的。他曾是川东某县殡仪馆的资深遗体整容师，1993 年迁居来蓉。1995 年 9 月 30 日下午，秋意已浓，我在与张先生交往了半年之后，完成了这次非正式的采访。

其时斜阳红了半边天，我出了茶馆，迎头撞见送灵车队堵塞了巷头。而同一条小街的另一端美女如云，轻歌曼舞，令人想起唐代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的诗境。原来是四川音乐学院，四川川剧学校及舞蹈学校正在积极排练，准备迎接全国性的文艺调演。

牙齿已缺的张先生执意告别哀乐，去凑年轻人的热闹，我谢绝了。

老威：张师傅，你做这个工作有多久了？

张道陵：近四十年，该退休了。我是这个殡仪馆的首批职工，57 年美专刚毕业，就来了。当时正反右，如不服从组织分配，就极可能成右倾。那阵馆里挺清闲，还不到十个人，一个月才烧几具尸，还包括无主的。虽然中央大力倡导火葬，毛主席、朱委员长、刘主席、周总理等都在“实行火葬，移风易俗”和为科学捐献遗体的志愿书上带头签字，但土葬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要改变很难。我在馆里派不上用场，领导就指定我负责墙报。好在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我的专长得到了充分发挥。

老威：这同你的职业没关系。

张道陵：政治挂帅是时代潮流，政治是全国人民共同的第一职

业。58 年大炼钢铁最火的时候，群众竟上门建议把焚尸炉改造铸钢炉，说反正你们一年也烧不了几具尸，还不如多炼钢铁为“超英赶美”作贡献。馆长解释说，两种炉子的设计不一样，群众不相信，认为炼人和钢是一回事，就以反对大跃进为罪名，把馆长抓起来，还抢着向馆里运矿石和焦炭，幸好县委书记亲自赶来，才说服大伙，并应允在院里建土法上马的小高炉。这下殡仪馆热闹了，人没烧，废铁倒炼出不少。我在人山人海中瞎忙乎，与我现在的老婆对上象了，她是共青团员，当时早忘记我是干遗体整容的。

老威：这行道什么时候热闹起来的？

张道陵：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这个县饿死了好几万人，别说埋，就棺材也做不赢，只能裹一床草席朝这儿送。60 年下半年，我们就忙不赢，开始加夜班了，那时不像现在，电纽一按，就自动传送、关闸、焚烧出骨灰。那时烧死人是力气活儿，抱着朝里送，有时电刀跳闸，火苗子提前冲起来，还熏你个大黑脸，再加死者亲属在外面哭哭啼啼，使你觉得自己是刽子手。

老威：你不是美容师吗？怎么也做炉前工作？

张道陵：都是饿死鬼，美什么容呀。开始，我还把吐出来的舌头送回嘴里，塞进一砣棉花让腮帮子鼓起来，后来就什么顾不上了，你感觉那是一捆接一捆的柴禾就行了。到了 61 年春天，青黄不接，成百上千的人满山遍野地转悠，捡到什么都朝嘴里填。树皮、草根、野菜、甚至昆虫。当然，荒山秃岭的，能捡到什么好东西。有的人在山上转着转着，就卜地栽倒，永远起不来了。我们把县里配备的收尸卡车停在山脚公路边，等基干民兵押着一串串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上坡捡尸。五类分子也饿得不行，不发馒头就把脑袋一抱，身子一缩，任你枪托怎么乱捣也不上。于是，我们支书发明了抛尸法，即用一根长绳连好几具尸体，利用互相之间的牵引力，转翻朝下面抛，果然省了不少力气。

老威：你们没挨饿？

张道陵：基本的口粮还是能保证，但肚皮稍大点就勉强了。县里特别重视我们这种单位，人与炉子都不能出故障。到了 62 年初，

人吃人的现象终于出现了，从山上运回的尸首，大都肢离破碎，大腿、膀子、肩背和屁股的肉都被卸去了，领导指示尽快处理掉。那时民兵昼伏夜出，也抓了几个吃人狂，判了刑。你猜他们吃人的理由是什么？不是因为人肉香，而是因为糠馍馍和观音土积在体内，下腹坠胀，拉不出屎，需要人肉润肠。

老威：你还真挺过来了，我 62 年害过浮肿病，差点死，所以我特别怕饿。那时我爸是干部，悄悄把口粮省回家里，自己在外面混吃混喝。他的中山装上口袋里，并排着两支钢笔，一支汤匙，只要见谁端碗，就笑嘻嘻地把汤匙戳进去尝味道。他眼睛尖，别人又躲不开他，于是给他取了个浑名叫“雷达科长”。

张道陵：你爸爸挺不容易的。

老威：我们不谈这个话题吧，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后来怎么样，你的专业荒废了吗？

张道陵：后来殡仪馆扩建了，增加了专门的追悼会堂，会堂的侧门进去，就是遗体整容室。自然灾害一过，苏修也卡不成咱的脖子了，殡葬工作也进入了正轨。当年，整容也得分挡次，文化高的，比较有钱的，要求自然就高；像普通的人，连追悼会也免了，就举行个遗体告别仪式，那么整容的程序就简化到洗洗脸，梳梳头，朝口腔内填棉花，再涂抹点胭脂了事。

老威：这么简单？

张道陵：我不是说了么，要因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而言。完全的整容要先把尸体里里外外洗个透，喷专门防腐的香水，再换新衣、理发。还得一点点按摩皮肤的裸露部分，从额头、双颊、嘴唇、脖子到双手，都要反复弄遍，直到“起死回生”，使皮肤像活人一般富有弹性，再抹上一层油，使之富有光泽；接着才是化妆美容，节奏要不紧不慢。颜色要搭配得当，眉尾、嘴角、鼻翼都挺重要但关键还是眼睛，能否给人以安详睡去的感觉。你想，一般人死了，要在家里停放两、三天，搭设灵堂祭奠，送到殡仪馆时，肢体僵硬，双颊凹陷，脸色青灰，天气炎热之际，还会有异味。这时如果家属要求举行个仪式，要化妆整容，难度就比较大。因此，干这一行，

生理、心理都要特别健康，要像医生做解剖，久而不知其身在何处，你要让一个龇牙咧嘴的凶死者逐渐恢复常态，要让他微笑起来。

老威：这是勇敢者的事业。

张道陵：谈不上勇敢，这是训练的过程，弄不好，重新来就是，熟能生巧嘛。许多作家都写过停尸房的故事，我在这呆了这么些年，那有什么故事、鬼怪！文革当中，有人想吓唬我，就趁夜把我整过容的尸体扛出来，立在执班室前。待我半夜出门上厕所，那玩意就嗡地一下扑过来，与我啃了个嘴对嘴。我当时吓懵了，幸好是自己熟悉的东西，才没信邪。我扶住尸体打了两耳光，又把它扛回去锁好。我其它倒没什么感觉，就是满嘴的福尔马林味，害得我漱口刷牙一阵忙乎。

老威：我头皮都发麻了，你还好像没事似的。

张道陵：我天生就是做这个的材料。文革武斗当中，这儿也是够热闹的，三天两头，有裹着红旗的尸体送进来，红卫兵拿枪逼着我为他们的战友整容。有的尸体一下池子，水就成了殷红色。捞上来，把身上钢钎捅的眼用橡皮膏一贴，再换军装。有个红卫兵头头，大约是被对手当胸一刺刀，死了还咬牙切齿，眼瞪出了眼眶之外，我按了半晌不进去，只好用大号夹子把眼皮封住定型。而那嘴巴更闭得比城门还紧，我用改刀撬不开，就使出开口器，把大牙都给他顶裂了。

老威：你成钳工了。

张道陵：可不。我这钳工却差点被那鸟嘴给熏昏了。我拿牙刷一挑，一窝蛆滚了出来，原来舌头烂掉了。我急忙冲出去呼吸新鲜空气，最后才回来仔细给它刷牙，我一壶接一壶朝里面灌防腐剂，这那是整容，我在洗厕所呢。我耗了一下午，那张愤怒的面孔终于浮现出大家所熟悉的微笑。红卫兵们被我的认真劲感动了，硬把红袖章给我套上，在喊了几句“向工人阶级学习”之后，还把我发展成组织成员。

老威：我也很感动。但大凡上殡仪馆来的死者亲属，几乎都沉浸在生离死别的悲恸中，极少有人能想起你这种“化腐朽为神奇”

的魔术师，报上也很少宣传，似乎你们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生活。

张道陵：没意思。哪怕收入再高，哪怕记者们拿出捧明星的力气，也没人会羡慕这个岗位。去年我新买了商品房，迁居，换了环境，同旧的邻居，从小熟悉的一切都断了关系。现在外头没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也别拿着我的真名实姓乱嚷嚷，否则我会找你打官司。

老威：有这么严重吗？那我隐去你的真名和工作单位可以吧？

张道陵：可以，没关系就行。有一回，我儿子的女友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我干这个买卖，死活不愿再上家里来。据说她害怕得拼命洗同我握过的右手。好在我儿孝顺，懂得一家人全靠老爸的工资支撑，就没同我闹别扭。唉，每个人都要死，但每个人活着的时候，都不会想到或本能地避开死。这我理解，因为就在我自己整理遗体时，也忽略了死，而只想到工作。

老威：这么说你是超越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过着一种社会边缘人的生活？我曾在一部香港电影中，看过这么一个情节：一个守停尸房的老人醉酒之际，就数不清有多少具尸了，结果被一只死人手打了一巴掌。

张道陵：我不喜欢有关死人的电影，还是喜剧片好，笑一笑，十年少。我真正对死者动感情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小女孩遭车祸，送到这儿来时，半个脑袋都没了。我抚摸着她的小身子，感到心里挺酸的。我赶走洗尸工，还原她那可爱的小模样，用硅胶把那淘空了后脑勺填满，再把药水处理过的头皮整个蒙上去。我一根根地清理她的头发，扎了粗粗的马尾巴独辫，粉和胭脂淡淡地涂上后，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家伙光彩照人冲我笑。我还给她刷了法国的睫毛油，使那眼睛深邃得不见底。我着迷地工作，连领导敲门也没听见。你猜，我这样费尽心血创作艺术品，结合怎样？

老威：我不敢设想。

张道陵：灵堂里所有的人，都抱着这可爱的小天使，又哭又亲。我躲在一边，我不敢奢望有人想起我，给我递一杯水。我只暗暗祈

祷上苍，让我的创造物留得长一些，至少再留一夜，让我独自再多看几眼，给她献点花和玩具。然而，她却那么快地进了焚尸炉！我离开她才一个小时！美是必然要毁灭的。

老威：你别伤感，张师傅。美通过死亡在你心里留下了印迹，这种印迹是不可毁灭的。世上没有几人能从死里读出美好的事物来。现在，你把这种感觉传达给了我，我们在为美的灭亡惋惜之际，它就永恒了。

张道陵：你是作家吧，这么会讲话。

老威：我说的是实话。历史上有许多无法追寻的东西，但你认定它们肯定存在过。就如霸王别姬的瞬间，你只记住了霸王穷途而歌，虞姬起舞自刎的场景，你把这种千古绝响孤悬起来，不断地赋予它新的想象、新的意义、虞姬—— 一个无法言说的绝美毁灭了，就像你的那个小姑娘——当然，这与世俗社会没多大关系。

张道陵：但是我老了，眼睛和手都不太准确了。我虽然不太懂你的话，可知道你是在夸我，从来没人用这么些中听而又迷迷糊糊的字眼来夸我。现在做遗体整容这一行很难。许多人不愿做，即使愿做的年轻人，也是看在挣钱多的份上。我的心劲已耗光了，退休后又干什么呢？我不会下棋打牌，聊天也不会，我满肚子都是死人话题，也没人听。

老威：你可以养养猫狗，钓钓鱼什么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玩法。

张道陵：我害怕与谁建立感情，猫狗也一样。一旦处久了，有一天它们要永远离开你了，你就会难过。那么多好人，漂亮的人都死去了，尽管我竭尽全力为他们化妆，恢复一种短暂的假象。我再不愿失去什么。人最可怕的不是死，而是不断地丢失东西，上了一定的岁数，你环视四周，会发觉已丢不起了。

我的老上级，这个馆的第一任书记年初死了，还没满 70 岁，是我为他整的容。这人平生就一个嗜好，年轻时收集结婚请柬，50 岁以后，就改为收集讣告，整整一间屋全是那玩意。据他讲，中国人的想象特别贫乏，连讣告也是翻来覆去那几句，文章格式也就一

两种，因此这种东西从古至今都不值钱。

老威：这是个怪人。

张道陵：不错，更怪的是他自己为自己写了一份讣告，在生前悄悄印了几百份，同遗嘱存款折子锁在一块。死后，这讣告无法寄，因为谁也看不懂。

老威：什么体裁的？我想应该是古代吊唁的哀词吧？

张道陵：也许是。反正全是四言八句，有一半的生字我不认识。文中还标满了抑扬顿挫的符号，大约他老先生自己念过几百遍了。可惜，他作不了主，讣告还得组织上研究、定调、写成公文散发。

老威：张师傅，你还是自己捉摸一套玩法，把心情放轻松些。我觉得钓鱼挺适合老年人，我家里有一套轻便的鱼竿，放在那里不用，已生锈了，下次我给你带来？

张道陵：小时候钓鱼还差不多，那时削一根竿子，自己装线设钩，到任何一个河沟边坐上半天，至少也要弄十几条。现在河沟全干涸了，稍大一点的河也污染严重，造纸厂的泡沫一泻千里，别说鱼虾活不下去，连人的健康也受影响。

老威：你可以到公园里去钓，反正娱乐嘛。

张道陵：没意思，别人养着鱼，让你去钓，太没意思了。我看，退休后实在闲得无聊，我还回殡仪馆当个化妆顾问吧。

84　胡风牢友张广天

采访缘起：认识 63 岁的张广天纯属意外，但一回生，两回熟，幸好我在四川东北部某县的一个社会福利机构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否则就不会知道胡风曾有这么一个贼眉鼠眼的“牢友”。1992 年隆冬的这次谈话有些随意，逮着什么说什么，同心理医生的路数相似。张广天太不像话了，对历史，对大文化人，居然不晓得敬畏，这大约是受转型期大众趣味的影响吧。所以，严肃的胡风研究者应该对这篇东西持批判态度。

老威：你认识胡风吧？

张广天：这些年已经有好几拨人打听过他的情况，是通过领导找来的，我不谈也得谈。今天你私下约我，是啥意思？你肯出点儿血么？三百块咋样？那么大的名人才值三百块。如今市场经济，我工资低，没办法。

老威：没办法？老张，你可是这里面响当当的人物。在监狱进进出出，顺带替犯人交封信，捎点熟食，还有港台的光屁股美女明信片。你的油水大了。

张广天：还是内盘？不过，我现在是自由公民，你管得了么。我坐了 20 多年牢，又留监当了十来年工人，这辈子，监狱就是我的家。我在自己家里弄些小买卖，犯逑法。

老威：里面有台湾间谍，你也替他传信？

张广天：我比警察更了解犯人。有的警察还是我看着长大的，几寸高，就晓得在我这儿要烟抽。当然啰，监规一条条订在那儿，该不该执行？该。但是劳改场所不是中转站，犯人进来，一住十几年，咋熬的？叫化子打手虫，穷欢呗。

老威：莫扯远了。我付一百元。

张广天：你太抠了。

老威：这不算正式采访。老张，你晓不晓得，在监狱图书室有

胡风的专柜？胡风夫人、胡风集团成员的种种回忆文章自不必说，还有他老先生的作品集，包括那封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倒霉的三十万言书。这十几年，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有关胡风案件的文章，至少几百篇，我若真要搞研究，直接查资料就完了。找你嘛，不外乎就是吹吹闲牛。

张广天：你倒是个爽快人。好，那一百元收下了，就摆摆龙门阵。你不能记录，我搜搜身，没录音机吧？失过脚的人，防人之心不可无，否则会影响我的饭碗。现在讲胡风，他坐牢的名字叫张光人，开玩笑时，大伙就喊“张光棍”。当时谁也没想到，他居然是我们这儿名气最大的犯人。当然，这儿也关过刘吉挺、张西挺两口子，四川省革委副主任；还关过二、三十个造反派头头。

重庆八·一五的造反司令黄廉，至今还在一队当卫生员，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场上练出来的顽固劲，牢坐了近 20 年，还保持着从毛主席他老人家那儿学来的读书做眉批的良好习惯。黄廉讲得最多的故事，就是他指挥手下把军舰开入长江口，向据守朝天门码头的“反到底”示威，结果码头上打炮，击中了军舰旁边的运猪船，猪满江逃窜，重庆人民因此断了一个月一人半斤的供应肉。

老威：张光人咋样了？

张广天：我又扯远了。张光人长得牛高马大，比所有犯人都高一头。他是七几年从雅安苗溪茶场转来的，到底哪一年记不清了，大约是冬天。这座监狱很大，从大门进来，是干部的家属区；再过一道岗哨，就是劳改区了。左边有一条河沟，沿着河沟走，是铸造和磨砂车间；而右边一溜长坡，约两、三百米，通往深监重地。里头有八个队、两千多犯人。

我当时在二队二组任学习组长。天刚擦黑，大红毛（劳改大组长）吹哨收监学习，教导员却站在楼上，叫我出去搬行李。我跟教导员一直走到二道岗，才接住张光人。有好几人护驾，军便服、蓝制服都有，连监狱政委都出动了。

我骇得大气不敢出，猜想可能是大官犯了错误，起码省市一级。因为普通新犯都是自己跟政府进来，几道岗都得立正喊报告，待哨

兵放行，才能通过。张光人虽然也懂立正报告，但那么大个子，声音比蚂蚁还小。张光人的行李就一个铺盖卷，一个网兜。里面装些洗漱用具、换洗衣裳、几本书。一群人都爬那溜长坡，张光人在中间，看起比我们高出半截，大脑壳大眼睛秃脑门，一望就知有来头。遗憾的是衣冠不整，帽子小，外衣扣子掉了两颗，就用一根鸡肠带拦腰一捆。那风又硬又猛，从坡上一阵阵刮下来，张光人的衣领被灌风，边爬坡边咳嗽。唉，太凄凉了。

后来，张光人就分到 2 组。政府找我单独谈话，要求我密切注意他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还说如果干得出色，就记功减刑。犯人哪听得这个？我的神经都绷紧了，心里盼望他在我假睡的时候自杀，被我及时制止，那起码减个一年半。那时的监舍一溜红砖平房，前面有球场大的放风坝，从放风坝上几梯，就是食堂。一个院两百多号人，算大队。我们的监舍主要是水泥通铺，排排躺十几个。我睡最里头，靠着桌子，我安排张光人睡我旁边，接着是生产组长。

第一次学习，我向大家介绍新同改张光人，并传达政府训令：不准私下盘问，串通案情。然后才例行公事地总结当日劳改表现，最后学报纸。大家发言时，我吩咐张光人做记录。他在灯下眯着近视眼，脑壳习惯性地下磕，极其认真。

过去这项工作由我做，张光人来我就轻松了。你晓得，过去的运动多，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连《水浒》里的叛徒宋江也揪出来批。把孔夫子和林副主席绑在一块，挖祖坟挖出超水平了。大家发言老一套，路数跟着报纸文章走，只要把上次运动的坏蛋换成这次运动的坏蛋就行了。坐牢三件宝：劳动、发言、耳朵好。天天学习操练嘴皮功，结巴也口若悬河了——因为不发言过不了关。自从有了张光人，我们组的学习记录精彩多了，同一句表态话，他能翻出许多花样，篇篇不重复，这是真功夫。

老威：对于大批评家胡风，这算小菜一碟吧。

张广天：我多次口头表扬他，可他谦虚，说是写检讨练出来的。我不敢多问。那年头，文人倒霉，即使没犯啥事，也能随手给自己列出十条八件“罪状”，更别说这种专吃笔墨饭的。他的本事也就

这么一点点，而我花的功夫太大了。学习完十点钟，值班政府点名收监，挂上大锁，犯人各就各位躺倒。可张光人块头大，要多占半个铺。我吆喝大家往后挪，生产组长杀人前当过兵，看不惯文人，就悄悄用手拐捣他。张光人夜里失眠，死鱼眼球定在一个地方，而其他人劳累一天，一沾床就死。我也困，但不敢睡死。好在张光人翻身的动静大，总能惊醒我。

开头我见他夜夜失眠，以为有心事。文人有心事，特麻烦，他不一打架二不闹监，而是趁你迷糊时抹脖子。我向政府汇报，才晓得张光人前列腺有问题。他害怕睡死了尿床，招人笑话，就憋着。实在憋不住，只好翻身起夜。张光人的确上了年纪，每次解手都磕磕绊绊，一会是洗脸桶，一会儿是小方凳，一会儿又是劳保胶鞋。夜深人静，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何况他弄出的响动？好几个犯人都惊得从铺上弹坐起来，懵懵懂懂，以为开工了。便桶在门背后，张光人在桶前磨蹭许久，才挣扎着挤出两小股尿。监舍起夜的规矩是，屙尿不出声响，而张光人不管这些，他屙尿不冲桶壁，直通通下去。咕咕咕，隔好一阵，你都眯眼了，又是咕咕咕，那出水的动静，能把你吓出心脏病。我默算估计，他小便一次费时 7 分钟，也有超常规发挥，达 10 分钟。有一次，一刻钟还没回铺，我探头侦察，发觉他的脑袋抵着墙，我急忙起身，却听见他的牙咬得嘎嘎响。我把他扶回来，他却犟着不肯上铺，我一松手，他又赶向便桶。唉，我看桶里不是尿，而是迷魂药！

老威：张光人与你们一起出工么？

张广天：他留在院里干些手工活，守守监舍。每次我们收工回来，都见他腰间扎着绳子，双手抄在棉袄袖子里，定定地望天。他从来不与普通犯人搭话，醒着的时候还不如梦里说的话多。真的，后来大家对他习惯了，他起夜也有了规律。开春时，他居然胖了些。可是，在一群刑事犯中间，他肯定憋坏了，脑子有毛病了。不管刮风下雨，他能在院坝上一站几个钟头，像在等天上的什么东西掉下来。听队里的卫生员悄悄讲，张光人在和毛主席说话。他说："毛主席，我没反对过你，心都可以掏出来看。毛主席，你受蒙蔽了，但是我认……这辈子完了！"他还骂落在身上的雪："这些鬼！不要

来抓我，我整不死！”卫生员说张光人的泪大颗大颗地流，不晓得受了啥冤枉？

有天夜里，我被一阵磕牙惊醒了，抬头却见张光人站在地下，望着后窗外发楞。我也瞟了一眼窗外，感到阴风惨惨的，我顿时起了身鸡皮疙瘩。你不晓得，这座大监狱在解放前是坟山，分好几块，墓碑东倒西歪的。有的死人连个坑都没有，就地掀几铲土，就算埋了。这儿流行过瘟病，还有灾荒。据老的犯人说，因为这儿的坟太多，把山丘都掏空了，旧的和新的，几十年前和几十年后的墓道，经常通在一处。解放后，人民政府做好事，改造旧城，顺带把城郊的坟山推平填实，依山势建了监狱。在这里关过的犯人，都做过死鬼上身的梦。一般都是又哭又叫，控诉我们占了他们的窝。我还在梦里和游魂野鬼对骂，我说我又不想占你的窝，是别人要关我进来，有逑法。

老威：张光人咋样了？

张广天：他被鬼迷住了，他说看见了鬼，从最黑的地方划一条船，来接他回去。他说他不迷信，但这辈子只有阎王来给自己平反了。他自言自语的时候太可怕了，有个鬼在脑壳里，透过眼睛看外面。前几天，二队有个反革命半夜从上铺翻下来，把脚脖子歪了。他梦见一个秃脑门的胖大老头推他，骂他霸占铺位，我一听就晓得张光人回来了，他那个铺位过去是人家的，虽然牢房改建了，但位置没变。唉，我又乱扯了。总之，那个晚上我吓得要命，急忙报告了值班政府，管理叫来狱医，给了几片安定，张光人才踏实了。这事过去没几天，张光人就搬走了。

老威：搬到哪儿去了？

张广天：严管队的单间牢房，关的都是有级别的人物。里面有小灶，有卧室和放风间。生活条件很好，就是太孤独，与外界完全隔绝，据说每天早上从巴掌大的窗口发一份《人民日报》。如果上面有不利于改造的文章，也要剪下来。

老威：《人民日报》也开天窗？

张广天：单间关的都是高级文化人，脑子特别好使，有时凭一

字一句，或一个先后排名，就能分析出形势的变化，所以发放的《人民日报》也要经过严密的检查。

老威：张光人搬走你没感到遗憾？

张广天：啥遗憾？

老威：你没减刑吧？

张广天：减刑是政府的事，犯人嘛，顺其自然地坐牢吧。我一个村小老师，就这点能耐，哪吃得住张光人？他不添乱就谢天谢地了。

老威：你刚才说的我看也没什么，张光人内心痛苦，把自己折磨疯了，他也没惹谁。

张广天：他闯过祸呢。有一回，他把大伙的饭给弄倒了。

老威：咋回事？

张广天：队里犯人开饭都以组为单位，每组挑出两个人上伙房，一个领饭，一个领汤，而大伙拉开圆圈，蹲在院坝里等候。领饭两人一搭，一个星期一轮换。那次恰好转到我与张光人，我点清数，把钵饭码进木条筐里，才让他端走，我随后提汤桶。寒冬腊月，才5点多钟，天就擦黑了，我一再叮嘱老头注意脚下滑，却不料他下石阶时，真卜地一声滑了下去，栽得半天爬不起来。

钵饭满院坝滚，大伙马蜂窝一样炸了，四处去撵。天刚下了些雨，院里汤汤水水的，钵儿轮着没翻当然好，可有两钵滚着滚着就扣在稀泥里了，一起上来，白饭都浸成黑饭了。还有一钵朝前疯滚，一直进了阴沟，那是特等钵，有半斤，是铸造工吃的，所以组里的李二娃手脚并用地扑了过去，抓了两把稀泥，还没按着。这咋办？伙房蒸饭都是一人一钵，计划好了的。李二娃哇哇大哭，并二话没说，捡起张光人那钵就啃。那两个吃泥饭的，冲着张光人骂开了。

大伙劳累了一天，腰都直不起来了，饭是命根子呵。我放下桶，还没来得及拉，已经有两、三个人闪过去，揪住张光人就打。那老头护住脑壳，浑身泥透了，仍没吭一声，直到有一脚踩中了腰子，他才忍不住呻吟起来。

政府出面，把打人者关了禁闭。说实话，我当时一点没同情张光人。真是个废物，就那么两梯石阶，也没站稳。伙食本来就不好，万一饭钵全滚进阴沟，大伙就只能挨饿。那是文革当中，外面搞运动，不搞生产，老百姓都凭票购买半斤肉半斤油，26 斤半米，还要搭粗粮，更别提牢里。我们常被饿醒，清口水一股一股朝上冒。

老威：你们这帮人也真是禽兽，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一个老人。

张广天：只要有吃的，你骂什么都成。如果没有政府管着，我们早把张光人分吃了。依我说，政府对张光人还是比较特殊，生怕他出事，据说他住单间时，他夫人还来陪过。我们呢，只有成群结队趴在后窗打望，看几层墙外有没有女人经过。我是饿了好多年了。

老威：人家张光人是冤案，是中国数一数二的知识分子，你们呢，永远脱不了罪犯的皮，岂能与他比？

张广天：管他外面有多大的本事，一进这里，都是罪犯。监狱到处都写着："你是谁？你到了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

老威：我与你扯不清。你知道这监狱图书室为啥要弄胡风专柜？因为你们的政委是文化人，他说胡风是在这儿关疯的，这是监狱的耻辱。

张广天：胡风就这么厉害？

老威：这儿就因为关过胡风而名扬四海，不过，不是监狱的错。执行机关嘛，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也只能这么管理。

张广天：对，在犯人眼里，他是政府的重点保护对象，稍微犯点事也不会受罚。有一次，张光人把伙房打的浆糊偷吃了好多，那是用来刷标语的。在这之前，他趁做手工活，偷吃过很多浆糊，在犯人里都传开了。如果这事犯在其他人身上，早上纲上线，与阶级斗争挂钩了；可对他，政府还是睁只眼闭只眼。有人告状，管理还解释：张光人个头大，比小个子饿得快。的确，张光人的饭量比一般人要大些，好像在我们组他从没吃饱过。

老威：你其它还晓得啥事？

张广天：一时想不起来了，我和他相处近两年吧，彼此谈不上

啥交情。他是文豪，书上写着，特别犟，哪怕憋疯也不拐弯；我呢，小爬虫一个，莫说狗洞，耗子洞也钻。现在看来，他瞧不起我们这种人是应该的。张光人给我总的印象，就是另一个星球上的人，苦难是身外之物，哪怕突然枪毙他，依然是慢吞吞的。我们监舍耗子特别多，啃衣服，有时缺油荤，还啃人的脚趾头。张光人的脚趾头就被啃过，他坐起来，从被子下翻开脚，一点一点挤出咬口的坏血，又继续躺下睡。这种定力，一般人达不到。即使我个组长遭咬，也是惊爪爪地叫，还要满舍撵一阵才罢休。至于他后来的疯，那是我们理解不了的。这里私下说，政府也理解不了。犹如飞碟，见得再多，也不晓得那是啥东西。

85　川西神医张松

采访缘起：1998 年 5 月 21 日晨，习惯睡懒觉的我破例早起，与妹妹小飞一起，受成都波洋电讯工程设备公司瞿曲小姐的邀请，驱车几十公里去某郊县乡下探访川西神医张松。柏油大道之后，还走了很长一段泥泞小路，抵达稻田环绕中的四合院。等接“体波”诊病的人们已排起了长队。我们好不容易挤入，一人交了十元挂号费，又从 8 点多钟等到 11 点多钟，方从窗口见到神医尊容。不过一普通的中年男人矣。

张神医下午歇诊，我在瞿曲的大力引荐下，终于与其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

这对纠正我的种种偏见很有用。

什么叫“破除迷信”呢？柯云路和司马南，这两个急功近利的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已打了好几年，张松会成为第二个胡万林吗？成都的一家无聊报纸已经开始炒了。

我和妹妹的身体都很健康，虽然开了张松的药，但试不出有多大的神效。倒是他的一番言语，对治疗这个社会的疾病有效。

老威：您就是远近闻名的川西神医张松吗？您真能体波诊病？

张松：也就在这个院子里，出了这院子，我就不灵了。您来看，这儿有一道后门，外面是我家的祖坟地，按风水先生的说法，我的床摆在阴阳界上，一旦入睡，我就同逝去的亲人们在一起了，他们通过托梦，把灵感给我，使我产生一种压制不住的“看病”的冲动，有的时候，我面对病人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手在处方笺上开药，脑袋却一片空白，好像有人借我的身体替人治病。

老威：您感觉谁在您身体内？

张松：有的时候是爷爷，有的时候是爹，但很多时候弄不清楚是谁。也许您不信，我常常自己给自己开药方，抓药。我的药都不煎不熬，我到坟地里兜一圈，这座坟头扯把草，那座坟尾刨点根子，

就着泥土、蚯蚓什么的，一口口填进嘴，见效得很。

老威：别人不敢这样治病吧？

张松：当然，他们得按照我开的药方，排队在我药房抓药，我雇了五个伙计，还忙不过来。我每天上午 7 点至 12 点看病，过了中午，我就疲倦了，没灵感了。

老威：谢谢您在没灵感的时候接受我的访问。要不，我就不明白是在同人说话，还是同鬼说话。

张松：人鬼的界线本来就不分明，这就是人经常得病的原因，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其实是病得最深的，因为不信神不信鬼，人就什么都不怕，世上没有个怕字，天下就要大乱了。人人都想发财，但国家发行钞票也是有计划的，不可能把印钞厂搬到您的家里去，人人都想当官，但国家的官帽子只有那么多，您分一顶，他分一顶，那谁来做老百姓呢？道理就这么简单，可许多人连简单的道理都不懂，搞得社会乌烟瘴气，害虫横行，病啊，没治了。

老威：您知道胡万林吗？

张松：告诉您，如果您是小报记者，想学习司马南来搞点什么名堂的话，老子根本就不怕您，我一没偷，二没抢，三没医死过人，四没拿过别人的冤枉钱。您看看这院子周围的店铺、饭馆和旅馆，他们都是乡里乡亲，围绕着我在做生意。这儿十年前，只有我张松一家，与世隔绝，连路都长密了齐膝深的乱草，而现在，这儿有水泥路，有停车场，比公路边的小镇还漂亮，我响应邓小平的号召，与大伙共同富裕，也给国家纳了不少的税。您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老威：张老师息怒，我不是新闻记者，我没任何恶意。

张松：难说，记者什么卑鄙的勾当干不出来？前一晌，成都一家小报的记者来找新闻题材，为了试验我是否能体波诊病，他们乱写了一个姓名让我看。后来，这事登出来了，他们的用心就是要砸我的饭碗。现在的记者，与老百姓格格不入，却要做出一幅钦差大臣的样子，到处“明查暗访”，好像是公安局在破案。但报纸是越办越低级，除了广告就没看头了。因为记者太不是东西了。他们不

敢惹有权有势的人，不敢报道那些有点背景的敏感的冤案和假案，也不敢为老百姓做主、呼吁，偏偏揪住没靠山的人不放。

老威：您的思想还挺活跃。

张松：您以为农民医生就没脑子？就可以任人宰割和愚弄？告诉您，柯云路和司马南的书和报道我都细细读过。

老威：您没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实话说，如果不亲自来走一趟，我也很难相信体波诊病，因为再神的医生，也不可能只看一眼某个名字就如见其人，乃至开出药方。您没练过气功吧？

张松：没有。

老威：气功和类似的"特异功能"在我国盛行过好一阵，在柯云路的书之前，关于严新就有许多报道。国家之所以后来取缔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活动，是因为大师们有意造神，把正常的东西引向邪教，诈骗钱财。

张松：谁在造神？谁把严新、张洪宝吹神的？还不是记者和文人。

老威：您的药真能包医百病吗？

张松：不能。但是在我的眼里，没有绝对独立的人。我把人分成几大类，这几大类都是通过母体而来，所以，哪有突发的、偶然的病？病的来源说穿了就是人体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被外界诱发出来的潜在的变化，这种病变能通过一个人的名字看出来。我有"鬼眼"。

老威：总之有点玄，不把脉，也不介绍病情，还隔着丈把远，就能治病？

张松：古代算命先生有望气之说，据传能在早晨八、九点钟的时候，分辨出在人的印堂中变幻的七种颜色，以此类比，我也不算神。

老威：人家是算命。

张松：吉、凶、休、咎不是病变么？

老威：据说报道您的记者还专程带着您开的几十包药拜访了某

著名的医学教授，这位权威专家仔细查过您的处方和每味药，认为您在下大包围，什么都弄点，吃不死人也医不了病。

张松：这种说法我不想解释，您能否在这个院子里多留几天？多问问病人？他们才最有发言权。当然，记者可以抬出专家、教授来压我这个泥腿子，但是，有几个病人能够请得起专家、教授？这些所谓的专家、教授拿着国家的津贴，住在小洋楼里，同许多官僚差不多，老百姓没钱，请不起他们，连见他们一面都很困难。我是老高中的文化底子，以前读过一些史书，知道历史上有名的医生，象扁鹊、华佗、张仲景都不是专家、教授，而是专家、教授瞧不起的游方郎中。

他们一辈子都背着药袋，在民间奔波为老百姓看病，而从来不管高低贵贱，病员能否出得起钱等等。

老威：看来您很反感学院派？

张松：不敢。我生气的是他们不该与记者同流合污，借整别人来出名。其实，我除了敬神怕鬼，也没什么奇特之处，如果哪个专家、教授，特别是名牌医学院的教授能象我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扎根农村、任劳任怨地为人治病，我敢担保不出半年，他肯定成为远近闻名、万众拥戴的神医！就算我的医术臭到茅坑里去，也比他们强，因为我做到的他们做不到，甚至连想都不敢想！您问问这方圆十多里的乡亲，我收过他们诊病费没有？城里、外省，哪怕海外的病人来求医，我也是一视同仁，从挂号到抓药，平均三、四十元钱一个人。

老威：您这些话讲得实在，也许农村普遍缺医少药才是您“神”起来的最初原因？

张松：开始没觉得，后来一传十，十传百，病人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来，甚至外宾也来求医了，我才意识到自己有点特异功能，当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我想胡万林也没料到，柯云路会进终南山找他，为他写书，后来这书为他惹了麻烦。我认为柯云路和司马南之间，本来是文人间的笔墨官司，一个说气功好，一个说气功大师个个都是骗子；一个

说他发现了什么，自己伟大得不得了，在报纸上打来打去，名气就越来越响亮，但受害的是胡万林，还有那些看病的群众。

老威：您觉得是柯云路害了胡万林？

张松：对，柯云路和司马南本来就是老冤家老对头，柯云路吹一个，司马南打一个，老柯是作家，灵感来了，不免天马行空上下五千年地玄想，并把玄想同现实混在一块，因此漏洞不少。这次遇上胡万林，就借胡万林来证明自己的一贯思路，惹翻了司马南。司马南是记者，大报小报当然要向着自己的同行，司马南的地位提高了，新闻界的地位也就提高了；司马南一腔正气，普天下记者也就个个都成了为民做主的侠客。

但问题是，司马南既然是到终南山去救人于胡万林的“水火”之中，可为什么要偷偷摸摸？报上说他怕被人指认出来，后来被胡万林的信徒们认出，挨了打，并且还跪地求饶才捡得一条命。大伙为什么这样恨记者？因为记者从某种角度上是站在群众的对立面的。当然，您可以证明，群众很愚昧、很迷信，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您还可以证明，农村需要科学，需要科学和文明去战胜愚昧，然而，谁到深山老林去充当科学的使者？司马南说他也是苦出身，烧过窑、脱过坯，还在农场打过草、盖过房，既使千辛万苦考上大学，也是在饥饿中读完书的。他既然是劳动人民出身，又满腔热血和正气，那他为什么不回到农村、引导乡亲们发家致富？而要作为一个京城来的大记者，花一两天的功夫破除迷信？分明是自己想冒险出名。柯云路和司马南，还有两派人马搬出的大专家们，有谁敢深入偏远农村，呆上一年半载，为农民排忧解难？如果有这样的人，他不仅是神医、大师，而是救苦救难的菩萨，您让我为他为奴作马，我也愿意。中国农民，特别是未开化的农民是最老实最有情义的，胡万林在他们中间，他们觉得有责任保护他不受外来势力的伤害，他们清楚胡万林一完蛋，就没有第二个胡万林来为他们治病，您是城里人，不知道农村看病有多难！一点小病小灾，能捱就捱，如果严重了，要送医院，就得先准备几百元的押金。

老威：听说胡万林给所有的病员用一种药？

张松：也有人这样说我，还告到县卫生局，质问上面为什么要发给我执照？因为胡万林无照行医。

老威：今年四月，我不慎由感冒发烧引发肺炎，在一家大医院门诊室开后门，输了两星期液方有所好转。我花了两千多元治疗费，幸好没接受医生劝告住院，否则费用还要翻一番。我是单身汉，暂时没家室拖累，工作两年，才勉强生得起一场病，一般百姓家庭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目前，国家处于转型期，一切都市场化，以前计划经济下的公费医疗看来会逐步被医疗保险制度所取代，张松先生，您认为您这种神医现象是不是转型期的产物？您是靠医疗价格低廉赢得名声吗？

张松：价格再低廉，你医不好病，人家也不会白扔钱。当然，同样的医疗效果，我收费又比医院，甚至私人诊所低几倍、十几倍。从古至今，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在我们这个农业大国，大多数人在哪里？在农村。而大多数医院在哪里？在城市。毛主席是农民出生、懂得这个理，于是号召知识分子下乡，同贫下中农相结合，老人家最大的功德，就是在农村建立了赤脚医生制度，赤脚医生经过培训，懂得针灸，懂得一般的医学原理，治点常见病不成问题，并且随叫随到。那时农村没电话，许多地方不通公路，但只要有人来叫，赤脚医生马上背起药箱，连夜赶山路去治病。在那个时代，赤脚医生和乡下民办教师都象征着一种荣誉。而作为对赤脚医生的补充，县城和省市级医院也经常组织巡回下乡，检查示范就诊。而现在，商品经济，什么都说钱，穷人不仅不光荣，而且该死。更有缺德的医院，不见钱不开刀；还有为了敲诈红包，把纱布缝入病员伤口的，如果毛主席还活着，谁敢这样胡作非为？有多少杀多少。柯云路和司马南应该把他们打笔墨官司挣的钱捐出来，建一所乡村医院，您说胡万林是个江湖骗子，现在他跑了，您就在他的根据地建一座司马南医院，并把支持你的医学专家、科学家都请进去，胡万林的信徒一定会转而鼓吹您，拥护您。

老威：假如有一天您的执照被吊销，您的处境会不会同胡万林一样？

张松：即使不准我行医，人们也会来找我，酒好不怕巷子深，正神说不邪，您说中国有多少算命先生？算命先生又有几个领了执照的？但是，这行道最红火，只要算得准，哪怕您躲到深山老林，崇拜者也会象猎犬一般跟来，并且越传越神秘。我不想走这条路，虽然我从阴间的亲人那儿汲取灵感，但同巫医是两回事。

至于胡万林，糟就糟在他把治病同造神混淆了，历代农民起义领袖都以治病显灵笼络人心，这不是造反么？而我同病员没特殊关系，不收礼金，也绝不想让柯云路之类的作家来这儿找创作素材。我胆小，希望诸位记者先生看在许多贫穷的患者需要医生的份上，放我一马。

这世道本来就够乱的，大家不要再添乱。安定团结是大局，理解万岁吧。

86　街头瞎子张无名

采访缘起：1996 年 12 月 22 日，冬至夜。家中冷锅冷灶，我独自一人，想吃些热食，却懒于动手。拉开抽屉，数了数银两，就顶着寒风和城市噪音步行到王建墓一带烫火锅。几大块辣毛肚刚涮进嘴，有人从街沿右首牵出一位瞎子，怀抱二胡，摸上石阶，挨桌向食客打躬问手。我怜其年老瑟缩，遂吆喝一声，点了一曲。不料琴弓初开，即非寻常之音也。感慨系之，动了访问之念。

瞎子琴师 63 岁，伪称“张无名”，想来是自惭卖艺低贱，不愿透露真名。若有怀旧的慈善家肯扶危济困，请随时到成都王建墓选家露天火锅店，秉夜坐等。

老威：师父，您这二胡拉得真神！能为我再来一曲《江河水》吗？

瞎子：请您先付钱，按这一带的规矩，十块钱一曲。

老威：这是五十块，您摸好。本来琴声无价，但我只能掏这么多，我还要付酒钱。

瞎子：客官您是行家，如果想听，我可以在这街头为您一直拉到天亮。这二胡的脾气，如同你们读书人的熬夜，越到深处越来劲。《江河水》太悲了，我还是拉《空山鸟语》给您醒酒？

老威：您想拉什么就拉什么吧。

瞎子：您这么客气，我就不敢动手了。

老威：为什么？

瞎子：我眼瞎心不瞎。卖了几十年的艺，从国民党拉到共产党，我懂得这二胡有许多种玩法，对于绝大多数没长耳朵、附庸风雅的食客，弄个热闹就过去了，哪怕是悲到极点的曲子，也是手上功夫，滑把颤弓而已。而给您献艺，是要费心劲的。

老威：风挺硬的，师父，请您坐上来与我喝两杯。

瞎子：不敢造次。

老威：放下行头吧。来，我敬您。我平生最喜欢的两样乐器，一是二胡，一是箫。瞧这二胡，只有两根弦，就拉尽了人世间的沧桑。我的老家李家坪，三面靠山，一面冲着向远方蜿蜒的公路。我不知道山脚那座破败的地主小院是否还在，看见师父您，童年的一切就栩栩如生地凸现了。有一位乡村教书先生坐在门坎上拉二胡，他下雨拉，月亮升起来也拉，把我的性格拉得孤僻而伤感。现在，我只能隔着岁月听了。

瞎子：隔着岁月听？我不懂您的话，但我想哭。很多年没有哭的感觉啦，从娘肚子里出来，我就两眼一抹黑地乱抓，才三岁多，有人就把二胡恶狠狠地塞到我手里，用一根细细的鞭子抽着我拉。瞎子只能靠这手艺讨生活，哪有客官您讲的那么浪漫？我的爹妈很早就不在了，不知他们作过什么孽，我们三弟兄全是先天瞎，方圆几十里把咱家叫"一窝黑"。我的爹妈受不了这个，就双双服毒自杀了。那时我才七岁，顶着孝帕坐在尸体前，一个劲地拉琴，为爹妈讨棺材钱。这样连拉三天，尸体发臭了，人也快散架了，但我不敢停下来，总觉得头顶上悬着一根细细的鞭子。我至今对师父的印象都是贴着肉疼的鞭子。后来，我就开始走街串巷地卖艺，先在我的家乡邛崃，后来跑的地方就多了。

老威：您走路方便么？要不要人牵着您？像许多国产电影里那样，一个小姑娘牵着个老盲人，还拿着个碗，边走边声调凄凉地叫卖？

瞎子：客官您说笑了。明眼人有明眼人的社会，瞎子也有瞎子的社会，我每到一地，都要拜访当地的瞎老大，吹吹拍拍几句，交纳一点见面银子，这样，他就会指派一个小瞎子，赔我大街小巷地探路，怎样进怎样出，谁的门坎高谁的台阶低，谁是当地的大户，脾性如何，店铺区在哪儿，应该选择什么时候去，都要有个讲究。等把这些烂熟于心后，方可卖艺。

老威：你这是解放前的规矩吧？现在是九十年代，卖艺人到处都是。

唱歌拉琴卖药耍猴敲连花落，应有尽有，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见热闹就扯场子，要不治安管理就撵过来了。去年春节期间，我家门前来了五个瞎子，五把二胡一齐拉《太阳出来喜洋洋》，我只好一人分发一个红包。

瞎子：您说的是“伪劣产品”，不是真正的艺人，城市大了，他们就能这个区那个区地流动，骗人钱财。不过，民间艺人界也正在形成一套行规，大家都希望靠硬本事挣钱吃饭，江湖骗术的市场会越来越窄。

老威：你指的行规是什么？

瞎子：首先在一个地方应该有相对固定的卖艺人群，其次是卖艺人中应该有自己的老大。老百姓需要单位和政府来管，艺人也需要。比如，我在王建墓附近卖了七年艺，人家都认识我，知道我拉琴认真，就愿意点我的曲子。或许像我这样的盲艺人，武侯祠也有，春熙路或水碾河也有，但我不知道，也不想打听。我就愿意每晚在王建墓。我这种想法也是我周围一大群人的想法，他们有的弹吉他、拉提琴，有的擦皮鞋、修自行车或者讨饭。如果我们有一天想到武侯祠去立脚，就很困难，会很快被赶出来。

老威：您就不怕经济萧条？万一这一带的馆子接二连三地倒闭怎么办？

瞎子：馆子是倒闭过无数家，但食客和做发财梦的永远有那么多。

所以“倒闭”不过是换招牌而已，店铺永远不会空着。中餐垮了有西餐，海鲜垮了有火锅。这王建墓到底是埋过小皇帝的地方，风水好，人气旺。特别是夏天，火锅一片连一片，从店里摆到人行道上，搞得人连腿都迈不开。这个时候，我就满鼻子麻辣，特别担心撞到人家锅里去。

老威：这是卖艺的好时候吧？

瞎子：汤锅咕嘲嘲该成一大片，我四周吹拉弹唱的此起彼伏，二胡音量大小，压不过他们，我就只好让人给接上个喇叭，驮在背上拉。到处都是戏台子，谁在乎谁？反正是为了给食客助兴。赚钱

嘛。

老威：给人感觉您是在猪圈里拉琴。

瞎子：世上像您这样懂琴的又有几个？话说回来，如果世上人都像您，我早就累死了。

老威：此话怎讲？

瞎子：我每次都要用心劲拉。一个人的心劲是有限的。

老威：您是否觉得这辈子被浪费掉了？

瞎子：这辈子？我从没想过这种大问题。对于瞎子来说，每天都一样，除非病了，撞疼了。15 岁那年，我正在茶馆卖艺，突然鞭炮震天价响，把二胡声全盖了，但找还是拼命拉，直到茶博士的手抓住琴，才明白跟前已空空荡荡。外面的人们敲锣打鼓，我摸过去，方醒悟到解放军进城了。后来，人民政府发给路费，把我们一批盲流遣送回四川。我学过一年盲文，还相中过对象。

老威：怎么“相中”？

瞎子：凭两只手，大约是 1957 年吧，瞎子阿炳的曲子很风行，民乐的确火过一阵，我也沾光上了舞台，给群众拉，也给音乐学院的教授拉，还录过唱片呢。领导上让我带徒弟，有眼睛的我不要，因为明眼人进不了我们这个世界。

我的弟子比我小三岁，为了弘扬民族文化，跟我没日没夜地练，有天中午我打盹，总感觉有虫子在脸上爬，我挥了好几次，终于碰着一双柔软的小手，那发烫的指头一点点淌过我的五官官，一直痒到心窝里去。于是我装着继续打吨，也伸出手，梦游般摸她，她的辫子好粗啊，眼睛好大啊，睫毛好长啊，那皮肤也挺滑。我们终于抱得紧紧的。那段时间，我的二胡拉得最好，仿佛不是我在拉，而是有人在身体内外替我拉，我能在琴声中，“看见”我的恋人，非常漂亮，能带着她同游世界该多好。

老威：你们结婚了吗？有孩子吗？

瞎子：我们发生了关系，那个年代，未婚而发生关系，是要判刑的。领导考虑我们是残疾人，没法判刑、就一再逼她打胎，然后

隐瞒过去，以免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我们要求领结婚证，领导说这非同一般，要开会研究。开了几次会，也没最后“研究”下来，她的肚子却出了怀。

不料，反右开始了，这个好领导成了批判对象，群众检举说，我徒弟的肚子是他搞大的，要不他为啥那么热衷于帮我遮丑？结婚证领不成，我还被批斗了几次。打成堕落分子。多亏我是瞎子，要不早整死了。而我徒弟让几个人按着，强迫流产，她更成了堕落分子加封、资、修。

老威：后来呢？

瞎子：后来就散了，这是命，您得认了，按现在的观念，瞎配瞎不更好？解决了社会问题。但那时候，整个中国像个大家庭，吃喝拉撒生儿有女都靠组织，没组织的，就找民政局和居委会。当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是例外，组织没能力来管大伙了，连组织里的人也饿死了不少。我的徒弟死于 61 年。造孽呀。

老威：您觉得现在比过去开化多了吧？恋爱、同居都不成问题，卖艺也没人让您办执照交税。

瞎子：谁给谁上税？社会应该给我上福利税才是。我六十年代就下岗了。如果不是那些年政治气候变来变去，说不定我也能像相声演员侯宝林一样，弄个北京大学教授当当，音乐学院有二胡专业。

老威：教授有啥好羡慕的？没您老自由。

瞎子：光棍一条当然自由，您怎么不来“享受”这种自由？

老威：您引条路，我明天来享受。我把箫带上，与您的二胡合奏，讨的钱归您。另外，希望您能帮我召集更多的盲艺人。

瞎子：干什么？

老威：我想找一位懂二胡的生意老板，出钱搞一次盲艺人的音乐会，如果您能聚拢二十位瞎子，就有戏了。

瞎子：这个主意好，我回去与瞎老大商议。

老威：还有比您更老的盲人？

瞎子：不是盲人，而是这个地盘上的头儿。我习惯旧称呼，就

叫他瞎老大。这事只有他出面，到武侯、春熙路、双桥子、西门车站等码头去借些瞎子过来，不过，收费很高。

老威：您别一心钻到钱眼里，那就把我最初听您二胡的感觉给毁了。

瞎子：夜深了，还是拉琴吧？

老威：身子骨要紧，师父，心劲别太过。

87　底层诗人赵大虎

采访缘起：赵大虎与毛主席是同乡，但长得尖嘴猴腮，面目可憎。由于没条件换衣服和洗澡，身上的异味经久不散。

我不嫌弃这位矿工的儿子，经常与其切磋写作问题。1997 年 5 月 6 日中午，我与周忠陵在饭桌上同他谈话，其恶狠狠的幽默中不乏闪光的东西。

赵大虎是九十年代中国唯一的底层诗人，其诗风破罐子破摔，与八十年代“为劳动人民写诗”的莽汉诗人有血肉联系，可惜改革开放以来，忙于谋生的群众都不读诗了。

赵大虎在北京苦撑苦熬了两三年，名利欲比性欲强烈几倍，由于被学院派及官方文坛屡屡拒之门外，不得不愤世嫉俗。有人说，湖南人就这股不达目标不罢休的蛮劲，所以在历朝历代的中国政界、军界和文艺界中，都占压倒一切的优势。

那么，赵大虎没出头，是因为主攻方向错了。

老威：大虎先生，请坐过来一起吃饭吧。

赵大虎：我已经吃过了，不过，我还可以再吃。我现在能够连吃 24 小时，或者连睡 24 小时，比猪还过分吧？我只剩下饭票了，不，这两个月我从来就没买过菜票，我缺钱，遇上食堂师傅心情好，想发善心，就顺便尝给我一瓢菜。但是这段时间，北京老是阴雨绵绵，直接影响大伙的心情，因此都忘了发善心，你看我的牙齿，出血了，还有点松动……

老威：你就坐下来尽管吃。喂，我的朋友忠忠昨天才给了你十块钱的菜票，今天就没了？

赵大虎：哦，我留下了，能混就混，还有更艰苦的日子在后头。

老威：我再给你打两份肉，这儿还有啤酒。

赵大虎：哎哟，真他妈资产阶级生活！不行，你对我这么好，我要报答你。

老威：怎么报答？

赵大虎：我为你唱两首歌，你随便点，不过我最拿手的还是崔健的《苦行僧》和《回到拉萨》。这是两首走路的歌。“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要从白走到黑”，然后就回到了拉萨，世界屋脊，离上帝最近的地方！我做梦都想去。我唱啦，不，我付你酒饭钱啦，完事后我们就两不欠啦。让我灌半瓶啤酒，这样，激情上来得快些。

老威：感觉不错。你的声音好像不是从嘴巴而是从脚心发出的，充满了尘土飞扬的摩擦，也充满了脚气臭。赵大虎，你流浪了多久了？

赵大虎：我 90 年从家乡出来，只有前年回去过一次。我本来不该回去的，因为我曾从北京给我妈发过“赵大虎车祸身亡，已于 1994 年 6 月 4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的电报，我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时，差点把父母吓晕过去。接着，就遭到老俩口的合力声讨，仿佛我的死而复生令他们愤怒。于是，我在万般无奈之下，盗取了我妈用于养老的 8000 元存款，畏罪潜逃。途经长沙时，正遇体育场几十万人争购福利彩票，被那种壮观场面所感染，我不由自主卷入，在众人惊叹中，我把 8000 元全部投入，买了十几箱彩票，垒在那里慢慢抠，太阳落山了，我又把彩票背回旅馆，通宵达旦地抠，特等奖 20 万没中，一等奖 10000 也没中，却中了一口钢筋锅，两床踏花被和八双袜子。我原想中奖后孝敬父母，让这碌碌无为老矿工夫妇也经历一次人生的大悲大喜，不料美梦破灭，我只好背上锅和被子上路，我把八双袜子都套在脚上，虽然是十冬腊月，也厚得走不动路，又一双接一双脱下来。你看。我现在还穿着上次抠奖的尼龙袜。

老威：你父母多大年纪了？

赵大虎：60 多岁吧。

老威：这么说，都退休了。你把他们养老钱都拿走了，他们想不通，出问题咋办？

赵大虎：出问题？我没想过。我知道，这是一种无法偿还的罪孽，而对父母的原罪感正是艺术的源泉之一，这种冲动，在现实中

无法偿还的东西，只有用诗歌偿还。我不想做一个平凡人，天才总是下意识地为自己设置路障。我这张丑陋的面孔就是路障，小时候，我就试过，当自己忏悔、流泪，没人会理解、同情；只有仇恨甚至愤怒，才令人大吃一惊，虽然随之而来的是拳脚交加。

老威：你为自己设置路障，这倒是一个绝妙的比喻。赵大虎，你在北京混了几年了？

赵大虎：两年了，都住在这所文学院里。这儿的进修班一年一届，我看着他们上了两届。

老威：你的房间在几楼几号？

赵大虎：我没房间。这五楼的教室就是我的大客房，白天上正课我不能进来，晚上自习我就溜进来，找一个座位看书、写作，因为有紧迫感所以工作效率挺高。大约过了 11 点，这教室的人差不多走光了，我就把六把椅子拼成一张床，躺着睡了。这儿的学员已习惯我了，可教师和院长不太习惯，想方设法使坏，甚至不让我进大门。前段时间，我象翻越日寇封锁线的进步学生，怀着去延安朝圣的心情，半夜 1 点钟爬墙爬门进教室，被院长发现，正要训斥，却没料到我先声夺人："我是高玉宝！我要读书！"正巧，写《高玉宝》的作者高玉宝是院长的同乡兼朋友，被我一句话就感动了，可能他不愿做半夜学鸡叫的地主周扒皮吧。

老威：既是这样，你让院长免费给你安排个地方住嘛。

赵大虎：你忘了这是什么年代。商品社会，还想免费上学、住房？做梦去吧。院长也就感动了一两天，幸好在第三天头上，《创作界》发表了我一组长诗，提前送稿费来了。再加上一些捐款，我租了三个月的房，就在文学院的墙外。房东是个菜农，满脸横肉，还养着一条大狼狗，我不讨好房东，也得讨好这条狗，它坐着站着都比我的腰还高，白天还没啥，夜里一回去迟了，它就扑上来，用爪子亲热地搂我肩膀，舔我喉咙。有一次，我半夜一点回去，房东故意不开小院门，我就翻墙，可一落地，狗就上来了，幸好是熟人，它只咬破了我的裤子而不是喉咙。就这样也麻烦，我坐在床上挑灯补裤子，以免第二天不能出入社交场合，没有针线怎么办？我就用

大头针把破洞锁住。

老威：听说你这段时间又没回去住了？

赵大虎：这儿算北京郊区，房租便宜，交通也还方便，所以租房的人特别多，当然，这儿不像通县、圆明园一带，住的都是艺术家，这儿是野鸡、人贩子、打工仔出没之地，三天两头，公安局扫黄打非查暂住户口。我的身份证都是临时的，哪来暂住户口？所以我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居住战术，在外头住几天，在文学院躲几天，校方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罢了。

老威：你还挺聪明的。

赵大虎：我被打聪明了。有天夜里查暂住证，我没有，联防队员二话不说，就把我的东西朝外扔，其实除了被子和几件衣裳，我只有几本书和手稿袋（里面装着我的近作），以及发表过我的作品的三本杂志。我交不出罚款，被狠狠地打了一顿。我在墙根边躲边喊："我是诗人赵大虎！你们打我就是打李白、打杜甫、打毛主席——毛主席也写诗！"听我出语不凡，联防队员吓得愣住了，就问："你是诗人？有证明吗？"我拿出杂志，翻到有自己作品的那几页让他们看。他们还真研究了半天，又把名字同临时身份证对了对，才恍然大悟地给了我一耳光："你这是抄袭吧，屙泡尿照照，你像李白？李鬼还差不多。"我反驳说："你们问房东！"不料房东应声出来，三拳两脚就把我弄趴下了，还让大狼狗把手稿袋衔给我说："提上你的收尸（诗）袋，滚远些吧。"

老威：这他妈太不像话了，你应该叫房东退租金。

赵大虎：过了两天，我一拐一拐想搬走了，房东却又是递烟又是赔笑说："兄弟，我是演给联防看的，你就放心在我这儿住吧。"

老威：我说赵大虎，你为啥非要在北京城里混呢？你又没工作，据我观察，你也不适合做任何工作。你到一个小地方去呆，民风也淳朴。你是大学生，下嫁到农村更好，白天种地，晚上写诗，到了年底，还可以热热闹闹地杀猪过年。

赵大虎：我有朋友在四川巫山，三峡的神女峰脚下，所以那地方又叫"爱情县"，我在巫山呆了好几个月，写了几首超级长诗，

还谈了一次恋爱，心就开始痒了。一听轮船汽笛响，我就受不了。他妈的，我又不是神女，干吗要在一个地方呆很多年呢？等什么？我看除了世界末日啥也等不到。北京当然艰苦，物价也比巫山昂贵许多倍，但这是中国的首都，最有文化的地方，在这儿，好歹也能闹出点名堂。要不，全国各地做生意、搞政治、玩文化，怀着各种理想或阴谋的人为啥都朝这儿钻？我写了那么多东西，在小地方没人懂，我又不可能自己念给自己听。我冲着女朋友口头“发表”了几次，都被她“口头”枪毙掉了。我只有到北京寻找机会。

老威：你弄出点名堂没有？

赵大虎：我在文学院有许多崇拜者，否则混不到现在。在这儿授课的名编辑和名作家不少，开座谈会时，我总能发言，引起大家关注。上半年，《创作界》继发表我的长诗之后，还组织名家讨论“赵大虎诗歌现象”，其中有北大的教授，中科院的研究员。出版社和杂志编辑以及电视公众人物。讨论记要上个月发表了，我和大评论家唐晓渡、刘恪、王一川都成了朋友，和西川也是朋友。

老威：你到会发言了吗？我似乎还没见你在公共场合长篇发言。

赵大虎：他们没请我，这使我深感遗憾。听说《创作界》还请了客。

老威：你在北京，他们为啥不请你？

赵大虎：我的诗能登大雅之堂，我的人，嘿嘿，差了点等级。其实我很想登门拜访这些名家，切磋诗艺，可他们都不留地址，害怕我赖着不走。

老威：你赖过吗？

赵大虎：只有一次，我摸到老刘家，在他家才住三天，他女儿的脸色就不好看了。我曾一边喝酒一边跟老刘侃廖亦武的《黑道》，里面讲了许多 80 年代地下诗人好玩的事。据说那时在江湖上混出点名头的诗人，流浪到一个陌生地方，只需按上一站同党开的路条，找到本地同党，一拱手，自报家门，递上路条，吆喝一声“打扰了”就成。大碗酒大碗肉好多天，临别主人还要馈赠路费，再开路条去找下一站英雄。真可谓“有诗走遍天下，无诗寸步难行。”

我就这样一边怀旧一边吃喝，忘乎所以，不料老刘却坐不住了，连说：“那是廖亦武编的！”就马上行动，趁醉把我送回文学院，丢进教室就不管了。

老威：眼看要出头了，你又暴露了本来面目。

赵大虎：北京城这么大，空荡荡的，可我努力这么久还是在门外。我盼望什么呢？盼望世界大战、瘟疫、地震、宫廷政变等等，反正，灭顶之灾中任选一种，外星人入侵也行。把这个捆绑人的秩序，这个铁血的扼杀人的创造性的奴隶的秩序毁一遍，高楼大厦都弄平，钞票作废，满地球都长草，那时，只有我这种最贱的生物能活，天才在这个假文明的环境里都是最贱的蟑螂，虽然在精神的荒漠中，油炸蟑螂也是一道好菜。你看，这么大个文学院，这么多作家和想掏腰包成为作家的奴才，可是，当一个诗人在文学院的门口挨打的时候，却没人挺身而出，说句公道话。还有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这些官僚和养官僚的机构，几十层高的大楼，却没有保护和救济过一个作家。我曾在中国作协门口卖唱，半天唱了近 30 首歌，却只卖了几块钱。

老威：不只几块钱吧，听说你在卖唱期间，爱上了一位女作家，还为她写了诗，灵感和爱情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

赵大虎：不错，我迷上她了，又不知怎样倾诉内心的感受，只好她走哪儿我跟哪儿。她回东北我也混火车去东北。我不知道她丈夫是某市公安局长，总之，我又失败了。回到北京时生了场大病，在病中自己给自己放了血，燃烧我灵魂的那股火才卜地灭了。但是那道面对权势无能为力的伤痛却永远留下，成为创作灵感。我想，同是诗人，欧阳××、王××、肖××他们为啥可以活得那样体面，那样名利双收？出书出国样样有份？

老威：为什么？

赵大虎：是因为我比他们有天才，所有时代的天才都与他所处的环境搞不好关系。天才不是用脑子处心积虑去想诗。而是用器官、血液、心跳去写诗。用行动去为自己的行动制造障碍。是的，我穷，我累，我坎坷，然而中国人民都坎坷，那些下岗工人、农村打工仔、

流浪汉、乞丐，谁不比我坎坷？我与他们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写诗，他们不写。我在他们中呆过，我住过桥洞，要过饭。你不相信？我撩起衣裳，你看看我浑身上下有多少疤？一个疤就是一种经历，一股气。你明白吧？我既与劳动人民有区别也同体面的文化诗人有区别。九十年代是不断引进文化浪潮的时代，而文化诗人就是这些文化浪潮的翻版，我不想成为复印机的产物，不想借助复制效果而出名。

老威：制造丑闻也可能出名嘛。不过，你的名要出到什么程度为止呢？公众人物？各种会议的嘉宾？各国驻京使馆的坐上客？经常出国的中国诗歌使者？还是文人沙龙捧出来的大师？你喜欢像他们那样，上中央电视台读书节目，向广大观众普及诗歌？那你改行吧，把脸洗干净，找个工作，边打工边到北京大学去进修，最后可以考谢冕的诗歌博士。

赵大虎：我……好像不行……人一多，我说话就结巴。我的灵魂是高贵的，可我的每个细胞都很贱，我常有当众撒尿的冲动。

老威：那你呆在这儿干啥？北京是祖国的首都，体面人的世界，不会操作最终是混不下去的。我劝你还是回老家，当然，你已不敢回老家。回四川巫山县去修炼，至少两年，不动笔，不动怪念头，忘记自己是诗人。至少在我看来，九十年代做诗人是极其卑鄙的，不管是体面还是不体面的诗人，因为我们的心已死掉了，被斑驳的血痕锈掉了。你要多想好事，于身心有益的健康事，最好下嫁到农村，娶个村姑，老老实实地种地、耕田，用辛勤的汗水换取丰收的果实……久而久之，你就会由不习惯到习惯。你这张丑脸会一天天变得漂亮、自信和体面起来，你读过书，自然懂得灵魂会逐渐影响改变外貌这个道理。当你有一天，突然又想写诗的时候，语言和环境全变了，然后你就杀头猪，腌点腊肉带到北京，依次送礼给各色文化名流，礼轻情义重，进门时不忘说："这是我赵大虎亲自养的猪，不是饲料猪。"

赵大虎：万一我修炼成了彻头彻尾的山间老农，写不成诗呢？

老威：那也没遗憾，你就干脆做当代李聃，倒骑水牛朝深山里

钻。

赵大虎：那是 70 岁以后的事，老子在 70 岁以前还做过周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也就是说，要先王后圣。我现在连著名诗人的滋味都没尝到，你就让我当农民？非憋死不可。

老威：你前后都看不到曙光，只能这样。

赵大虎：你就是我的“曙光”，我晓得你的箫和啸都堪称当今一绝，今晚上，一伙体面诗人要在北京文化宫彩排，朗诵诗歌，那种朗诵法特别贵族，背景是长裙拖地的小妞们弄钢琴，小提琴伴奏，穿晚礼服的诗人打开一个唱歌剧的本子，缓缓读诗。你记得叶芝的《当你老了》吗？

就是那种味，不过壁炉边不是诗人早年的恋人在打盹，而是满场的观众都老了。这消息绝对可靠，今晚彩排后，劳动节就要开朗诵会，据说预订票都抢购一空了。我现在就拜你为师，一会儿，我陪你去，你和导演、策划是朋友，你要求上节目，完了就顺便介绍我，我一上台唱也好，朗诵诗也好，不成功也成功。

老威：人家肯定事先都定好节目了。

赵大虎：如果没谈妥，你就把确切演出时间打听好，找一帮捧场的，我师徒直接上，闹出事故再说。

老威：会被抓起来的。

赵大虎：抓起来？成国际事件啦，下半生吃喝、出国、涮洋妞都不愁啦。

老威：行啊，赵大虎，你已百炼成钢了。吃饱喝足了？洗碗去吧。

赵大虎：你先请，我呢，从不洗碗，我的碗就放在这桌上，没人要。喂，老威，你再细致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88　打工仔赵二

采访缘起：除了北京和广州，成都算是外地打工仔最集中的城市，九眼桥一带的劳务市场长期火爆，在桥下蔓延了几站地。我曾伪装成招工老板，横贯其间，与男女讨价还价，企图以此诱出些真实民情，但没人愿在生存竞争中与我瞎扯。

赵二是我在新南门附近的巷内碰上的露宿者，40 多岁，川北某县人，挖过煤，外出打工已经七年。因一起露宿的同伙皆呼“赵二”，我也就入俗套近乎，用十元钱买下这篇谈话。

时为 1999 年 1 月 12 日晚上 9 点钟，阴有小雨，气温摄氏 4 度。

老威：大冷天，为啥露宿街头呢？

赵二：这不是街头，你看，上有塑料雨棚，下有隔湿的油布，再铺条棉絮，把被子连脑壳带脚一裹，啥感觉都没有，一闭眼就天亮了。出门在外，贱点好，贱点饿不死。

老威：想家么？

赵二：家有啥好想的？婆娘娃儿一大堆，一想就心烦。

老威：你们老家不搞计划生育？

赵二：搞，多生一个，罚款三千。我没钱你拿啥子罚？现在又不是前几年，动不动就掀房子，动不动就满山遍野地撵婆娘，几个人按倒安环。环一塞进去，筷子都夹不出来。宋丹丹演过《超生游击队》，挖苦我们这种人带着大肚子婆娘全国到处下崽崽，她就没考虑，路费由哪个出？伙食咋解决？现在火车也不好混，即使上了车，走不了几站就被赶下来。我三个女儿都是在本地生的，计生办上门来，黑咕弄冬啥都瞅不清，朝里再跨一步，灰盆子又踩翻了。我一个女儿在吃奶，另两个女儿扭住阿姨就要糖吃，从此计生办再不上门了。

老威：穷到这份，生这么多干啥？

赵二：我穷，我背运，我认了，但鸡巴不能认。我浑身上下就这宝贝是硬的，多下种，将来好打翻身仗。乡巴佬嘛，也没钱上夜总会，我们的夜总会就在床上，黑灯瞎火没事做，就按住婆娘上夜总会。人穷虱子多，婆娘的肚皮稍不留神就大了，怪哪个？她想得儿，儿偏不来。

老威：你想省些钱寄回家吧？看你这么节约，连住店的钱都舍不得。

赵二：我有大半年没寄钱了。

老威：她们在家咋办？

赵二：自谋生路嘛。乡下娃又不是金枝玉叶，养到两、三岁，只要走路的步子稳，一般就会讨饭要东西了；再不行，舔盘子也养人。我婆娘带着她们在县城里逛，熟门熟路的，说不定收入比我可观。我发觉，娃娃越金贵越难养，白白胖胖还三天两头上医院。我的娃，风吹雨打从不生病，像树苗，你不管它，眨眼功夫又冒高一切。

老威：你这当爹的的确想得开。

赵二：我自身难保。他们至少还有个窝，我却睡街沿。这一溜十几个人，就数我年纪大。这儿离九眼桥劳务市场近，明天我得赶早去，找家餐馆打工。我的肚子又饿了，天还没黑时，我想的是上建筑工地，卖苦力钱要多些。肚子一空，寒气一上来了，我最想的就是小面馆，热乎乎的一大碗下去。从殡仪馆门口过去十几步，有家胖大嫂面馆，三元钱一斗碗，吃了还可以添面，除了臊子不能添。

前天我们一伙六个人去，都添了三次面，把老板娘吃瓜了。我把全市的面馆比较了一下，就这家最实惠。九眼桥下的面虽说只要两元，素面只要一元，但一碗挑起来就那么一夹，我连吃三碗才半饱。有一次，我饿昏了，吃了七碗面。

老威：看来你对面食比对儿女有感情。

赵二：老板，你能不能给碗面钱？

老威：给你十元钱。你莫做动作，惊动了其它人，都来要钱，

我给不起。喂，你家里有多少地？

赵二：我没地，我是矿工。

老威：下岗工人？算了吧，你这样子还冒充下岗工人？

赵二：不是国营企业，是专挖国营企业墙角的小煤窑。比如大煤矿从山那边打洞，我们就从这边，远处一望，一匹山梁弄得像蜂窝煤。小煤窑的入口像狗洞，我们只能肩拖着煤筐爬进去，胳膊伸直了要碰脑壳，只能学解放军练兵，倒拐支着朝前挪。煤窑斜着下，像一个酒瓶子，只有下到底才能挖煤。唉，伸手不见五指啊。

老威：你们没有矿灯和风镐？

赵二：你是电影里见的？我们这种贼矿工没有那种矿灯帽，都在头上绑把手电筒，风镐更不能用，一发电，山体震动大，山那边很快就发现了，更要命的是塌方，洞里都是临时性木桩，经不起震。这种累死牛的活儿，我陆陆续续干了许多年，一天才挣几块钱，一张脸从来没洗干净过，有时太累了，一回家卸下行头，就倒下睡。天长日久，你看我这后颈窝，这倒拐子，黑碴碴的，洗不掉，哪怕搓层油皮下来也不行，煤印子浸进肉里了。

老威：不在家挖煤，跑出来干啥？

赵二：80 年代还凑和糊口，90 年代就不行了。几块钱能买啥，恐怕钻一天煤窑，连肚子都填不饱。乡上太黑了，我们偷煤他们赚钱，干部都盖了宅子。大煤矿亏损，发不起工资，帐也算在我们头上，工人一见我们就咬牙切齿。最后，小煤窑的人跑了一半多，工钱少还能忍耐，万一哪天惹急了，那边工人来堵洞子，不死路一条？唉，一个乡一个村，男的女的，只要走得动路的，都朝外跑，男的卖苦力女的当鸡，都想得开。我婆娘幸好有三个娃拖着，只能在县城荡，否则我一离开，哪个晓得她干啥去？两个月前，我在九眼桥还碰到一个熟人，天都擦黑了，还不收摊子，还在喊“擦皮鞋”，我瞅了一会儿，觉得有点像本村张狗嘴的婆娘，结果硬是，原来在擦黄色皮鞋。

老威：啥意思？

赵二：就是专门在天黑时出来擦皮鞋，借幌子找客户，擦着擦

着，手就摸客人的脚脖子。接着边擦边砍价，能给 50 元钱算大老板，当然，年轻奶大的，容易成交，老点的比较困难，像狗嘴婆娘，快 30 了，你想想，乡下女的 30 是啥概念？生过娃，奶子都垮齐裤腰了。卖不起钱，20 元算不错了，也有 10 元一炮的，这是底价，婆娘们想起都难受。我拉偏三轮那阵，还比较风光，隔三岔五打肉牙祭，10 元给过，20 元也给过，有一次手紧，就试着刹到 5 元，不提防当头挨了一鞋刷子。我想还手，那泼妇叉起腰站起来说："把胯风给你吞两口，不收钱！"我说："你这么老。"泼妇说："老就贱？那你比我老得多，我倒出 5 元钱买你的屁眼儿，干不干？"

老威：骂得好，你他妈也太过份了。

赵二：我挣钱容易么？我刚到成都，挖楼房地基，一方土几块钱。我干一年多，才存了 200 元，托人买了辆偏三轮，开始还兴奋了一阵，后来就经常被撵得鸡飞狗跳，霉的时候，一天也挣不了 5 元钱。况且，水灵的，乖巧的，嘴皮翻得出花儿的都上夜总会，档次低的，也有发廊和卡拉 OK 厅。小婆娘学东西快，没几天，普通话也操起了，打粉扭屁股也会了，还有挣钱买假文凭的，听说是为了傍大款跳槽，彻底换装苞谷屎的肚肠。只有卖不起价的货，才在街上摆摊，5 块钱真的差不多，九眼桥最便宜的店，就 5 元住一夜。

老威：你为啥不住便宜店？

赵二：刚来那阵经常住，挖土住工棚，拉偏三轮租房，几个人合租，一个月才出几十块钱。后来我的车被没收，山穷水尽，就住不起房了。今晚本想住 5 元店，去晚了，客满。

老威：在哪儿？这么打挤？

赵二：九眼桥旁边，好长一溜塑料棚，还有正在折迁的平房，白天摆摊卖百货，晚上围起来架成通铺。没床位，屁股大的一间，能挤七、八个，当然，十几个也挤得下，这铺有弹性，冬天人多，挤着也热和，有时，还热得蹬被子，打个屁也出汗。他妈的，老板守在门口收钱，不断叫："再挤一点，再挤一点，都是出门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发财目标，挤到一起来了。"

老威：你没挤得下？

赵二：我挤了好几个地方，却崩地一下爆出来。昨晚我去得早，睡在最里头，不料半夜屙尿，一回头铺就没了。我挤了半天，七、八只脚将我朝门外蹬。我气惨了，拖起铺盖，想找老板退钱，可半夜三更哪有人？只好裹起被子靠门坐到天亮。还是这宽敞，如果是热天，就舒服了。

老威：你拉了几年偏三轮？

赵二：两年多。

老威：两年多才被缴了一辆车，你算有本事。

赵二：我被缴了三辆车，也不算多，好多人一年就要损失四、五辆。

老威：成都市拉偏三轮的有十几万吧，既影响市容，又抢了人家正规三轮车的饭碗。

赵二：靠劳力吃饭，总比偷抢正当。我只气不过这一行的社会待遇和小偷差不多。只要一听说警车来了，大家马上蹬起车飞逃，像一群挨了竹竿的下河鸭子，恨不得长出翅膀冲上天。我的第一辆车就是在白果林附近遭缴的，本来偏三轮都有固定的地盘，比如我在五块石、高笋塘、长途汽车站一转拉，一般就不出这个范围。人熟地熟，警车还没拢，就有人飞叉叉地沿途报信："端窝子的来了！端窝子的来了！"于是所有的偏三轮都掉头，见尿巷子就钻，拐进居民院脱了险，还可以锁上车，出街来看热闹。唉，我每次倒霉都是贪心，人家价钱一出高，就不晓得东南西北了。那次，从长途站到白果林，我不想去，就乱喊 10 元，那婆娘还 8 元。并且一口一个师傅，叫得人麻酥酥的。我一横心，反正是星期天，路线又是二环，就答应了。那是 97 年夏天，外地人坐偏三轮又便宜又凉快，虽然二环路灰尘大，但沿途观光嘛。我蹬了将近一个小时，背心湿透了，就干脆光着脊梁。那婆娘躲在遮阳伞下，还关心我感不感冒。唉，我这人贱，客人说话一平等，我的舌头就长，向人家介绍好耍的公园，省钱的商场，老地名等等，仿佛是老成都。其实我也是吹得闹热。

我绕开好几个有交警的大口子，走营门口立交桥再穿金鱼村，

过交警四大队都顺利，偏偏拐过中新路口，就见摩托堵了过来，好几辆，把来回方向都拦断了。我吓得没主意，就转头朝坡上冲，冲了几盘车都倒退。最后上去了，是个居民大院，我拉着个婆娘在几栋楼房之间疯转，她也骇惨了，试了几次，都不敢跳车，就拿伞戳我的光背，背都出血了，还不停车，她就举起伞打我，脚还在下面踢，我十几元买的遮阳伞被她打成刷刷。后来，摩托还是把我堵死在墙里。妈哟，我心疼的！刚刚才把车的本钱挣回来！我死死地抱住车把子不放，泪水和汗水，在脸上都分不清了，最后，车还是被缴了。停在路边的大卡车上，偏三轮冒央央的，车屁股还挂了七、八辆。我跟着车撵了一条街，有屁的用？我只有往回走，走了好几个钟头，还没拢家，心里空捞捞，差点就弄疯逑了。怪只怪自己贪心跑长途，车没了，伞也没了，连 8 元力钱都没收！那婆娘还当警察面闹着要我赔偿精神损失。

老威：偏三轮的交通隐患大，不整治就泛滥成灾了。喂，你不会只跑二环路以外？

赵二：二环路外盲流多，治安复杂，经常遇到白坐车的。

老威：连三轮钱也给不起？

赵二：地头蛇，惹不起。他没向你抽人头税，就是天大的人情。况且拉贼三轮的，真碰上敲榨，也不敢报案，到了派出所，你算自投罗网。五块石一带，小偷都抱成团，金堂帮、新津帮，帮与帮还常打群架，动刀子呢。

老威：伤人么？

赵二：连肠子都挑出来了，就用我的三轮，拉到一个小诊所缝合，嘿，啥子医生，戴个老花镜，像老娘们纳鞋底一般，把线扯得呼呼响，血淌个不停，就在手术床下放个洋瓷盆，哒哒哒，把医生护士的裤脚都溅湿了。我见得多了，一般死不了。最狠的数彝胞，黑压压的一大片，在马路两旁蹲着，像秃头鹰，他们白天披着察尔瓦一蹲就是一天，好像不吃不喝，只有随地大小便，才挪动位置。半年前，五块石还是他们的地盘，内地贼帮不敢惹，只有撤退，他们管彝胞叫“乌云”。

老威：这倒很形象。

赵二：彝胞特懒，如果不是饿急了，一般不抢行人，可是专抢小偷，只要见你得手，他们就黑压压地跟上你，然后展开察尔瓦，把你围在中间，“哦！哦！

哦！”一顿怪叫。识相的交出钱包则罢，若要反抗，彝胞的刀拔得比你快，并且在毒药里浸过，随便挑你一下就要感染，伤口溃烂，几个月好不了。

老威：小偷成了彝胞的打工仔了。

赵二：差不多。所以彝胞迁移到哪里，哪里的小偷和强盗就绝迹。结果，彝胞就自己动手。一般在深更半夜，彝胞像夜猫子，挨门挨户地袭击居民小区，只要一根带钩的绳子，他们就能飞檐走壁，这都是山区练出来的，只要没上年纪，几乎个个都是爬岩的高手。彝胞的特点是见啥收啥，阳台上挂的香肠、腊肉、衣服，甚至奶娃子的尿布，都一齐装进察尔瓦里，如果入了室，只要是搬不走的东西，冰箱、洗衣机、沙衣等等，都统统砸个稀巴烂，所以民愤极大。每年警察都要清剿彝胞聚集的地方，拉一大网，连耗子也逃不掉。除了有作案嫌疑的，不管男女老幼，全部遣送回去。彝胞最害怕这个，一见警察就四处乱窜，有的还朝下水道里钻。下面在钻，上面在掀石板，硬拖出来，裤子都掉了。这样整治过后，得清静 20 多天，贼娃帮才会卷土重来，这下子，住家户拍手叫好，过路行人却惨了。

老威：你见过扒窃么？

赵二：两年前还是单个的贼，悄悄摸人家钱包，现在结成帮，就明目张胆抢了。扯耳环、项链，几个人把女娃子的手掰开，倒抹戒指，最容易糟的是花枝招展的婆娘，挎一个巴掌大的皮包，屁股把人的眼睛都扭昏了。嘿，一眨眼，皮包带就被割断了，有时不是割，简直是硬生生地扯，你喊抓贼，谨防后脑勺挨一石头。有一次，我拉一个老板过老成摸彭路口，那老板长得像匹山，还喂喂打手机，把我累闭气了，不料从背后扑上来六、七个人，勒颈项、扭手、抱脚，差点把车子都按翻了。他妈的，老板衣裤所有的兜都被抖出来，

皮带也被抽了，连内裤也伸进手去捏了个遍，最后，公文包、手机、皮鞋全被拿去，老板求把皮鞋留下，否则不好走路。贼说这盘收获不多，要把皮鞋提回去，撬底子，看彝没彝宝贝。老板被抢得瓜兮兮的，那么大个人，还捂着脸哭了半天。

老威：你是啥东西，看着大白天抢劫也不报警？

赵二：我走得开么？我腿都吓抽筋了。况且，这种事不是一次两次。我管？找死啦？

老威：那你当时咋想的？

赵二：我就想着我的车，万一摔坏了，修理还得花钱，所以在旁边干着急。那老板笨得像狗熊，看模样倒像有武功。我帮着那些人推他，他就是赖在车上。后来，我问他要车钱，他还骂人。

老威：有觉悟，真他妈有觉悟。

赵二：先生你是讽刺我吧？我这个等级的人，也值得你讽刺？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我已流落街头了，没有做英雄好汉的本钱。虽然，到处都在放英雄好汉的录相，我经常看，一块钱，看两部，还有一杯面面茶。前头巷子拐弯，就有四、五家，塑料棚子里黑麻麻坐了好几十个人，都是打工仔。这就是我们的娱乐，天天看录相，就说明运气好，工打得顺。先生，你是记者吧？记者还是有做英雄的本钱，管闲事受了伤，报纸要登，电视要演，自己不出医药费，说不定还要得奖金。

老威：你在胡说八道，我记得九眼桥和五块石都整治过好多次，警察花了大力气。

赵二：这世道穷人太多，都想发横财，我没去偷，就算有觉悟了。这雨已经下了十来天，明天会咋样呢？鬼晓得。

89　影子杀手赵苗苗

采访缘起：赵苗苗的“事迹”在监狱传为笑谈，当我偶然听一位警察讲起时，不觉目瞪口呆，于是动了拜访的念头。我动用了许多关系，终于在 1991 年 8 月 2 日如愿。

当时太湖正闹水灾，据报载，某地监狱为防水患，已把犯人转移到防洪大提上。而赵苗苗倒安然无恙，一如既往地在监舍练习“射击”。赵苗苗杀了人，依律该斩，只因为犯罪动机不明，两派权威专家对其是否是疯子争论不止，所以在重庆市某看守所一住四年。他曾是杀人碎尸犯卢人标的邻居，相似的个头和脸谱，像双胞胎。据看守介绍，赵苗苗除了“射击”不止，其它行为无异常。由于做手工活卖力，他曾被评为先进人犯，多次得香皂、毛巾、牙膏的奖励。赵苗苗已 35 岁了，还保留着某些儿童的不良习惯。

老威：你在看守所关了几年？

赵苗苗：你是我的律师么？我已经四年没见过律师了。我也从来没请过律师。我是山城第一杀手，抓我的时候，来了一百名刑警。我以为早该判死的，等了这么久，终于来律师了。哪个出的钱？我啥时出庭？

老威：我也不晓得。喂，杀手，你既然那么大名气，肯定探你的人不少。

赵苗苗：我四年没在社会上混了，兄弟伙早把我忘了。半年前，我妈来过一次，我写了八封信，邮票也是借的，她才来一次，大冷天，她只给我送进来十块钱，一双长统丝袜。我穿在身上，连肚脐眼都被封了，前头还鼓一包，像个跳芭蕾的，惹得全房的贼都笑。这老疯子，我明明要她送 50 元现金，还有绒衣绒裤，她偏要讽刺我，送丝袜！这是让我冷了就在房里跳舞玩。监狱里敢跳舞么？我一怒之下，就给老疯子发了封信，可管房政府给卡了，还把我狠狠训了一顿。

老威：你写了什么？

赵苗苗：我悄悄带出来了，你看。我写不了多少字，只能用图表示。有些字原来也认得，久不碰面，就有些生疏，就像我们街上的有些人，我看着面熟，就是叫不出名字。你认好了，这个乱鸡窝一样的白发老太婆，就是我妈，现在已经不叫妈了。老疯子。对，老疯子举手投降，嘴里还喊饶命。她的裤子吓掉了，瘦屁眼儿淌下的这几点墨砣砣，叫屎，这几团雾，叫屁。为啥把她吓出了夹屎屁？是因为这把大号手枪抵住了她的脑门，扳机还没抠，否则上半身就全开花……!！过瘾惨了！请你把这封信带给老疯子，让她马上送 50 块！最后通谍！

老威：这封信还是留着，我这儿有 50 元，你妈带给你的。

赵苗苗：老疯子开窍了？这一晌，我天天都在舍房里练枪法。对着电视，对着墙，对着其它贼练，好久没举行实弹演习，见着铁栅外武警背着枪，就咽口水。昨天中午，大白天做梦，与警察对射，不料上头武警却拉着枪栓，命令我站起来，原来不是做梦。老疯子不送钱，我就把每个人都认成老疯子，我每天枪毙她一万次，她肯定会有感觉。好，钱我收下了。她的伤势如何？

老威：谁的伤势？

赵苗苗：我妈。

老威：她没受伤。

赵苗苗：咋会送钱来？对于老疯子那种吝啬鬼，拿钱叫出血，我给你开张收条，拿回家给她止血。将就这张，我把手枪撕下来，下面写几个字："暂时留下你的狗命。""暂"啷个写？

老威：你有毛病吧？

赵苗苗：上次的律师也这么说，于是把我送到医院做脑电图。我有啥毛病？杀人抵命，借债还钱，我又不想抵赖。

老威：你说你是山城第一杀手，你受雇于谁？

赵苗苗：我杀人如麻，受雇了很多家，嘿嘿，暂时保密。人家给了钱，在美国和瑞士银行给我存了户头。这个户头，你如果答应

做我徒弟，我也可以传给你。全是金条子，把重庆市都买得下来，等我出去之后，就先给乔石打电话，让他开办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兵工厂，先把下岗工人给我解决完。还有乔丹，还有戈尔巴乔夫。反正都是带“乔”的。嘿嘿，我说漏嘴了，反正带乔的都是自己人，是雇主，我是国际主义，是白乔恩。

老威：白求恩。

赵苗苗：白乔恩!!! 还是律师呢，张口就是逑！太不文明。

老威：我叫乔脑壳。

赵苗苗：那就是组织里的人了。

老威：张春桥同志还健在吗？

赵苗苗：关在秦城……他妈的！你这叛徒，都关进来了，就你还在外面。

老威：你晓得 5・21 枪战么？

赵苗苗：5 •21？这是暗号。每次雇主不会直接出面，都用 5 •21 接头。对方递一箱钱过来，叫“5”，我收下钱，回答“21”。

老威：亏你是山城第一杀手，连 5・21 枪战都不晓得。江北的斧头帮和市中区的解放帮在大桥下面黑吃黑，双方的管事都被丢翻了。枪战打了一个多小时，警方才赶到。

赵苗苗：他们用的啥子枪？

老威：当然是火药枪。

赵苗苗：混战没意思，挣大钱的都是单干户。

老威：你到底杀了好多人？

赵苗苗：天哪么多。

老威：这是吹的。据你的管房政府说，你只杀了一个人，而且还是女的。

赵苗苗：不错，是女的，住我楼上，她是双枪老太婆的后人。

老威：你把双枪老太婆的后人都干掉了？佩服。

赵苗苗：你不要看我个头小，练武的人都是这样，精骨人。那

婆娘就欺负我这一点。我恨她的时候，她就故意不看我。当然，不看就不看，练武的人宽宏大量，你不看我，我就懒得恨你了。可叫人气炸肺的是，她的电视天线竟然牵到我的窗外！占了我的天空，每当想到我的天空中有一根仇人的电视天线，我就失眠。我拿竿子去戳那天线，自己的电视却在抖。原来那婆娘把她的天线连到我的天线上。这是啥子意思？她莫非对我有意思？这个淫妇，娃儿都上小学了，还拿天线来勾引男人！我是哪个？山城第一杀手。看得起她？于是我戳断电视天线，大家都搞不成。可是居委会大妈又来了，后头跟了一大帮，围住我就开批判会，还把祖宗三代都联系上，说是我爸的遗传。这不是闹文革么？

老子有问题儿子也有问题。终于，老疯子回家了，承认“破坏闭路天线”的罪名。这一下，我的仇更深了。

我开始熬夜制造火药枪，床底下，有一箱子弹壳，那是我爸的遗产，文革武斗时从街上捡的。有了子弹壳，这枪就太容易造了，其它原理，同弹弓差不多。我半个月做了七支枪，又到废品站回收铁砂子，最后去杂货店买一百盒火柴，把老板娘骇了一跳。她问我：“苗苗，想做生意啦？”我点头回答：“对，军火生意。”回家后，我就上床，在被窝里打着电筒，用铅笔刀刮火药。我连干了一个多星期，把刮下来的火药用布包好。其实，一百盒火柴连一捧火药都刮不够。我又干了一个多月才把弹药储备好。

在作战之前，要进行军事演习。好在除了星期天，我妈都是早出晚归，她退休后，就卖报去了。我一个人在家，把床当作战壕，我埋伏在战壕里，拿枪瞄准敞开的门。有一回，我的枪走火，把来收电费的大爷打了，幸好只是耳朵流血。我妈回来，把我的武器没收了。但她一走，我又做了七把枪。

汲取教训，我把穿衣镜搬来对着门，每天向镜子里的敌人瞄准。我百发百中，每次听到楼梯口传来脚步，我就立即躲进战壕，只露出枪口。敌人渐渐近了，我的气紧，心剧跳。终于，那婆娘进入镜子，我一扣扳机，玻璃哗拉垮了下来。

为了节省弹药，三个月，我只换了 11 次玻璃，老疯子不拿钱

换，我就当着她跳楼，她把我从窗台上拉下来，就狠狠咬，把肉都咬下了，还是犟不过我。10 月一过，天就凉了，有天下午，我准备关窗户，突然听见脚步声。“仇敌来了！”我立即埋伏。窗子被风吹得啪啪响，雨也斜飘进来，狡猾的敌人往往选择恶劣的天气进犯！我正在猜测，那婆娘出现在镜子里，披头散发。她不上楼，居然直奔我而来。他妈的，你敢缴我第一杀手的械！“出去！”我命令说，她不理，我甩手一枪。怪了，镜子还好好竖在那儿，镜子里头的婆娘却轰地一声倒下去！

她满身都是血，躺在门口叫唤。我换了一把枪，冲过去抵着脑门又一下。

她不呻唤了，战斗结束。我坐在她身边，等候警察来绑我。嘿嘿，太奇怪了。

我想打碎镜子时，敌人就倒下；我要敌人倒下，却只倒镜子。

老威：你上过法庭吗？

赵苗苗：差点就上了。后来法院为我指定了律师，开庭前，他来了一次，接着我没去法庭，改去了医院。以后，律师和法官都失踪了。他们说我缺乏杀人动机，其实我的动机就是天线。我已经关了四年，还要关多久？

老威：我也奇怪，为啥不把你送精神病院，那里有电击枪，专门对付你这种杀手的。

赵苗苗：精神病院全是疯子，我一个健康人为啥要去？我在看守所吃不愁，还可以一天折三千纸盒，混包烟钱。

老威：看来你在监狱里还挺逍遥自在。

赵苗苗：就是油荤太少。杀手没油荤，如同枪膛生锈。

老威：你的父亲不管你么？

赵苗苗：他也需要人管。

老威：进监狱里了？

赵苗苗：进医院了。

老威：这么说，你的病有遗传。

赵苗苗：我毙了你！

老威：我是组织里的人。

赵苗苗：暗号？

老威：乔。

赵苗苗：乔石、乔丹，还是戈尔巴乔夫？

老威：乔脑壳。

赵苗苗：同志，终于找到你了。

老威：看见了红星，看见了红旗。打不死的乔脑壳，我还活在人间。

赵苗苗：亲人啊，党啊，有啥任务就交给我吧。

老威：组织上派我来审查你的病，是不是遗传？

赵苗苗：组织上？

老威：组织上吩咐，一旦审查终结，就给你一百万美元和一百条枪，你被雇佣了。

赵苗苗：好吧，我坦白。我爸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武斗时就喜欢玩双枪，他曾经指挥军舰，攻占朝天门码头。四人帮垮台，他跟着倒霉，想不通，就疯了。做梦都喊冲啊杀啊，把我家的床和大立柜当作碉堡攻打。这下忙坏了我妈。几次找人把他朝医院送，他都逃了回来。但是，遇见街上有啥热闹的话，他就脱光衣裳裤子挤过去，把群众的眼睛吸引过来，并且发表演讲，边说边唱，边跳忠字舞。有一次，他还把煤油炉子放在我妈床下，点燃就跑，差点把我妈烧死。我平生第一个敌人是我爸，我练枪，可不敢朝他开枪，这不是我孝顺，而是不敢，他当杀手的工龄太长了。江青曾经雇他去杀华国锋，他入不了中南海，才回来的。后来我长到 25 岁，觉得应该比我爸更厉害了，就在家里与他对打，把床当成战壕，我们一人占一边，对射。子弹打完了，就滚在一块互相掐脖子。好几回，他翻白眼了，我才晓得他是我老汉，就一松手；他就反过来掐得我翻白眼，我蹬腿舞手，快不行了，他才晓得我是他儿子。后来我们数一二三，一起松手。

我们亲密得象战友一样。他手把手教我枪法，教我斗走资派李井泉。把我的脑壳朝下按，还给我挂黑牌，在家里游街。我与他商量："现在改革开放了，不是这套耍法了。"他问："哪套耍法？"我说："吃喝嫖赌。"他说："你娃学坏了。"我说："你娃过时了。"他问："哪点过时了？"我说："现在当杀手挣钱，你不挣钱。"他说："阶级觉悟就是钱。"我拿出钱让他认：

"这是票子，还是觉悟？"他想了半天说："你把这票子给我，觉悟就提高了，这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我气坏了，就骂他："你疯个屁，见钱眼开。"他恨了我半天说："你说我不疯？"我说："装疯！"他又说："你说我装疯？"我说："是装疯！"

他一把扯住我说："那好，我们走。"

我和他来到街上，他说："我要脱裤子了，你敢不敢？"我说："敢。"

于是我们都脱了裤子，引得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他说："我要上台发表革命演讲，你敢不敢？"我说："敢。"就上街中心的岗警台模仿《列宁在 1918》："反革命的烈火从东边烧到西边……他们要我们死亡……死亡？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我爸被我镇得不敢上台，只好在台下跳忠字舞。一会儿，警察赶来了，要抓我们，我们一口气跑到万福桥才停下，他说："敢不敢跳水？"我说："敢。"就卜通跳了。我爸跳的时候，脑壳碰着河床了，游到对岸时，满脸是血。这时候我问："敢不敢去医院？"我爸心虚，不吭声，我就又说："你老逑了，疯不起来了。"我爸一听，顿时火冒三丈："你才老逑了，走！"他前头领路，杀进精神病院，不用办手续，里面就把我们收监了。我急忙声明："我是送我爸进来的。"医生说："你光着屁股陪他来？"我说：

"我不光着，他会来吗？"医生一想有道理，就丢了套衣服让我穿上回家。我爸不依，死活要跟我走。我只好指着过道上的痰盂说："敢不敢端起喝？"他说："敢。"就端起来凑到嘴边，可里面的东西太臭了，他皱起眉毛不敢下口。我一把夺过来，仰起脖子就

把痰盂灌了个底朝天。我爸呆了，这个假疯子，只好跟倒医生走。

我转身跑回家，躺在床上就梦见一个大痰盂。从此，我成了我爸的爸，只要把手枪瞄准他，他就举手缴械。最后，他就安心住医院，再也不回来了。

老威：你把这情况给律师说过么？

赵苗苗：这是组织秘密，不能告诉外人。

老威：你妈也没说？

赵苗苗：她是哑巴。

老威：我的审查任务完成了，同志，你的病不轻啊。

赵苗苗：我没病。

老威：组织上让我命令你，把你刚才说的向政府坦白。

赵苗苗：我刚才说啥了？

老威：你爸爸。

赵苗苗：我是你爸爸。现在你已经审查过了，该我审查你了。

老威：我是你上级，你以下犯上。

赵苗苗：不行，同志，你有病。

老威：我没病。

赵苗苗：你敢对抗组织？叛徒！甫志高！

老威：……

赵苗苗：我代表人民。啪！啪啪！！啪啪啪！！！

90　工作组组长郑大军

采访缘起：2002 年 6 月 28 日下午，星期六，我与妻子搭长途客车去崇庆县九龙沟躲避酷热，黄昏在沟头红纸村某农家大院投宿时，认识了山野散步归来的郑大军先生。

郑老 72 岁，原籍河北，宽身板，亮嗓音，一望便知颇有来历。他是县团级离休干部，但目前已习惯了闲云野鹤的生活。当其回首几十年前，自己初涉仕途，任县委下乡工作组组长的历史，不禁悲从中来，几番欲潸然涕下，“大冤案啊，”他叹道，“饿死几千万人，可至今没个正式的交代。”

老威：老人家好逍遥！

郑大军：穿了一辈子制服，再不逍遥一点，黄土就埋齐脖子根了。告诉你年轻人，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已十年，每年都要来这回龙沟，找一农家乐（接待外来客的农家院子，包吃住，月费约 450 元人民币——老威注），避暑几个月，连世界观都住变了。

老威：除了党报，现在可没人在乎世界观了。您以前做啥工作？

郑大军：四八年参军打老蒋，五零年转业到地方，搞土改，学文化，从此步入仕途。算啦，提这些老皇历没意思，而今无官无职一身轻，正好为自己活两天。

老威：率性而为？难得难得。

郑大军：年轻人，你的马屁拍得肤浅，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有几个能“率性而为”？1959 年庐山会议，上千万共产党员中也只有一个彭德怀“率性而为”，上书毛主席，反映真实情况，“为人民鼓而呼”，其下场如何？相比之下，我这种多如牛毛的县团级芝麻官算个屁。

老威：您算个屁，我就只能算个跟屁虫，嘿嘿，扯个笑话。老人家，彭德怀的冤案早已昭雪，而今，造成三年大饥荒的不是天灾是人祸，已不再属于国家机密……

郑大军：党对不起农民啊，和平时期，比世界大战死的人都多，可至今没有给人民一个正式的交待。

老威：我是 1958 年大跃进出生的，60 年春天饿出水肿病，差点都没命了。您当时呢？

郑大军：58 年我 26 岁，是××县委农村工作组的副组长，在放卫星的第一线——东阳公社二大队蹲点，检验大跃进的成果。当时，反右斗争刚刚结束，中苏关系即将破裂，毛主席、党中央认识到，中国必须独立自主，以自己的方式在短期内完成初、高级社会主义过渡。形式逼人，共产风在上下一心的运动激情中越刮越猛，终于不可收拾。放卫星成为时代潮流，各行各业，钢铁卫星，轰麻雀、拍苍蝇的除四害卫星，诗歌卫星，犹为恐怖的是粮食卫星。我蹲点的地方属丘陵地带，田地肥沃，风调雨顺，盛产水稻、小麦和玉米，兼产豆类、红苕，本来算传统富庶之乡，可共产风一刮，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人类在造假方面的想象力是无穷的，比如上面一推广“合理密植”创高产，那些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们因怕戴“保守落后”的帽子，竟当着参观团的面，把秧苗像开大会一般热热闹闹地密插。小麦、玉米也如法炮制，结果青苗倒满眼绿，就是季节到了不抽穗、灌浆。那时候，只要敢吹牛，一不小心就上报纸，还配大幅图片，紧接着，各级检查参观团如潮水般涌来，里三层、外三层围住“亩产上万、几万”的示范田，赞不绝口。所谓示范田就是把山上沟边的几十亩水稻连夜抢收，并移植到大路旁的一亩田内，那光景真是密不透风，记者把娃娃抱上去拍照，谷穗竟丝纹不动。58 年秋，“钢铁元帅”升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达到白热化。男女老幼都上山，不是秋收，而是砍树、捡矿石。当地从古至今都没听说过铁矿，乱捡回来的黑石头，与挨门挨户搜缴的锅碗瓢盆，甚至锅铲、火钳、门扣、门环一起投入土法上马的小高炉，没日没夜地架柴禾狂熬一气，最终炼出了嵌着些碎矿石块的废铁疙瘩。造孽呵，山砍秃了，庄稼烂了，颗粒无收，连苞谷杆也被秋雨给泡垮了。面对冬天，发高烧的社员们冷下来，日子没法过了。

老威：往年存的余粮呢？

郑大军：大办公共食堂时征用了，一平二调嘛。

老威：一平二调？

郑大军：就是以公社为单位，实行全面的平均分配，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任何财产，为彻底铲除私有制，走向人类大同铺平道路。说得简单些，就是一切归集体。每家的灶台都拆了，碗筷也上缴了，因为有了公共食堂，有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小家庭就不用开伙，否则违法。猪、羊、鸡、鸭统统进了集体的笼圈，有的社员甚至从家徒四壁中搬出来，住集体茅棚，好让人民政府放心。开头几天食堂还挺红火，大锅饭嘛。我们工作组一进食堂门，大伙就全体起立，放下饭碗鼓掌，并齐唱《社会主义好》。我问："伙食好么？"大伙回答："好！"我又问："吃得饱么？"大伙更响亮地回答："饱！"此时，有个豁嘴老头还出场打了一段赞美快板，大意是从今以后不靠天，不靠地，只靠共产党端碗了。

我们在大队党支书的陪同下检查了厨房和每张饭桌，红苕稀饭敞开供应，玉米窝头在笼屉里堆成小山。我惊讶地问："这也敞开吃？"支书回答："无论大人、娃儿，每人限吃四个。"我说："这窝头足有三两吧？小孩没撑着？"支书说："农村娃儿撑不着，蹦两蹦肚子就瘪了。"我厉声批评说："要有计划，不能浪费！"支书连连称是。由于准吃不准揣，农民们顿顿死撑，稀饭锅里的红苕没人舀，窝头皮满地扔。

大队干部五、六人簇拥着我们进小饭厅，桌子上已摆好两脸盆红烧肥肠和回锅肉。我问："这是咋回事？"支书答："前天公社批准杀猪，经支部研究决定，留了些下来慰问工作组，这也是社员们的一番心意。"

我和其他同志都拒绝搞特殊化，命令把肥肠和肉加菜烩了一锅，在晚餐时按人头分给社员。那年头，我们常下乡，对农村干部的阳奉阴违深有体会，但时代风气如此，谁不识时务，就要犯错误，所以没人对公共食堂的浪费现象提出异议。

直到两年后，我率领整风整社工作组一行四人，进驻同一地方，落实《十二条》（即 1960 年 11 月 3 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

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文件的核心是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努力纠正 1958 年以来在农村刮起的共产风，彻底清理“一平二调”——老威注），才发觉其后果的严重性。

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共食堂一派破败，靠厨房的隔墙已经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上百号社员排着长队，捧着碗，有气无力地绕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绕圈，领取一勺照得见人影子的午饭。这是将政府救济的陈谷子连壳带米碾细，再下锅狠熬出来的糠米粥。后来了解到，是因为工作组大驾光临，大伙方能领到如此“见米”的上等货色，若在平时，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苕，一人两小砣；或者清水野菜，撒几把珍贵的米糠进去搅匀，如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豌豆，那就近乎奢侈了。

我们四个人躲在门外，观察了好一阵，组员老王示意大队支书不要声张。桌子、板凳都失踪了，人们领了饭，迫不及待往嘴里倒，却没有一个人被滚烫的粥伤着。队伍继续移动，除了勺碰碗的声音，一切都显得空荡荡的。终于，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围成九个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专心，仿佛要把已经透亮的碗舔穿。没舔碗的直喘气，似乎开饭是体力活儿。我们呆了，不禁面面相觑，作为党的干部，我们深为自己没有被饿垮的身子骨羞愧！

趁我们发楞，大队支书却按捺不住提步进门，大吼一声：“欢迎工作组同志！”

于是全体起立鼓掌。我们只得露面，招呼大伙。不料社员们却有节奏地边鼓掌边背诵：“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一连背诵三遍，就有五、六个人因元气消耗过度，倒地昏厥过去。我忙叫救人，老王掏出临出发前带的一封压缩饼干，泡在开水碗里捣散，依次灌了。

当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十二条》，并当众宣布将“一平二调”中擅自调拨的私人财产归还原主，许多社员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老贫民牛东山说：“终于可以死在自己屋顶下了。”而大队、生产队两级干部都阴着脸，没一个吱声。散会后，大队支书埋怨说：“现在才来纠正共产风，意义已经不大，因为这两年大伙偷的偷，

拿的拿，集体财产都搞光了，连米糠缸子也给砸了。大河断流小河干，住在自家屋顶下有啥用，瓦又不能吃。”我批评了这种悲观情绪，大队支书顶撞说：“凭共产党的良心，我这个书记没有亏待社员，除了上面领导视察时陪点吃喝，我没有搞明显的等级。饿死的社员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难受么？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都吃人了……”

我们大吃一惊，我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讲，要负责任哟。”大队支书把胸脯擂得崩崩响：“百分之百负责任！我闺女前天逃回娘家来，说她们生产队几岁的女娃儿快叫吃光了。”

事关重大，当机立断，我派老王连夜赶回县委汇报，我则立即去后山五大队，把最新“敌情”通报派住那儿的工作组刘、聂、姜三同志，他们还被蒙在鼓里！

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 82 户 491 口，仅在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11 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 7 岁以下的女童 48 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

最早发现吃人的是生产队会计王解放，据他供述，1959 年底，公共食堂无粮下锅，经常“变相断炊”。所谓“变相断炊”，即灶房只敞开供应白开水，而把从社员的牙缝里强制节余的度春荒救命粮扣下来，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因为“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去了革命的主心骨”。

按当时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开伙属违法行为，所以干部们半夜填了肚子，还肩负着巡逻的重任，要保证家家房顶不冒烟——如此“坚壁清野”持续了一年余，而唯一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广大群众只好放弃生产自救，满山疯转，捞着啥吃啥。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相恐后地铲回家。

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带土色，有的咽气时还发出“哞哞”牛叫。连蚯蚓和地蚕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乡村四、五十岁以上的社员，普遍尝过观音土（有的地方叫白鳝泥，一种有

光泽的白色黏土），饿疯了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一撮泥一口水，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肚皮就沉甸甸的，并且越来越沉，终于，饿转化成痛。当人们抱着肚子，倒地打滚、痉挛，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泻药：生菜油，桐油，最厉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时也化胃肠粘膜，令你最终走向胀死的反面——泻死。尽管如此，观音土仍是宝物，它带腥甜味，进口感觉似乎比锯齿草还要好些。

所以人们掏泥把山都掏亮了——王解放说——人吃人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开始的。

他说："那晚轮到我和出纳、保管巡逻，已是下半夜，我们沿着村子转了一大圈，肚皮又瘪了。出纳说：这餐加的，屙泡尿就不行了。我说：你吃了四个玉米窝头，咋不行了？出纳说：没油荤，吃多少都不顶事。保管说：你等着吧，到了共产主义，让你一天吃一头猪。出纳说：

你现在就变成猪，让我啃一口。我说：莫开这种没觉悟的玩笑，想想普通社员咋过的？

"于是三人都不吭气了。那晚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月亮钻出云层，照着雪地，格外晃眼睛。保管突然说：我看见冒烟了。我和出纳正揣着手，准备回家呢。保管又说：他妈吃了豹子胆！

"我们一下来了精神，就趴在一堵山墙后面仔细观察，果然有几丝淡烟兜着圈儿顺风斜飘。队里的情况我了如指掌，可此刻却不敢相信这烟是从莫二娃屋顶冒出的，人家是老实巴交的贫农，家里八口人饿死了两口，也从来没有违犯过政策！

"况且这年月有啥可煮的？

"二娃家房前房后都是敞地，我们就迂回包抄，还匍匐前进了一会儿。我望见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风，大冷天也不怕冻掉屁股。没看出来呀，叮当响的穷棒棒也打饮食埋伏，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我们从后门撞入灶房，手电一打亮，莫二娃那一窝耗子就乱窜开了。我喊：不准动！保管举起鸟枪，朝天轰一炮，把房顶冲开

个窟窿。

惊慌之中，不晓得谁踩翻了地下正咕咕冒泡的盆，烫得我们直跳脚。汤泼进灶坑，激起一片水气，把屋里全弄雾了。点灯！我揪住莫二娃命令，这狗日的卜地瘫了。出纳摸出火柴，划燃马灯就地一照，顿时傻了。

“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胆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了口地灶，平时用石板扣着，要偷煮东西时才挪开——他这次煮的是自己的亲生幺女，3 岁的树才妹。难怪这么大的油荤，嗅两下都穿鼻。当锅用的脸盆四周，到处是小拳头大的肉砣砣，出纳埋下腰，用筷子戳起一砣，热腾腾地举到灯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蜷裹成诱人的一团，把个保管看得眼发绿，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衣角，叫寻根绳来捆莫二娃。话音没落，莫二娃嗷的一声，做了倒地门板，这畜牲抓了一砣好肉就塞口中，我估计是小腿肉，因为我们卡脖子撬开他的嘴时，那牙缝还嵌着竖条的瘦肉丝。既然做老子的开了虎口，这一窝野种就疯逑了，当我们的面，一人抢一砣肉啃。唉，我们三个人六只手，揪住这个溜了那个，莫二娃的老四，九岁的狗剩，边躲我们边撕肉吃，还把耗子一样尖的嘴壳戳进去，滋滋吮骨油。保管惹火了，就出屋借月光装了满枪管火药和铁砂子回来，抵住莫二娃，我按住将他捆了。待把这男女老幼五口绑成一串，押到大队时，天已大亮。

“作为证据的碎骨头装了半背兜，头颅也在屋旁土坎挖了出来，空空的骨器，外无面皮，内无脑髓，作案手段真是残忍之极！大队支书怒不可遏，权充法官升堂，莫二娃一家却在阶沿下呜呜咽咽，叫起冤来。

他说：树才妹生下来就缺奶，连米汤都没没喝饱过，好不容易熬到三岁，连路都走不稳，她命里只该活这么大。支书大吼：晓不晓得随便杀人，国法难容？莫二娃回答：与其饿死，不如让她提前咽气救全家。二娃婆娘磕头哭诉：我们全家都吞了观音土，没油荤过不去嘛，妈心疼的树才妹哟，下辈子投胎莫变人了。

“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释放了，大队干部们再三研究和权

衡，决定为了官帽而压下这起吃人案。”

老威：人命关天，居然敢不上报？

郑大军：我们当年审讯王解放时，也这样问，连口吻都一样。可他反问：上报了又能咋样？国家都那么困难。

老威：还忧国忧民呢。

郑大军：我说上报了就能刹住吃人歪风，人民政府再困难，也会发放救济粮。王解放说：我们队已经领过救济粮了，一户人 70 斤陈谷子，管一年，牙缝都不够塞。

老威：我在图书馆查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一些原始材料，的确艰苦，连毛主席都穿打补丁的衣裳，自己在屋前开地种菜；国家主席刘少奇则去郊外拣野果，琢磨饥荒中的粮食替用品。中央领导们都纷纷要求降低生活标准。

郑大军：这些报道我都清楚。我觉得这笔账应该算在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头上，他一直瞒着中央在搞统购统销，都饿死人了还搞，还吹嘘风调雨顺，粮食吃不完，能调拨多少多少援助兄弟省。罢了，扯远了，总之那年头人命如草，不仅会计王解放，连吃人生产队的队长也抱我们的腿，痛哭流涕。

老威：干部也吃人？

郑大军：有权力就有食物保障，当然不必吃人；可普通社员家，吃人风泛滥成灾了。莫二娃一放，大伙私底下奔走相告，以为政府默许这样做。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非劳动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操家伙在自己家里下手；不忍心的，就抹把泪，与邻居约定交换着下手，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那时的小孩都骨瘦如柴，连皮带肉，带碾碎的骨渣骨粉，也不够一门饿鬼吃几天，于是稍有远见的社员，就上远处绑邻队的娃娃，还到处挖陷阱，设兽夹。有种外表涂过油的“糖果”叫“欢喜豆”，过去用于炸狼，现在没狼，就成了小孩克星，嗅着馋香，不禁送嘴里咬，崩地就炸个面目全非。待家长们闻声赶来，原地就只剩下一滩血浆了。

老威：我读过一篇文章，名字和作者都忘了，谈到三年大饥荒中，某地发生过贫下中农围剿地主和富农，当场宰杀，放入露天大

锅内煮熟分肉的事，那欢欣鼓舞的场面，令人久久难忘。您经历过类似的“阶级斗争”

惨剧么？

郑大军：没有，并对这篇文章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不得已而吃人的主要原因是饥饿，而不是阶级斗争。土改伊始，剥削阶级在历次运动中都受打击，吃人并不光彩，哪怕吃坏蛋，也只能偷偷摸摸，让人民政府晓得了，一定会追查到底。

老威：您是工作组长，政策水平高，您的水平并不能代表全国各地基层干部的水平。

郑大军：这个问题就不争论了。

老威：那吃人生产队的案件是如何处理的？

郑大军：进入司法程序，该杀的杀，该判的判，毫不含糊。不过《判决书》上，都略去了背景和原因，也略去了种种吃人的情节，因为是公开审理，要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形象。莫二娃虐杀亲女，又制造“欢喜豆”炸死邻队两个男孩，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听说枪毙时他还吼了几声“无罪”，把执行民兵骇呆了，结果换上正规法警，连发三响才栽进坑中。

老威：后来呢？

郑大军：啥子后来？

老威：饥荒还在继续么？

郑大军：一直到 62 年夏天，国民经济才有所好转。而我们工作组除了处理恶性案件，解决问题干部，其主要任务就是“纠偏”，发动群众自救。

公共食堂解散了，社员可以领回属于自己的财产，至少锅碗瓢盆又有了，打掉的灶台重新砌，开伙合法了。我们向地区行署、县委紧急汇报，调拨救命粮，至少保证每个社员每天半斤粮。以前吃大锅饭，半斤粮经过大队、生产队两级克扣，到个人嘴里不足二两，几把苞谷面撒进一大锅清水，或者连糠带米加些红苕、野菜，一人一勺。今天，有我们工作组守在分粮现场，半斤就是半斤，谁也不

敢捣鬼。群众可以拿粮回家，自己计划着吃。当然，国家的救济能力有限，一时调不了粮，就运来些苞谷杆、稻草、麦杆，把它们碾碎了，掺水熬，大半天，或者一整夜，能够熬出些淀粉来，分给社员们炕饼子，很香。还派人搜集小便，倒入一个大缸里，再投放些垃圾，隔一星期左右，由于尿和垃圾的化合作用，缸面会发酵出一层绿莹莹的“苔藓”，叫“搅球藻”。这就是食物，薄薄地刮上来，兑些清水，可能的话，放点糖精，喝下去口感很爽。

老威：您们真是些廉洁的好干部啊。

郑大军：日日夜夜，满脑子都是“吃”，不瞒你说，当年我还没满 30，都白头了。可绞尽脑汁，饿死的人还是有增无减。61 年春荒过去，地里依旧颗粒无收，别提社员，连我的腿都浮肿了，一挤就出黄水，走路摇摇晃晃。工作组其它三人，都因吃糠咽菜便秘，躺床上，翘着光屁股，互相用挖耳勺掏。有时堵得深，勺够不着，就将勺把绑在竹签上，再深度疏通，鲜血长流，被掏的人一声高一声低地呻吟，惨啊。

不过那时年轻，能打熬，实在撑不住，就借汇报工作赶回县里，休整两天，在食堂大吃一番。县城各机关单位都在政府的号召下，向农村捐粮票，但是杯水车薪，乡下又流行吃人了。还好，没吃活人，而是把死人身上肉厚处割下煮。

老威：您们咋处理新一轮的吃人案件？

郑大军：这是司法空白，没法处理。撇开道德伦理，人肉毕竟比观音土容易消化、汲收，虽然吃人（应该叫吃尸体）会染上多种疾病。社员们没力气，家里死了人，就草草覆一层土，有时在掩埋之前，好肉就已经被自家人割了，所以，你就是当场捉住“盗墓贼”，也难以准确判断、定罪。

老威：啥子意思？

郑大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意思。铁的事实是，吃人比吃土的成活率高。

我曾经在某农家大院，目睹过如此景象：六个食土过量的社员头朝下竖躺在门板上，叉开腿，由他们的亲属把桐油灌进肛门。看

见我出现，那些濒死者都突然睁大眼睛叫：政府啊，我们没吃人，死也不吃人啊！

我吩咐放平门板，社员们解释说：桐油味道大，从嘴里灌要反刍，浸不进肚肠，还是倒灌来得快。我说桐油有毒，用生菜油吧。社员们说：一两年没嗅过菜油味了，只要能下掉泥巴，沤烂肠子也甘心。我说不行，大家说行，烂肠子总比泥巴胀破肚皮强。

老威：真是命贱如蚁。

郑大军：我能再说啥呢，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农民真纯善啊，死到临头还没造反的念头。不过，党有枪杆子，不怕人造反，而我们工作组是枪杆子之外的政策消防队，哪里有起火的情况就赶往哪里。

91　北京混混周二黄

采访缘起：据说周二黄这样的“名流”在各大城市都有，不过在首都北京更为普遍，谁也不清楚他们具体弄过什么，可文化艺术的事他们都沾边。

翻翻历史，似乎每个朝代都有这样的交际名流，女的叫“交际花”，男的不可能称“花”，只好暂时以“混混”代之。当年李白奉诏入京，红极一时，常与贺之章、张旭等名流出入青楼、酒肆，放浪形骸，并称“长安八绝”，我掰指头数来数去，也凑不够八人。显然，被史家略去的滥竽充数者，属混混之辈。有了这种参照，当混混也是名垂千古的伟业。不知周二黄以为然否？我在 1995 年 4 月 21 日夜访问他时，他已满嘴酒气和文化箴言。可爱的人谁不需要呢？混混又不犯法，而且使世界充满温暖。

周二黄：老威，你怎么混进来了？

老威：我是打着你的旗号进来的。没想到，地下音乐会还收门票，30 元一张呢。

周二黄：这不是普通的音乐会，这是“超载”，一流的摇滚乐。台上的号见过吗？比一辆汽车还长，澳大利亚土著吹的，那个加拿大胖子，我们叫他“白求恩”，负责吹号；拉小提琴的是美国人，大使馆的二秘，特别值得介绍的，还是扬琴演奏家某某，亚洲第一扬琴，大至雷劈，小至心跳，他都能敲出来。还有鼓手、电贝斯，都是空前绝后。老威，乡巴佬，今天你能混进来，真沾了咱周二黄的光了，你看周围的观众，洋人比中国人还多两倍，几乎都是各国使馆来的，一会儿幕间休息，我给你介绍介绍。

老威：我是冲着你来的，其他人就不用认识了。

周二黄：我还有很多应酬。你看，光是来来往往的笑脸，就够我点头的。我周二黄在北京，也算个名流，娱乐公司要开，酒吧要开，艺术要搞，书和广告也要写，有时，我也把这身名流皮脱了，

去街头充当马路求爱者，过过穷光蛋的瘾。

老威：周二黄，今晚你他妈的得先把心收起来，应付应付我，认识十几年了，你的底我还不清楚？哪样时髦玩哪样呗。

周二黄：老威怎么啦？是不是为了那盘诗歌朗诵带？不行不行，我的公司出不了，我要推歌星赚钱，这当中的难处，咱哥俩改天再喝酒聊，好吧？

老威：你的几任老婆都是歌星，就没一个成器的。你是招歌星还是招老婆？

周二黄：你的嘴还是这么臭。老威，我们都不年轻啦，该熄熄火啦。唉，今晚我也没法听“超载”了，看样子，你是不顾老脸要缠出个结果。我们出去找个店儿吧。

老威：这才像话。我每年都到北京，每年都见你忙。别，你先别打插，你的理由总是很大，好像北京城离了你，交通要堵塞，政府机器也要停转似的。

周二黄：不折腾，我这名流还当得下去吗？这是北京城，名流像地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冒出一茬，只有我周二黄是永远的嫩韭菜，你割不完。女人需要我，流浪歌手需要我，打工仔需要我，像你这样在野的作家，也需要我。我就象征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什么都涌进来吧，我这瘦胸脯容纳得下。我出过十几趟国，什么诗歌节，什么摇滚音乐会，我都混腻了，在老外中间，也就是吃吃喝喝，谁会关心你写过什么作品，谱过什么曲子。什么叫“不朽”？生命过程就是不朽，一夜搞一个女人，直到有一天突然不灵了，就是不朽。谎言就是不朽，只要谎言能让人高兴。再过几年，我折腾不动了，就停下来做绅士，成天溜狗玩，当然书和唱片都要有，满满的几屋子，我在中间像赏花一样，不一定要摘下来看，只感受那种气氛就够了。一个贵族，有各种阶层的朋友，由于他早年的活动，大伙都尊敬他，给他面子。各个历史阶段都缺不了这样的人——哪怕你老威这么狠，将来名扬天下了，也会卖二黄的账。

老威：我喜欢诚实的人，哪怕是坏蛋，也坏得透明。周二黄，你是从哪儿发迹的？

周二黄：三里屯，那里靠使馆区，外国人经常出没，酒吧特别旺。我最先做书生意，想约人写一本酒吧故事，主人公是一位 18 岁的少女，从外省来到北京，在她的眼里，什么都是新鲜的，不设防的，于是她走了进来，把青春、贞操、纯朴、真情全留在这儿了。她最先遇见的就是一个三流歌手，然后是三流导演，以招收女演员为名，到处骗人肉体的那种。后来，这个少女变了，把与人睡觉当作家常便饭。当然，这是一个很俗很滥的伤感故事，上个世纪的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写过很多。可这条线索能把三里屯和圆明园画家村流传的许多黄色段子都操进去。

老威：纯情少女堕落成女混混，这是写你自己吧？

周二黄：也包括我自己的早年故事，比如有一回，我单独一人在三里屯喝酒，见一女孩坐在角落里，神态很凄美，并一杯接一杯地灌酒。你晓得，那时我年轻，怜香惜玉，就凑过去与她搭话。先谈音乐，后侃各自的经历，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下就对上号了，我提出送她回家，她抹着泪说，自己也不知道家在哪儿。我一惊一喜，就叫了出租，把她扶到我的楼上，刚准备给她宽衣洗澡，不料她包里的 BB 机响了，我这傻逼还把电话亲自送她手中，她接了，酒也醒了大半，然后站起来，说要下楼一会儿。我等了一刻钟，不放心，就追出去，见楼下院里停了一辆面包车，一小子正在扇女孩的耳光，挺狠的，打得女孩靠在车上了。他妈太不叫话！我想都没想就冲上去拉住那小子，可他吼道："这是我老婆，你干吗？！"我刚要回吼他一句，脑袋就轰地大了，原来暗处还有一人，把一板砖砸下来。我昏迷了一天一夜，要不是过路的邻居送我到医院抢救，早被冻死啦。

这段教训把我的邪火浇下去大半，从此我的目光不光盯着女孩子，那没用，有了身份、地位，女孩子们会反过来盯你。你晓得，我的英语还凑合，在三里屯混个一年半载，与各国使馆的年轻人也熟了，我向他们提供了不少地下诗刊，介绍一些地下歌手，这种事干多了，阅历广了，百炼成钢，境界也就高起来。你老威想出国么？想参加诗歌节，或者当某所大学的访问学者么？把资料准备好，把钱准备好，邀请不成问题，护照和签证也不成问题，包在我二黄身

上。

老威：别说大话，有了钱，我不自己去旅游？

周二黄：这不是一回事。旅游？到新马泰？你又不是农民企业家，到哪些地方干吗？出了国，镀了金，还得弄一些名份回来。名份就是无形资产，什么场合都用得着。比如我，代表中国参加过欧美的四次诗歌节，一个写作计划中心，曾在三个著名大学访问、讲学，还同著名汉学家某某、某某某对过话，怎么样？吓唬中国人绰绰有余吧？

老威：我都被你唬住了，你写过什么东西？

周二黄：我写过什么东西？老外也会这样问。我写过诗、小说、散文、回忆录，可在中国出不了。还制作过广告，因为广告画面有些反党，也不出来。汉语很深奥，很隔阂，老外不太愿意深究，只要一出了国门，给你提供一个讲坛，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连放个屁也能代表中国。老威，你不是在写鸿篇巨制吗？拿出来我瞧瞧，介绍到外面去。

老威：我对你不放心。

周二黄：啥不放心，现在早过了“十年寒窗苦”的时代。

老威：你不会把我的作品说成是你的吧？

周二黄：嘿嘿，我只添个名字，咱哥俩合著。

老威：你这种东西，怎么没被那板砖砸死。

周二黄：开玩笑呢。老威，你把这些看得太重了，其实汉语作家在西方，就那么回事，翻译过去一本书，印数几百本，影响得了谁？我知道，你也没多少钱。我们来联手搞个出国文化致富的计划怎样？

老威：我洗耳恭听。

周二黄：我负责搞邀请，荷兰诗歌节的，哈佛大学、哥本哈根大学，甚至巴黎或牛津大学都能想到办法，还有国际笔会、爱荷华写作中心也行，你呢，负责拉几个有文化品位的商人，让他们与我们一道出国，当然，往返机票，旅行开销都得由他们全报。这是他

们打国际广告的机会，商务活动也可以与文化交流同时进行，而且，他们还能弄到“访问学者”、“特邀文化代表”的头衔。

老威：这事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好的，我回四川后再给你个信吧。好，这个话题就暂时打住，我们还是回到三里屯，你的酒吧故事弄好了吗？能不能拿给我拜读？

周二黄：我曾找了好几个写手，都不灵，这不是瞎编的活儿。后来，我又找到一个诗人朋友，我花钱，领着他泡一个月的酒吧，还付了订金。可他只写了两万字，我就让打住了。不，我不是说他文笔不行，而是他篡改改了我的创意。他把主人公由少女换成一只在酒吧里长大的母猫，认为以动物的眼光看人，更刺激、更自由。

老威：我也认为是这样。前苏联的布尔加科夫就写过名作《狗心》。

周二黄：我不否认“猫”的创意更艺术，说不定还能弄出后现代的经典来。但市场接受不了，市场需要煽情，以纯情少女为主角的书都能卖大钱。

老威：那你自己写最合适。

周二黄：这些年出没于社交场合，口才突飞猛进，但文字能力却退化得一塌湖涂，一摸笔就头晕，再说，后现代社会的特点是，炒作比作品本身显得重要。

老威：你可以口述，让秘书记录嘛。

周二黄：你在挖苦我，哪有这样当作家的？不过，这种“青春冲动”已逐渐平息了，不，后来又被新的刺激所代替。

老威：你的绯闻太多，讲一个有特色的。

周二黄：讲一个你感兴趣的，有一天下午，阳光明媚，我着一件印有“牛津大学”的黑色 T 恤去北大参加一个诗歌朗诵会。刚入大门，就有一只手从背后拍我，一回头，见一位金发女郎冲我微笑，“您上过牛津？”她问。

我点头，就与她天南海北地瞎扯上了，当然，诗歌会也就不去了。小姐是德国人，有位表哥去年刚上牛津大学。我被她迷住，眼

看太阳快落山，就约她一起去三里屯。

她彬彬有礼地谢绝，我就急忙与她敲定明天约会，她摇头，我说后天。最后，她好不容易敲定一个星期后见面。我熬呀熬呀，几乎就动了娶洋老婆的邪念，终于到头了。我把她接到家里来，你猜怎么着了我们之间有语言障碍！她刚到中国不久，汉语不熟，说英语吧，我平时水平还过得去，可要谈情说受还差了点。你别笑，我一般的求爱语言也会，但这不是一般的求爱，我是想……这个，嗯……一宿之欢……嗨，他妈的，汉语要隐晦些，有时绕来绕去就那意思，可表达得挺妙趣横生；英语不行，要么白要么黑。我万一直露地表现我的冲动，就同找鸡婆的行为差不多，人家肯定会严辞拒绝。就这样，狗啃骨头似的对话，进行了三个钟头，还没实质性的突破。我和她开始互相打手势，太糟了，她的蔚蓝大眼睛老是那么天真，而我都汗流浃背了，她见我坐卧不安，就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问："密斯周，您有事？打扰了。"我一听有收场的意思，眼泪都急出来了。她吃惊地说："您病了？"

我真犯病了，我趴在她肩上嚎啕大哭，并用英语吼道："yes！yes！我病了，在这个垃圾国家，做一个艺术家都有病！我太惨了！"这洋妞闻之一愣，同情心随之被激发出来，她替我擦眼泪，还拍我的后背安慰说："别哭，周，您会好的。"我见苦肉计奏效，便加紧放肆："我 34 岁了，从来就没好过一天，没人理解我！在我的祖国，我这样的天才艺术家连老婆都找不到！你不会了解中国人，唐诗宋词的浪漫已经没有了！这是个猪圈！您一个德国人，到这儿来干什么？来嘲笑我？我，我爱上了您，可我不是德国人。"

这一下，这妞被我的羊癫疯感动了。她抚着我的脑袋说："没关系。"我的身子直往她的奶子上压……下一步，我们就哭哭啼啼把什么事都做了。不瞒你说，我太入戏了，差点就没硬得起来。

老威：你为了一夜风流，把祖国，把唐诗宋词，把我们这些崇尚艺术的人，全拉去垫背了。我真佩服你这名流，卵蛋一胀，什么话都说得出口。

周二黄：是人就得活下去，不亏了自己。至于祖国呀，传统呀，

艺术呀，明摆着的，很伟大。伟大的有定论的东西并不因为我周二黄的亵渎就贬低了。你知道，我周二黄心眼不坏，如果坏，就不会让你老威看出坏来，就不会给你掏心窝子，把丑事一件一件朝外抖。我只是软弱，太没约束。60 年代出生的人，一睁眼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有理。这种阶级原则一垮，就再没东西值得信任。

老威：你就没尝试约束一下自己？

周二黄：约束？我是石头蹦出来的，父母约束不了；老婆，两三年一换；警察管不了，因为混混不犯法。哦，明白了，你是指宗教？

老威：信教也不错。

周二黄：我曾信过天主教。年前在西安的一个场合，我认识了三个女教徒，她们都有相当曲折的人生经历，可入教之后，一心向天主，渐渐就脱胎换骨了。为首的圣女叫樊音，我们对上目光后，彼此都砰然心动，她开口就称我为"上帝的孩子"，我不禁流泪了，急忙说："我不配，我的身上有撒旦。"她说："我们三位姐妹，今晚上会跪在圣灵之前，为你祈祷一个通宵，上帝是仁慈的，他会宽恕你的罪。"你听，这多动人，我妈也没对我说这么动听的话！于是，我就向她们忏悔，凡是能记得的丑事，都一一坦白。我还说："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所天主教前徘徊过一天，可守门的教徒就是不让我进去参加弥撒，他用挺凶的眼光钉住我，因为我的脖子正害牛皮癣，我怀疑他已看穿了我体内的魔鬼。"然而樊音说："这是个凶气笼罩的黑暗时期，撒旦大行其道，它有很多种化身，或许不让你参加弥撒的守门信徒就是撒旦的化身，你看穿了他，可你不敢上前与他搏斗，因为你看到的就是你自己的罪。现在，你忏悔了，那就与我们一起祷告，你将在祷告中感觉到仁慈的主在承担你的罪，洗清你，并赋与你一种信仰的力量。"

老威：这樊音真不简单。

周二黄：她还说："不是你病了，而是这个时代病了，20 世纪一开始，人类就染上了一场精神瘟疫，诱惑太多了，而种种诱惑都是撒旦的化身，而上帝只有一个。虽然我父慈爱无边，但在一次次

与撒旦的交战中，他退却了，几乎抛弃了人类，因为人们堕落的天性与撒旦一致。于是有了希特勒，有了南京大屠杀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人们被一幅幅末日图景吓坏了，又向上帝伸手。上帝因为他是造物主，他不能不为了天下苍生去降服魔鬼，下次决战在 1999 年，宇宙中将闪现威力无比的大十字星座。”

老威：《大预言》里也这么讲，有了这么个圣女引路，你该回头是岸吧。

周二黄：我苦心静修了三个月，酒色都戒了，一想到三个圣女为我这个陌生人祈祷了一个通宵，心里就热乎乎的，我周二黄也是对世道看穿了，才一天天混的，现在算慧根绽露，说不定将来能做一个牧师，派上大用场。于是我破天荒地写信，邀请樊音她们来北京，最好把一些好哥们都发展成教友。樊音她们果然应约来了，住在我家不出门，成天祈祷。有天下午我出门，她们也说要出去办点事，会很快回来。我把一串钥匙给了她们，自己在外面耽搁到夜里 12 点才回家。一敲门，没反应，我慌了手脚，把门擂得惊动了四邻也没辙。他妈天下着雪，这么晚到哪儿去过夜？跺了一会儿脚，快成冰砣子了，只好打车直奔三里屯，找个热闹酒吧。我三个月没来了，太亲切了。到了下半夜，酒吧也冷清起来，我喝得迷迷糊糊的，只好在附近找个丑得没人要的鸡婆，去她那儿将就着过了一夜。

第二天大早就回家，门里还是没反应。我熬到中午，真怀疑圣女们出车祸了。我一边报案，一边找锁匠，防盗门过分结实，连找三个锁匠也弄不开。只好从邻居家借把焊枪，在门上割个洞钻进去。圣女们的洗漱用品还在呢，这怎么办？

焦头烂额又过一夜，樊音终于来电话了，原来她们在京城迷路了，当天绕德胜门兜了不少圈。圣女嘛，一心一意迷天父，当然记不住我的地址和手机号码。她们当夜就赶回西安了，连电话都是在那边查到的。唉，现代社会有这种白痴！在她们的开导下，我周二黄几乎成了坐吃山空的蠢蛋。

老威：信教本身又没错。今后你多配几把钥匙不就行了。

周二黄：我哪经得这种折腾！特别令人恼火的是，几个月以后，

我的那地方居然冒出了两朵菜花!这尖锐湿疣不痒不痛,可最难治。我花了好几千元，菜花还复发了一回。他妈的，天主那样仁慈，我一心向着他，他干吗要这么惩罚我?

老威：你那晚经不起考验，又堕落了。那鸡婆也许又是撒旦的化身。

周二黄：我的鸡巴才是撒旦的化身。看来，只有掐掉它上帝才满意。

92 陈家桅杆见证人周开里

采访缘起：关于清代庄园“陈家桅杆”的新闻，本地媒体早几年就已经炒过，至今却加速破败到倾废的地步。

“你再不去，就永远看不到了”，学者朋友李亚东在去年的某一天叹息道。我当时没怎么在意，因为比这更有价值的传统民居也因无钱维护而在消亡之中。

“眼不见为净。”我敷衍道。

2003 年 6 月 13 日下午，雨没下透，天气异常闷热，有着浓厚考古兴趣的李亚东死拉硬拽，领着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位于成都远郊温江县寿安镇界内的陈家桅杆。大门紧闭，墙上有“正在抢修，谢绝参观”的木牌，而传得挺神的双桅杆和圣旨碑已没了踪影。

李亚东轻车熟路地敲开圆墙旁边的农家小院，露头者就是 65 岁的周开里，他身材高大，知书识礼，因祖上与陈家是世交，所以从小随意出入庄园，有一肚子桅杆背后的掌故。

历史血腥的一页就这样揭开了。

2003 年 7 月 2 日下午，我也领着朋友，轻车熟路地去了。同样花 20 元钱买通看门人，由一狗洞似的缝隙鱼贯挤入；也同样由周大爷充当现实和历史的双重导游，流连惆怅，不觉天色已晚。

周大爷恋恋不舍地送行，回望他以废园为背景的孤寂的身影，我耳边还回荡着他绘声绘色的讲述：“我爷爷周志远与陈地石在竹林盘里赌刀，他们互立了《生死状》，二话不说就亮出大刀片子，嗖嗖砍了起来。月亮刚升时开砍，直到第二天太阳出头，两个人才歇手。两个人都血淋淋的，衣裳成刷把了，居然都没倒下……”

然而共产党来了，以“保境安民”为已任的豪绅统治倒下了，众多无辜的冤魂在改朝换代的枪炮声中呼喊、哭泣，直到消失，直到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老威：大约几年前，成都几家媒体曾经有“抢救川西传统民居

陈家桅杆”的报道，当时我溜了一眼，没怎么在意，因为在中国，值得抢救的旧东西太多太多，新闻再如何呼吁、鼓噪，没人出钱，旧事物最终的命运也就是逐渐消亡。

周开里：陈家桅杆不是一般的民居，它大有来头。

老威：来头？至多相当于大邑刘文彩的地主庄园吧。

周开里：名气没有地方庄园炒得大。

老威：建筑规模也不如。

周开里：那可不见得。当然，现在破败成这个样子，已看不出当年的辉煌了。

老威：老人家，就请您从头讲起吧。

周开里：陈家桅杆占地十几亩，修了 8 年，据说是清朝同治 8 年完的工。原先的地形为三沟两渠，将庄园和外界隔开，成为一座虎踞龙盘的岛，现在沟渠早填平了，一点痕迹没留，庄园也只剩不足两亩，断墙破瓦，成了摇摇欲坠的危房。今天塌一角，明天垮一方，所以政府已挂牌封闭，不准人参观了。

老威：今天算沾您的光了。

周开里：沾陈宗典在天之灵的光吧。他是陈家桅杆的第一代主人，祖籍重庆璧山县，在清朝做了多年的翰林，一品大学士，专门为皇上起草诏书。晚年衣锦还乡，因信奉道教，就举家西迁。本想一直去青城山脚下，不料刚进温江寿安境内，就感觉神清气爽，风景如画。找风水先生一测，风水绝佳，于是陈翰林就定居下来，建了这座远近闻名的宅子。陈家桅杆有 24 座院落，不是报纸上介绍的 12 座。照壁、堂屋、正院、偏院，一环扣一环，陌生人乍一进去，稍不留意就迷了路；更有雕梁画栋、金壁石嵌、歌赋诗词，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有来历，紧系着道教的掌故。陈翰林还把青城山微缩下来，从安徽和湖北专门运来特殊石材，请能工巧匠垒了一座两层楼高的青城山全景盆栽，并将道教观庙融入其中。

老威：这可是典型的道家园林，比大邑地主庄园境界高出许多。

周开里：刘文彩、刘文辉、刘湘，当时都是土绅、军长、司令，

修宅子可以，尾巴翘上天可以，就不敢立桅杆，而且是双桅杆。陈宗典的儿子中了武举，封为边关守将，于是由同治皇帝特许，在陈家庄园大门外，立一文一武两根十几米高的斗座桅杆，天晴时，两里外都能望见；同治帝还亲书斗大的“圣旨”二字，让陈家父子刻成石碑，立于宅外大道旁。你是文人，晓得一见这圣旨，文官要下轿，武将要下马，叩拜之后，方可过路。

老威：了得！

周开里：后来，陈翰林彻底看破红尘，上青城山当了道士。而这宅子一代接一代往下传，倒也人丁兴旺，到了民国，以陈家桅杆为轴心，散布在寿安乃至温江境内的陈氏后代已达数百。那时候，四川军阀派系众多，拉锯式的混战，只为抢夺地盘。胜者为王败者寇，杨森、邓锡侯、唐敬尧、刘湘刘文辉俩叔侄等等，风水轮流转着，但所做的头等大事都是抓壮丁征粮，盘剥老百姓。多亏有陈家桅杆在，寿安地方才有安宁的日子过。

老威：是么？可我听说地方军阀都是天王老子，连中央政府的号令都不认，哪还认得清朝的死翰林！

周开里：在这方圆十里，陈家桅杆是天王老子的老子，势力大，气焰旺。陈翰林的末末（玄孙）陈地石传下令，在各保各村都竖起保境安民的大旗，并且自己出钱出枪，组织团练，农忙耕种，农闲演兵，一遇乱兵犯境，快马就四处出动传讯，一呼百应。后来，“保境安民”叫响了，周遭地区的旺族、士绅、袍哥都上门来拜帖，寻求保护和相互声援。最后，军阀也纷纷找陈家巴结，给陈地石封官。陈地石不愿受制于谁，一概谢绝。只是解放前夕，国军兵败如山倒，他才于危难之际，一拍大腿，出任“反共救国军司令”。陈地石治下，本地不抓丁，不横征暴敛，因为陈家桅杆就不怎么纳税，连省主席亲征的税也不交，所以那时的寿安，官民富足，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本地人都以陈地石为榜样，彪悍尚武，男女老幼玩枪弄棍。一遇赶场，必有人山人海的比武大会，得胜者有奖，并选入陈家桅杆的卫队。

老威：这陈家桅杆是个由地方豪绅统治的独立王国。

周开里：四川都是独立王国，蒋介石的手一直插不进来，好不容易借打抗战把山大王刘湘骗出省去干掉，其它军阀马上就搞割据，四分五裂。连成都都划了势力范围。以驻军为界，东城姓唐（敬尧）或姓邓（锡侯），西城姓刘（文辉）。老百姓也习惯了，哪怕猛追湾在两军混战，枪炮声隐约可闻，皇城坝的小吃摊和茶铺依旧热闹，人们吃喝得面不改色，川戏票友还在唱《风波亭》或《秋江》。

老威：那陈家桅杆是独立王国内的独立王国。

周开里：差不多，从同治皇帝到解放初期，这宅子风风雨雨，也算有 100 多年的基业。也许是命数至此，共产党打来了，覆巢之下终无完卵。

老威：听我的朋友李亚东说，你对这宅子的末代主人了如指掌？

周开里：我们家和陈家世代交好，我从小就喜欢在庄园内玩耍。当时正面有大门和侧门，平常侧门开着，由人进出；大门一般在贵客驾临时才敞开。而陈地石骑快马，打双枪，拢了门前，就马上一纵，空中翻个筋头，即落入几米高的墙里了。

陈地石的三姨太生一脸大麻子，比东北大汉还魁伟，也是耍双抢，不瞄准就开火，百发百中，她是老公的贴身保镖；另外，还有“马前张保，马后王横”，腿快枪快，所谓腿快赛过马，枪快比过风。这三员虎将，人人见了都喝彩。陈地石的卫队有九九八十一人，个个都是神枪手。有一次，卫队里的一个镖头在家里与老婆角逆（当地土话，意为打架），那婆娘也不是吃素的，隔着灶台，连飞去两把菜刀。镖头一闪一蹲，只听得耳边嗖嗖两声，好险！他顿时毛了，就从腰后摸出双抢，崩崩开火。那枪打得蹊跷，不中要害，却像泼水一般贴着皮肉，密不透风。婆娘吓瓜了，从灶房跑到睡房，又从睡房跑出来，站在院坝中央跳脚。镖头射完了几匣子弹，才停下来吹枪筒的烟，再定睛一看，婆娘的衣裤却已碎成渣渣，几乎成了光身子，却毫发不损。

老威：老人家，这有点评书的味道了。

周开里：这样的事儿还多，你不信，我就不深说。总之，解放

军、工作组刚开到时，正是考虑到陈家桅杆的影响，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才使软绳套猛虎，通过谈判，劝陈地石投诚。陈地石晓得大势所趋，就在共产党承诺不动他家一草一木的前提下，答应接受收编，解散团练，只保留八十一人的贴身卫队。

接着闹土改，工作组挨门挨户访贫问苦，阶级斗争的大道理讲了一筐又一筐，但群众就是发动不起来。大伙哪敢到地主家去分东西？陈地石不发话，乡上村上的会都开不起来。工作组只好去庄园请“开明士绅”到场，陈地石一去，会场就挤得满满的，明明是斗地主的忆苦会，却开成对陈家的歌颂会。政府的脸挂不住，解放军荷枪实弹，一个营围住了会场，却不敢对陈地石轻易动手，因为他带了十几个挎双抢的保镖一道赴鸿门宴。陈家和新政权周旋了近两年，私藏了大量枪支弹药。解散了的三万多人，明里回家种地，暗里却仍是招之即来的兵勇。解放军曾调查到陈家缴过窜至本地的胡宗南败兵的械，得了上千套军事装备，但陈家百般抵赖不上交，省里市里来人做工作，也软硬不吃。

老威：胳膊哪拧得过大腿啊。

周开里：拧不过也得拧，因为土改是国策，深入不下去，就得拿拦路虎开刀。陈地石“保境安民”的祖宗规矩要破了，他晓得日子长不了——连卫队中，也安插了党代表，今天找这个，明天约那个，一心做陈家桅杆的反水工作。

陈地石觉得自己的一再忍让，不仅换不来共产党的信任，反而受尽窝囊气，被逼入死胡同。“撕破皇袍也是死，打了太子也是死”，于是他在亲信们的怂恿下，发动叛乱。

那是 1952 年正月初十晚饭后，卫队集合，党代表站在石碾上，正发表革命形势大好的演说，只听崩的一声，他就中弹栽倒，并且至死不明白从哪儿开的枪。

干掉党代表是个信号，陈地石全副武装，登高训话，接着快马传书。寿安地方的青壮汉子个个揭竿而起，重返陈家桅杆，领取枪支弹药，恢复团练的番号。几个钟头就聚集了三万多人。当时正值清匪反霸，崇庆、彭县、大邑、邛崃等地的袍哥大爷，正在山里与

剿匪部队周旋得苦，突然接报，像快淹死的人捞到根稻草，立刻突围，急行军几十百多里，增援陈家。

陈家的旗号仍是“保境安民”，所以大本营设在庄园里，沿东西南北，连夜挖了几层战壕。眼看要打仗，老百姓就携小搀老，连夜逃难。只见田野道路，密密麻麻滚动着人脑壳，陈家沿大道设了几线马灯作路标，指示人们出境，不料人河淌得过于缓慢，凌晨四点钟，剿匪大部队开到，有一万多人。昏天黑地，民匪难辨，双方就不问三七二十一交上了火。当时我才十几岁，也夹在逃难人群中，只见往还的炮火，像马蜂窝炸营一样嗡嗡，搞得人不晓得该朝何处跑。

我亲眼所见，周围十几个人倒下，有一个腿炸没了，还在炮弹坑里乱刨乱抓，喊救命。有个背娃娃的婆娘，脊梁上血糊糊，娃娃已经被子弹崩开膛了，她还不晓得，一会儿朝左跑，一会儿朝右跑，躲开了炮弹躲不开子弹，她就在我前头栽下去，不知是绊倒还是挨了打。

还有人扯我的裤脚，可我也爹啊娘啊地乱叫，几乎路上的家庭都失散了，因为在暗中，躲子弹，人是慌的，见坑也跳，见坎也跃，比畜牲还不如。直到天色麻麻亮，我才发觉夜里逢上鬼打墙，又绕回到陈家外面。

我趴在一条田埂下，只听得机枪声嘟嘟的，像开了锅的水，而且一直不间断。解放军的武器好，有正规作战的经验，所以占了上风。天大亮时，几条防线都突破了，包围圈缩小到庄园附近。陈地石的大部队都打散了，只剩下铁杆卫队还在顽抗。

老威：我在成都生活了几十年，还从未听说过这么惨烈的战斗。

周开里：当时那硝烟，像起浓雾一样，把太阳都遮没了。好几里罩着雾，陈家桅杆周围的空地、竹林盘、圣旨碑底，那子弹壳铺满了，双手一舀，就一大棒。血啊，脑浆子啊，碎布片啊，挂在枝上，混在泥里。人都没了，地遁了，所以不觉得惨，只是过后想起来，觉得后怕。这寿安，村村户户，青壮年都去了大半；而解放军阵亡了一千多人，相当于一个加强营。

老威：死了一千多？有没有夸张呢？

周开里：没夸张。土匪的阵亡数字还要翻几番，田坝地头随便捡，拖到一处，堆成一匹山。然后由解放军挖坑，耗了一整天，坑才挖好，把尸体丢下去，填平了，种了些树。而解放军则烧了，名字刻在县里烈士陵园的功德碑里。

老威：是纪念碑吧？

周开里：意思和皇上赐的功德碑差不多。

老威：还有哪些值得一说的战斗场面？

周开里：太多了。陈地石的卫队，八十一人，每个平均都欠了共产党好几条人命。双方交火前，村民都看见他们把一男一女两个共产党干部绑到水渠边，用脚踹跪下了，就崩崩两枪，两个干部叫了声“妈呀”，百米外的人都听见了，还感到蹊跷。因干部给农民的印象不应该叫“妈呀”，而是宁死不屈，喊两声其它的。

已过去五十几年，我这一闭眼，还能感觉到机枪嘟嘟嘟的，开了锅，压得陈家抬不起头。眼看庄园要攻破了，却见陈地石的镖头跃出墙，眨眼间，连翻跟头，就在地心滚碾子一般旋着双手开枪，把机枪手撂翻，接着一口气撂翻了八个兵，再夺过机枪，箭步射了回来，一查验，自己身上也挂了好几个窟窿！

就这样对阵到中午，解放军吹响冲锋号，浪头一般涌上来。陈地石中弹死了，卫队死伤大半，陈家桅杆被占领了。之后，园里的巷战又进行了大半天，直到肃清残匪，园内几乎没剩下活物。

这仗打了十来个小时，这边是团练、家丁、庄稼人、乌合之众，那边是炮火先进的从延安一路杀过来的正规军，能扛这么久不错了。那时交通也落后，邻近几个县来汇合的土匪在瓢把子老大的率领下，紧赶慢跑，不料在半路就打探到已平叛的消息，只好折返回去。

接下来就是将陈家桅杆充公，骡马车在路上牵成线，搬运庄园里的粮食、财物、金银细软，搬了好几天。拦路虎崩掉了，政府就放胆开展清匪反霸，寿安一带，凡是跟着陈家桅杆，与解放军交过火的，管你是啥子阶级成分，都定为土匪，统统脱不了手。工作组在解放军的护卫下，走村过户，进行清理，只要有两个以上的群众

口头揭发检举，马上拿麻绳绑人到乡上关押。当时的公审大会是一个星期开一次，主要是毙人，少则 5 个，多达 32 个，眨间功夫就报销了。群众挤在主席台下，谁讲话谁宣判都不留意，只垫脚打望五花大绑跪在台下的坏人，他们或许昨天还在种庄稼，还在田埂上与你对火抽叶子烟，说不定就是你的邻居，你舅子的舅子，今天就被绑来吃枪子了。

陈家桅杆外面也开过许多次公审大会，四乡八邻都赶来，看毙陈家的人。

陈地石的三姨太，打双枪的大麻子，挨了一梭子弹。开枪的兵边射边骂，还呜呜地哭，可能是战友死多了，解放军要报仇。沟里的水都染红了，地也被人肉蚀得特别肥，抓一把起来，油浸浸的，泥巴的汁水是土红土红的，直到几十年过去，这周围的林木、庄稼还是长得快，比其它地盘快。

陈地石的叔伯弟兄×××，本来没参与打仗，却被定为“恶霸地主”。由于×××吃斋念佛，在乡里人缘好，所以几次批斗会都没开起来。为了逼他向人民低头认罪，工作组派人将其按进一个石头水缸，整个人泡着，只露半个脑袋。然后抬来一架风斗，几个人轮换着绞，将一阵阵夹着糠壳的风直吹过去。

这个刑叫做“养金鱼”，寒冬腊月，水面都结冰了，体质再好的人，都经不住水泡，更别说又泡又吹了。可说来奇怪，×××连养了三天金鱼，出水时只打了几个喷嚏就没事儿了，也不晓得他练的啥子功。

×××是陈家桅杆命最大的，第一次押他去乡上接受公审时，突降瓢泼大雨，会开不成，只得半路返回；第二次，政府铆足了劲要枪崩他，不料又是瓢泼大雨，并且一下一整天，连个停顿都没有，据说大道小路全淹没了；到了第三次，你以为肯定该死了吧——上面毙人的政策又变了，只有区级政府以上才有权批死。×××捡了一条命，被改判有期徒刑 17 年，最后死在劳改队。

老威：陈家桅杆还有后人么？

周开里：这一带，陈家后代好几百，但都属于远亲，不是直系。

老威：这么漂亮的老宅子，如此破败，怪可惜的。

周开里：这是个土匪窝，又没像大邑刘文彩地主庄园那样，竖为阶级斗争的典型，所以过去没任何维护。53 年，这儿是棉麻仓库；54 至 56 年，倒还辉煌过一阵，成为军政学校，许多国共两党的退休将军进进出出，讲课、休假，优哉游哉；58 年大跃进，这儿又成为公共食堂的粮食仓库；61、62 年生活紧张，庄园里的的集体财产几乎被偷光了，连房梁也差点让人锯下来卖；接下来就破落了，有几户人在里头养猪，敞放，屎拉得到处都是；到了文化大革命，重庆开来十几卡车红卫兵，据说是陈翰林祖籍重庆壁山县的“反到底战斗队”，乒乒乓乓砸了一整天，梁上墙上的雕刻被当作四旧铲了，字画、对联粉碎了，连喷水池的蛤蟆头也被斩下。这次毁得彻底，园里显得空荡荡了。在 1985 年，陈家桅杆定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前，院墙外都是猪圈，臭气熏天。后来国家强令拆除，这墙面至今还有好多搭猪圈留下的插洞。

老威：既是“文物”，政府采取了那些保护措施？

周开里：前两年，报纸上登了陈家桅杆的大幅照片，认为这样有价值的民居毁了太可惜，应该开发利用。省市领导多次来视察过，人大常委会李鹏委员长也来过，一个车队乌啦啦的一片官，可也就热了一泡屎的功夫。时过境迁，政府把恢复工程包给了私人，一个文盲老板，弄了三年，修了座大门，结果完全弄错，成了一座烧香拜佛的庙门，而侧门就干脆省略了。刚才你们进去看过，地基多，断墙颓壁多，能遮雨的房子几乎没有，满园子杂草、污水坑，维修的木板堆在那儿，都朽了。

老威：乱整一气，跟破坏没区别。

周开里：维修老板曾拿着图纸来拜访我，我费尽口舌，一点点指出毛病。他发火说：大爷你也太挑剔了，政府不出钱，我做的可是赔本买卖。我当场揭穿说：政府咋没出钱？省里市里都拨了钱。他承认上面是拨了款子，但是到了乡里，就被当官的吃掉了大头。他说：大爷你不晓得现在的乡官胆子多大，连皇帝买马的钱都敢花！再从牙缝里抠点零头，硬要承包给我，摆摆抢救文物的样子。所以，

水泥、木材、砖瓦都只能选便宜货，请的工人也是便宜货，哪能与清代的上等建材和能工巧匠相比？！

老威：上面没追查么？

周开里：问题多，查不过来。大前天，乡里的书记大白天被人砍了，群众拍手称快。这路面不太平，专抢公共汽车的毛贼好几拨，公安打掉一拨，其它就逃到邻县。

所以，时代变化太快，天天有热点，陈家桅杆迟早会被忘得干干净净。可惜满园的诗词歌赋、楹联妙对……只好让孤魂野鬼们去慢慢消遣。

93　厕所门卫周明贵

采访缘起：年近七十的周大爷与粪便打了一辈子交道，晚年却鸿运临头，承包了成都市西郊茶店子附近的一所公厕，“这也算生意，”他说，挺精神的样子。

1997 年夏日的一个深夜，我从母亲开的茶馆出来，因入厕与周大爷搭上了关系。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已互相眼熟久矣。

我鼓足勇气，才挣脱所谓知识分子的角色感将这次访问进行到底，那种豁然开朗的喜悦如一次畅快的排泻。

公厕历史也是城市历史的一部分，可我至今没见过以研究公厕著称的学者，那么，这篇文字倒填补了一段空白。

老威：周大爷，公共厕所还锁门呀？

周明贵：快 12 点了，也该锁门了，任何单位都有上下班。

老威：你这也算单位？

周明贵：当然是单位。我是正儿八经向环卫所承包了的，一年要上交好几千元。每人大小便一次一角，你这知识分子帮忙算算，要多少个一角才能凑齐几千？喂，你到底解手不？已经超过 12 点，按规矩，要加收入厕费，看在老主顾的份上，免了吧。

老威：我不解手，我请你喝茶。

周明贵：嘿嘿，你太客气了。哦，你妈的茶馆还没关？今晚上她的生意不错。你妈是个善人，平常我要口水，灌个壶，她从不收费。我做梦都在为她老人家烧高香，视这个街坊铜壶煮三口，天天客满。茶卖得越多，尿也就越多，大家的生意都搞活了。

老威：那就请吧，周大爷？

周明贵：我一个守厕所的，就算了吧。

老威：这世上哪有高低贵贱？皇亲国戚就不拉屎？

周明贵：我没见过皇亲国戚拉屎，至少不会上公共厕所大小便。据说身份太高的人，当着众人是不会大小便的。好啦，说笑呢。我

晓得你是文人，喜欢收集个素材。你该不会把啥子都朝报纸上捅吧？

老威：我是小报记者么？况且你这里面又没发生凶杀案。

周明贵：嘿，叫你说谁了。前两天，一个男的追一个女娃子，撵到厕所里来了，拉都拉不住，把解手的人吓得惊抓抓地叫。我让儿子去抱他，他刷地抽出一把刀来。结果大家都不敢上前。那家伙逮住女娃子，要破相，女娃子跪倒求饶。幸好我一尿桶泼过去。后来 110 来了，也没找我了解情况，就把男的女的都带走了。你猜后来咋样？才隔了一天多，那两活宝，又出现在街上，还搂搂抱抱的。我不想看他们，他们却偏偏冲过来，指着我鼻子骂："老狗日的，你敢泼我的尿！"我不吭声，他又骂："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你劝架么，拉开就完了嘛，搞得我们一身臭哄哄的。"我忍不住说："不泼你，早出人命了。"没想到女娃子也帮腔说："死了也与你厕所所长无关。我们已经耍了三年朋友，他已经杀了我三盘了，出没出人命？哼，你还报 110，搞得家里人捂住鼻子来接我们，街坊邻居都闹麻了。今天，我们特地来向你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现在都讲法律。"这话气得我儿干瞪眼。"吵了好几声，就顺手抓了把铜水瓢，要开打。我急忙拦住，那泼妇却跳到大街上，惊鸣辣喊"杀人了！"弄得河翻水翻。围了大群人，更可气的是，那男的居然说："不愧是看厕所的，杀人也用粪瓢。"这太侮辱人了，我儿把水瓢砸了过去，大家却以为粪瓢来了，纷纷躲闪，其实，现在的公厕哪来的粪瓢？

老威：后来咋收场的？

周明贵：多亏你妈挤进来，把那对瘟神请进茶馆。你妈是走南闯北的艺人，是团长，水平就是高。她说："这种无赖，我的茶馆一天要进来好多个，你千万莫跟他们要面子，冷言冷语打发就完。"唉，这种混混，社会上太多了，也没工作，整天在街上杀进杀出的。我听了你妈的话，发毒誓，以后再不管这种闲事了。大家都不管，免得血喷到自己身上，我一个看厕所的出面管了，反而让群众当笑话摆，封我一个绰号，叫"粪瓢雷锋"。现在，那小杂种一入厕，总要没大没小地与我开玩笑，说："你挣钱困难，经济损失就不赔了，我们两口子在这儿免费解手一年咋样？"

老威：太混蛋了！

周明贵：我也不气了，恶人自有恶人收拾。今后，就是茅坑里栽个人来摆起，我照样认钱不认人。

老威：对，你这把年纪，自己的身子骨要紧。现在是世纪末，情况复杂，你看这条街，三百米不到，卡拉 OK 厅十来家，美容院六、七家，哪儿来的生意？这是城乡接合部嘛，城里一扫黄整顿市容，嫖客就都上这儿打挤来了。那个女娃子姓张，就是我妈茶馆隔壁美容院的小姐，乐至县的人，一过夜里 12 点，如果没有约会，就到斜对面的“在水一方”坐台去了。她的那个二杆子男友还蒙在鼓里。

周明贵：不愧文人，了解得很仔细。

老威：我的意思是说，这条街夜里的生意比白天好，卡拉 OK 点一首歌才 2 元钱，小姐唱歪了嘴也花不了几十元。

周明贵：与我没关系。

老威：唱歌嗑瓜子，口就干，而经常嫖的人，一般都肾虚尿频，你不做买卖，人家就朝街上冲了，夜里没人管，这不是浪费么？

周明贵：歌厅里有卫生间。

老威：这些低档次的角落，屁的卫生间。看，说着说着生意就来了，那鸡婆提着裤子，尿胀慌了，你一定收她五角。

周明贵：收三角算了，我明天和老伴商量，把作息时间调一下。上午的生意不好，门可以开晚点，感谢你提醒了我。

老威：你这是红灯区里唯一的公厕。

周明贵：与你摆龙门阵，精神越吹越新鲜。唉，如果倒退十几年，谁会想到靠公厕谋生？那阵，全中国解手都不要钱，厕所是公益事业，归环卫部门管。有一段时间，环卫下放到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下放到居委会，结果，这项又脏又臭的亏本事业就没人管了。现在公厕红火了，我是环卫所的退休老职工，与脏东西打了一辈子交道，还死缠了半个多月，才承包下来。

老威：现在还有不要钱的厕所吗？

周明贵：大概在老居民区还有吧，因 70 年代以前修的房子，家里都没有卫生间，大伙都习惯跑公厕，有时，要转好多弯，跑几条街。夜里应急，有夜壶和马桶，这是家家户户都必备的东西，红漆马桶过去还是新媳妇的陪嫁品呢，结实的马桶要用几十年。乡农市一带还有两个老公厕，一下雨，粪水就满街涨，弄得小汽车都不敢过；而一出大太阳，陈年老粪蒸发，臭气跑出一里外，熏得过路人眼泪直流。附近居民天天盼望折迁。

以前，群众都有早起涮马桶的习惯，就近有厕所则罢，没厕所就一齐候着，粪车肯定比公共汽车还准时，大家说说笑笑地倒尿，彼此的关系很融洽。

老威：你还很怀旧的。

周明贵：对，我也拉过粪车嘛。群众都尊称我为师傅，没有谁瞧不起谁。过去，夜里还有偷粪的，经常被居委会的值班人员逮住，关起来，并扣住车辆。那会儿，没经济概念，不罚款，但要写检讨书，挖思想根源。文化大革命中，偷粪贼引用的毛主席语录，一律都是“要斗争批修”，然后说，偷粪是中了刘少奇损人利己的毒。

老威：偷点屎尿也上纲上线，太过分了吧？

周明贵：一切都是国家的嘛。过去，很少有化肥，农村用的几乎都是自然肥，大粪是宝。我们是专业单位，掏出来的粪量大、质量也高，得服从组织安排，送往红光公社。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因为毛主席 57 年到成都，亲临视察过。那儿至今还留着当年的公社牌坊。红光公社和毛主席有关，所以是农业的榜样，种出的庄稼绝对应该是最最好的。我们得配合，确保它年年丰收，我们每年都敲锣打鼓送“争气肥”，汽车鼻子还戴特大红花。”

其它机关、学校也送肥，但地点就不是红光公社了。他们的所谓“肥”，阴沟的污泥、杂草居多，质量也就差远了，可场面还是很壮观的，一路上，各种板车望不到头，还有不少小学生拉板车的。

老威：我小时候也送过肥，走“五•七”道路嘛。周大爷，你过去在环卫所具体干啥工作？

周明贵：掏粪、送粪、打扫公厕都干过，那年头，没有价钱可

讲，党叫干啥就干啥。我们的榜样就是时传祥，全国人大代表，受过毛主席的接见。我原来住在线香街，街口的公厕，有男女各三十多个蹲位，用木板起了一层楼，下面是半封闭的大茅坑。到了 70 年代，城里的大公厕不再用板车拉粪，改用汽车，把碗口大的管道插进坑，开动马达往上抽。有一次，管子堵住了，我拔起来伸手掏，原来里面卡了半截木棍，还有一块巴掌大的死胎，这一硬一软的两种东西缠成一团，差点把机器弄坏了。

老威：谁这么缺德？打胎的地方遍地都是嘛。

周明贵：年轻人，你说的是九十年代。过去的人，没有结婚证，哪个敢公开到医院打胎？这是道德败坏的丑事，一旦张扬出去，就一辈子抬不起头了。所以，许多一时失脚的女娃子，都是悄悄开些药，人不知鬼不觉地下掉肚子里的货。甚至还有吃错药，闹出人命的。通过文革，大家开化了很多，而在文革前，公共厕所就是打胎的医院，我还遇过昏死在厕所里的，满下身都是血，我将她抱出来，那个惹祸的男人守在外面，明明脸都急青了，还装着不认识人。我拦了辆公共汽车，他却推了东西自行车过来，自称"学雷锋做好事。"我懒得点破，也不晓得后来他驮她上医院没有，反正中国命贱。

老威：你是清洁工，可以随便进女厕所。而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女厕所就绝对神秘，街坊上曾揪出过偷看女厕所的流氓犯，游街示众不说，还要挨观众的口水。

周明贵：我有规定时间，选没人的时候进去。并且在外面立牌："因打扫，暂停使用。"那次救人，是有女同志拉我进去的。

老威：听说在文革期间，教授也扫厕所？

周明贵：牛鬼蛇神下放到居委会，归群众管制，扫街、扫厕所，啥都干。我想干，但是造反组织不批准，只好在家里耍。劳动惯了的人，要耍出毛病，就一早一晚，习惯去厕所，给牛鬼蛇神做示范。我晓得，知识分子是受不得委屈的，虽然他暂时像狗一样毕恭毕敬，但是内心把账一笔一笔地记着，时机成熟了，再一笔一笔抖出来。古戏里有孟姜女哭长城，如果现在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也就没有人敢写孟姜女哭长城了，也就没账可算了。共产党毛主席毕

竟是仁慈的，不杀文人，连胡风也不杀，讲思想改造，”讲“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这容易吗？劳动人民知识化当然容易，进扫盲班，学政治、学历史，哪个不乐意？可是，要让教授扫厕所，斯文就扫地了。报纸经常登这类文章，诉苦，变着法子挖苦思想改造。据说还有当时想不通，用裤带在厕所里上吊的，惨哪。唉，这也叫惨，我生来就是掏粪坑的命，就不惨。你说惨，没人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孔夫子说的，连毛主席的胳膊也扭不过他的大腿。

老威：我觉得你挺风趣的。

周明贵：谈不上，劳动人民嘛，拿得起，放得下。

老威：你勾起了我许多回忆，那种回廊式的公共大厕所，我们这种小屁娃经常在里藏猫猫，屙屎忘了带纸，就撅起小屁股在隔板上蹭。惹得大人骂。可以说，厕所是我们这代人的第二课堂。

周明贵：你把厕所叫“课堂”？

老威：差不多。因为在课堂学不到的东西，都能在厕所里找到。我第一次接触到女性生殖器，就在厕所的隔墙上，一团乱麻中的一个洞，那么直观，那么触目惊心，接下来的一幅画，是性交的剖面图，男女形象都省略了，就剩下两个嵌在一块的器官。当时我才 8 岁，读二年级，连课本都是红彤彤的，万万没料到在革命的红海洋之外，还有这种阴暗角落，于是就咬牙切齿的掏出铅笔，在性交图旁歪歪扭扭地批注：“刘少奇和王光美干坏事。”

周明贵：你也有乱写乱画的习惯？这不好，我也想不透是啥原因，许多人一解大手就乱来，你费心费力地擦了，刮了，弄干净了，嘿，一会儿他又给画上了。几十年，我就是这样擦了刮，刮了擦，这比扫地冲坑更难整。文革，反右，四清，政治空气浓，人人没地方发泄，就到这儿来，还情有可原；可现在，发泄的地方有的是，你还在墙上鬼画桃符。这又不是出风头的场合。

老威：有些啥内容，你晓得的一定比我多。

周明贵：我文化低，也没认真看，气都气不过来。好像儿歌，下流图画，粗话，标语，一段一段的文章，啥都有，反正这种东西

的历史很长，城里、农村，只要拉的时候顺手，都来几句。文革是个例外，打走资派，打派仗的标语，直接刷进厕所，啥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保皇派吃屎”; 啥子“庙小妖风大，坑浅苍蝇多”。

老威：据我哥说，他会背的唯一的儿歌就是厕所的产物，你听听：“我们两个好，我们两个好/我们两个凑钱买皮袄/你穿皮袄我烧火/房子烧了莫怪我/救火车，来救我/吉普车，来撵我/把我撵进东门派出所/派出所，关的坏蛋多/把我挤成肉砣砣/你一碗，他一碗/妈妈哭进来舔锅铲”。

周明贵：这有啥意思嘛？

老威：意思谈不上，就觉得比老师教的儿歌有趣。还有一首《厕所恋歌》：“你是天上的鸟儿/我是地下的推屎爬儿（屎克螂）；/你在云中打旋旋/我在屎里头栽筋头儿。

周明贵：你一个文化人，记这些下三滥的口诀干啥？

老威：见笑了，老人家。厕所文化嘛。你晓得，中国有十几亿人口，能够写文章，并在报刊上发表的，毕竟很少，况且，发表出来的东西，也审查了又审查，不见得就真美实。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在大庭广众中的发言权，所以，厕所也算自由发表言论的地方。绝大多数情况下，写了就写了，没人追究责任。以前，我恨班上的一个女同学告状，就在厕所里写：“王小红是地主婆！”还写“地主婆王小红与走资派日×！”这种明目张胆的诽谤在中国小孩中经常发生，并从厕所发展到外面的墙上，还由一个人骂街发展到许多人参与的对骂，直到墙装不下了，于是擦了重新开骂。而大人呢，要么不屑一顾，要么饶有兴趣的欣赏一番。没人打算破案。

周明贵：我是大老粗，没你这些想法。

老威：我是向你请教呢。

周明贵：其实，产生乱写乱画，主要是因为环境不好，过去的厕所，有木架结构、有水泥板结构，甚至还有土墙、竹篱笆那种简陋的围子，铅笔、粉笔、钢笔很容易在上面写画。以前的人，一般都随身带笔，边解手边发挥，也是忘掉臭味的娱乐方式。现在，厕所要收费，几乎都改进了。隔墙上镶了瓷砖，滑溜溜的。笔在上头

不好写。屙屎看报的人比较多，打手机的比较多，随身带笔的少。不过，乱写乱画仍然有，昨天，里面还有一首纪念毛主席的诗，嘿，好记，看一遍就记倒了："毛主席呀，您爬起来看/前面尽是贪污犯/毛主席呀，你朝右边看/右边尽是嫖娼犯/毛主席呀，你朝左边看/假冒伪劣一片片/毛主席呀，你回头看/下岗工人一串串/毛主席呀，你再朝脚下看/还有几个婚外恋/毛主席呀，您莫法看/人民想吃大锅饭。"

老威：我不想吃大锅饭。

周明贵：你当然不想，你又不是打工仔。

老威：周大爷，你的收入还行吧？

周明贵：勉强糊口。这条街比较背，街口又是体育中心，陌生人懒得朝这边逛。

老威：你可以改善一下经营环境，再提高入厕费。滨江路的高级厕所你晓得不？里面有鲜花，有电话，有吸烟厅，还卖与排他有关的小百货。例如高档手纸、卫生巾、香水、痔疮药、消炎药水、口香糖等等，大小便五角，生意火爆极了。

周明贵：厕所不存在知名度，只要肚子胀，啥地方都能屙，否则，你轿子也抬不进人来。我与老伴考察过滨江路的厕所，那儿的露天全是茶馆，密密麻麻的人脑壳。人家本钱厚，客源猛，而且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掏五角钱，进去享受了一盘，消毒水太浓了，熏得人受不了。墙上贴满了各种痔疮便秘和性病广告，彩色的明星头，眼睛直勾勾的，一门心思要赚屁眼儿的钱。我估计隔壁女厕所也少不了卫生巾和各种妇科病广告。我上下不得空，眼界倒是开了，可惜啥也没拉出来。

唉，一个月有个两三百元钱，我也就知足了。至少，我不给房租，我儿子，儿媳进城拉偏三轮，也有个歇脚的地方，活路也轻松，跟养老差不多。现在，下岗的太多了，年轻力壮都找不到工作，何况老头子。生活累啊，难啊，绷起一根筋做人，哪天筋绷断了，就完逑了。你还没瞌睡？夜猫子。文人火旺，鸡巴傲在头上。

94　老地主周树德

采访缘起：我爷爷就是四川盐亭县黑坪区的老地主，逝于 1988 年，享年 84 岁。他倒田地的霉，一辈子从没走出过县境。

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吝啬，腊肉、花生放上七、八年，都舍不得吃。可据说借他钱的不少，均是几角、几元，人家不提还，他也不敢去讨。我一直想问他这是什么心情？现在问不了了。

我的写作同行周鸣乐弥补了我的遗憾，他爷爷周树德也是乡村地主，现年 89 岁，口齿和头脑都还清梦。1998 年 2 月 3 日，我与女朋友宋玉起个大早，搭长途客车，奔波几百里，终于当日下午抵达川北某县。翌日天晴，又乘车去一乡场，再步行数里，方叩访了周树德老先生。

整理录音之际，我还忍不住叹道："全国的地主成千上万，可像周老爷子这么有趣的土老财，实属稀罕。"

老威：老人家，您晚年有啥愿望？

周树德：愿望：我都成孤老头子了。虽然养了三个儿子，三个姑娘，可现在一个也不在身边。他们都出息了，在外面工作。我的孙儿中数鸣乐最孝，他去年回来看过我两次。你是他的同事？

老威：朋友。也算同行，我们都写东西。

周树德：哦，文人。

老威：您这房子也太破了，鸣乐他爸也没花钱翻修？

周树德：他要我到潘家沟，跟着二姑娘，赡养费由他出。可哪个来守这祖宗地基？我一搬，就不是周家坪的人了，户口没了，地还划给别人种。您不要看这房子破，以前可是四合院。左厢房、右厢房、堂屋、耳朵房，下首的横房。我爷爷创下的基业，传给我爸，民国 34 年，我爸因操劳过度，撒手去了。他留下遗嘱，把田地、

房产分作两份，我与我哥均分。那年鸣乐他爸已大学毕业，到江西跑滩去了，三兄弟中数他最野。

我哥周树贵，是个败家子，我到了阴间，也要拉他到阎王爷跟前评理。他到了几趟县城，吃喝嫖赌不说，还染上鸦片烟。你们年轻一辈的可能不晓得，那年头若是染上鸦片烟，就完蛋了，万贯家产也经不起抽。不过一两年，他先卖地后卖房，最后典婆娘。她婆娘跳了几次堰塘，都没唤醒他的追悔之心，只好找到族长，要求分开，宁愿守活寡。族长唤了一伙保丁，把周树贵捆在树下，日晒雨淋一星期，想把他的毒瘾戒掉。可一松绳子，他就一阵烟跑到我屋里来借钱，磕头、打滚，自己抽耳光，最后撞墙，还威胁要点火把祖宗的神龛烧了。我太寒心了，就写下字据，与他断绝手足之情。他划了押，夺过我手上的十个银元就不见了。你想想，这样的人哪配活在世上！连族长那样的善人，最后也逼得召集全村乡亲，宣告周树贵已不是本乡人，如果他的狗腿胆敢踏进本土一步，立即打断。

为了挣回面子，我起早贪黑，外出贩盐，我婆娘身怀六甲，还同长工一道下田。我发誓要把周树贵败掉的产业重新买回来，创业难，守业也不易。好在他的婆娘儿女都很争气，所以，我在民国 37 年把他的欠账还清后，仍然把她们娘儿三个从娘家接回，住右厢房。眼见一大家子，各有其所，六畜兴旺，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忙早晚上香，托祖宗的荫福。

不料好景不长，解放了。50 年县里的土改工作组进村，我被划成地主。村里有五、六个地主，而族长和保长都是恶霸地主，被押到乡里开完忆苦思甜的斗争会，就镇压了。我，鸣乐他奶，还有地主、富农一大串，都陪了杀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五花大绑。唉，我也是读过私塾的，懂得孔孟之道，积德行善。我从不坑人害人，可过去你敬我让的乡里乡亲，这时都变了脸，指指戳戳地斗争我。我家的两个长工，都当了贫协的委员。领着工作组上我家登记田地、房产、牲畜。地契、房契全被搜走了，这两个家贼，我一向待他们不薄。

当然，天下的大形势就是富人遭殃，穷人翻身作主，想通了，

也没啥，因为被瓜分掉财产的又不是我一家，改朝换代嘛，只要把命保住，还来日方长。所以我劝住老婆，莫寻短见；至于儿子，都大了，要与亲娘老子划清界限也好，远走高飞参加工作也罢，都随便，土改到了后期，工作组长还找我谈过话，表扬我态度积极，能配合政府。我心里肉疼，但只有点头哈腰的份。最让我想不通的，是我哥周树贵，那个败家子，居然成了贫农！当然，不管他怎样变成穷光蛋的，解放初期他的确沿街乞讨，唱莲花落了。若不是共产党，他早被饿死了。现在，天地翻了个，他在上我在下，他竟上台斗我，扇我耳光，骂我猪狗不如，不仅夺了他的地，还霸占了他的婆娘和儿女。真是活天冤枉啊，全村人都晓得是我周树德念手脚之情，积德行善，替他白白地供养妻儿老小，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我被气昏了，醒来的时候，四合院已搬进了四家人，我们一大家子，都被赶进耳朵房，还好，堂屋没拆，还可以偷着烧香。可周树贵占了右厢房三大间屋，一下子又有房有地有家室，成阔人了。哪个想得到，一个鸦片烟鬼竟时来运转！

我一见他在院子里转悠，心里就堵得慌，但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天长日久，也就认命了。私底下碰见，周树贵常问："德娃子，你当了一辈子的牛，守住祖宗基业了？"我回答："我是地主，你是贫农，要划清阶级界限哟。"他说："逑，我的江山可是一杆烟枪打来的，若不是鸦片，你我都没有好下场。"

老威：你哥对你"忆苦思甜"呢。看来，要在农村找三代贫农不太容易。

周树德：败家是转眼的事，而兴家则要看某一辈里出没出能人，田产都是几分、半亩慢慢积攒来的，要攒几十上百亩田地，弄不好会花几十年的光阴，甚至几辈人的心血。可家败如山倒，说没就没了。所以，在乡下找三代穷人容易，要找三代大户才不容易。

老威：以后的日子您怎么过的？

周树德：全国有那么多地富反坏右，他们怎么过，我就怎么过。土改工作组一撤，我就一直住现在这房子。祸从口出，只要少说话，本乡人也不会太为难你。过去，这院里安有一个喇叭，一有风吹草

动，就会招集我们开会训话，20 多名坏蛋，周围有十多名基干民兵监视。你看我坐的这只小板凳，土改那年钉的，多结实，屁股在上头磨了 47 年，面子蹭得比石板还滑。你看，还能照出人影子，我坐着，两只膝盖能夹住下巴。小的运动，在村里开两三次会就行了，运动搞大了，基干民兵就要押着我们，走十几里山路，到公社开会，好几万人的场面，台上坐两排领导，台下站着一窝地富反坏右，上百名，一站就是好几个钟点。每个领导讲话都很长，国际国内大好形势，中央精神的贯彻，再到省里县里，最后到公社，到具体的生产、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会，有时得开三天，天不见亮就起床做饭，烧包谷粑，尽量吃饱点，然后揣几个包谷粑坐在门坎上等广播通知，这样一出门，天擦黑才回得来，只要不点汽灯开“火把会议”，就算烧了高香了。五几年，我 40 多岁，长期肩挑背磨，身板结实，随便罚多久的站，我眼都不眨，随着岁数一天天高，腰就不行啦，一天天埋下去，幸好到了七几年，运动搞水了，押我们到公社的次数就少了，即使去，也允许幕间休息和解手，有时也允许坐着开，大伙对地主的态度，也好了许多，也敢来串门了，乡里乡亲嘛，山不转水转，风水几十年，也有转回来的时候。

老威：小时候，学校里常请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代表对孩子们“忆苦思甜”，还吃忆苦饭，特别是参观大邑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后，受到了震动，我们都恨地主，恨剥削，不愿回到旧社会去吃二遍苦，受二道罪，您觉得我们这种阶级立场咋样？您是否想复辟，回到解放前？

周树德：你是明白人，何必用阶级斗争来蒙我？早过时了。我 79 年被摘去地主帽子，我感激邓小平，感激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给了我第二次做人的机会。有错必纠嘛。当然，我没那么大口气，不敢说共产党有错必纠，我是说我有错必纠。现在，我们的生活那点不比解放前的地主强？有电灯、电视，肉随便吃，人上了点岁数，就只呆在家做点手工活，这在旧社会不可能，电灯、电视不提了，肉是一星期吃一回，鸣乐告诉我，监狱的犯人一星期也吃两回肉。我爷我爸，全是泥腿子，六、七十岁，还与长工一道下田，有时牛累吐血了，人就接着拉，就这样挣来的家产，还不如现在出去的打

工仔、打工妹，两手空空出乡几年，就衣锦还乡，变戏法一般，要起新房了。若按土改时的标准，村里一半人都是地主富农。鸣乐他爸在省城教书，鸣乐这娃儿上了大学，听说还是博士，过去整个县城都没听说有博士。私塾先生说，胡适是博士，连皇上都接见过他，向他请教问题，你想博士的学问有多大。真是祖先修来的福。我小孙儿是博士，住在北京，说不定，中央领导也经常向他请教问题，康有为说，海内一家嘛。

至于“忆苦思甜”，吃忆苦饭，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都想通了。古人云：“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一个老糊涂，别无能耐，就帮儿孙把罪受了。开始，我的两个长工上台控诉我剥削他们，寒冬腊月逼他们下地，工钱也克扣了。我心里不服，因为我也与他们一道下地，新社会也没说冬天就不上班。渐渐，我想通了，这是命，这天下就是由好人和坏人组成，既使做不了好人，就只好朝坏蛋堆里靠。既使我这个小小的地主不想坏了，早就没有变天账了，但是，上面还有，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时刻存在。比如高岗，比如彭德怀，比如刘少奇，比如林彪、四人帮，我都做过他们的孝子贤孙。你不要笑，文化大革命中，就有“打倒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周树德”的口号。我都不认得这些伟人，却攀上了亲戚，我还与邓小平攀过亲戚，他为我们摘了帽，别说孝子贤孙，就是做牛做马，我也情愿。

老威：龙门阵摆到这会儿，我晓得您老人家心胸开阔，知命知足，难怪能享高寿。

周树德：我今年 89 岁，早活腻了，可咋办，越想死越死不了。堂房里那口柏木棺材，放了 20 多年，我还死不了。这已经是第三口棺材啦，前面两口，被白蚂蚁蛀了，棺材都死了我还不死。风水先生来看过好几遍，连夸我这边的地势好，耳朵房正处在东南角，把西北的风水全盖了，所以我周树德一脉，虽然被划成地主，劫数几十年，但终有时来运转，这鸿运不应在我这老不死身上，也当应在儿孙辈身上。鸣乐那孩子，因为成分不好，参军招工都不准，还偷偷哭过好几回，可 79 年我一摘帽，他就考上大学，双喜临门，

不比当兵当工人强十倍。其它孙儿孙女也不错，都吃皇粮，告诉你，我的重孙子都读小学了。

老威：您就更应该多活几年，享享清福。

周树德：你都看见了，这座四合院只剩下我一人了，其它人死的死，搬的搬。好像我在东南角把阳寿占尽了，另外四家的男丁全没迈过 50 岁，你不信？20 多年前，那半边院子就是满门寡妇啦，为首的就是我嫂子。我哥周树贵，我婆娘周王氏都死在自然灾害，不能说是报应，因为死者为大，哪怕周树贵是冤家对头。

老威：您还是应该跟儿孙住一起，有个照应。

周树德：鸣乐他爸接我到省城住过两个月，我憋出病来了。他是中学老师，挺受尊敬，我一个乡下老头，在高楼里住不惯，鸽子笼一般，还不能随便下楼透气，因为一大帮中学生会嘻嘻哈哈围上来参观。有一回，我坐在篮球架下面晒太阳，刚拉开裤裆捉虱子，就听见周围惊呜呐喊，若在农村，哪个管这个？可在学校，周老师的爸咋能当众捉虱子？还有我抽的叶子烟，儿媳她们也闻不惯，弄得我抽烟还得下楼。唉，大城市的规矩太多，上街入茅坑也得花钱，哪像乡下方便自由，拉泡屎在院子里，第二天早晨一看，没有了，野狗舔得干干净净。我一直与鸣乐他们赌气，几个小辈一直缠着他们爸妈，要拆这四合院，对，这已经不叫四合院了，三面都塌了，我住的这面，柱子里全是白蚂蚁，晚上能听见扎扎的声音。开始听的时候，我的皮都麻了，慢慢就习惯了。这房子正在变轻，说不定哪天就全塌了，可地基是石头夯的，蛀不坏，堂屋前这对石狮子，脑壳都被我摸光了，这是百年老宅，小辈们不晓得，一搬家就要我的命，再好的房子有啥用？

老威：没想到您还这么固执。这大概是做了几十年地主，被管制，逆来顺受够了，现在要自由。

周树德：对，我最烦人管我，儿孙们回老家，都不敢住这院子，害怕跳蚤。我养着猫，先是一对，后来就好几窝，这畜牲喜欢上床，挨人睡。人老了，一夜到亮，身子总是凉的，全靠它们给我取暖，赶耗子。我经常同它们说说话，说我们这辈人的话。前年，周树中

死了，他比我大两岁，经常到院子里来，摆摆旧，现在没有人摆旧了，只有养猫，它们说不定是死去的人变的。冬天，它们钻被窝，呼噜打成一片，使我想起年轻时贩盐住店，一张通铺摆十几个人。

老威：猫会传染病菌的。

周树德：我的病菌比猫还多。

老威：嘿嘿，是这话。不过，这房顶太漏，好些地面积着水呢。

周树德：只要床这块不漏雨就行了。

老威：您对生活的要求这样简单？难怪您长寿。

周树德：像我这样，死活也没啥区别。

老威：您不像个地主，倒像个守破庙的和尚。

周树德：您觉得地主应该咋样？

老威：应该有变天账呀，小学课本里就这么写的。

周树德：您在开玩笑。不过，破庙也守不了几年了，村里人常常借故到我这儿来要东西，我编的背架子，蝈蝈笼，蓑衣，斗笠等等，我的碗筷也有人偷。按迷信的说法，长寿的人死了，参加丧礼的会将他的生活用品带回家给孩子用，以添福添寿，可我还没死，人们就等不及了。

老威：您是个风趣的老人，我和鸣乐还是希望你搬进城，当然，到潘家沟他姨家也不错，社会进步了，生活改善了，到处都有长寿老人嘛，打打太极拳、钓钓鱼，猫狗也哪里都能养，您试一试与别人交往，不一定就合不来，说不定，您的故事有许多人喜欢听。

周树德：我的棺材放哪儿呢？

老威：城里时兴火葬，您老不用带棺材。

周树德：烧成灰？那不行，魂就没法还了。实话告诉你，我的坟地都选好了，就在鸣乐他奶旁边，我留有空穴，好去处，风水先生看过，它正处在来凤山的尾巴上，所谓“龙头凤尾”，地脉旺着呢。我没功夫与城里人扯谈，我活得踏实，或许等大家都到了阴间，就该我向他们“忆苦思甜”了——现在一想到死，我就乐哈哈的，

就觉得这地主没白当。为儿孙造福嘛，听说现在又可以买房买地了，地主又多起来了。

老威：您认为会再一次划阶级成分吗？

周树德：你们这一辈人的事，天晓得。

95 赌徒周忠陵

采访缘起：周忠陵是我的患难朋友，我住疯人院的时候他仍然九死不悔地坚持探望，后来我发觉他也有病，这叫我太绝望了，原来在这个薄情寡义的时代，只有疯子之间的交情牢不可破。

治内心疾病的唯一方法就是互相出卖，把弱点啦隐私啦统统当众抖出来，用伤口制成美味的笑料供人品尝。他妈的，我真想把这篇东西印成传单，撒遍中国的每一张麻将桌，断了狗日的后路。

但是，就在我蠢蠢欲动的时候，周妻东南站出来控诉：周忠陵曾在摄氏 43 度的塑料棚下，不喝水不撒尿，搓麻一天一夜，居然没被热昏头。

老威：忠忠，千禧年之夜你是咋过的？

周忠陵：睡觉嘛。

老威：就没做点辞旧迎新的动作？例如放放鞭炮，望望夜景，大叫几声，或者看通宵电视？

周忠陵：我就这么弱智？本来想去搓几圈麻将，但记起岳建一的告诫，就忍了。唉，睡吧睡吧，这世道除了赌，就睡觉舒服。98 和 99 年我都走背运，翻过这个坎儿，把旧世界丢在枕头那边，然后蹬几下梦脚，一睁眼就是美丽的新世界。老岳说了，只要我戒赌，就马上转运，财运如洪水，一直发下去，到 70 岁也止不住。

老威：你就那么迷信岳建一？

周忠陵：老岳得道高人，我岂能不信？

老威：嗜赌如命与随便玩几圈不是一回事。

周忠陵：倒霉就是从随便玩几圈开始的，就像马疯子，原来牌都认不明白，自从去年被三缺一的妇女帮拉住凑数，入了门道后，就着迷了。除了吃、睡、印书和发书外，其它时间都耗在麻将上。还埋怨赌友说：“这么好玩的东西，过去咋不告诉我？”有一回，他把两个二筒都码反了，大伙忍着没提醒，他却在自言自语：“咋

半天糊不了牌呢？”——你看，手艺臭成这样，还经常拼到底不下桌，没现钱就拿书抵，一晚上要输几件货，几百本书。马疯子的今天就是我的昨天，从 89 年算起，我的赌龄不算短了，你晓得，以前我除了做生意，是个特纯洁特正派的读书人，还写了不少先锋小说。我差不多已成名了，作品讨论会也开过，书也出过，评论家把我归于格非、孙甘露、余华一类，说不定我的悟性还高过这些人。正当我把文学搞得意气风发的时候，麻将来了，这是上帝的安排，我一摸就上瘾。重庆北碚天生桥一带，就那么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如果没有西农和西师两所大学，这儿就是偏远乡村。在乡村中，我读呀写呀，打电话邀约文学朋友，接着就是盼望某人风尘仆仆从外地赶来，促膝谈心一夜几夜然后分手。可平时，我一惯无精打采，老觉得身上不对头。这就是成名？不是热闹就是寂寞，而热闹短暂寂寞漫长，搞得人越发无病呻吟。自从沾了麻将，我的精神面貌得到彻底改观，“十亿人民九亿赌”，我顿感朋友遍天下。我的体重只有 70 多斤，一天吃不了四两饭，可一上桌就目光炯炯，熬个三天三夜没问题。输赢倒是其次，我要的就是那种近乎虚脱的感觉，仿佛骨头渣子都化进稀里哗啦的牌里。最开始我也同马疯子一样，输多赢少；有时三家一使眼色，盯准我下套；还有的时候，牌友换了一泼又一泼，只有我一人坚守阵地。嘿，别看我二目射神光，眼窝深得像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可啥也看不见。只要有人与我赌，管他老幼男女、尊卑贵贱。有一次在老黄家赌到第三天早上，所有的人都感到昏昏欲睡，就我腰板笔直地钉在坐位上。老黄告饶说来不起了，我说你来不起了就去躺一会儿，换个新人继续打。老黄说：“我老婆、岳父、岳母、舅子、小姑子、小姑子的同学都轮番上过四、五盘，只有我 15 岁的崽儿没陪你。”我赶紧说：“既然这样，叫小崽儿也来凑个数，输赢好说。”老黄说：“他还在上学。”我说：“从小有赌兴，将来能成大器。”老黄尊敬我是作家，只好把小崽儿从被窝里掏出来，揪到桌边懵懵懂懂地坐起。又勉强打了一圈，兴趣索然，我才觉得一阵瞌睡像酒劲一样，从尾椎骨猛冲上脑门。我摇摇晃晃地出门，差点在路上睡着了。回家这一觉，嘿，睡了一天一夜。东南几次催我起来吃东西，我都毫无知觉。她吓坏了，还以为

我啥事想不通吃安眠药，找来医生翻眼皮查看，被告之正常。

觉睡够了，吃了饭，就坐在窗前发愣。我突然想起我还是作家，这样浪费时间简直罪过。于是打起穷精神，拿出纸和笔，准备干正事。没料到，我才在纸上写了几行字，脑袋就重得不行。我连换了几道浓茶，依然哈欠连天，最后只好弃笔打盹。我的许多小说都这样只开了个头，就一直丢在那儿。

生活如此周而复始了好几年，你在文章里说我熬骨油，算抬举我了。对于我，文学上成名远没有麻将那么有诱惑力，不信我教你摸几把，那光溜溜、凉滋滋的小方块真的像女人皮肤一样，很有快感。打麻将讲手气，你晓得啥叫“手气”？这是超越技巧的东西，甚至超越游戏规则，你事先根本不知道手气如何，一会儿，你赢或者输，才恍然间明白啥叫“上帝之手”。若干年前，我就读到过“上帝教我掷骰子”的书名。

老威：你一年输赢多少？

周忠陵：五万多吧，特别背的时候，输过十来万。后来东南无奈，也鼓励我到北京鲁院读书兼做书生意，跳离赌博环境，她嫌我的赌友文化层次低，以为我是被拉下水的。她说，北京有文化氛围，大家都有事业做，就没人陪我消耗时间。她没料到这麻将是 20 世纪中国最大的时尚，它的普及程度相当于清末民初的鸦片烟，官场、文化界、生意场、百姓家、甚至三陪小姐和收荒匠都玩。教授和打工仔没共同语言吧？可方城一开，就四海一家了。特别是成都，街头巷尾，除了密密麻麻的串串香小火锅，就是遮天蔽日的赌桌，警察抓了一阵又一阵，也丧失信心了，因为这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问题，而是野火根本烧不起来。唯一的办法，不是堵，而是导，干脆把麻将也列为体育项目，与象棋、围棋并列算了。嘿，你说中国处于转型期，群众生活压力大？你说竞争激烈，工作不好找？可麻将一望无涯，仿佛成都人都没正经职业。听说有家国营企业，几个月不发工资了，住底楼的下岗职工们为了自谋生路，就破墙开麻将馆，结果家家都热火朝天。后来连领导也加入了，大小都是赌嘛。

老威：你老婆放你出来戒赌，你倒赌得更欢了。

周忠陵：刚到北京住鲁院，还没怎么赌。渐渐，会朋友的热劲头过去了，就忍不住摸两把。我这么大把年纪，上述的学，哪怕在教室门口站一站，也觉得有点像范进中举。我听不得电话响，一听就掉魂。还是搓麻将踏实，骰子是老师，掷下去认点子，课就开始上了。如此昏天黑地，瘾倒过足了，可痔疮却发了。这痔疮又叫坐板疮，跟长期练坐功，憋屎憋尿有直接关系。俗话说"十男九痔"。

但一般人发痔疮不过屁眼儿火烧火辣，出点血而已。我的痔疮不是出点血，而是像女人月经，来很多天，有时血来得猛，大肠头子就坠出一节，在裤裆里荡来荡去，像猪尾巴。嘿，真他妈像《百年孤独》里写的，布恩迪亚上校的家族发生返祖现象了。我一年要卧床好几次，肛门内塞了颗炸弹，我觉得早晚要被痔疮炸死，轰！直肠的导火索一拉，我坐自己的土飞机上天，下一阵肉渣渣雨。

老威：听说你认识一位专治屁眼儿的神医？

周忠陵：也是打牌认识的。你晓得，我这人轻信，况且这痔疮发作如十万火急，也由不得我。那神医原是写诗的，突然有一天开悟，改钻中医，半年就成名了。许多离休将军找他医过屁眼儿。据说他家的客厅还有香港船王包玉刚送的匾，上提"华陀再世"。神医平生最大的憾事，就是没能给胡耀邦治病，"便秘引发心脏病，"他经常叹息说，"我可是治便秘的专家！"他的确专家，一帖药下肚，我就一泻千里；再二贴三贴若干贴，我再也没消停。平均半个钟头拉一次，有时刚把裤子提起来，稀屎又出来了。我折腾了一个多月，不敢上街，不敢坐车，不敢见朋友，特别是女性朋友，不怕你笑，有次我打了个喷嚏，下面也卜地一口射出。我本来就只有 70 多斤，这样一拉，人几乎虚脱，连走路也得扶墙，挪两步，歇口气，头上直冒虚汗。

老威：这哪是治病，纯粹是下毒！

周忠陵：就是毒，大剂量的芒硝，又医痔疮又医赌瘾。我的肠子和思维都泻成直的，汲收了什么，就直接排掉。所有的朋友都劝我中断这种要命疗法，但神医在我心中的地位，不可动摇。40 岁

生日，我还特邀他一起过，结果他发酒疯，在大街练拳脚，把护送他回家的人打了。

老威：这么不给你面子？

周忠陵：经过一番脱胎换骨，我认清了他的真面目，与胡万林是一路货，治一百种病统统使一味药：芒硝。我记得制造炸药也用芒硝，我差点就成了这种疯狂实验的牺牲品。后来我停服芒硝，痔疮又翻了。

老威：这叫“屁眼儿的报复”，你还是改邪归正吧。

周忠陵：我从小身体就弱，不是这出毛病，就是那儿不舒服，所以对病痛的忍耐力特强。真叫我毛骨悚然的是岳建一，98 年的一个夏夜，我正在都江堰打麻将，他从北京来长途，声音出奇地阴冷，他在电话里说：“周忠陵，你还在赌么？再这样下去，你有血光之灾啊！”我的心尖尖抖了一下，仍强笑说：“不算赌，就摸几把耍麻将。”老岳说：“你要绕开麻将，连看也不要去看！”放下电话，我的手都湿了，可还是依着惯性赌下去，一个通宵，手气还不错，赢了几千。

睡到第二天下午，到河边去喝茶，途中碰见一个算命老头，竟当头一句：“先生大贵之相，千万不能沾赌！否则有血光之灾！”这一来，我有点灵魂出窍了。莫非冥冥之中，真有人在安排我的命运？

老威：老岳也给我打过电话，让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劝你，他在家中烦躁不安，觉得你似乎躲不过这一劫。

周忠陵：我在许多朋友的面前诅咒发誓，今生再不沾赌，可有人一约，我就不由自主地去，像丢了魂，脑子一片空白。我经常一边摸牌一边想：“打完这圈就下桌！”心理压力太大了，我就在乌烟瘴气中自我解嘲：“岳建一说我再赌下去有血光之灾！”其他三位随口应付：“这么厉害？开玩笑吧？”我打出个么鸡说：“老岳的话，百分之九十要应验。”我的下家说：“真的？让他给我也算算？”我说：“算个逑，老子就是让你给祸害的。”对家说：“是条害人虫。”我说：“明天开始金盆洗手。”上家说：“那今晚赌个莽的，再翻一番如何？”我正犹豫，下家说：“周哥的赌场绝笔，不搞个杠上花

不收兵。”

老威：这样折腾，不出事才怪。你一把骨头在哪儿熬，全神贯注，又是烟又是茶，长年累月，连健康人也受不了。最近的报纸连登两起麻坛惨案，都是老年人鏖战太久，引发了心肌梗塞。

周忠陵：我到处宣传岳建一的预言，还算了很多次命，可一天不赌，我又憋得慌。我喜欢热闹，总想找什么东西去塞满这脑子，免得它空荡荡的。都江堰风景如画，气候宜人，倒是适合隐居。40来岁的人隐啥居？后来，我爸死了，你晓得，是场车祸。

我爸才 60 多岁，身体很健康。那天傍晚，他和妈从西农校园散步回来，过了马路，老俩口已站到路边了，一辆中巴车挤过来，把爸爸撞出几米远。这是一个月里，这块地面出的第四起车祸，都是中巴车为了抢客，恶性竞争造成的。我父亲，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好人就这样去了，我从北京赶回来料理丧事，心力交瘁。

此前我曾经历过死亡，我的第一个未婚妻在举行婚礼前夕，突然病倒，一检查就是晚期脑瘤，我目睹了一个美丽生命消逝的全过程。我晓得，死者对其亲属的影响远不是眼前的悲痛，而是一种无尽头的空漠，血缘崩地断了，你只能飘着活，肉体和房屋不是家园，而死者带走了你真正的家园。现在我妈信了基督教，向上帝祈祷时也在同我爸对话。我没有父母那辈人的自制力，嗜赌如命肯定跟死亡有关，我逃避，在借一种游戏淡化记忆。

老威：你爸爸的死也算血光之灾吧？你不认为这是一种预兆？

周忠陵：守灵之夜，朋友来得太多，应酬也离不开麻将。这是中国民间的风俗，我只能上桌。以后，我几乎放任自流，谁也拦不住了。

老威：你是否觉得“血光之灾”已应验过了？

周忠陵：我没仔细想，只凭一种惯性在生活。哦，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有个胖和尚还给我算命，说得也跟岳建一差不多。真是蹊跷。

老威：后来呢？

周忠陵：又过去大半年，我见没动静，就彻底放松，觉得老岳不过是出于老朋友的深厚友情，装神弄鬼吓唬我戒赌而已。一直到 99 年开春的一个晚上，我楼上的书商打麻将三缺一，硬要拉我凑份。当时我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但盛情难却，不好推辞。屋里四人都是大烟枪，一支接一支，一会儿就浓雾弥漫。我打了几圈，感到透不过气，就趁洗牌出门站了一下，回来接着打。精神老集中不了，平时的赌场神威不晓得跑哪儿去了。对家说："忠忠，你的脸色咋这么难看？还没输赢嘛。"胸闷得受不了，我就站起来，灌两口水，呛住了。一咳嗽，面前冒开金花，看不见谁了。我一软就下了麻将桌。

赌友们手忙脚乱把我搀下楼，在床上躺了半个钟头，快窒息了，赶紧朝医院送。抢救几个小时才还阳，我胸肋上开了两三个刀口，浑身插管子。原来是肺泡打破了，如果晚抢救一个小时，必见阎王。

老威：太悬了。

周忠陵：还有悬的。我在病床上垂死挣扎了一星期，转危为安，于是我又浮想连翩。没办法，我天生的盲目乐观主义，活着多美好，有牛皮可吹，有钱可赚，郑州马上开书会，我的《证券法》正行情看涨。

老威：刚从鬼门关归来就想去热闹？

周忠陵：鬼门关太冷清了，我要去人多的地方冲冲晦气。

老威：你弟弟代你开会不行？

周忠陵：我是我们家唯一的交际明星，关键时刻，非我出马才摆得平，从小到大都这样。于是我预订了飞机票，去的那天还同医生发生争执，他不同意我出院，我骗他说回家静养。结果一出门，就直奔机场，临上飞机，才发觉《身份证》忘带了。

老威：你奔丧啊！

周忠陵：差不多。嘿，幸好忘带《身份证》，否则这条命就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你想想，伤还没全好，能坐飞机么？肺不炸了。我拖着浑身伤痛，连夜赶火车到郑州，没料到，第二天又租了辆桑塔纳朝回赶，全靠敖歌一路照顾，否则这条命又献给祖国的铁

路事业了。

老威：咋回事？

周忠陵：我拢郑州的当天，肺就不行了，剧痛，找到医院，技术不过硬，不敢开刀复查。我弟弟搁下业务，陪我到火车站，突然想起刚才医生“再也颠簸不得”的警告，立即找出租车。花了一千多元，在傍晚又驶进同一个医院。这是老天的惩罚！可笑的是，我在病床上连做三个梦，都在搓麻将，并且盘盘赢，清一色，杠上花，我占全了。我还盖着麻将铺盖睡，嘿，这玩意儿与围棋有点相像，不过一个是方的，一个是圆的。妈的，人类发明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原子弹、氢弹的破坏力大得多。岳建一神机莫测，我服了。

老威：不赌啦？

周忠陵：瘾小多了，可赌可不赌。以后就别当正事做，打点娱乐麻将算了。

老威：你差点从麻将桌底直接溜下鬼门关，还不戒？

周忠陵：死而后生，死而后生。

老威：你太没出息。

周忠陵：男人的出息就在于赌，我算开悟了。你以为你不赌？

老威：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

周忠陵：你在写作，埋头苦干许多年，不发表也写，这是在下注呀。你的赌瘾比谁都大，你把一辈子都赌进去了，赢就赢个鸡犬升天，输就输个血本无归。

政治家也在赌，注下得更大，甚至不是钱，不是生命，而是千秋万代，几辈人都看不见的乌托邦。文革就是个乌托邦，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也是乌托邦，结果输了，几代人的青春和理想都搭了进去。你看，这颗小小的骰子，我们这种凡人掷下去，不过在桌面打滚，而抽象的骰子掷向历史的桌面，开局的每张牌都是血腥的。而乞丐、打工仔、下岗工人也在赌，或者怀着赌的欲望。麻将、纸牌、扑克、围棋只是寻常的赌具，而活的赌具是人，到处游荡，为生存熬尽骨油的人，自己赌的同时也成为别人的赌具。

老威：你还弄出哲理了？

周忠陵：十年前，我被抓进去一次，在牢里撞见重庆大名鼎鼎的赌王张，近 70 岁，就赌了 60 多年，国共两党的赌牢都坐过，永远戒不了。承办人只草草审了一次，就让他卷铺盖滚蛋。

老威：老家伙赖帐？

周忠陵：他一竿子坦白到底，然后告诉承办人：赌博嘛，最多劳教三年，我这点数目，最多一年半。我年纪大，干不动活，只能到劳教农场看门;看门相当于养老,我犯了错误,没脸让政府养着。承办人让他写戒赌保证书，他说，我写了就是欺骗政府，几十年的坏毛病，恐怕戒不了。承办人说不写就劳教。他说劳教也戒不了。承办人说关在里面赌什么？他说见什么赌什么,没钱就赌饭赌肉赌不干活，我怕里头的娃娃跟我学，赌上了瘾，输了就偷、就抢，我的罪就大了。

承办人气得拍桌子，赌王张却大声喝彩：“一个巴掌，拍了两下，五根指头，八个点！你干脆轰我两炮，凑个满贯，我好办保外就医。”

老威：这无疑是你的榜样吧？

周忠陵：这是我听到的最精彩的赌徒故事。我？永远上不了这境界。

老威：境界？亡命徒嘛。你比赌王张更亡命,不过身体差远了，这正好挽救了你。回头是岸吧，忠忠，世上好玩的事情多，何必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96　严打幸存者左长钟

采访缘起：1983 年的“严打运动”对中国许多家庭来说是一场噩梦，据说起因于当时震惊全国的“二王持枪流窜杀人案”。这王氏兄弟为东北长春人，服兵役期间受过特种训练，精通枪支和射击，因报复杀人出逃，居然在长达几个月中流窜十余省，与各地成百上千的公安干警周旋、顽抗，屡屡突破重围，造成警方重大的人员伤亡，为中共建国以来首次被公安部重金悬赏通缉的要犯。

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恶化的社会治安，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亲自出面召集各部人马，制定了“从重从快从严打击犯罪”的方略，并作为一种治乱国策，保留延续到本世纪。

今年 54 岁的左长钟正是“严打”的牺牲品，当我 2002 年 4 月 1 日傍晚在“上访客栈”内与之交谈时，他仍心有余悸。“严打期间，司法从简，”

他说。我追问“简”到什么程度，他回答：“公、检、法挤在一条板凳上，甚至一条裤裆里审案。”

左长钟：久仰了，老威先生，我曾在地摊上买过您的《底层》盗版，一口气读了个通宵，佩服。

老威：您太客气了，看样子是个读书的人。

左长钟：老三届高中，要毕业那年赶上文革，所以没拿毕业证。

老威：但知识底子打得相当扎实，这从您的上访材料中能感觉到，行文简练，申诉理由充分，一笔行书也相当漂亮。

左长钟：可惜衙门深如海，写得再多也不顶用。

老威：上访得有耐心，你进入这个行当才一年，小学没毕业呢。老陆是上访名人，已抗战八年，算大学，上访十五、六年，就可以拿硕士、博士文凭了。好啦，不开玩笑了，这次交谈的主角应该是您。

左长钟：听说您也坐过牢？

老威：四年，反革命宣传煽动。

左长钟：那您一定晓得 1983 年的“严打”。

老威：我所在的监狱，大约有一半犯人是 1983 年“严打”进去的。

20 来岁关到 30 出头，个个都成了劳改的主力军。他们说，所谓“严打”就是从重从快，公、检、法三家坐在一间屋，甚至一条板凳上审案，如果你要抵赖，不按承办机关的要求“供认不讳”，就吊就捆，打断肋骨算便宜了。有一个叫钟某某的教书匠，涪陵人，被指控强奸女学生，屈打成招后，就投进死牢，镣铐加身一年零四个月！在绑赴刑场的前夜，高院下达了发回重审的通知，原来是“受害人”上诉翻供，并状告公安局制造伪证，冤枉好人。钟某某被依法改判“死缓”，保住了脑壳。

左长钟：唉，类似的案子我见得多了，怪只怪钟某某生错了时代。我也生错了时代，按现在的标准，我的罪名根本不成立，因为卖淫嫖娼也不算啥，罚款走路嘛。可是在 80 年代初，国门刚开了一条缝……

老威：你也犯“花案”？

左长钟：不过是暗地里开家庭舞会，跳跳贴面舞。我支过边，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后来随大流返城，白天成群结队去省市有关部门静坐示威兼刷大字报、大标语，晚上更成群结队游逛、聚会，满腔青春热血发泄不完。那年头，支边知青个个多才多艺，弹吉他、吹口琴，唱文革前的老歌、港台歌、苏联歌，或根据这些曲调重新填词的知青歌。这是多年半军事化生活培养出来的，在那种类似劳改的环境里，不懂得自娱自乐就只有疯掉或自杀。总之，那个时代的风骚都领过了：造反、下乡、返城、街头演说、街头音乐；还有手抄本、喇叭裤（后来又穿牛仔裤）、火箭头皮鞋，最早都是由知青穿戴回城，才在追求时髦的城里青少年中流行开的。78 年我就穿喇叭裤了，裤腿一尺五寸，在地上扫来扫去，把街坊上的居委会老太婆气惨了，就打小报告给派出所。户籍警揣了一把大剪刀来找我谈话，威胁“不剪大裤腿就关起来”。我根本不睬这一套，一心

要新潮到底。现在回过头去看 80 年初的老电影，后进青年或港台特务都穿花衬衫、喇叭裤，真他妈活见鬼。

那年月的街头音乐家多如牛毛，经常在滨江路和人民公园一带表演，两地的夹竹桃都非常茂密，路灯照不透。但见一个人在浓荫里抱吉他，衔口琴，又吹又拍，像一台音乐机器，从《送你一朵玫瑰花》到《哎哟，妈妈》，再到《秋水伊人》，不歇气地朝下弄。渐渐，围观者越来越多，先是勇敢的一对进入圈中起舞，而后是两对、三对，终于全场都舞开了，把音乐家累得够呛，就以录音机放老歌来代替演奏，那时的录音机体积相当于 14 英寸的黑白电视。

成都坝坝舞会的兴起肯定有我一份功劳，这大约是文革后最早的民间社交场合。在夹竹桃的掩护下，陌生男女可以自由交往，不用先调查对方的家庭成分、工作单位，再考虑是否确立关系。我在其中如鱼得水，和许多新潮青年成了朋友或舞友，一个星期至少碰面三次以上，偶尔不跳舞，就听我弹吉他——这种音乐、幻想加浪漫爱情的幸福时光持续了大约一年，坝坝舞会就被政府明令取缔。

记得有一次，有上百名舞客在人民公园的“辛亥年保路同志会纪念碑”下如痴如醉，忽听有人大喊：“牛脑壳（由民兵组成的执勤人员——老威注）扫黄来了！”吓得大伙轰地一下散开，钻树林逃跑。谁知戴红箍箍的“牛脑壳”们就埋伏在四周，大半非法跳舞的人都落网了。公园派出所被挤得水泄不通，值班警察忙不过来，就命令大伙蹲在院子里，一个挨一个进屋候审。“把《工作证》掏出来！”他吼一声。结果有单位的就让牛脑壳押回去受处分，没单位的即送交所在街道派出所受审——就这样，我的吉他被缴，还被单位，一家街道修配厂除名。父母气坏了，赶我出门。

我血气方刚，破罐子破摔，就搬出去和朋友王翼同住，他分在阀门厂当钳工，住集体宿舍。80 年代的人都轻财重义，我在王翼处□混了几个月，同室的四个年轻单身汉都挺崇拜我的音乐天赋。那年头，像我这种 33 岁还没结婚的人，也算物以稀为贵。

没事可干，心里又骚动得厉害，坝坝舞会取缔了，就像把一个戏子的台拆了，咋办？只好组织家庭舞会。我的门路宽，就负责给

单身汉们约舞伴，相貌好歹倒是其次，在当时，姑娘能来就算胆子大了。王翼从家里搞来录音机和几盘港台歌曲，硬件就齐全了——舞会定在周末，宿舍楼的单身职工几乎都回家或外出，我们用被单和棉絮遮死窗门，熄了顶灯，只留用毛巾裹了又裹的台灯。正是阳春三月，春心萌动，五对年轻人在几平方米的空间搂抱着跳舞，两边是双层架子床，磕磕绊绊的，莫说动作不能大，就是手臂抬高了也不方便。灯光幽暗，邓丽君的歌显得朦朦胧胧的。我们像幽灵一般，无声无息地原地你进我退，脚不敢抬，鞋底不敢摩擦，生怕惊动楼下的告密者。其实，这种所谓的舞会只是借跳舞之名男女拥抱罢了——所以单身汉们一旦尝到禁果的甜头，就兴奋莫名地企盼着下一次——一共三次，到了第四次，大伙刚轻车熟路地堵死门窗，放出音乐，让身体接触到一块时，门就被蓬地一声撞开了。

那是 1983 年夏天，“严打”正进入高峰，经过三天三夜的突审，我们被定为“特大流氓轮奸集团”。您看我的手指关节，都变形了，这是筷子夹的，有一出古装川剧叫《审妻》，用的就是这种刑。谁招架得住？还有拳打脚踢，灌辣椒水，更可恶的是警察累了，就让看守所的劳改犯上场。我的生殖器现在还有疤痕，烟头烫的，替你搓硬了，烫龟头。你只能招供，哪怕指控你奶奶和蒋介石乱搞，你也只能盖手印。

我和王翼都判了死刑，脚镣手铐，我不甘心，天天撞铁栅喊冤。看守所为了整治我，在死刑复核前，居然把我硬扛出去陪了回杀场。听说那次一溜毙了 64 颗脑袋，游街示众时，万人空巷，热闹非凡，20 多辆卡车载着五花大绑的死囚，缓缓穿过市中心。我的嘴和脖子都注射了麻药，一声不能吭，像一条死鱼先曝晒，后又淋了场瓢泼大雨。

回到看守所，同监的犯人议论说，一次崩这么多脑袋，老天爷都不忍，流泪啦。我哆嗦了一宿，还是不甘心，就狂喊报告，要见住所检查官。唉，天不绝我，这个案子的五个被告都喊冤，翻供，把看守所闹得河翻水翻。

我被反铐了大半年，腋下生疮溃疡，浓淌到哪儿就烂到哪儿，

但我一有机会得到笔，就用反铐的手在背后写申冤状——我居然学会了如此绝技！

1983 年底，我和王翼都熬到了改判（我无期，他有期 20 年）。解铐那一瞬间，我的双臂还下意识反拧着，复不了原。我慢慢活动关节，骨头，咔咔响，动作不能猛，这是老犯说的，动作猛了要损筋断骨。20 分钟后，我试着伸平手臂，腋窝忽地掉下几颗臭虫。我走向水池，终于可以自己给自己洗澡了——从此，我暗下决心，要不惜代价洗刷罪名，争取一个清白的自由之身。

老威：明明是冤案，怎么没无罪释放呢？这“严打”不成了“乱打”么！

左长钟：只要在“严打”中栽了，就不可能无罪，这就是共产党的逻辑。可惜我老子没做大官。

老威：请您接着讲。

左长钟：接着是漫长的劳改，差不多把一辈子耗尽了。监狱的规矩是，只要你坚持申诉，不认罪服法，哪怕劳改再卖力气，也不考虑减刑，所以 83 年进去的一批人，尽管冤案如山，敢冒险申诉的也很少。我认命了，入监随俗，混吧。我是吉他高手，由新犯集训时就成了文艺积极分子，一年不到名扬全监，经常参加排练演出。王翼内向，不善交际，所以分在隔壁二大队，干铸造，这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天不亮就得起床，列队去车间开炉，机器将熔化的铁水倒入坩埚，浑身裹得严严实实的犯人们伸着长柄耳勺，从锅里舀铁水，像菜农浇地一般灌入广阔沙盘中的一个个模型。由于车间的粉尘如经年不散的大雾笼罩着，铸造工百分之九十都得硅肺病，咳黑痰、黑血，死亡率极高。

我终于混入知识分子成堆的教育队，彻底逃避了重体力改造。我和王翼经常擦肩而过，每次都见一个从煤坑里掏出的黑人，一摘下黑口罩，白牙齿格外醒目。坏蛋惜坏蛋，我得帮帮这位患难兄弟，就向教导员介绍他的专长——毛笔字，刚好写大标语用得着。

过程太长，我简略点，总之，我和王翼在一块了。他忍不住向我透露天大的秘密：逃跑。开始我认为是痴人说梦，深监重地，岗

哨密布，插翅难飞嘛。

王翼说，上天不行就入地，我已绘制了监狱下水道的分布图，肯定能爬出去！

我说，你是外国电影看多了吧，想做“基督山伯爵”，逃出孤岛发大财。王翼说，电影算个屁，还不如做个寻鼠专家，只要搞清老鼠经过哪条沟，哪个洞的路线，这事就成了百分之七十。我问，没钱出去奔哪儿？王翼说，他有两百块现金，出去就直奔新疆，那儿的流窜犯多如牛毛，逼急了，就向苏联越境，宁愿赌一把，也比憋在笼子内强。

我动心了，自由诱人啊，在苏联境内弹吉他浪漫啊！我有音乐天赋，在哪儿都能混出人样。于是乘父母探监，我也积攒了两百元现金藏下来。就这样不急不躁地准备了三个多月，机会却出奇不意地降临：教导员的孩子嚷着跟我学吉他，教导员拗不过，就带那 12 岁的小姑娘来教育队，命令我教——这显然违反干警纪律，我毕竟是重刑犯嘛。为了避嫌，教导员只好假公济私，将我和王翼安插进短刑犯组成的建筑队，带出重兵把守的内圈，经过家属宿舍区时让我们留下，吩咐某管教领去他家教孩子。

一星期出来两次，一晃两个月了，王翼教书法，我教吉他。教导员夫妇培养神童心切，我们迎合这种心理，对孩子的每点微小的进步都赞不绝口，陶醉的回数多了，他们自然就放松警惕，忘记了随时可能发生的敌情。1986 年 1 月 3 日下午 5 点半钟，我由无期减为有期徒刑 20 年的第四天，我和王翼趁无人之机，偷了教导员的便装，穿过楼下的小买部脱逃。门岗就在三米开外，背对着我们。出了小卖部就是大街——自由这么轻而易举就到手了。满地树叶的秋日，我们强作镇定沿街走了 20 多米，转过街角，突然撒腿疯跑。80 年代的小县城，既没有公共汽车，更没有出租，我们跑一阵，大口大口喘气，才想起叫三轮去长途汽车站。

最晚一班车是 7 点，还要等 1 个钟头。我们哪敢停，抬腿就朝城外跑，没任何熟人，不晓得任何一个地名。只能像无头苍蝇瞎撞。出城时天色黯淡，一弯新月跃出云端，前方一片开阔的田野。我们

连啃干粮都顾不上，奔命啊！

田野尽头是丘陵，我们边跑边寻藏身之地，几十步开外就有瓦房和炊烟，可逃犯哪敢冒失！这地球上最危险的就是人，为了避开人，累死也要跑。我说我不行了，快虚脱了。王翼说再冲一百米，五十米……二十米吧……唉，他拖着哭腔，泪汗交加，长钟啊，看来你我活到头了！

好像为了应验这句倒霉话，身后响起汽车喇叭，然后是人声和狗吠——追兵到了。我抱住一棵树止步回望，山脚下，几十支手电光拉开了一张追捕网。

快跑啊，王翼嚎叫着，我紧跟上去，在丛林里乱窜。站住！缴枪不杀！喝令声回荡着，紧接着是枪声，子弹擦过我的头皮，簌簌击落了一片叶子。狼狗脚撵脚扑过来，爪子撕开衣背，露出光溜溜的后脊梁。天晓得我为啥要跑？都尿裤子了还要跑！王翼在我前头，双臂狂舞，迎击密密匝匝的枝条，两条狼狗从左右窜过去，回身反扑。王翼蹦个高，居然一腿踢翻了狗。这家伙厉害得不像人了，像他妈个外星人！

眼前豁然开朗，波光粼粼，原来遭遇了一座堰塘。我本能地在陡坎边猛刹步，转瞬就被狼狗扑倒，束手就擒。而王翼却凌空一跃入水，激起颇为壮观的水柱。一班，左！二班，三班，右！全线包围！教导员一声令下，天罗地网几分钟就布好了，几百平方米的堰塘四周长满了兵。

眩目的手电在塘面扫荡、交叉，最终牢牢地罩住王翼。没料到，他不仅体力好，水性也好。自由泳、蛙泳、侧泳、剪刀泳，他换着姿势游，而几十道光柱如胶水一般死粘着，那怕他下潜，也紧追水下模糊的剪影，直到轰地冲出一条人鱼。不准开枪！教导员吼道，看这狗日的能顽抗多久！

我投降！王翼喊，他已在几百米水面游了数十来回，累极了，就中止折腾，在离堤坎几米远的地方高举双臂。

你尽管逃嘛，你咋不逃呢？教导员笑道。

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王翼绝望地喘气。

不敢就算了？教导员埋腰察看说，王八蛋，你必须继续逃。

政府饶了我！

你变鬼嘛，教导员拔出佩枪，哗啦子弹上膛。你死定了，泡着也拒捕，上来也拒捕，总之你死定了。

静夜里响起一片拉枪闸的声音，王翼吓坏了，急忙回头朝塘中心游去，只有交叉的手电光，真是索命光啊，不依不饶地粘着他。月儿高挂，山丘起伏，狼狗也不叫了，堰塘里的划水声那样清晰，估计一里之外都能听见。真的，太安静了，我被铸在陡坎上，脑子一片空白，可眼睛却下意识地瞅塘里。哗，哗，王翼游得太慢了，越来越慢，像梦游一样，我居高临下地跟踪他，我的眼睛也成手电光了，几十名武警的眼睛都变成手电光，哪怕王翼潜入泥底，也能取他性命。他又靠近塘边了，他又喊投降了，可回答他的是滚回去，上来就打死你。这已经是第十次，或者第十三次，他可怜巴巴地回头朝相反的岸上游，哗，哗，他喘气，他开始呛水，咳嗽。他哭了起来，喊着教导员，我不想死的话。可二十来分钟过去，他靠近另一处塘边时，答复他的还是滚回去，否则以拒捕罪打死你。他再次回头，这大约是十五或十七个回头了，他划不动了，就仰在水中歇着。还有啥子花样，尽管拿出来耍！教导员大骂。

王翼漂在面上，只露一张脸，几十道手电光就钉死那张脸，比月光强一百倍。他又挥了两三下手臂，疲软得像鞭子。他到底放弃了划水，那张脸又在表面浮了几分钟，就突然下沉。

手电光还钉在原地，王翼又憋不住冒出水，动静比前几次小多了。他再沉，再浮，翻来覆去。没人吭气，直到他永远沉没，手电光还钉着原地咕咕回旋的几颗水泡不放。

跟着是声势浩大的打捞工作，世界转眼间苏醒了，人喊狗叫，两个排的武警战士几乎都下了水，不远的山下公路上，报警器拉得嘟嘟响，惊动附近的村民赶来看热闹。

尸体上岸在大半个小时以后，王翼在月光下呲牙裂嘴，死相难看，他的肚皮灌圆了，比平时大两倍，连裤腰带都胀断了。教导员命令两名武警架我去“受教育”，我一下子瘫了。

像拖死狗，一副手铐把我和王翼连在一块，塞进囚车，这叫生死相随。之后我被送进由地下防空洞改造的小间……老威先生！怎么啦，老威先生您走神了……

老威：我的思路已中断在水里。那王翼咋不上坎呢？宁愿挨子弹也该上坎呵。

左长钟：他吓迷糊了，水鬼附体了。

老威：无论如何该活下去……

左长钟：您流泪了，老威先生？唉，我不该讲这一段，既伸不了冤，也报不了仇，连个证人都没有。罢，罢，死了好，省得受活罪。我被全监批斗，宣布加刑四年后，就戴脚镣手铐打入小间。深入地下十多米，再拐三个弯，走一段烂泥路，到了，某某管教说，就弯腰开锁，并把住铁栅门命令我进去。这是一口凿在岩壁内的棺材，我从门口直接爬上石头床，稻草垫子，渔网般的被褥，我一曲腿，铁栅就关上了。

借着外头昏暗的灯光，我认清了床边的马桶和塑料碗，这就是全部家当。

熄灯了，我一动不动躺着，浑身发潮。我用手摸洞顶，湿漉漉的，坐起来，就顶天接地了——我就在里面关了整整四年，吃喝拉撒睡，不见天日，不出这长两米，宽一米的洞穴。不能站，连伸个懒腰也不行，我唯一的运动场是石头床，做伏卧撑、仰卧起坐和下蹲，几十上百，几百上千，哪怕一顿只吃二两饭，哪怕天旋地转，眼冒金花，运动也是每日必修功课。我宁愿累死，也不能成残废——后来我晓得，周围的反改造邻居有 20 多个，多半都废了，抬出去已半死不活。

昼夜的区别是有没有人来，送不送饭。老鼠自由出入，令人嫉妒。监狱政委和大队指导员每年视察一次，戴着口罩和手套，挨着问犯人有啥想法，悔不悔罪？一大堆领导由武警保护着，离栅栏门两米远，大约在黑暗里关久了，小间犯人的眼睛都闪闪的亮得骇人，所以领导总要开玩笑说，生活咋样？学没学会咬人？

老威：你咋回答？

左长钟：和所有人一样，磕头作揖，叫政府亲爹亲娘。我绝不逃了，谁要逃，我就揭发，和他斗争到底。我要立功受奖，回到人民怀抱，我满嘴白沫地嚼着舌头。

老威：您想没想过王翼？

左长钟：我恨他，淹死憋死还不够，该拿他千刀万剐。教导员大好人，几次叫这狗日的上来，他拒捕顽抗，太反动了。

老威：您真洗心革面了？

左长钟：您进去试试，不“洗心革面”就烂在里头。

老威：古罗马有一个人，因为信教问题被统治者关进地窖好几年，结果他利于黑暗沉思默想，重见天日时已修炼成哲学家。

左长钟：您嘲笑我？太没心肝了。我在里面啥也没想，思路集中不了，对镣铐都失去知觉了。当某一天，突然上了地面，眼睛差点叫光刺瞎。教导员不计前仇，过来鼓励我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减刑回家。不知咋的，我居然感动得哭起来。由于缺钙，除去镣铐时我试着起身，动作猛了点，两腿胫骨崩地全骨折，在医院住了三个月，才柱着拐下地。

老威：有后遗症么？

左长钟：风湿性肌肉萎缩，还有心脏病，痛风，糖尿病，总之，所有器官都提前衰退，我今年 53，已相当于 70 岁。还好，办保外就医顺利得出奇。

老威：您上访，企图翻案，就不怕被重新收监？

左长钟：尽管放马过来，候着呢。笑话，现在的我是当年的王翼么？

为无权势者立命

李亚东

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它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这是一部底层生存的选集。

一座为小人物修造的碑林。

“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欧阳修这样概括他《新五代史》的“义法”。我想顺着他的话，指出《中国底层访谈录》是为无功、无德、无言的底层人物立命。

近些年，世上流行人类劫难的预言。本书提出，“即将”云云不过掩盖真相。事实真相是，我们早已沦入无底的深渊。

本书展示深渊、揭露真相、发现历史、洞察人性。见得真、写得深，揭示了生活的水深火热，透露出生命的荒诞凄凉。而有一种残酷的美，让人震惊颤栗。即以那种“冷的美学”为标准，自有显见的美学价值。

当然它是“热”的。当然它更有伦理价值、历史价值。真相和美，哪一种更永恒？高明者见智，沉潜者见仁。底层的生命贱若蚂蚁，但也冬去春又来、野火烧不尽。天地间有种刚正之气，即使被压车轮仍要旋转、升腾。确认这一点，跟指出他们赴告无门、力不从心一样真实。哲人说：所谓乱世，先乱在我们的心上。

所以哀告，所以呻吟，所以疼痛，所以倾听。微观心理学与宏观历史学相互交织，精神治病与人性复归相互推动。两眼向下，立定自身，我命由我，拨乱反正。

主耶酥说：“凡你们为这些卑微者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

是为立命。

一

一叶而知秋。

一口海水包孕着大海的滋味。

小人物身边淌走的每一秒钟，都是历史。本书的历史从旧社会写起。“在旧社会，人们身上的血只够跑百把米；在旧社会，女人身上长不出乳房。”所谓穷则思变，历史掀开新纪元：抗战爆发，少年投笔从戎。谈判破裂，内战爆发。地主下地，学生游行。瞎子卖艺，解放军进城。梦游者梦游。巡官挨枪子，地主被分家。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不爱组织爱女人，自投罗网当右派。小高炉，殡仪馆，饿死鬼，麻疯院。新疆出境好几万，人吃人的故事讲不完。红卫兵满山红遍，走资派满脸淌血。抄家，串联，武斗，游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校长投井，教授掏粪。广阔天地偷鸡摸狗，罗湖下水奋不顾身。《沙家浜》“斗智”，梁山上批林批孔。……这是一部“底层人物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只有纪传，没有大事编年。我想只要愿意，读者可以在自己脑海里整理出编年来。作者自称整理访谈时，那个时代的马车轰隆隆地从脑海中碾过，这也是我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历史事件多次出现，如 1958、1959、1960 那场被称为“大跃进灾难性后果”的“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不但集中出现于《食客迟福》、《遗体整容师张道陵》、《民间艺人任唤琴》、《老军人廖恩泽侄儿廖党》诸篇，在《风水先生黄天元》、《拆迁户罗月霞》、《多余的人高歌》、《梦游者之妻黎英》、《藏书家冉云飞》等篇也有它的阴影。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世界的主宰者是饥饿。古人说，“一身之遭逢，其小者也，盖亦视国家之运焉”。是的，你可以说无辜的小人物同祖国一起受难。可几十年过去了，国家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三千万生灵却一去不返。

这令人心里不好受。为什么回忆这些？列夫•托尔斯泰如是说：“如果我害过一场重病，治好了，根除了，我将永远会高兴地回忆

这件事。只有当我的病情依然如故或日渐沉重，当我想欺骗自己的时候，我才不去回忆。如果我们回忆旧的暴行，敢于正视它，我们今日的新的暴行也将暴露无余。”

今日？——跨世纪的门槛上，横卧着流浪儿、打工仔、乞丐王、吸毒者、人贩子、色情狂、碎尸犯、三陪小姐、民间神医、厕所门卫、算命先生、下岗职工、街头艺人、农民皇帝、居委会主任、黑社会杀手……。真正的三教九流，“沉默的多数”。用法国人福柯的说法，它们是“无名者的生活”。福柯把“无名”分为假的无名和严格意义上的无名，前者虽也卑贱，却借助了某异乎寻常的事而得名，“这件事要么圣洁辉煌，要么罪大恶极”。后者才是十恶不赦的无名，其中“既没有混入暧昧的丑闻，也没有产生私下的崇拜，没有掺杂任何荣耀”。应该说，本书主要聚焦后者。比如厕所门卫、遗体整容师、吹鼓手兼嚎丧者……那等人，说他们是边缘的边缘，底层的底层并不过分。当然，书中也写了些边缘文化人，如底层诗人、无名学者、不得志的作家、被敲诈的行为艺术家，他们像鲁迅笔下的孔已己，属于“穿长衫站着喝酒”的一类人。他们也是我们社会的弱势人群。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大家一齐见证生存空间的险恶。

在今天，我们的生存环境确实在急遽恶化。诸如失学、贪污、吸毒、车祸、红灯区、黑社会、性虐待、看病难、入室抢劫、环境污染、计划生育、见死不救、下岗工穷困、北方农村光棍、民间艺术濒临绝种……等等，好比雨后春笋，人们已见惯不惊。也有未必纳入公众视野的，譬如“邪教”问题、狱政问题、皇权回归问题、城市失忆问题、文学变质问题……等等。总之形形色色的人，带出光怪陆离的问题。“你的记忆力还是这么好？”书中的酒鬼告诫：“很危险，老兄，很危险。这是个不需要记忆的时代，一个人出车祸死了，脑浆涂满的轮胎依旧要在道路上滚动。”我也觉得危险，进而佩服作者的道德勇气。

当然我最关注的，是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态。世道太乱，书中人说，中国人开始病急乱投医了。彩票、酗酒、吸毒、色情、麻将、

算命。麻将成为 20 世纪末中国最大的时尚，其普及程度不亚于上个世纪的鸦片。“输赢倒是其次，我要的是那种近乎虚脱的感觉”，赌徒袒露。“我不醉又咋办？这世道太空虚了。”酒鬼为自己辩护。“虚无，虚无使人疯狂”，色情狂呻吟。“这世道，穷也累富也累，下岗工人、打工仔、叫花子累，老板、官僚、警察也累。”吸毒者偶尔清醒。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有头有脸的官方诗人，为 5 万元钱不惜把自己的一生卖断，什么情书、照片、日记、剪报、纸条，甚至作为定情信物的女人内衣……全部拱手转让。人们摇曳在怎样一个无根底的空间啊。我们是否有命可救？我们去找瞎子，算命先生说:“难道这世界真是由瞎子指路么？”我们去世界屋脊，西藏的朝圣者说话不客气：“你们痛苦，因为你们的心在地狱里。”

作者是否刻意写史？如果是，这种写法能否让历史学家满意？我不敢肯定。不过心里还是有所触动。为小人物立传，主观上写人，客观上写史。“以人带史”并不新鲜，自司马迁《史记》以来汗牛充栋。不过太史公作传的多是大人物，即使小人物也有其精神上的“大”（如侠客悲歌慷慨、伯、叔不食周粟）。本书写严格意义上的小人物，他们不光身份低微，兼且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他们何时有权述说历史？他们的述说有什么价值？作者未予正面回答，只说“我觉得从一个影子杀手或一个碎尸犯的口中得到的叙述，也比大批当红作家的小说、散文精彩数倍”。这当然类似挑衅。挑衅表明作者美学上的自信，他说透过时间去看那段历史，许多东西还是有趣。

这是一种“历史之美”吗？那么美从何来？因时间的距离。有别的因素吗？访谈者跟人议论：从某种程度说，80 年代以前中国没有个人史，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社会背景的产物。所以，要尽量绕开时尚话题。又说自己不是新闻记者，对境界啦、白领啦、好人好事啦、一夜成名啦不感兴趣，因为，“所有的成功者或超凡脱俗者全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连说话的语气都差不多。”这足以见出他趣味的独特、眼光的独到。独特的趣味必然对历史有独到的发现。比如你看，梦游者关东成为“右派”，竟是有感于组织上对自己照顾，要报恩、要替领导分忧解难；再看，团委书记反右中的“失

足”，竟最早起因于听到一首钢琴曲后的反应：“……你觉得那样深情，像落在深渊里的叹息，我愣住了。这一愣，后半生的命运就全改变了。”不知别人怎么看，我认为这种细节更近历史。有史实，也有史情、史意、史魂。历史本是偶然、感性、甚至荒诞的，哪有那么多理性成分、逻辑推理？更何况作者选择了失败者。套用那句有名的话，成功者都是相似的，失败者各有各的不同。选择了“不同”，就选择了更高的审美价值。古人说了：“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

尽管如此，主要不是美学问题，甚至也未必是历史问题。如果单对历史感兴趣，你可以选择看其他著作，《二十五史》、《乌托邦祭》和大量“解秘”书籍。如果单是为了写史，本书也可以用别的写法。主要是当代问题，是良心问题、道德问题，是我们生活的真正处境问题。这些问题血肉模糊，掐一把就痛，我们如何能够背过眼去？你看这样的细节描写：“……妈约，我心疼的！刚刚把车的本钱挣回来！我死死地抱住车把子不放，泪水和汗水，在脸上都分不清了，最后，车还是被缴了。……我只有往回走，走了好几个钟头，还没拢家，心里空捞捞，差点就弄疯毬了。”（《打工仔赵二》）类似“疯毬了”的情景，我亲眼见过。本书第 543 页上方那张照片，画家曾循拍摄的时候我在场。那是某年的冬天，一个蹬三轮的老人车被没收，想不通就跳了府南河。尸体出水时，两岸观者如堵。再如《偷越国境者黎忆丰》中的描写：“……那种刺激，那才叫人生哪！我曾被一条长绳子拴在手扶拖拉机的后面，被拖着在密林里跑，衣裤烂得像刷把。那时，我羡慕电影里绑在木桩上出卖的黑奴，市场里的买主都有权出价，有权带我漂洋过海，到天南海北去服苦役。嘿，奴隶的生活！今儿东明儿西的浪漫生活！……这世上最难追求的就是自由。你饿死没人管，可是你要挪地方，变一种活法，就有人管你了。”

连电影里的黑奴都羡慕，我们活在怎样的世上？写到这儿，我想起了去年，因漂洋过海而闷死在闷罐车中的中国偷渡者。58 名偷渡者活活闷死，欧盟峰会立即中断，发表联合声明，称这是“人

类的悲剧”;《世界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多佛惨剧是全球共同的耻辱”。当然这里“人类”、“全球”不包括我们。我们这边有人在报上写文章，说死者往国外跑，是“要钱不要命”，差一点没说他们活该。唉，这世上没有小人物的位置。你活得低贱，草木尚且有荣辱；你死得耻辱，九泉之下有余辜。我们活在怎样的世上！

二

这是一部失败的故事汇编。

失败是人类恒久的故事，更是小人物专有的别名。造化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在底层，更身不由己。高尔泰先生曾深刻地指出，“无力感”是东方社会显著的意志特征，也是东方人普遍持久的心理体验。无力，是由他们命运被控制、不能自主决定的。底层小人物可谓失败者中的失败者。他们活得力不从心，死后更被历史灭口。本书做的，是类似“挽回活口”、“抢救史料”的工作，即小人物见证大历史。虽然所见证的，顶多冰山露出的一角，甚至一角也不算。

应该指出，说小人物见证大历史，不等于他们的个人经历加起来构成“宏观叙事”。从严格意义上讲，小人物没有历史、只有宿命，只不过是宏观叙事的看客，或者刑场陪斩的陪客。国民党老军人廖恩泽说：“……历史是大人物们创造的，面对着无法支配自我命运的小人物，只是一种宿命。”我想，他道出了实情。在动荡不已的时代，许多风云一时的人物尚且有力不从心之感，不要说底层小人物了。失败是他们的别名，无力是他们的本质，朝不保夕是他们的现状，没有历史是他们最大的历史。我想，这样说虽然残酷，却接近真实。如果不这样写，那就不真实了，更谈不上深刻。“生活累啊，难啊，绷起一根筋做人，哪天筋绷断了，就完毬了。”这位小人物表述的，不是专属于哪一个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感受、普遍的现实。

作为失败的缩影与象征，我想指出，本书一组以监狱生活为背景的访谈，具有更高的认识价值和欣赏价值。它们是：《胡风牢友张广天》、《死刑犯牟大路》、《影子杀手赵苗苗》、《逃犯崔志雄》、

《碎尸犯卢人标》、《狱霸田洪》、《色情狂梁寒》、《农民皇帝曾应龙》。

监狱的事情，对一般人来讲显得神秘。在中国，自古以来似乎是一种禁忌、禁区。不用说，从来很少有作家真实、全面地写它，但我们读者呢？难道我们不在自觉不自觉回避？人们不想影响自己的生活，不愿破坏自己生活的安宁。还用说别的吗？在这样的土地上，当然不能指望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产生。“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这是真理，却不是现实。真理何时成为现实呢？1990 年，本书作者他因失声嚎叫而沦落地狱，有缘跟那些杀人、强奸、贩毒、碎尸犯为伍。如果说他曾有短暂的委屈，那很快就想通了。事实上从那时起，他一直在为本书做准备。“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我们读到本书，不知该感谢作者，还是感谢老天的相助？

西方人但丁说，地狱的入口处，写着：“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在监狱的入口处呢？东方人牟大路说：“入了班房，就四海之类皆王八”。

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世界。据狱霸田洪介绍，自从盘古王开天地，神农尝五谷，牢里的规矩就有了。变了泥鳅你就只有在泥巴里翻，不朝上就朝下，不朝左就朝右，总之你要尽量做最大最粗的那根泥鳅，搅得其它泥鳅瞎撵着你转。在外人上人，在内鳅上鳅，社会层面不同嘛。“大社会，小监狱，当然是外头有啥，里头就有啥。”

这个社会信奉“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天”是写在菜单上的话，菜单是牢里的传家宝。“菜”的花样很多，谦虚地说，地下党未必能一一消化。总之，在“上菜”的幽默下，牢房变成了厨房，厨房变成了屠宰场。幽默冷到我们的脊梁，也冷到了历史的脚板心。愿人们放下书后，忘掉这一切。但有句话不容易忘、也不该忘的，就是那位狱霸自辩的话：“……这不是我发明的，菜单上的东西，还不是烂贼东一份西一份凑出来的，咋能算在我一个身上？我也是受害者。”他肯定在开脱自己。都不当刽子手，怎么会有死刑？没有他那样的“厨子”，“菜单”又有什么作用？但我担心，即使他被枪毙了，“菜单”却可能不会消失，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我的担心并不多余。事实上饥饿并没有完全消失，在这个星球上有些地区，它甚至在扮演主要的角色。它有时被作为需要创造出来。古拉格群岛史的编纂者索尔仁尼琴就发现，到今天，人们还在用饥饿改造那些不慎落水的同胞。这些同胞们做梦也只梦见面包。在这种情势下，谁还会反对“民以食为天”呢？当然不会。索氏进一步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捷克政治家、作家哈维尔有类似的观察，他说：“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据此而言，饥饿或者说败坏，不只属于“被统治者”，更属于人性全体，它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

败坏使人堕入地狱。而在地狱的底部，也还是有对于人性的追寻，哪怕它以扭曲的形式出现。这一点，没有经验的人可能难以想通。比如你会问，“都落到这步田地，为啥还要相互折磨？”死刑犯牟大路解释，不管落到哪步田地，人和人都互相折磨。社会上天地宽，所以摩擦要少些，在牢里，一间房关十几个人，严打的时候，经常涨到二十来个，人和人挤得这么亲密无间，不寻开心咋办？何况坐牢太单调，除了干活，连唱歌也只能在喉管里打转，谁不需要“开心果”呢？需要，所以囚犯的赛吃居然构成“舍房里最快活的一天”。它是生活中的味精和盐，使坐牢充满令人回味的温情。没有牢狱生活经验的人，谁能理解？所以光怜悯不顶用，还需要设身处地的理解。而如果你理解，你就会明白：人性的败坏与自由的丧失密不可分。

人性与自由不可分，人性与社会也不可分。“监狱”不过是一个观察窗和方便的法门。监狱小社会，社会大监狱。狱内有狱，狱外有狱。有形的狱，心造的狱。虽然它们外延不同，内涵却高度一致。比如那位“最小的短命鬼”，不过 18 岁。“你猜他干了啥？他赶公共汽车，不肯给孕妇让座，人家就骂了声‘傻农民’。他气不过，竟拔出水果刀，把孕妇的肚子捅漏了。”天底下有这样的事？我们的人性多么脆弱。用精神分析眼光看，“我们都存在某种心理

缺陷，当某种外力恰好击中了这种缺陷，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瞬间丧失理智，沦为疯子”（见《碎尸犯卢人标》）。还应考虑社会环境。良好的环境有助于人们抑制缺陷，而另一种环境则相反。就像上述故事中，那位怀孕的妇女至死都不明白，“傻农民”一语对那位愣头青，竟然是骆驼背上最后的一根草？！

“想不到”，于是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应该想到的。如果说以前想不起来，则本书是一种提醒。我们需要这种提醒，我们应该为社会、人性的健康建立档案。人性的档案上写着：“这世上哪有高低贵贱？皇亲国戚就不拉屎？”“谁晓得国难当头的堂堂大丈夫，在私生活中是不是变态狂？”“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论，成王败寇都相差那么一点点。”在社会的卷宗里，记载着关于黑暗和死亡的故事：“我的罪名是热爱黑暗”；“我们在脑髓里讨论死亡/在永恒的日光灯下/讨论死亡/跪着去还是站着去/子弹是穿过后心还是后脑/刽子手的枪法如何/浆汁溅往哪个方向/灵魂出窍的刹那/是否还来得及回眸一笑/当屁股朝天栽入土坑时/腿会不会像旗杆高高地竖起”（参见《死刑犯牟大路》）这些残酷的文字，难道不使你感到眼前发黑，感到无法可想、无路可走？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谁信他的话。不是绝望，谁说出那样的话来？这世间谁不畏死？谁真正不畏？谁愿意主动赴死？谁感到生不如死？谁觉得生也难死也难？……我不能再说下去。

作者 80 年代是诗人，我没怎么读过他的诗。也一直没想到找来读读。可本书第 27 页那幅母亲的照片，以及旁边配的诗，我一见就喜欢：

只有从嘴里吐出来的人才不动感情

而我们是从阴道里生出来的

知道疼

再坏的家伙也有母亲。

为什么喜欢？我也怕疼，我也有母亲，我更怕死。依我看，“怕”其实包含人性。有人性才产生共鸣，有人性才产生悲悯，有悲悯才

感到疼痛。有人性、有同情、有疼痛才反躬自问，拥抱众生。并注视自己的脚下，观看生命的源头。常言道，急来抱佛脚。黑暗使我们心向光明，厄运使我们亲近上帝。尼采说，“一切祝福者都向下看”。一位俄罗斯军官说:“索尔仁尼琴回来了,古拉格就不会回来。”《中国底层访谈录》则明确表示：“某种档案应该通过公布而永远保存，为了历史与社会的健康。”

地狱是小人物的快乐老家，其中不乏零落的英雄。

胡风就是这样一个英雄。——然而是怎样的“英雄”啊？本书开宗明义一篇访谈《胡风牢友张广天》，通过一位普通囚犯张广天之口“反英雄”。这里没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胡风狱中的表现可能让有的读者失望。“自从有了张光人，我们组的学习记录精彩多了”,这是大批评家的用武之地。可他的无能却很突出:“有一回，他把大家的饭给弄到了”，为此他挨了一顿烂打。“如果没有政府管着，我们早把张光人分吃了。”还有什么？他偷吃……浆糊！

我们问：这样写“中国数一数二的知识分子”是否合适？把他放在一本以底层人物为对象的书中，是否合适？莫非“钦犯”胡风也是底层人物？莫非真的“凤凰落架不如鸡”？我们会摆出许多道道：人当然有价值上的高低，不管他在什么地方。就算是四海之内皆王八，“王八”总要分个大小、等级吧？政治王八跟刑事王八总不该是一回事。同时，良心未完全泯灭的坏人，和一念之差而做了坏事的好人总该不同。我们继续引经据典：完美的苍蝇总归是苍蝇，有缺点的英雄毕竟是英雄。即使虎落平阳被犬欺，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等等。我们的发问义正词严，没人能够驳倒。好了，这种人可以合上此书，继续睡他的觉去。

以本书观点，犯人张光人（胡风原名）跟张广天们，不同却也没甚本质上的不同。自其异者言之，天下哪有两片相同树叶？自其同者言之，入了班房，四海之内谁不王八？人为地区分大王八、小王八有什么意义？不看僧面看佛面，黄泉路上无老小。“管他外面有多大的本事，一进这里，都是罪犯。监狱到处都写着：你是谁？你到了什么地方？你来干什么？”来到这里，你就既来则安，提什

么当年勇？英雄失路跟贩夫走卒失手杀人，有什么区别？都是身不由己、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你是“好人做坏事”，谁又像中世纪魔鬼罪不容赦？而且说白说黑，“外面”的乌鸦有什么不同？……庄子说“齐物”；佛祖说，众生皆苦；西方人说，自由不可分割。一切分割的思想，排他的原则，都导致了冷酷、无情、自私、暴虐，成为我们精神上的芥藓，并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政治与道德痛苦的根源。我们刚愎自用、礼令智昏了。这样的人群、民族要想得救，比骆驼通过针眼还困难。他们有成王败寇，却不配有自由。

古人讲究“礼辨异、乐和同”。《中国底层访谈录》对“辨异”不感兴趣。作者其实缺少做那种讲究的勇气及资本。十年前，他感叹“阳痿的警察，用他的电鸡巴，把我这个知识分子的后路给抄了”。十年后，他更不敢轻易戴“知识分子”的桂冠。也罢，“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作者失去的只是一张皮，得到的却是千载难磨的心，可能更接近“知识分子”本义。在人生阴霾密布的黑森林里，他忍看活人变新鬼，推敲着“新鬼和旧鬼，政治鬼和刑事鬼，是不是同一个鬼？”再由鬼及人，想到哪怕流氓、恶棍、下三烂、滚刀肉，再坏的家伙也有母亲。失去儿子的母亲，晚年多么凄凉。想到这里，他就没来由感到心酸：“我的心经常发软，控制不住怜悯坏蛋的冲动”，他甚至喊出“发明监狱的人类，我多么爱你们”那样的傻话。傻近乎仁。仁者爱人。《被抢劫者余桂生》篇引述了《禅说》一则故事：一个贼去偷庙里的和尚，那和尚躺着一动不动。眼看着贼到处乱翻，一无所获，只好把和尚晾在窗外的唯一的袈裟扯下了。和尚不忍，忙起身喊站住，准备将裤衩脱下一并送他，不料贼听见喊声就不见踪影。于是和尚只好抱着光膀子，站在庙外的空荡荡中叹息：“可怜的贼！我为什么不能把天上的月亮送给你？”

这，就是悲悯情怀，就是人道主义。高尔泰先生有句名言：“人道主义是没有被意识到的美学。而美学，从本质上来说，则应当是被意识到的人道主义。”确实如此。人道主义、或人道情怀，是现代美学的发源地，也是它最坚实的根基。如果没有主义、也没有情怀，美感与文学能够像猴子一样从石头缝迸出来？果真那样，我们也就见不到这一部“恶则恶矣、趣实趣也”的作品。不错，这是一

部人类惨败的记录。然而，悲情与怜悯在，它们是本书真正的主角，它们隐身于叙事背后、现身于字里行间，而成为天寒地冻中、温暖我们心灵的不绝如缕的光辉。

呜呼，魂兮归来！

三

招魂即立心。

本书为底层人物立心。

古人抗议："昊天不惠"，"昊天不平"。没有这一抗议和激愤，不会有本访谈录产生。可只有这个，访谈录也还是产生不了。因为一味怨天而不反躬自问，谈不上什么道德感和人的尊严。人应该有道德感有尊严。即便在世界东方，即便大山般的"超稳定结构"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天生一人，必有一人之用"。历史虽然不听小人物的发言，而无力者确有他的力量。他的力量不容易为别人认可，其实也不容易为自己发现。完全是"平时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还要提到，对历史中的许多人来讲，命运就是承受；对另外一些人来讲，性格就是命运，造次必如是，颠沛必如是，江山易改而秉性难移。人性的败坏是事实，事实还有其他方面。

索尔仁尼琴提出："把在严寒的气候中会变凉的房子一座座地历数一遍有什么意思，指出那些在严寒的气候里仍能保暖的房子不更使人惊奇吗？"

应该看到"使人惊奇"的故事。

——先说胡风，即使身陷牢狱，他的心志却未被完全摧毁。记得文革初起，当局要他揭发周扬、立功赎罪。他拒绝了，说：不管报上说得怎么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问题是怎样就说怎么样。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像这样来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我们不用"英雄"这个词称他，也要公正地说，在没有英雄的年代，胡风的表现不愧为真正的人。《胡风难友张广天》也承认："他是文豪，特别犟，哪怕憋疯也不拐弯；我呢，小爬虫一个，莫说狗洞，耗子

洞也钻。”“这里私下说，政府也理解不了。犹如飞碟，见得再多，也不晓得那是啥东西。”

还有老右派冯中慈。1957 年，如果他稍微少一点人性，顺着别人搭好的梯子往上爬，他本来可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的。但他有个弱点，就是太有良心、太有人性了。这害了他。他看不惯“有那么多党员的组织，欺负一个弱女子”，他这一生就此注定。奇怪的是，他不为当初的选择后悔。“我不愿意做畜生！不，那个龌龊的年代，做畜生也比做人强！”这是一个怎样的傻瓜呀？！

类似的傻瓜还有：梦游者关东“一直生活在天堂里”；黄浦军人廖恩泽表示，“自己的历史自己负责”，他为自己没有扛着假名过一生而庆幸；偷越国境者黎忆丰为了追求自由“九死其犹未悔”；甚至“天才的贼”崔志雄也有人的骨气，他说“人的尊严比本性更重要”。我固执地认为，我们的社会中，许多道貌岸然的人灵魂很肮脏，比不上一个“天才的贼”。他们的故事看得人心热。他们那样的人，在全中国究竟有多少？

最震撼我的，是下面一个故事：

……这人是 57 年反右时判的刑，反革命罪，无期徒刑。由于坐牢坐成老资格，再加上懂点医，就成了队里的卫生员。你可能不清楚，牢里的油荤很缺乏，更别说大鱼大肉了。按规定，一个星期吃两回肉，有时是辣椒回锅肉，一人一瓢，当然辣椒占大半；有时是莲花白炒肉，肉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小砣。我讲的这人姓杨，当时 65 岁。每次吃肉时，他都厚着老脸，让犯人组长给他多分肥一点的，而后，他端起肉钵回到卫生室，关上门，点燃酒精灯，把挑选出的肥肉片或肥肉砣放在灯火上炼油。他只能炼出很少的一点油，他把这辛辛苦苦得来的猪油一滴滴刮进一个瓶子，才端起碗，把剩下的油渣和菜吃掉，还舔碗。……他把这三个月才能攒满的一小瓶化猪油（大约三两多吧）捎给他母亲，几十年都这样。当时他妈快满 90 岁了，只有他这么一个儿子。

（《流浪汉王响》，本书 327 页）

这个故事，我曾听作者当面讲起。难以形容我听后的震撼。当

时，我半晌说不出话来。久违了，让人心热的传奇。好比大旱时的云霓，沙漠中的甘泉，因为久违，我们怀疑它的存在，怀疑它的真实性，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夏虫不可语冰，我们不可语天堂。久而久之，我们见日月而起吠；久而久之，我们见死水而倾心。善恶成为上帝的成见，撒旦进入我们的内心。我们倾心后现代，不惜伤天害理；我们膜拜洋祖宗，费耶阿本德说，“怎么都行”。却忘了独自一人时扪心自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有朝一日，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种水样的透明沁入我的内心：“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是两千多年前孔子说过的话。

刹那间，我觉得、我懂了孔子。

话到这里，感到语言难以为继。

但还是要讲。

究竟，我们的头顶有没有命运？我们的命究竟由天定、还是由自己决定？小人物该怎样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历史和作用？……这些，都是大得无边的问题，世界任何地方都有数不清的议论，这种议论还将继续下去。“你我都是小人物呀”，小人物许长久说，“所以尽量别诉苦”。是这样吗？不，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讲“安身立命”。按下安身不表，命如何立？从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孟子“立命”，庄子“安命”，到后世王充、张载、二程、王夫之等，人言言殊、各有侧重。似乎也有一种“家族相似”的色彩，即不废命、提倡知命而更重人事。什么造命在天、立命在人啦；什么我命由我不在天啦；什么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福祸无门、惟人自召啦；什么太上立命、其次制命、再下听命啦……，中国思想中的几大家有相近、相似的观点。似乎儒家表现得更积极，“立命”主要是他们的说法。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颐说，“在天为性，在人为命，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又说“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数，直到不得已处，然

后归之于命可也”……他的话明白得不能再明白。

西方人说法跟我们不同，他们喜欢用“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唯名”与“唯实”之类语言。不过，似乎问题的性质差不多，结论也有跟我们相仿的。我不打算引经据典论证，只谈一种感觉，那就是他们对人的兴趣比我们更浓。而且似乎越到现在，对人的自由问题越强调，对其他问题采取“存而不论”立场。限于篇幅，我不全面、系统地举哲学家的的例子，还是举文史方面现成的两例：《古拉格群岛》和哈维尔。在逮捕成风的岁月，索尔仁尼琴意外地发现：即使劳改营，也不能败坏一个具有坚强内核的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毕竟是可以做到的”。哈维尔则标举“无权者的权力”，向我们昭示在真实中生活的可能。他说：政治没有理由只是专家的事，随便一个人，例如一个电子工程师，只要心术正，懂得赞美能使他超越和无所惧怕的那种力量，一样可以影响他的民族的历史；另一方面，“没有只为理想而死的英雄，是万人坑的第一步”。

《中国底层访谈录》也在关注这些问题。一方面，向我们揭示了底层民众真实的生活处境；另一方面，指出自我负责的必要性、可能性。作者不是专家学者，他说不出“重建本体论”之类话，何况他在骨子里是怀疑论者。怀疑论者不相信任何乌托邦，老实坦白着“我不明白信命好还是不信命好”。不过他显然厌恶虚无主义，不过他显然想坚持一些东西，可能是做人的一些基本东西罢。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我们的祖先讲“敬天知命”、“不诚无物”，它们维系了我们这个没有坚实信仰的民族几千年。但现在不作数了，物质主义宣传摧毁了它。我们几十年鼓吹的物质主义，不是最原始、最粗鄙的虚无主义是什么？经过它的摧枯拉朽，现在哪里寻心灵的甘泉、信仰的绿洲？人们活得惶惶不可终日像丧家之狗，不是很自然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连人贩子都知道“报应？哄鬼，封建主义那一套。”夜总会老板嘲笑老师“讲迷信”：“人死如灯灭，哪有灵？老师这是迷信嘛。”我们活在什么样的文明社会、礼仪之邦？人们除了“奇里斯玛”和严刑峻法，“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什么样子？川西神医张松说：“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其实是病得最深的，因为不信神不信鬼，人就什么都不怕，

世上没有个怕字，天下就要大乱了”。另一位风水先生对“人”心有余悸：“人太毒了，比蛇和蝎子毒得多”。

“信命好，”书中的算命先生对人们说，“上畏天命，下守法律”不是封建迷信，是积德行善走正道，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个人。但“信命”不等于一事不做、听天由命。那就同样违背了圣人的教导。按孔圣人的教导，命是不可违也不可算的。应该不怨天、不尤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当一个人对他的命运感到无能为力时，庇护他的星座也将从他的面孔消失。这位孔夫子第74代玄孙说：“一个人在被无形的凶象所笼罩之际，他往往是茫然无知的，哪怕神明在上，他也不会抬起头来仰望”，比如，被坑杀的四十万赵军中，无一人有好相。他们都在无法摆脱的国家命运笼罩下，像羊群一般被驱赶到前线当炮灰。所谓天无好天，地无好地，作为“三才”中的人哪来好相？发国难财的都是大奸大恶，谁让这些大奸大恶者能够得逞？再说南京大屠杀的前几日就已有城破迹象，危城之中的百姓如同放在砧板上待宰的鱼，哪来什么好相？总之，“覆巢之下，所有的相是同一个相，工农兵学商同命”。（《算命先生孔庆天》）由此引出“天谴”思想。当然，你可以说，“天谴”是反科学是唯心主义，我不愿回答。只想说，人不该放弃自己。古人说，天作孽，犹可逭，自作孽，不可活。什么是“天谴”，自作孽就是。哈维尔表达过近似的意思：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这个自我定向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剥夺他们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质。这并不是因为对历史的不可思议的误解，也不是历史误入歧途。这更不是冥冥中某种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来让人类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这种情形之所以得发生，就是因为显然在现代人类之中有某种与之相呼应的东西，人们思考和容纳这个东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图都被瓦解。人类被迫在谎言中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具有这样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现制度不仅使人类异化，异化了的人类同时支持这个制度，以此为他们必然的纲领，成为他们蜕变人性的现象，为人类的自身失败的记录。”

总之，异化就是自弃。自弃就是作孽。作孽必遭天谴。从这里能够引出什么结论？就是：人应自负其责，自立其命；人之立命，象树立根。人应忠实于自己，尊重自己的历史，不管别人如何看。“独立生活最重要的中心是高度的内在的解放。这样独立生活犹如一叶小舟，在任人宰割的生活的汪洋中，虽然在风浪中颠簸飘摇，但总能不断浮起，在为在真实生活看得见的使者，为受压制的生活目标仗义执言。”内心解放的人不媚俗，不随波逐流、逢场作戏。对于他来说，不论环境如何恶劣，自由都是可期的。孔子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佛经说，“性名自有，不待因缘。若待因缘，则是作法，不名为性”。萨特说，在纳粹的牢狱中，人也可以实现内心自由。而如果做不到这个，则世界再大、宇宙无垠，对他而言也不过是硕大无垠的囚房。

这个道理难懂吗？我们举两个现成的例子：“我经常想起两年前的那次逃跑，太神了。然而，人是逃不过命的，我就这命，身体自由了，心也不自由。”这是“天才的贼”、逃犯崔志雄的自白。他逃出了有形的监狱，却对活下去感到了厌倦。流浪汉王响与之不同：他说自己经常兜圈子，一天要走好几十圈。“自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东西，你尽管走，一直走下去，就感觉不到是在监狱里。”禅说：“脚在哪里，我就在哪里。”王响就是如此。他身在大墙之内，心却跨越了巴士底狱。这是一种精神的越狱，他成功了。

常言道，心想事成。只要你的心在想，怎么都不算失败。

——有多少这样想的人呢，中国？

四

这样想的人似乎不多，向上的、使人惊奇的故事总体嫌少。在我们的生活中，多而又多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打着底层民众幌子的“小人物”如过江之鲫、招摇过市，另外一些人打着“为人民”的旗号为自己牟利。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是孔子说的“乡愿，德之贼也”。与此同时，就有人明火执仗地攻击英雄，对向上的英雄做毁尸灭迹的处理。这年头，与忧患做斗争，与命运做斗争的真正英

雄越来越少，他们一意孤行、应者寥寥；精神的芥藓却在大面积疯长，腐败却如青苔、渐行渐远还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演员高洋》里，写一位无耻诗人传授心得：“……诚实和正直和真理和原则当不了饭吃；但只要肯公开这样叫板，就能当饭吃，当酒喝，当宝贝卖。”在精神领域跟物质领域一样，也有假冒的真理和主义。在真实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时，抽象的人民是我们的图腾。现在草民们的生死没人管，“为穷人的主义”却依旧大行其道。即以人民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对每一具体的公民实施绑架。就像前苏联夏达尔的雕塑作品《圆石块——无产阶级的武器》，据介绍，乃是“通过普通人物的塑造来反映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表面的普通人物其实一点都不普通，“普通人物”像骊山的刑徒被武装起来，向真实的个人发起一次次冲锋。这是一种借鸡生蛋、铸犁为剑的把戏。

我们看一眼文学领域。前些年，有几个作家在那里“抵抗投降”，除了众多的反对者以外，也确实博得一些由衷的喝彩。包括我自己，一段时间都被他们瞒过了眼。但是经过长期的“听其言而观其行”，越来越感到怀疑，越来越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就说作家张承志吧，他标榜以“骑手歌唱母亲”的姿态歌唱人民，断定“山野之民最高洁、王侯上流最卑污”。1993 年，我曾跟几个朋友通过对话向他表示致意。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标榜“为人民”的他何曾作过一、两件具体的事情，比如为哪一个草民的利益抗争，并因这种抗争同“王侯上流”、同食利者发生冲突？我想不起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类似的现象还有。前不久，小剧场里瓦格拉在声嘶力竭，荧屏上保尔?柯察金为“壮丽的事业”燃烧生命。我进不起小剧场，只是根据生活的经验和阅读，知道“壮丽的事业”与“古拉格群岛”脱不开干系。算了，导演。算了，编剧。托克维尔说：“当世界由个别有钱和有权的人把持时，这些人喜欢大肆谈有关人的责任的崇高理想。他们津津乐道忘我的品质如何值得赞美，为善又如何不该希望报答，就该像神的为善一样。”

朱学勤有篇访谈，叫《文人发嗲》，揭发“为穷人的主义”的

伪善。他说，有史以来富人剥夺穷人，“为穷人的主义”也在剥夺穷人，而且是更彻底、更无情的剥夺，篡改他们的记忆，剥夺他们的历史。这种“为穷人”的呼声，本书那些底层生命能够听见吗？即便听见，他们能感受到有人在“为”自己吗？大概不会。底层人物不是那么没头脑的。举一个例：《川西神医张松》中，农民医生张松质问世人：“你以为农民医生就没脑子？就可以任人宰割和愚弄？告诉你，柯云路和司马南的书和报道我都细细读过。”他的看法是，柯云路同胡万林其实没多大关系。柯云路同司马南是对头，柯云路吹一个，司马南打一个。柯云路遇上胡万林，想借他证明自己的一贯思路，却惹翻了司马南。后者是记者，大报小报当然向着他，“司马南一腔正气，普天下记者也就个个都成了为民做主的侠客。”所谓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现在江湖骗子戳穿了，乡下人到哪里看病？那些为民做主的记者管不管这些？司马南他们难道不该把打笔墨官司挣的钱捐出来，建一所乡村医院？——“您说胡万林是个江湖骗子，现在他跑了，您就在他的根据地建一座司马南医院，并把支持你的医学专家、科学家都请进去，胡万林的信徒一定会转而鼓吹您，拥护您。”

农民医生的话当然偏激，但是否也有几分道理？

如果“为人民的主义”高调登场，则文艺领域的“小人物”则姿态很低。其实它也是一种“为人民”，如果说前者是假冒的为人民，则后者是伪劣的为人民。假冒与伪劣其实不可分，高调与低调经常两极相通。而从效果来看，后者有更大的欺骗性：它宣称自己写真实的凡人。写小人物是文学史上的宝贵传统。好多世纪了，据福柯介绍，西方 17 世纪开始写小人物。一般人提起“小人物”一词，总要联想到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等名字，他们以写“被欺凌和被践踏的小人物”著称。我们中国呢，如果说对《诗经》是否在写“小人物”有争议，至少汉乐府已在明确写他们。“惟歌生民病，报得天子知”，被认为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也同样？五四以来作家，有多少没在底层社会呆过？“新时期文学”不也是？像《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不也看得过去吗？这一传统不该中断，是吗？作为读者和观众，我们对“小

人物”有先天的好感，对他们今日的粉墨登场应鼓掌才是。

然而不然，揉揉眼睛，你看见了怎样的“小人物”？与其说那就是“小人物”，不如说是仿冒小人物商标的大人先生或侏儒。变了，全变了，变样了、变味了。中央电视台有个《生活空间》，据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谁在讲述呢？摄像机和扛摄像机的人，以及电视台的编导加上把关的领导。在影视界，从冯小刚到张艺谋都纷纷青睐小人物，大家说“小人物换来了高票房”。同时，一部部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渲染普通人的情感故事、欲望追求，看得大家如痴如醉、欲罢不能。我还见到一则报道，说中国 21 世纪传记文学的走向是“淡化历史责任转向普通人”。原因呢？写伟人、领袖总要有所忌讳，写普通群众作家就更放得开。原来如此。我本以为传记作家爱他们，原来作家们有一本难念的经。写普通人真的没有忌讳？写他们真能够逃避“生命之重”？我怎么都觉得像缘木求鱼。当然，作家用心我领会了：是想“淡化历史责任”。淡化谁的责任？作家自己，还是那些普通人？语焉不详，那就兼而有之。

我们看到了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表演。欢跳在小说、传记、影视的舞台的“小人物”，一半是活人一半是木偶，一半是真实一半是戏说。表面上是真实的普通人，是柴米油盐交响曲，是流水账烦恼人生“众生皆苦”，其实表达的不过作家自己。经常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写小人物的作家同样如此。他们有的热衷于表现“痞子”，有的热衷于表现“小日子”。是怎样的小人物、小日子呢？早已有批评者先我提出了自己的怀疑，指出：“所谓小人物的银幕行迹和穿街走巷贩盗版贺岁片的一样可疑”。我同意这一判断。你看，《没事偷着乐》的主人公“贫嘴张大民”在亡父遗照前怎么说的：“我们活得不比别人好，也不见得比别人差，大伙正咬着牙往前奔呢”。几乎是基层干部向下岗职工做安抚工作。我们还欣慰地看到，张大民主任喜气洋洋乔迁新居。

这就是银幕上的小人物，他们经过了包装和美容，就像那些严重亏损、濒临“摘牌”的公司，经过了资产重组成了金凤凰。这些

资产重组的小人物，怎么看都不是真正的小人物。电影是电影，生活是生活。如果你了解真实的底层，如果你有平民立场具同情心，如果你不愿自欺欺人，你其实知道真实的底层是怎样的，知道底层人物过着怎样的日子。在我们身边，小人物的处境要不老样子，要不更加恶劣。局部的改善掩盖不住总体的恶劣。尤其最近十年，真实的生活并没多大的改善，一变再变的是包装、是标语。为什么不正视这些呢？你的眼睛没瞎你的耳朵没聋，为什么做鸵鸟自欺欺人？天道福善祸淫，说假话是失德早晚要丧身的。

我反感"小人物"借壳上市，反感对他们进行包装和强奸。人们容易看透强奸，却不大容易识破包装。其实包装最常见最普遍最有麻痹性。包装就是人们的意识形态。我们以前用"共产主义"大同理想包装苦难，现在用"向前看"的小康理想掩盖卑微。小康与大同固然有别，作为包装它们有共同的效果，它们都是障眼术、麻醉药、以及"能指"的游戏。障眼术使人们看不清真正的现实，对真实的苦难能够甘之如饴。用哈维尔的话说，它是人人能用的藉口，有时冠冕堂皇地为上上下下正名和开脱，有时用来掩饰自己的失落和卑琐——"帮助他遮掩一下他惟命是从的可鄙境界，同样掩盖了权势的可鄙基础。它用某种高等的东西掩盖基本的现实。"包装也是"偷换"。索尔仁尼琴揭露说："就像魔术师几乎不用方巾遮盖就立即把母鸡换成橙子一样，他们偷换了整个群岛，使群众看到的已不是小说里描写的古拉格群岛，而是比它要美好得多的完全另外一个群岛了。"如果说，画布上有时也有几笔真实，那不过是作者"为了取得读者信任"。

为了换取读者信任，包装者也要说一些常见事实。你不能说它完全在编造、在宣传。但是可否说，这其实是一种更高明、更巧妙的宣传？"高明的宣传与阿谀有时也不是撒谎，而是投合权势的需要，只说出一种事实，不说另一种事实。"而"另一种事实"却更说明问题。比如，如果你稍微留心，或者时常翻翻《南方周末》等报纸，就能得出结论：在我们的生活中，像"贫嘴张大民"那样"活得不比别人好、也不见得比别人差"的人，已经够幸运、够吉星高照的了。君不见许多活得比他好的人，命运却比他惨得无比。顺手

举几例：活活闷死在车中的 58 名偷渡客，烟台海难中死去的 280 多个同胞，还有洛阳火灾中烧死的那么多人，他们是不是普通人物、或者“小人物”？法院干部到水库游泳，将农民的孩子扔到水中活活淹死，被淹死的小孩是不是“小人物”？因口角纠纷引来杀身之祸的研究生，他是不是“小人物”？山西岚县的青年被关押他的警察割了舌头，被害青年是不是“小人物”？……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我只是一株野草，低贱而卑微的草，任人弋割践踏的野草。谁都可以任何神圣的名义把我粉碎了做饲料。没有谁关心我是活生生的人，我可以在微凉的清晨感觉风的存在，我因为爱而受的伤害，我被刀割破皮肤的时候会有鲜血流出来，我是在这世界上真实存在的，而且独一无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能够替代。”——这是洛阳大火后，我从网上见到的一段话。作者为无名氏。我要提的问题是，类似的事情在我们周围屡见不鲜，有多少在我们的电影、电视、小说、传记中得到了表现？《生活空间》几时邀请他们中的幸存者面对镜头讲述？那些以“底层”、“民间”、“小人物”相标榜的先锋作家、先锋导演，几时把这些“被侮辱被践踏”的人纳入视野？偌大个国家，有多少“专家、学者”、多少“院士、博导”为他们拍案而起、仗义执言？没有，要不就是他低声咕哝，我们听不到。但是，就有人代表他们说，没什么大不了，大伙正在往前奔呢，等等。

人道洛阳花似锦，依我看来不是春。

作假的“小人物”可以退场了。中国底层民众过得够难了，如果你不能帮他们，至少不要打他们的主意，把他们当作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刽子手要杀人，你阻止不了，那也不要当帮凶，并替刽子手粉饰现场、铺撒花瓣，行不行？你在往活人的灵魂上投毒。世界上没什么事比这可怕。孔子明白这一点，他强烈地抨击“乡愿”，因其“同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实皆说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之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他之所以厌恶乡愿，胜过公开的恶人，因为“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也”。对今天的“穷人秀”、“小人物秀”，难道不该

说同样的话？

你见过吗，什么是“毁尸灭迹”？

向上的人被毁尸灭迹。

只讲一件事。几年前，有家不错的杂志登了一篇陈寅恪、王小波比较谈的文章，标题是《从圣贤到凡人：中国人文精神的蜕变》。文章认为，陈代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王则代表“凡人时代的人文精神”。同样是人文精神，陈属于过去、王属于现在。按一般的理解，“属于过去”就是不合时宜，即使不明说“反动”，总该自己退出历史。果然，作者讨伐起那场人文精神讨论，说凡人时代知识分子虽也批判，但不“犯禁”更也不怂恿别人“犯禁”，等等。读了这篇文章，我想自己领会了作者的“微言大义”，期期然不敢赞同，就写了一篇短文，指出王、陈两种人文精神的区分，不过是重复历史上“宋、明儒”和“清儒”人格类型的区别。并针对该文的“醉翁之意”提出批评：

……章太炎指出：“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刘师培提出：“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于应世，清儒之学，用于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谲。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陈寅恪，我们知道他是“新宋学”的倡导者；至于“王小波”，我不好说；如就人们为他描绘的肖像而言，我以为属于典型的“清儒”。我们处于后清学时代。处于这一时代的我们，看惯了陈寅恪、胡风、顾准那帮“想凭奇骨在这一代求得贯彻”的“糊涂人”，怎样“不自量力”而“飞蛾扑火”。相形之下，“王小波”则显得平易可亲。作为良民，我不能不认可“王小波”的机智，却不想过于赞美。基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一点粗浅认识，我更不敢轻易抹煞别人“犯禁”的成就。我们不能饮水忘源。何况，据说现在是多元社会。既是多元，则“凡人”、“英雄”，也如萝卜、青菜。你当农夫好了，犯不着诋毁海员；更不用说对“海员”做毁尸灭迹的处理！

（《不读王小波》）

现在我持同样的看法。多元时代，萝卜青菜。你当你的农夫，犯不着诋毁海员，更不必犬吠他们，否认他们的存在。这样提要求，

跟“应然”无关，仅仅是“退而求其次”。可事实上，在自由准则消失的地方，连退而求其次都办不到。普遍的情形是，人们以“凡人”自命，却避而不谈凡人也是“人”，凡人也有理由活得像个人。事实上，不少人把太监当作人的标准，把侏儒的高度当作人的平均值。如果你不同意他们，他们就说你想充好汉、当英雄。他们开始疏远你，像疏远麻风病人。结局呢？上帝死了，谁杀的？尼采。人死了，谁杀的？凡人。“凡人”长什么样？太监的嘴脸、侏儒的身材。我们忘了凡人究竟是人，“英雄”只不过是不想当奴隶的人。英雄上天堂，人也就下地狱。要说区别，区别只在这里。难怪哈威尔说，“没有只为理想而死的英雄，是万人坑的第一步”。索尔仁尼琴痛切陈辞：“我们丧失了自由的标尺。我们无法衡量，哪里是它的起点，哪里是天的终点。我们是亚细亚人，谁只要不手懒，谁就可以从我们这里取得，取得，取得这些无穷无尽的关于不泄露的甘结。我们已经搞不清楚：我们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

在普遍的溃败中，我格外看重向上的故事。看重它们就是看重人性，看重人的尊严，看重生活本身，看重获取自由的信心。在今天，重建信心非常困难，但是应该。人应该对自己怀有信心，而不该被轻易摧毁。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时不在枷锁中。我说，人生而枷锁，却无时不在向往自由。自由的、富于道德意味的故事数量不多，却每每产生一以抵十、甚至一以抵百的效果。这也难怪。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所谓“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唱天下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尼采说，“谁喜爱深渊，必须有翅膀。”哈维尔则提醒：

“我们只有先沉到井底，才有指望看到星星。”

五

天上一个星。

地上一个人。

本书写灿若星河的中国底层民众。真实的他们什么样？当然不着统一的制服。由于长期以来，政治、道德、历史、文学、审美的

目光疏远了他们，一般的读者要不歪曲地理解他们，要不顶多有模糊的印象。那情形，就像一个老外和中国人初次相交，浅尝辄止谈不上理解。而如果你生活在他们当中，自然会发现他们一个跟一个不同，他们有美学价值也有道德感。就像在本书中，即使作者戴有“绿色眼镜”，还是似真地描摹出了他们。哪个人没有“绿色眼镜”呢？

可能因为视界比较融合，我觉得真实的中国底层生活大体如本书所写。而且，真实的底层人物同前述影视“小人物”大不相同。即使你用同一个名称，叫他们底层人物、民间人物、或小人物，事实上内涵很不同。依我看，其间的不同远大于表面的相同。比如：真实的底层人物是无权势者，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而影视小人物虽也置身于“基层”，他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这个社会的主人，有时他们自己如是宣称。真实的底层民众活得无望，活得喘不过气来，有时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而影视小人物虽也“活得累”，气还出得赢，他们的视野里没有死亡线，他们是革命乐观主义。在他们看来，困难是暂时的，历史是前进的。而真实的底层生命则根本不信“进步”这类鬼话。他们搞不懂深沉的理论，只相信自己的感觉。感觉告诉他们，古代的帝王没有见过冰箱、彩电，自己见到了，不等于自己的生活赛过帝王。那不相干。真实的底层小人物凭本能生活，凭“好死不如赖活”的生命天性支撑自己；而影视小人物却为自己的生命赋予诸多说道，什么“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啊、什么“青春无悔”啊之类的。那是读了几本小册子的导演让他们说的，我们怎么都感觉到一种酸腐和狐假虎威的味儿。真实的底层草民活得艰辛，却不想辜负老天、辜负生养自己的父母，只要有机会就要“黄连树下弹琴”，强做的欢颜让人觉着酸心；而影视小人物却没有什么“生命之重”，他们顶多“没事偷着乐”，本能地实行精神胜利、自欺欺人。在我看来，“强颜为欢”与“精神胜利”之间，存在着一条明显的鸿沟。

另一方面，真实的底层生命赴告无门，他们经常用“草民”来称呼自己，这并不等于他们自轻自贱。事实正相反，就像本书写的那些偷渡国境者、遗体整容师、三陪小姐一样，虽然身处下贱却不

失人的尊严，有着真正的梦和纯情。那些影视中主角哪能谈得上这些？影视小人物骨子里就是“雇佣军”，没有自我没有精神没有灵魂，在他们的“大脑”中安装着冰箱、彩电、房子、职称……等遥控程序，和“奔小康”、“希望工程”、“再苦不能苦孩子”之类冠冕堂皇的假话、空话、大话。那是官员、报纸和导演命令他们说的。他们被洗脑了，不，他们其实压根儿就没脑，有的只是机械装置和中央处理器。所以，我在这里说“他们”是不确切的，严格来说是“它们”。真实的他们被挤在边缘、蠕动在底层，而底层之下还有底层，边缘之外还有边缘。尽管如此，他们并不安命、不认命，在不断努力、不断追求、不断抗争，有时成为主流社会的“麻烦制造者”；而影视的“它们”基本是皇军的良民，是安分守己的齿轮和螺丝钉。总之是天生的贱种、万劫不复的奴才：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一颗红心交给你，叫奴家干啥就干啥。……

底层的他们和荧幕的它们：对上述区分可以继续说明下去。但也可以打住了，相信上面的话已足以给读者一个明晰的印象。最后只想交代一点：如果你愿意继续分析，则底层的真相还包括：底层之下有底层，边缘之外有边缘，就像陨星在太空中坠落，不可能有止境；而抢夺了无数眼球的影视“它们”，却从来不告诉人们这个。“它们”存在的本意和合法性，似乎正是为了抹杀“另类”事实。我想打个比方来说明：影视的“它们”自居于中国底层的“主流社会”，它起初说自己代表底层社会，后来宣布自己就是底层，“主流”之外别无“社会”；而“真实的他们”呢，好比那些不争气的厕所门卫、遗体整容师、吹鼓手兼嚎丧者一样，他们即使在底层社会也不足以前排就座。有时在底层也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别人代表他们，在麦克风前发言、诉苦、表功、博得掌声，后来索性抹杀了他们。而他们自始至终对此一无所知，也不觉得那麦克风跟自己有何关系。他们并非出于谦虚，而是发不出声音。这就是“沉默的多数”、“无声的中国”。对于他们的命运，启蒙主义者有所察觉，并做过初步的描述。比如胡风，他在为《生死场》写的后记中如是写：“……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存，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底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

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

我想说，对于冒名顶替的“它们”来说，《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出现肯定不是吉兆。好比说，野心家杀死了国王，篡位娶妻、快活如蚁。多少年以后，真正的国王却浮出海面，他高唱着“打不死的李尔王，我还活在人间”。本书有类似的性质。它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坛，拿过麦克风，面对台下观众，面对千秋万世，一字一顿：

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人。我看到，我作证。

我为之欢欣。

本来，我们该把目光对准他们。理由不言而喻。中国自古以来的社稷观念，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我们现代追求的国家观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是说，属于全体中国人，而不是少数中国人。那为什么不写他们？我说的是真实地写他们，如其所是地书写他们；既不歪曲他们的面貌更不抹杀他们的存在。可为什么没写呢？

我知道，存在大于本质，生命大于注解。但也知道，没有合法性就难以生存，没有效果就很难有历史。前后两句话是否矛盾呢？不矛盾。未能进入历史，首要原因是未能进入现实。没有今天奢谈什么明天？没有自尊哪能让人尊重？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尚鬼的墨子说：“执有命者不仁”。不仁的人背叛了自己，跟历史又能建立什么关系？关键问题是存在合法性，天生一人必有他的权利。什么立德、立功、立言都以此为前提。换句话说，立命是一切的前提。哈维尔提出，有荣誉感的人想过一种历史生活。但所谓历史生活说到底只是当代生活。不能把握自己的权利，无权势者就永远进入不了历史。怎样把握自己的权利呢？对于“沉默的多数”来讲，意味着开口说话。如果不开口，活着就像死去，更何待死神来“灭口”。自己早把自己灭了。——当然，这里“开口说话”只是一个比方，并不是说，立命只等于开口、等于立言。不是那么回事。立命首先意味着立心，在此前提下才有立德、立功、立言等等。立命可以体现于传统的“三不朽”，也可以有更多延伸和表现，比如人们常说的“见证”。相对而言，对于普普通

通的“他们”，古代所谓“三不朽”确实显得迂不可及也高不可及，而今天的“见证”则容易实现得多。

见证是小人物的一种参与形式，也是底层生命自我实现、自我提升的一种途径。见证是一种“为己之学”，为己才能为人。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他处”，他就无从见证。所以，见证意味着为己，意味着真实的生活，意味着生活在真实中。“《易经》难道不是一部招魂术么？”书中的算命先生孔庆天讲，“乱世之中，好命相者首先应具有好的心相，远离时代凶气，超凡入圣以独善其身。”我不认为他的思想消极。能够作到这一点，其实已经不容易。但是，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清醒，即使你是不起眼的小人物，你也能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有血有肉地过好每一天，最后成为一个时代的积极证人。

不是所有的人能够有效作证，没有灵魂无法作证，没有言语、没有血肉作不了证。有灵魂、有言语、有血肉，这就是你，每一个人，包括本书的作者。“见证”一头拉着现实，一头伸向历史。在未来与现在的连接中，底层人物获得了满足和自尊。如果说，算命先生“下算苍生百姓”，则本书为“苍生百姓”立命。命不可算的，立命或者招魂却是办得到的。“亡魂的感召力虽然不如宗教，但它有抑恶扬善之功。”从这层意义上讲，立命云云，既是心性之学也是社会哲学，既是道德哲学也是历史哲学。当然，也不妨碍它成为一种叙事学，一种热的美学。我要说，作者通过这本书所做的事，你我用其他方式也能做。难道不是吗？法法是心，尘尘是道。

“脚下的石块沙沙作响，我们在向上……”

作者说，此书起于他学习吹箫的经历。他师父是个 83 岁的和尚，他很想知道他的一些故事，但除了吹箫一无所知。中国民间还有多少这样的人物？在书中，这个问题被一再提起。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医生，像扁鹊、华佗、张仲景哪一个是专家、教授？从古至今那么多好的音乐，有几只是在朝教授弄出来的？“我觉得在一次次空前的掘墓鞭尸的文化浩劫之后，好的东西都流落到民间，而历朝历代的暴君所干的，正是肃清民间邪说，以正朝纲。”“礼失而求之

野”，这一思想来自孔子。作者不以此为满足，进一步提出：从古至今，中国有极深厚极成熟的“底层思想”，如将这些东西编排成小说，绝不亚于高尔基《人间三部曲》、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等。本书可谓他从“精神江湖”上采到的鲜果。

我欣赏作者“求诸野”的努力，也非常看重寻找工作取得的成就。不过，对于中国底层思想“极深厚极成熟”的说法有所保留。我是这样考虑的：底层是相对上层的概念，底层思想本质上是一种与权力、与社会控制有关的思想，底层人物的确切含义是“无权势者”。这是我受福柯启发引出的结论。福柯这人喜欢从权力角度分析一切问题，有时我感到他有些故作艰深。但是他有一句话我不敢否认，亦即：“命运表现为与权力的关系，要么与权力并肩作战，要么对抗权力，这不正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吗？”（《无名者的生活》）是啊，真正的化外之地（如果存在）能有什么底层思想？在社会控制相对松懈的地区，我想底层思想也成熟不到哪里去。传统中国的情形可能正好如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非常古老的话了，但也应分朝代具体分析。根据梁漱溟的研究，中国自古以来由于政权不下县等原因，社会控制其实不是那么一律，有时甚至网开一面。古代士人讲究“有道则出、无道则隐”，有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本身就透露了个中消息。在传统中国，“隐逸”之类思想异常丰富，但我所理解的“底层思想”则未必算得上。

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今天的社会控制空前严密，完全到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地步。不要说找不到一块净土，想要沿袭“有道则出、无道则隐”的行为模式也很困难。甚至那种划分本身都类似胶柱鼓瑟。你想隐？能“隐”到哪里去呢？这同时意味着反弹。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说，“底层思想”主要是一种当代思想。由于社会控制的空前严酷，由于阶级、阶层意识的普及和差距的拉开，底层人物到今天才真正获得自我意识。底层思想和无权势者的自我确认到今天才浮出海面，获得更加自觉、更加实际的意义。还有，几十年来，一方面是控制的加密，另一方面是社会参与渠道的单一，使我们的社会渐渐“野有遗贤”，所谓“三尺之

外，必有圣贤”；像本书写的那些古琴大师、算命先生、监狱卫生员等，他们是底层意识的体现者，也是底层思想得以深厚、丰富、系统的因子。我们看重民间社会的意义在此，我们对目前中国“民间社会”的发育程度保持清醒，也在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精神江湖”同样。我不主张用它指代一些确定的人。在我看来，“精神江湖”固然有它的所指、有它的实体成分，本质上不是什么实体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功能化的词。它跟中国哲学中的“道”一样，用来指示一种确定的价值、标准、原则、精神。从而精神江湖、底层人物、无权势者这类词，也具有更多的功能而非实体的成分。它们代表安身立命，就像几千年来的“道”，成为古中国人立身处世、评估万事万物的标准：无论“有道则出”、“无道则隐”，抑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们一以“道”为自身进退取舍的标准。在大道沉没、西风东渐的今日，我们不能不考虑熔铸新的标准。

标准不是标签，精神江湖不是言诠，更不是制订好了让人遵循的戒条。而是一声呼喊、一种方向、一种导引，帮助人们认清自己真实的处境，促使人们重视自己的历史，确认自个的权益和使命，脚踏实地创造自己的明天。就是说，它具有社会动力学的意义，而不简单是人群分割、自我定位的用处。我们一再看到，就像“戏说”不是历史，却在不断杀死真正的历史；影视“小人物”不是真的小人物，却取代了真的小人物；甚至，“民间写作”不是真正的民间，却败坏了人们对于“民间”的感知。可能我担心得太多，我觉得“底层人物”一词也可能被人们当作标签。这是无可如何的事，但我还是有一种恐惧。怎么办呢？起用哈维尔“无权势者”一词吧，相对来说，它在而今眼目下不易过早滥用。

“无权势”是无权势者的自我意识及心理感受。谁有了这一意识和感受，他就接近了我们所说的底层。所以，我说的无权势者主要是心理、价值概念，而非物理、社会概念。不，不是说它没有社会学意义，而是说它的主要意义在精神方面。传统那种朝与野、官与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两分法不宜被简约为“权势者”和“无权势者”的对立。我们每一个人既是无权势者，也应该认识到

自己本有的权利。用哈维尔的话讲，每个人都参与了奴役和被奴役，不管大家参与的程度如何不同，生活与控制的冲突却在每个人身上发生。“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老实说，某种物理的处境与身份已不足以说明一个人。一个体制之内的人，一旦他疏离权力并开始从民众角度提问题，他就成为我们的“无权势者”；一个寄身海外的人，如果他享受着民主制度的好处，却心存汉阙而忧其君，他很可能是统治者的后备。

基于这一立场，我不大赞成“还原精神江湖”的说法。说“还原”，不如说“熔铸”、“唤醒”。精神江湖何处寻？固然在一些底层精英的身上，更在无权势者的意识中。底层意识在底层者的心底，好比荷塘月色在朱自清的心底。

由此形成本书的叙事个性。

首先是用了对话体，由底层人物自己说话，而不是由作家代他们立言。虽然在实际操作中，不能完全避免“拟言”的可能，但由于有了“我口说我心”的意识，使本书总体上不同于那些借鸡生蛋的叙事。其次，本书叙事角度也很耐人寻味，从中可以透视出作者的主体意识和价值标准。这里涉及的，不单是一个叙事学的问题，而是美学问题；也不单是美学问题，说到底是精神向度的问题。

从来作家跟他的对象有仰视、俯视、平视三种视角，分别体现出作家与对象所处的三种不同关系。在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学很多时候被规定只能写人民大众。也还是有一个“怎么写”的问题。提倡“群众崇拜”，势必采用“仰视”式叙述；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势必采用“俯视”式叙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有民粹主义立场的作家跟一个启蒙主义者表现完全不同。本书什么“主义”？“生活之友”主义。就是说，大体上是平视，局部有一点俯视和仰视。概括的讲，平视中略带俯视；细致地讲，七分平视、两分俯视、一分仰视。就是说，跟民粹主义、启蒙主义都不同，基本是特立独行。如果你一定要问他跟何者更近？回答是略微靠近“启蒙”，也

只是略微靠近。谁说平视就等于“零距离”呢？本书采用平视略带俯视的角度，取决于访谈者对于自己访谈对象的态度，即：因同情而写，在同情中批评，在批评时同情。套用鲁迅的话，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只不过同情、悲悯成分大于批评不满、和改善的期望。这也其来有自。在知识分子一步步边缘化的今天，“怒”显得不合时宜，但人活一口气。

作者也有他“一口气”，在我看来理所应当。比如，面对人贩子的巧舌如簧，你难免产生割他舌头的冲动。面对居委会主任那以自我为中心的霸道，你觉得好笑又好气忍不住讽刺几句。面对那个说起吃人肉津津有味的食客，你难道不会产生“用一根大头针把这厮的嘴缝起来”的念头？面对“披着艺术家羊皮的狼”、那个长于演戏的无耻诗人，你难道在赞叹之余不会产生上前揭发脸上脂粉的恶意？甚至，对自己的一些朋友，因其积习难改、或沾染上世故，你也忍不住要揶揄几句，开玩笑、揭隐私、甚至添油加醋布告天下，以图“断狗日的后路”，这不也很正常吗？古人说“畏友”、“诤友”就是如此。当然，好诗不过近人情，你要“下猛药”也要考虑人家能否接受。要不，总有一天我们要为作品喜、为作者忧。都是吃五谷、生百病的人，谁没有弱点、缺点甚至劣根性？你没有吗？你的屁股就很干净可以照镜子？那你先照照自己吧。水至清则无鱼；中国人讲究立身与作文分开；哲学家在标榜“极高明而道中庸”，你为什么不想他们学习？你未必想让朋友们远离你？……尽管如此，也不觉得“妖魔化”了哪个。

“文人火旺，鸡巴傲在头上”，厕所门卫周明贵如是说。但总地说来，访谈双方的关系平等而隐忍，他们相互平视对方。所谓乌龟看王八，大眼盯小眼。书中写了“落魄文人阳九根”，他是一位柏拉图式的男人。鉴于他近乎自虐的性压抑，作者不顾自己在读者心目中形象可能受损，而以狐朋狗友身份“挑唆”他去嫖妓。“老阳，你还是适合放下老师架子，找一个生活之友。”“生活之友”——这是作者对于自我身份的圈认。这一身份在本书中多有流露，比如，为实现采访而跟对象讨价还价、“花钱肉疼”。我们开眼界了。我同时注意到，底层群众接纳了他，把他当成跟自己一样的人：街

头瞎子答应为他引路，再邀一些瞎子一同搞个街头音乐会；吹鼓手兼嚎丧者对他说，“你的嗓音不错，很适合做我们这一行”；同性恋者倪冬雪向他示爱：“你做男人，我就做你的女人。”色情狂梁寒跟他惺惺相惜：“听口气，你也是个老淫棍。”嫖客老唐也把他当成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他不想澄清反而暗喜：“这再好不过，访问顺利进行”。

有趣的是，“狗咬狗”的事时有发生。比如别人不买他的账，访谈过程中唇枪舌剑，就像街头吵架的小品。色情狂讽刺他说话没档次。他回敬，你的档次有多高？食客迟福教训他：你这辈子，吃没吃好，穿也没穿好，活得没意思。他反驳：我他妈自由。对方一句话噎得他喘不过气：“没见你飞上天啊。”三陪林小姐对他又爱到恨：你绕着弯子让我讲，你伤害了我，你和其他客人有啥两样？落魄文人老阳大骂：“你太烂了，啥子都嬉皮士，其实你的骨血里又不是这种人。”他无力地辩白：这跟是什么人没关。……类似的细节很有喜剧色彩。打是亲，骂是爱，可见访谈对象跟他“彼此彼此”。

也有仰视。主要体现在《蜀派古琴大师王峪》和《老右派冯中慈》等篇。对前者，他似乎有点必恭必敬：“晚辈真是高山仰止啊”。他祝愿大师保重、长寿，把扎根于心的好东西尽可能保存得完整。在后者面前，他也执晚辈之礼：“冯老伯，谢谢你的故事，谢谢你对我们这代人的情感教育。”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他的仰视有节制，仰望里面有平视。就是说，表达了崇敬也体现了理解，“迷信”与他无缘。他的仰视，不是自信心丧失而是增强。就是说，仰视之处曲折流露出“主观战斗精神”。这不容易。现在，除了那么几个声嘶力竭的“战士”外，多数中国作家精神状态不很好，普遍现象是“排死节、否正直、轻仁义、贱守节”。当然，那种现象不是凭空产生的。古人王夫之说，“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外国人约翰?密尔说，专制使人变成犬儒。尽管如此，“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的古训不可忘记。马克思讲，“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他的话也值得人们三思。

人活一口气，作家尤其应有自己的主体意识。作家也有一个自

我启蒙、自我立命的问题。我们的现实异常沉重，有时又感到“难以承受之轻”。乌托邦破灭了，我们看清了现实。看清了现实，人们觉得理想、梦想、意义那些东西不仅奢侈，更多时候还是陷阱。如果你不愿与狼共舞，最好远避它们。哈维尔对此不以为然。他说出，荒谬感可以同意义感连在一起。“在我的理解中，荒谬感决不是对生命的意义失去信念的表现，恰恰相反，只有那些渴求意义的人，那些把意义当作自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体验到缺乏意义是痛苦的，更准确地说，只有他们才能领悟到这一点，在令人痛苦的意义缺失状态，它反而比在其理所当然、无可置疑存在时更真切地呈现出来，就像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身体好一样。”本书作者是同样的情况。他是一个怀疑论者，怀疑一切乌托邦，自称连梦都不做。另一方面，他对天命有敬畏心理，该他承担的他不敢逃避。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摒弃乌托邦，同时拒绝一个后现代上帝。

六

说一点“写史”话题，可能不是多余。

前面提到，本书“以人带史”。不管主观上如何，客观上一个作家闯入历史学家的领地。这能否让人家满意呢？我说没把握。你殖民了人家还要人家谢你，天底下有那那样吃力又讨好的事？信手举数例，足以交代作家“非法越境”的不受欢迎：“文之与史，皎然异辙”（刘知几）；“文人不可与言史事”（章学诚）；“断不可以文学手段去做历史工作”（何炳松）；“历史而以文学出之，令人迷乱，不知所谓，不可不谓为幼稚之史学也”（朱希祖）；“天下人有文学趣味者多，懂科学方法者少，所以虽然满口客观，其实读起记事一类书来，欢迎主观的叙述。喜读稗史而厌正史；喜前四史而厌宋以后史。殊不知四史等的叙述，全以主观为主，时代愈后，则客观的成分愈多。”（吕思勉）

但我想，应允许这东西存在。我无意于鼓励众人“不务正业”，而想说史无定法、亦无定式。你说它“幼稚之史学”也罢，“有史

心而缺史德”也罢，这种亦文亦史的东西自有其价值，那就是“写心”价值。历史要写事、也要写心。龚自珍很明白地讲：“后世读书者，毋向兰台寻。兰台能书汉朝事，不能尽书汉朝千百心。”我还注意到，也有历史学家认可它的价值。历史实际分为“艺术化之史”与科学化之史两类，它们的目标都是“显真”，但“前者之所显者为真相，后者之所显者为真理。”历史本身具有宗庙之美、百宫之富，故讲求历史之美学价值，并非对史学的背叛（张荫麟）。更有人热衷搞“诗史互证”，比如用唐诗证唐史，这样做的人大家都知道，是大名鼎鼎的陈寅恪先生。当然有人对此不以为然，终究是你们历史学内部的事情。“诗文皆史”的说法本身，不正是史家对“诗史”的一种有条件认可吗？

不仅如此。我还想提醒人们，文史不分可是我们文化的一大传统。文史不分不等于文史合一。有人批评文史不分，指陈《战国策》为“小说家言”，《史记》为“太史公文集”；甚至整个前四史，都被指责为主观的历史。可人们就喜欢它们；而且批评的人也不能断然下结论，说前四史跟“历史演义”相同。“《史记》、《汉书》亦仅文词之工，记事亦有不事处。”这是康熙皇帝的批评。但“亦有不事处”一语本身表明，它们总体讲是信史。人们承认《三国志》有“小说笔法”，不过谁会把它与《三国演义》混淆呢？大概不会有人那么聪明。当然你说，客观点不是更好吗？向后世那些正史学习不是更好吗？史书应该是主观成分越少、客观成分越多越好。我不能反驳你的意见。我深知后世历史失实的问题不少，自有当行之人考证、讨论。作为非当行出身的我，坚持五十步有理由笑百步。只不过对“客观主义”史观本身，我不敢轻易点头。蒙谁呢？

限于本文性质，我不能扯得太远，不想太多引证解释学之类，说历史与写史像两条平行伸展的钢轨、永远并不拢。写史当然要力求客观，可任何写史都不能没有标准。如没有价值标准，就算你本人“没有主义”，你的著作没有“义法”，可你连材料的罗列也完不成（天地间何物非“史料”？）。所以问题不是该不该有标准，而是选择怎么样的标准？孔子编《春秋》，以此“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司马迁写《史记》，在大军出发、旌旗飘飘的阵候，穿插

进“螳螂挡车”的伯夷、叔齐，若不是史家别有怀抱，两个“小丑”以何德何能进入一部中国大历史？！欧阳修写《新五代史》，用了那么多“呜呼”，不是价值观作祟又是什么？我知道，今天的史学工作者可能对他们看不上眼。今天的人偏爱客观、偏爱宏观叙事，但什么时候说自己要拒绝“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能说，热爱“大历史”的人，世界观跟我们不同。可怜的小人物，你不仅没有历史价值，你的历史存在本身都没有真实性！在许多人心目中，历史正是这样的。易言之，表面讨论的是“客观”、“真实”，其实还是“成王败寇”的价值标准。在此等标准的裁制下，我们的史学不能不瘫痪。人们说，历史被修改得太多，已没有一个权威的版本。如此写史，连基本的“修辞立其诚”都办不到，有什么真理性、客观性可言？由它宣讲“真实”，岂不笑掉人的大牙？

打开天窗说亮话：客观云云，只是一种逻辑要求，只是一种理想境界。否认它、不向着它，历史则不成为历史。但任何人类的写史活动都不能完全让它满意。史不是天地之心，而是为天地立心。人世间没有一部人写的历史不带“心”的印记。如果有，那只能是神的所为。我们不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说自己还原了天地之心。完全还原根本做不到，我们只能真诚书写。我们明知不能还原，还要哼哧哼哧写，就像人带着镣铐跳舞，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人世间许多事都无可奈何。历史活动中的人“知其不可为而为”，历史写作中人同样“知其不可为而为”。这不是要人放弃“朝向真实”，而是说，非此不足以达到真实，哪怕只是有限的真实。古人说，“不诚无物”。我们所能要求于史家的，就是真诚。人通过真诚达到真实，而不是与真诚无关的什么真实。人的品质的高低由此见出，史家、史学品质的高低亦由此见出。

此外，有更好的方法吗？我想不出。

我说本书写史，有两层含义：一是“以人带史”，小人物见证大历史，前面说多了。这里要指出，它不是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作为看客的小人物，能够见证什么历史？顶多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一部没有历史的历史，好比一出发不出声音的话剧。“今天回首解

放以来的种种运动，我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拉线木偶，没有家庭，没有私生活，因为家庭和私生活都是时代文本复制下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吗？世界上哪个民族的历史是无形的大复印机弄出来的？我这样想着，感到心里有泪，却淌不出来。”这是《边缘学者洪声》里的议论。真正的“历史”当然不该如此。真正的历史是走路，而不是收藏留下的足迹；真正的历史是“独自行走”，而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真正的历史是和声，而不是什么大合唱；真正的历史是使人活，而不是使人死。真历史就是立史。

本书为无权势者立史。一方面，为无权势者立传，为真实的中国底层“写心”，为“普普通通的依万”、银河沙数般的“柳如是”立传；另一方面，自觉地“为往圣继绝学”，使我们民族中断已久的精神血脉再相连。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可否说，这是一部特殊的《春秋》？

写史，本质上是抗拒虚无。真正的写史，促使人对自己恢复信心，同时导引出今后的路来。顾名思义，写史就是“写”历史。那何为历史？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及其活动轨迹。在时间的洪流中，活动使人成为人，书写使历史成为历史。所以重要的是“活动”、是“书写”，而不是超出人的“活动”、“书写”之外的什么东西。超出人的活动之外的一切，包括所谓“历史规律”在内，只不过是虚无。对于真诚的、勇于负责任的史家来说，“历史规律”之类没有好处，反而是瘫痪自己生命的东西。真正的史家重视人，尤其一个一个个人。只有个人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重视个人“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大观点，也可说是中国一番绝大的历史哲学，而且亦是中国传统学问中一绝大精神”。据历史学家钱穆介绍，至少从《春秋》起，个人就在我们的史书中占了上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着眼的是事情背后的人。中国史书重视列传体，常记载一些没有事功的人，比如伯夷、叔齐，他俩居然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还有颜渊，也没有丰功伟绩。但颜渊这一人在历史上有他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人就特别看重颜渊。宋明时代人讲理学，也特别看重颜渊。怎能说他不是一历史人物？既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所以司马迁以人物来做历史中心，创

为列传体，那是中国史学上一极大创见。“中国历史之伟大正在此，”钱穆先生说：“纪传体的伟大，也伟大在这里。”

我感觉，《中国底层访谈录》继承了中国古人的传统。“所谓古者何？古之书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明?宋濂）比如，你不觉得有其中《史记》的影子？同为纪传体，同为没有事功的底层小人物。甚至，曾感动过太史公的一些人和事，在这里也顽强地露出他们的身影：像周文王，伯夷、叔齐，孔子，庄子，老子，师旷，荆轲，聂政，高渐离，项羽，阮籍，嵇康……等，本书屡次提到他们。这不是偶然的，作者有他的深思熟虑。我甚至觉得，上述人其实正是作者的精神教父。亏了上述过时的英雄或小丑，“世代相传的汉人血脉腰斩，被接上；再次被腰斩，再次被接上。”今天做同样的工作是否徒劳？作者说不。——在《遗体整容师张道陵》里，他劝老人不必为美的毁灭而伤感：“历史上有许多无法追寻的东西，但你认定他们肯定存在过。就如霸王别姬的瞬间，你只记住了霸王穷途而歌，虞姬起舞自刎的场景，你把这种千古绝响孤悬起来，不断地赋予它新的想象、新的意义。”

当然，除了上述古人，作者的精神教父还有。比如，前苏联伟大作家索尔仁尼琴、当代捷克政治家、作家哈威尔。从前者身上，他吸收了为历史做见证的意识，对“古拉格群岛史编纂学”有所领会。他说，刽子手制造血腥的现实，诗人制造血腥的文字；“是的，许多人都死了，我还活着，并且还将继续活下去，活到底。为了给儿孙们留下一份真实的个人见证。”从后者身上，他最大的感触是小人物该重视自己，重视自己的历史。常言道，“贵人多忘事”。我们既然不是贵人，当然要记住自己的历史。无权势者应该发现自己的权利，脚踏实地刷新自己的历史记录。天助自助者。有志者事竟成。这也是主对我们的恩宠。《圣经》说：公义使邦国高举。这里的“公义”就包括，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让无能者显出大能，以卑微者成就大事，等等。

写史，首先意味着写当代史。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我们非常热衷。却很少

有人从另一个角度、非接受美学地提出：当代也该进入历史。我的见闻当然有限。据我观察，除极少数人外，大多数浑浑噩噩活在当代的人（包括“历史学工作者”），不思考自己对于当代史有什么责任。人们只在过活，而无暇对“过活”做人文反思；人们生活在“当代”，却把“当代史”的书写重担推给后人。有人会振振有辞，说中国传统是“隔代修史”，否则难以客观公正。我说你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稍微留心一下，就会注意到我们古代，其实一直有著当代史的传统。钱穆先生提出：《春秋》是孔子时代的现代史，《西周书》是周公那时的现代史，“我们此刻，主要也该是讲我们的现代史”；“今天我们都不再写历史了，明天的人考些什么呢？岂不连考都没有了？我们的历史岂不要从此中断？”这是史学的衰落。但，哪里仅是史学的悲哀？！

史学问题不是史学家的问题，它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系。

当代无史，根本原因是当代无人。人的存在更多体现为生物性、动物性而非精神性、社会性。这是人性的死亡，人性的死亡不能不造成历史的中断：历史意识的中断，历史写作的中断。让我们重温一下福柯的论断：“命运表现为与权力的关系，要么与权力并肩作战，要么对抗权力，这正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谁能否认这一点？谁能说回避现实，与回避写当代史不是一个意思？对历史的冷漠，当然源自对现实的冷漠。人们不能面对现实，对自身感到无能为力，如何对历史产生真正兴趣？深入分析其精神，则：一个人把持不住今天，他就不再试图把持。一旦把持的能力瘫痪，他发现明天也不属于自己。对不属于自己的一切，人们怎能产生真正的兴趣？有心无力——无力无史——无史无心——无心更无力……这一过程相互发明、相互推动，恶性循环、没有止境。虚空的坠落永远没止境。人死了，谁杀的？虚无。历史死了，谁杀的？“历史规律”。虚无杀死了生命，“历史规律”杀死了历史。虚无扎根于我们“万物之灵”的内心，这是“当代无史”的深层原因。

不能不指出，虚无的病毒也污染着我们民族一些精英人物的内心。恕我不恭，想举高行健先生为例：高先生去年刚荣获诺贝尔文

学奖，他在题为《文学存在的理由》的获奖演说中称："人类的历史如果只由那不可知的规律左右，盲目的潮流来来去去，而听不到个人有些异样的声音，不免令人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正是对历史的补充。历史那巨大的规律不由分说施加于人之时，人也得留下自己的声音。"看到这样的论述，我暗暗吃惊并略感伤心。他认可那"不由分说施加于人"的"历史规律"干啥？难道他不觉得，"历史规律"不过是"第二十二条军规"或"皇帝的新装"？我不承认有这样的东西，不承认形形色色决定论。根本不承认。规律是生命的敌人，它消灭、戕害了多少人啊。它似乎也在戕害着高行健的灵魂。我不反对他为文学辩护，但事情显然有其他方面。我明白了：一个认可规律的人怎么不可能安命？一个安命的作家如何见证、能见证到哪里？一个致力于见证的作家怎么会倡导"冷的文学"？一个对历史见证三心二意的作家，倡导一种新隐逸文学，不是很自然吗？

可能，有人不同意我的判断。他们会说，怎么会"当代无史"呢？不是事实嘛。我们有那么多历史考证，有多么多史学讨论，有那么多关于前天和昨天的书籍。谁说我们忘记历史？谁说人们对历史没有兴趣？历史不能忘记。忘记就是背叛。我们在抗拒遗忘，同时也在荆轲刺秦王。你难道没看见？我承认它们的意义，也认可他们的无奈，并且深知，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背对现实。确实，有人在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默默做着他们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著作不为一般人所知。我说"当代无史"的论断不包括他们。同时我还是感到，已有的工作似乎还是太少。相对于那么多的事情、相对于那么多的人（包括历史学家），现有的一切都少得不成比例。我们有那么多历史学从业人员，他们在忙些什么呢？忙于"抗拒遗忘"？抗拒遗忘能成为另一形式的遗忘。《床下作家汪建辉》中议论："你不认为这种'记忆'是另一种形式的健忘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人历史感过分沉重，就会不知不觉丧失对于现实、对于今天的感知。钱穆先生提醒：议论当代问题、尤其政治，其实是中国人的传统。

他们在干什么呢？在完成选题、晋升职称？我知道选题是怎么

回事。《中国底层访谈录》写了一位吹鼓手兼嚎丧者，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一片接一片，我也照吹天下太平调。孝子当多了，人就没啥心肝。这世道，为人就是要没心肝。”这是他的生活阅历。如果他吃历史学那碗饭，他兢兢业业完成的“选题”就是如此。这等选题摆在书店里货架上，除了另一些想应付考试或完成选题的人，谁会感兴趣、谁会关心？他们在干什么？现在“戏说”风行，人们“戏说”这、戏说那，戏说清代的皇帝也戏说饿死的外婆，越戏说越上瘾，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开始戏说奥斯威辛古拉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们什么都不相信、不认真，从一部历史里得出“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遮不住，依旧夕阳红”的结论。历史学家，你们为什么不制止？你们坚守自己的原则、尽到自己的责任了吗？未尽到责任，怎么说当代有史？不仅如此，所有历史都会被消解。玩世不恭必然玩史不恭，很自然的。

我的话似乎耸人听闻，也近乎杞人忧天。但愿是，我却不认为自己在“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历史跟每个人有关，跟自己有关，怎么是“多管闲事”？我还有个观点：有史不乱世，史与治相连。那位俄罗斯军官说得对：“索尔仁尼琴回来了，古拉格就不会回来。”中国传统思想也是同样。孔子作《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欧阳修著《新五代史》，“以治法而正乱君”，使大大小小“冯道”无所存身，而使我们民族重新迈入正道。类似的例子不少。史家不仅被动地记载历史，也在能动地影响着历史走向。50 年前，大军包围北平。自由主义史学家杨人缏劝告守城长官：“如果傅作义将军能为北平免于战火作贡献，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将来在书写历史时，一定要为傅将军大书一笔”。这位历史学家的自尊、自信、从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以，我对于中国史学传统素有敬畏，对今天的史家则有更深的期待。虽说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城也非一手一足所能建成，《中国底层访谈录》当然有它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我还是不敢贬低“当行”之人。孟子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为什么这样？因为“古史即诗”，反面说就是“史蕴史心”，算不上成熟的历史著作。那好，请你们拿出著作来，以成熟

的“春秋”之作促使“诗”安分守己，不是很顺乎情理吗？

历史学家，你在哪里？

七

回头说作者。

“老威”是化名，我还是用他的真名，喊他“老廖”。认识老廖是 1994 年，他刚刚流放中归来。他那时英雄失路，我红尘失语，朋友都很少，于是惺惺相惜，“叩寂寞以求音”，就像丰子恺那幅《冬夜工毕》的漫画。我们常在昏黄的灯下吃喝。《中国底层访谈录》这书也跟我有“缘分”，不仅因为许多有趣的故事听他当面说起，其中有些篇章还跟我有关。那次，在贵阳的阴霾中听人摆“灵哥、灵姐”的故事，我就在场。去西藏也是沾了老廖的光，坐的是“中国联航”免费飞机。《朝圣者旺吉》中提到此事，同时提到大昭寺深处那位抄经的老人。他的眼睛像孩子，也像太阳下的水，我们当时就深受感动。

书中的乡村教师说，胃口一致能成夫妻。可能朋友同理。但怎样才算“一致”呢？我们在一块主要是吃，可他的“吃道”比我精深多了，《食客迟福》一篇就是有力的证明材料。我甚至觉得，“吃”是他的世界观及本体论。有时边涮火锅我边纳闷：这家伙对吃的一往情深从何而来？后来知道，“三年自然灾害”中他差点饿死。再就是 1990 年他的“进宫”，那可是培养食欲的好地方。本书有句话：公子哥儿一跟斗栽成灾民，一天到晚就想吃。“穷人胃大”，老廖也时常把它挂在口上，嘲人更兼自嘲。真的，让人怜悯。

他因此算不上美食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类跟他无缘。一个饿汉，也不能指望他对中国的饮食文化有所贡献。确实，这家伙口味太粗了，能进口不能进口的都往口里放。我拿不稳的是，他的审美趣味变得粗俗是否与此有关？你看这本访谈录，说得好听一点，是大千世界、林林总总；说得不好呢，那是医院的痰盂、食堂的潲水桶、城市里的垃圾山。老廖喜欢庄子，经常拿《逍遥游》说事。庄子还有篇《德充符》，是古今畸人的大本营：“劈头出一个兀

者，又一个兀者，又一个兀者，又一个恶人，……令读者如登舞场，怪状错落，不知何故”。本书有同样的偏爱，全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举一例：这年头谁不青睐靓女？偏偏老廖变态，谁不好写偏写公认为“丑得稀奇”的茜茜。也有不同，庄子的畸人“德有所长而行有所忘”，可本书呢？有几个心灵美的，大多数不美。现代人的适应力、消化力比古人可强多了。我不知道是坏事还是好事。“方今之时，仅免刑焉”，能够活得安然无恙的，哪个不是狗崽子？

《流浪者王响》一篇，有作者精神自传成分。流浪者说，自己是钻垃圾桶的野狗，“肉体消失了，灵魂继续走”；又说自己是“没有教养的底层孩子”。我欣赏他的没有教养。百无一用是书生。而且，我从自己、从许多人身上发现，读书人的“儒雅”、“斯文”往往跟世故、自阉之类纠缠不清。大学问家钱钟书说，“认识字的人，未必不是文盲”，包括他自己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有一句话，我以为说得千真万确：“人性的堕落与他的文化或社会背景并无关系。一个人可以向活靶子射击却又欣赏一首诗的音韵、一幅画的构图。”……例子么，免了。

但老廖却不是没教养的人。“教养”比较笼统，那就说“学养”。《藏书家冉云飞》篇中，冉云飞当面吹捧老威：“……你目中无书，不也照样写大气磅礴、才华横溢的诗篇吗？”这话容易让人生厌，不过也不全是“猪八戒照镜子——自我作揖”。从本书，我惊奇地发现，老廖居然懂很多东西：命相学啊、风水术啊、艺术史啊、变态心理学啊、饮食文化啊、厕所文化啊、性文化啊，……远远超过了孔子提倡的“多识草木鱼虫之名”。不光是罗列学问，他更有自觉的问题意识——如《流浪儿》，提出“中国教育向何处去”这等大问题。依我看，许多读书专业户、“两脚书橱”正缺少问题意识。以前竟把他看扁了。

本书更有若干篇，立意跟“治学”直接有关：如《碎尸犯卢人标》（犯罪心理学）、《厕所门卫周明贵》（城市史），作者单刀直入表明，想要填补学术上的空白。学术界会买账吗？未必。但学院派本身不也问题多多？我就见识过若干少壮派“学者”，非汉非宋、

不古不今，门径未必摸到，自我感觉却好得不得了，没有“白首穷经”的真精神，却摆出一派“垂垂老儒”的姿态。我不明白他们良好的感觉哪里来？如果不是沐猴而冠，就只得归因于“路数”不同。还怎么想呢？“胸中成见尽消除，一气如云自卷舒。写出此身真阅历，强于饤饾古人书。”清人张问陶这首诗，诉说着老廖“入学”的门径。

显然，在这人心向吃的年代，老廖除了吃有着更广泛的爱好。他爱吹箫。“虽然年复一年，我被生计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吹箫是每日必做的功课。”在本书里，他劝好友忠忠戒赌，话头是：“世上好玩的事情多，何必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他好奇，喜欢在街头看叫花子打手虫。他有对于自由的深入爱好。他说为了写书，自己像条狗见缝就钻；同时干的营生跟叫花子差不多，都在“吃百家饭穿百家衣交百家朋友”。这还不算，根据本书坦白，有次，他跟一位三陪小姐在夜总会外面见面，“危险的浪漫”维持了一段时间（《三陪林小姐》）。这显然逾越了常人的“游戏规则”。不过也说明了，他跟访谈对象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人人都渴望一种平等而正常的交流，这容易吗？很容易，可几乎忘记了。久而久之，我们就失去了嘴巴，失去了说出内心想法的冲动。”

我想，问题出在这里。小人物的痛是真实的，没人理解、甚至没处诉说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确实跟我们放弃诉说、呐喊得不够有关。我们信奉内外有别：契柯夫的小人物向马倾诉，我们流泪；祥林嫂向人倾诉，我们耻笑。中国人真的不如一匹马吗？久而久之，连嘴巴都两极分化：权势者喋喋不休，我们噤若寒蝉。人们感到人微言轻，于是沉默。沉默得久了，人们渐渐失语。失语到最后，人们弄不清是否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利。哀莫大于心死。所谓“沉默的多数”、“无声的中国”，跟普遍的心死是同一个意思。

不能这样下去了。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们应该学会开口，应该鼓起勇气说话，努力说自己想说的话，而不是别人教会我们的台词。人的嘴巴不光是用来吃饭的。人的大

脑也不光是用来接收指令的。真正的说话是人际沟通，而不是关起门自言自语。索尔仁尼琴懂这个理，他提醒会说话的哑巴们：“必须把它说出来。说出来是为了求得改变！如果只是说说，不谈实质问题，不能使人有所作为，那么这种话有什么用？那不是无异于僻乡黑夜里远方的犬吠声吗？”

老廖生活在底层。他跟多数中国人一样，吃饭问题都未能得到解决。生活压力之于他，跟贫困农民、下岗职工一样具体。尽管这样，他不孜孜于追物逐利，为生存不择手段。而是志于道、据于德、游于艺，像蚂蚁一样勤奋劳动。他写煌煌巨著《活下去》，为当代史作见证；编《沉沦的圣殿》，寻访诗歌江湖的“根”；《中国底层访谈录》则通过平等交谈，唤醒小人物的记忆，开启小人物的嘴巴，使哑巴说话、铁树开花，让濒死的心灵重新苏醒。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我认为它近乎积德，善莫大焉。

天道酬勤，福善祸淫。老廖分明也在为自己立命。

“在当今文学界，‘呐喊’正遭受奚落；但是，对于那些被压在车轮子底下的活人来说，对于那些被禁锢在刚硬沉重的物结构中的桀骜不驯的灵魂来说，不管怎么样都不得不呐喊。这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一种情不自禁的绝叫，奚落不掉的。”高尔泰先生这段话，我以为很适于说明老廖。本书也就不是文学梦想驱使下的名山事业，而是五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血肉模糊的当今现实，是车轮下发出的绝叫，是一种天籁、一种自然、一种情不自禁的呐喊。也像飞船在太空播放的《欢乐颂》，奚落不掉的。不是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祝福他。“叫饥饿的得饱美食”，福音书如是说。

2001 年阳春三月，写于成都

（全书完）